

港香人湧式向成民人陳大
命奔於城劫劫投曾年境邊

圖十二第

日九初月四年亥壬曆農

第 000000 冊

陳秉安◎著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習仲勳

（增訂本）

大

陳秉安◎著

逃

港

(增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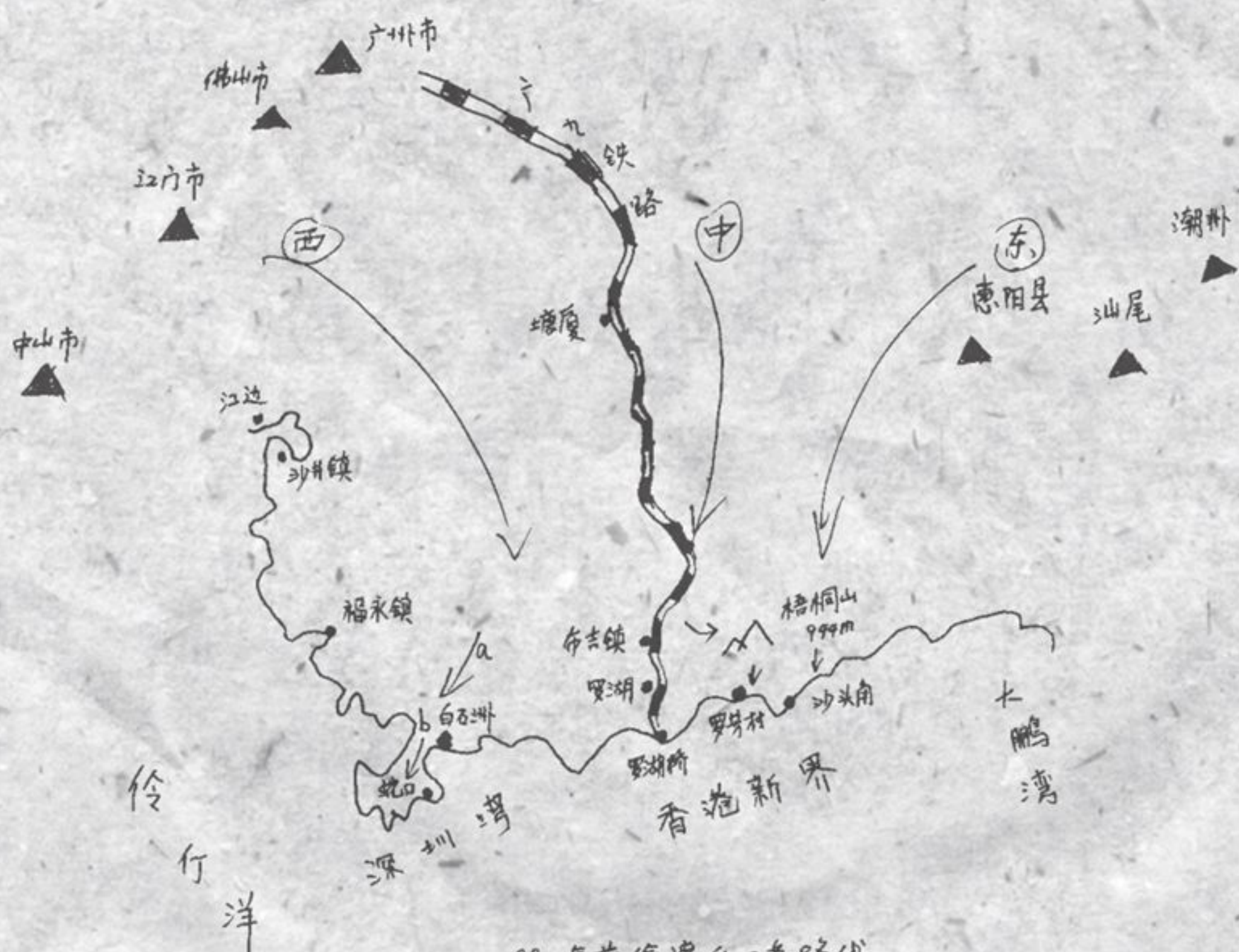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如果我不寫下它，歷史，將留下一頁空白。

——陳秉安

偷渡香港路线图



1980年前偷渡的三条路线。

西方向： a. 进入白石洲偷渡深圳湾，一般因渡需时，边防军防范甚严，有狼狗追捕。

b. 进入蛇口偷渡伶仃洋或深圳湾，一般因渡需时，潮汐较难掌控。

中方向：进入布吉镇后进入梧桐山，乘夜色潜入罗芳村一带偷渡，界内守卫较严。

东方向：直接进入梧桐山，经沙头角或罗芳村偷渡。

| | |
|------|-----|
| 責任編輯 | 許琮英 |
| 裝幀設計 | 彭若東 |
| 責任校對 | 江蓉甬 |
| 排 版 | 許靜鈿 |
| 印 務 | 馮政光 |

| | |
|-------|---|
| 書 名 | 大逃港 (增訂本) |
| 叢 書 名 | 20 世紀中國 |
| 作 者 | 陳秉安 |
| 出 版 |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8 樓 http://www.hkopenpage.com http://weibo.com/hkopenpage http://www.facebook.com/hkopenpage |

| | |
|------|-------------------------------------|
| 香港發行 |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
|------|-------------------------------------|

| | |
|-----|--|
| 印 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字樓 |
|-----|--|

| | |
|-----|----------------------|
| 版 次 | 2016 年 5 月香港第三版第一次印刷 |
|-----|----------------------|

| | |
|-----|--------------------------|
| 規 格 | 16 開 (168mm×230mm) 416 面 |
|-----|--------------------------|

| | |
|------|------------------------|
| 國際書號 | ISBN 978-988-8369-53-9 |
|------|------------------------|

© 2016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 錄

| | |
|---------------------------------|-----|
| 楔子：20多年前的尋找 | 9 |
| 第一章 風雲初變 | 17 |
| 第一節 淺淺的界河 | 18 |
| 第二節 血濺閘門山 | 32 |
| 第三節 深港特工秘密戰——活擒劉立福 | 45 |
| 第四節 荷葉塘故事——一個地主後代的回憶 | 57 |
| 第五節 強扭的瓜不甜——寶安縣的合作化和“退社風” | 68 |
|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 85 |
| 第一節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 86 |
| 第二節 三十年牛郎織女：文素巧尋夫 | 95 |
| 第三節 逃港的廣州女大學生 | 115 |
| 第四節 “木腦殼”八次逃港傳奇 | 127 |
|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 149 |
| 第一節 “六二”大逃港為甚麼會發生 | 150 |
| 第二節 逃港：饑荒中的出路 | 171 |
| 第三節 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 | 178 |
| 第四節 陶鑄下令：把崗哨撤了 | 199 |

| | | |
|------------|----------------------|-----|
| 第四章 |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響 | 227 |
| 第一節 | 湧過邊界的洪流 | 228 |
| 第二節 | 感天動地的華山淚雨 | 237 |
| 第三節 | 梁成功九龍寨奇遇 | 246 |
| 第四節 | 暴雨下的冤魂 | 253 |
| 第五節 | 潮水衝擊之後 | 267 |
| 第六節 | 全港大審判 | 276 |
| 第七節 | 從逃港者到“洋參大王” | 285 |
| | | |
| 第五章 | 撫不平的波瀾 | |
| | ——深圳河邊的社會主義大教育 | 303 |
| 第一節 | 北戴河的錯誤判斷 | 304 |
| 第二節 | 在深圳河邊築起“鐵壁銅牆” | 310 |
| 第三節 | 西坑之戰——社會主義陣地的爭奪 | 320 |
| 第四節 | “愛”也拴不住的“心” | 334 |
| 第五節 | 刑場上的鮮血——老頭與青年殊死血鬥 | 356 |
| | | |
| | 尾聲：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 371 |
| | | |
| | 附 | 392 |
| | | |
| | 後記 | 412 |

楔子：20多年前的尋找

一、發現徑肚村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有歷史學者告訴我說，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的空曠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與元軍最後決戰的古戰場。我想他一定是搞錯了。我記得“崖山之役”發生在海上，從福建逃來的南宋皇帝，帶著軍民在深圳的大鵬半島登陸後，因為害怕在陸上遇到追趕的元軍，於是從海上繞道走，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墟。

而頑固的老頭言之鑿鑿，說是南宋的軍隊大敗之後，小皇帝是由人抱著沿深圳墟東北的一條小徑逃跑的，倉皇中還把一條護肚的錦帕失落在小徑上，所以深圳墟東北的那個小村子後來就叫做“徑肚”。

真是這樣的嗎？

打開那本20世紀70年代印製的深圳市寶安縣地圖，上面清清楚楚記

錄著深圳東部各個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沒錯——徑肚，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就貼在蜿蜒的深圳河邊上。而且，現在從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共汽車有一個站就叫“徑肚”。

見鬼，難道史載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話？

我一定要到那個甚麼徑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條鬼才知道的小徑，看到底是不是史書出了問題。

於是我帶了地圖，騎上“笨驢”——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寶貝單車上路了。

這是 20 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準確地說是 1985 年 11 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時光。

遠處響著振動地皮的打樁聲。深圳城裡正在轟轟烈烈搞經濟特區的大建設，國貿大廈正在拔地而起，滿街塵土飛揚。我卻跑到深圳河邊去探古，似乎有點不合時宜。

腳下是從深圳墟通向沙頭角的一條鵝卵石公路。貼著深港的邊境線蜿蜒向深圳墟的東面伸去。“笨驢”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東拐西拐著，簡直要把主人“拐”下來。

在一塊寫著“邊防禁區”的木牌前下了單車，一支木杆攔住了路。路邊孤零零立著的矮小磚房，想來就是著名的“長嶺邊防哨所”。這裡就是邊防禁區了。當年這寂寞的邊防哨所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羅湖區行人如織豪華氣派的“蘭亭豪苑”附近。

哨所裡走出一個端著衝鋒槍的邊防軍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記者證拿過去端詳一陣，又拿了進屋去，同裡頭一個年紀稍大的軍人商量甚麼。

不久，哨兵揮手，表示我可以進入邊防禁區了。那年頭，一個黨報的記者是挺吃香的。

於是，我來到一片廣闊的田地，開始打量那塊被史學家稱為“戰場”的地方。

其實這兒就是香港的山脈和深圳的山脈之間形成的一片開闊地。沒錯，地勢平坦，三千元軍和他們的馬隊足可以展開慣用的弧形陣勢。

我在四周尋找著，沿著宋軍退敗時可能選擇的路徑。希望在小路上發

現點甚麼，比如一片馬甲、一截兵器甚麼的。

深圳河在身邊的蘆葦叢中無聲地流淌，只有隔著鐵絲網，在離我三十米處豎著英國旗的碉堡上，傳來執槍走動的英國兵沉重的皮鞋聲。

那位英國大兵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對我做了一個鬼臉——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過去……

難道 700 多年前南宋與元軍的最後決戰，真的就發生在這裡？

我睜大了眼睛注視地面。沒有啊，甚麼戰鬥痕跡也沒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開地圖，手指沿著深圳河邊上一個個地名找：蓮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羅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圖上的方位，在長嶺村邊，蓮塘村偏南，也就是在這條小河靠北一點的地方，應該就是徑肚村了。

我真糊塗，此刻，它不就應該在我的腳下嗎？

可是，哪兒是徑肚？哪有甚麼徑肚村？我蹣跚腳，身邊除了鬆軟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和從深圳河上吹過來的風拂動蘆葦的聲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錯了，還是地圖錯了？我開始懷疑頑固老頭的說法了。

我沿著河邊的山地往蘆葦深處走去……走近河邊，扒開蘆葦。

啊，那是甚麼？

在長滿野草的一條荒蕪小道邊，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東西，蹲下身去看時，發現那是一些磚瓦的殘片。

沒錯，這兒的確有一個村落。

接著，我撥開密密的蘆葦，終於看到路邊上幾截殘破的土牆。

對了，徑肚！這裡就是徑肚村！

“喂——有人嗎？”我把雙手做成話筒大聲喊。

四周除了風吹動蘆葦的“沙沙”聲和深圳河在轉彎處沖擊石頭的“嘩嘩”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我明白了：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調查深圳（寶安縣）歷史時，翻看的那些蒙著

厚厚灰塵的案卷。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那中間記載著的，深圳河邊上幾十年前發生的一段歷史——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我記得 1971 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難道這蘆葦叢中、這朝霞掩映下的斷壁殘垣，就是當年因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幾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

甚麼“崖山之役”，甚麼“徑肚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饑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 12 個省，62 個市（縣），實際人數超過了百萬！

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



“鬼村”

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那是一場保衛共和國的法紀尊嚴與人民群眾掙脫飢餓煎熬，尋找自由、幸福之間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悠悠三十年，誰的是，誰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過去，唯留下而今的蘆葦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靜悄悄……

鐵面無私的歷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極致的同時，已經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啟動！不正是那一場場殘酷的碰撞，鮮血的迸發，才促使了中國人沉思、覺醒、推動了改革開放的車輪前行嗎？

這，便是歷史，永遠藏著謎底的歷史！

冷風陣陣，蘆葦沙沙，深圳河無語西流……我默然肅立、低頭，祭奠那些在這場歷史的陣痛中，獻出了鮮血和生命的農民、軍人、共產黨員、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在這裡，在這片蘆葦中，他們曾一度不分階級、不分貧賤、不分地域，為了一個共同的追求而親密擁抱……

我不覺熱淚盈眶。

無情的深圳河啊，你輕輕流淌，不慮不憂。你還記得三十年前，你身邊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淚血摻和的辛酸嗎？

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

二、小松樹下的孤墳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那是在幾月之前，羅湖區的某家酒店開業。酒店的總經理親自登門我

任職的單位，要求派記者出席，任務輪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熱情，迎賓，嘉賓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詞時，情況起了變化。本來還平靜地站在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的歡迎辭之後，突然捧著演講稿號啕大哭。

台下猛然一片寂靜。

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慶開業的典禮上痛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各位嘉賓，”主人稍稍冷靜了一下，嗓音依然帶著哽塞，“請原諒我的失態。我實在是太難抑制住自己，在今天這個地方……”他用腳蹬了蹬鋪展著紅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變得激動起來，“就是在我現在站著的這個位置……”他又哽咽起來，“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當時我還小，他揹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上了，一顆子彈打來……”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聲。

“我沒有辜負他——”他擦了擦眼淚，鎮定了一下。

“不瞞大家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對一家港資工廠採訪之後，一位邱姓香港廠主突然把我拉到一個無人的客廳中：“你是記者嗎？”

我莫名其妙，“當然——當然是。”

“那麼，你有一個記者的良心嗎？”

我又點點頭：“當然，當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記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歷史，你應該記錄下來的，這對我們民族是筆財富。你敢寫嗎？”

他的問話使我為難。那年頭，對於“記錄”是有許多限制的，尤其對於一位黨報的記者來說。

“請你說說是甚麼？”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說，“我親身經歷的事。敢寫嗎？”

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夠不夠分量寫他的故事。

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

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敢啊！”我說，“充其量就是丟了這個飯碗吧！”

“那好。你跟我來吧。”

汽車沿著前面說的那條從深圳通往沙頭角的簡易公路往東走。公路崎嶇蜿蜒，進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山路邊下了車。

“看見了嗎？”他指著深圳河南面說。

一片隨著山勢綿延的英軍鐵絲網。

“不對，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樹林，對，那株小松樹的底下。”

我看見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墳墓。

“那裡是我的哥哥……”

頓時，我發現，這位香港人，眼睛裡湧上來一層白花花的淚水。

“20 多年前，我過去了，他沒有過得去。當時，他的腳受傷了。我小，才幾歲，是有人揹著的，他沒有。我一回頭，看見哥哥倒在河裡了。唉——”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沒辦法拉他啣……”

“其他的就不用說了……20 年後，我在那邊富了。就又到邊界上來，站在那邊的鐵絲網下，想看看哥哥過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彎了。”他搖著頭，哽咽起來，淚流滿面。

“於是我在河那邊對著河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碑。還好，現在它還在那，看見了嗎？”

我遠遠看去，河對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塊碑，留有紅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遠，字看不清。

“記住，這裡叫閘門山。”他說，“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我們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山谷中吹來了涼涼的山風，拂動我們的頭髮。

迎著山風，我打開筆記本……

第一章

風雲初變

第一節 淺淺的界河

一、新中國成立初年，中共高層最初的決策

20 世紀 40 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咕、咕……”這是海拔 214 米的深圳牛屋嶺上。撥開密密的亂枝樹葉，我看見一塊不到 50 平方米的沼澤地。水流，更準確地說是從地下湧出的泉水，在那兒發出輕微的“咕咕”聲……

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頭。

深圳河自梧桐山發源，從東北往西南流入深圳灣，全長 37 公里，河最寬處 75 米，最窄處僅為 2 米，人一躍就可以跳過去。

1898 年，中英談判代表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香港新界“租借”給英國，以深圳河作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線。

緊靠著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鎮有沙頭角、羅芳、徑肚、蓮塘、長嶺、

深圳鎮等。

緊靠著深圳河南岸的是香港的沙頭角、蓮麻坑、新屋嶺、老鼠嶺、粉嶺等。兩方陸地接界處有開闊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灣是兩地分界。深圳的最東面是南海，兩方的邊界為大鵬灣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葉密的深圳河邊基本上處於無人管轄的狀態。雖然在深圳鎮邊有一座羅湖橋，法定上它是香港與內地來往的唯一通道，但兩地農民一般不走羅湖橋，他們習慣挽著褲腿，牽著牛、揸著犁越過深圳河，想從哪裡下水就在哪裡下水。沿河兩岸雖然有衛兵巡邏，大都裝作沒看見。

河兩邊的村莊姓氏主要有陳、莊、葉、萬、黃等。沿河兩岸村莊，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說，中方的村莊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莊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兩地的農民常要過河到對岸去插田割禾。

有時收工晚了，過境的農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對方所屬的河邊搭個茅草篷過夜。香港一方，有一個小村叫較寮村，據說就是羅芳村的農民為耕作方便在河對岸建起的。

兩地的人，常是同一個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結親聯姻，常結著親戚。

1949年10月，由陳賡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佔領了廣州後向南挺進，直逼深圳。

河南岸緊張起來。解放軍的目標在哪裡？倫敦弄不清底細。於是兩個精銳師，從南洋群島的叢林調到深港邊境；而一封要求增派軍隊駐守深圳河防線的請示，也很快呈遞到英國首相的長桌上。

然而，情況突然變化，如滾滾洪流南下的數十萬解放軍，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帶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令葉劍英向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傳達命令：為避免引起邊界衝突和國際糾紛，部隊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從此，深圳河北岸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深圳河南岸隸屬於英國政府下轄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邊的邊境線上建起了鐵絲網，據守的是精銳的尼泊爾



20 世紀 50 年代的羅湖橋頭警備森嚴

廓爾喀雇傭軍；中方也在深圳河邊設立了檢查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組建的精銳的解放軍公安一〇師三〇團。

據說公安三〇團剛來的時候，河邊巡邏的英兵聽見對岸解放軍操純正的北方話，以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邊上來了，香港報紙也好一陣的報道，擔心大軍進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離港的輪船票曾一度緊張。

依照中英雙方的協定，兩地不再允許自由來往了。但習慣了“大家庭”生活的兩岸農民，尤其那些會纏著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嬸大嫂們，是不認甚麼鐵絲網和衝鋒槍的；而習慣了在田埂上鳥雀似的飛跑的小孩們，也從來不問腳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還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報紙登過一張照片：一群深港邊境村落的婦女圍住執槍的英方哨兵，理論要過河，另一群婦女則趁機把粽子從鐵絲網上拋過去。

一開始，邊境上中方與港英方的關係也還不錯。

從鹽田到蛇口，除了沙頭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鐵製的英國小旗插在路上作標誌外，整個深港邊界不設邊界標誌，人員車輛任意出入。由於從沙頭角到深圳開會要走 70 里山路，不方便，中方軍人常把軍帽軍服脫了，到港

英方搭公共汽車往文錦渡，繞近路進深圳。港英方警察認出，也不加阻攔。

由於深港兩地的農田互為“插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許給農民辦過界耕作證去港方耕種。並指定了出入路徑：長嶺村的農民通過一條 10 米長的石橋到香港境內的蓮麻坑村耕作；羅芳村的村民通過河邊的一個檢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嶺耕作；黃貝嶺村也有部分田地打在打鼓嶺，所以同羅芳村村民同經河邊缺口出入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打在港英方馬草龍、落馬洲，所以村民經深圳河邊檢查哨，下船出入境耕作；羅湖村有田地分佈在港英方的羅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經羅湖橋口出入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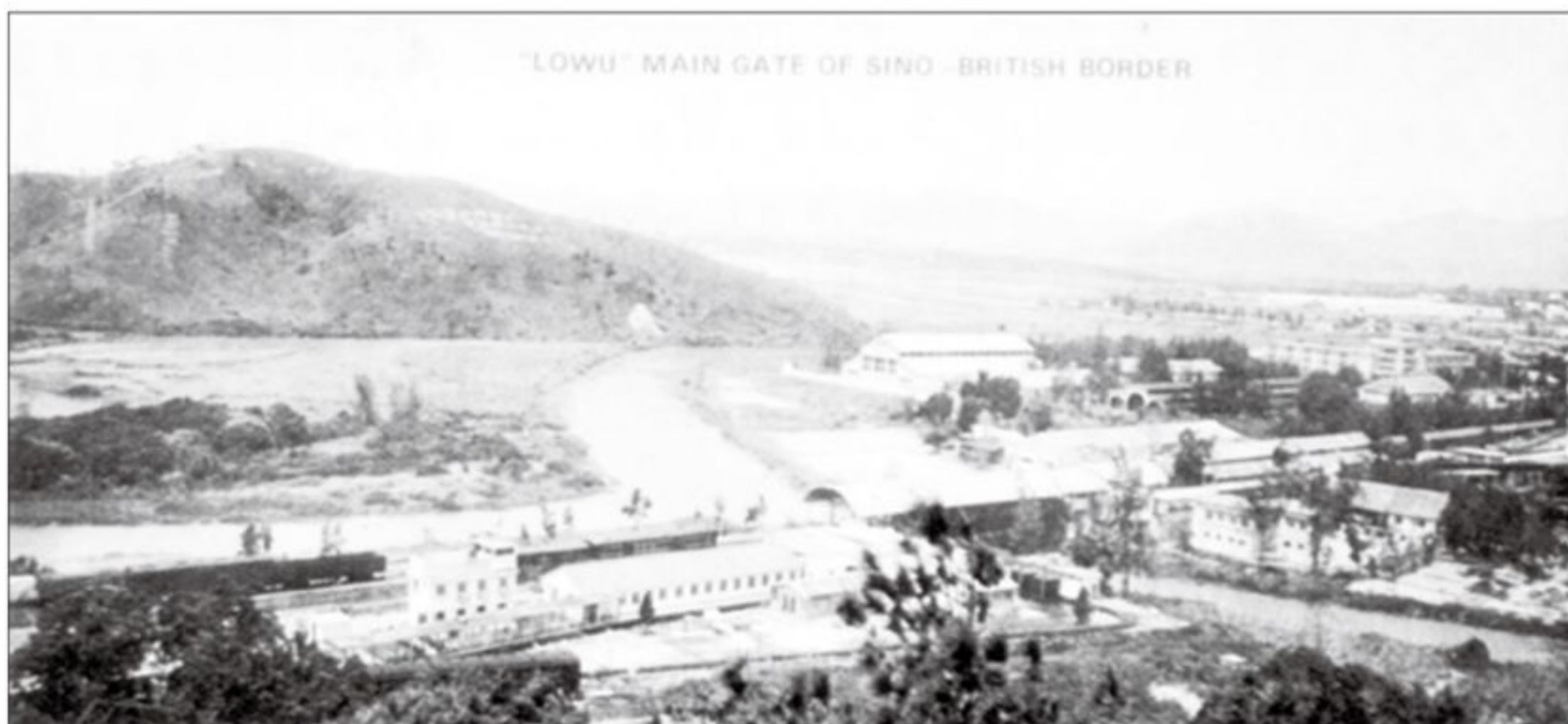
這，便是羅湖橋。

從民國年間廣九線通車起，由於鐵路經過深圳墟，羅湖橋頭成為大陸通往香港的最後一站。

橋中間的木板上，用紅漆劃出的一道線便是邊境線，也是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分界線：紅線的北邊，站著執槍的中國衛兵；紅線的南邊，站著執槍的大鼻子英國兵。

說起羅湖橋，至少到清代中期，它還只是過河種田的農民用幾株樹搭起來的“樹橋”。清代後期，村人合資修建了石橋。廣九鐵路修建時，中英雙方同意，由著名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設計建造鐵路橋，橋上設立“出境檢查站”。

當時的出境檢查是怎麼回事呢？



20 世紀 50 年代香港明信片上呈現出的深港海關，河上搭起的棚下是兩地交界處。

橋北邊的中方有兩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簡陋，以致你可能誤以為是某個單位的員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著堂堂中華民國實施管理出入境事務的“深圳海關”。

當然，平時出入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關”面向著羅湖橋，平房中有一個窗口，窗口邊貼有一張白紙，白紙上面有人用毛筆工整地寫了四個字：“出入檢查”。南來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華民國海關人員檢查。

那年頭，細心的檢查員，會在行李上按一下，用生理感應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細心的，看也不看，舉著一個大大的紅印，在你的證件上“啪”地一聲蓋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對來說，港英方的檢查要嚴格得多，除了檢查來者的出境證件外，還要檢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沒有攜帶違禁品。

火車過橋則比較麻煩，雙方的火車頭是不能越過那條紅漆分界線的。只能開到紅漆線後，一方把火車頭卸下來，對方在另一頭接上一個車頭，把車拉走。

到了 20 世紀 40 年代末期，邊境檢查突然放寬了，幾乎不需要證件就可放人過關，這是因為：在中國大陸一個巨大的政治變化發生了。

1949 年，蔣介石被中國共產黨打敗，倉皇退往台灣。出於對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害怕”或者“擔心”，成千上萬的不願在共產社會中生活，又來不及隨蔣介石逃到台灣去的大陸百姓，潮水般地湧向羅湖橋，企圖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漲水，1949 年的下半年羅湖橋頭突然變得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據當時香港的報紙記載，最高峰時，每天過境的人數不下十萬。

共產黨政權來得太突然，群眾成千上萬湧來。港英政府手足無措，生怕香港“漲水”。

怎麼才又“人道”，又不會“水浸”呢？

港英警方臨時訂了個奇怪的“過橋標準”——廣東人可以過，非廣東人則不可以。

港報這樣描述“奇怪的標準”：“難民”們牽兒帶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羅湖橋。先檢查車票，看行李，英方海關人員（不一定是英國人）眼睛瞟過

來，看看你的皮膚、長相，判斷一下像不像廣東人。然後問你：“喺邊度？”（粵語：“去哪裡”）如果你能答得上：“喺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廣東人，讓你過去。要回答不上的，便從隊伍中拉出來，推回到橋那邊去！

我的堂兄陳秉卓，原國民黨的一位軍官，就是這樣被港英方人員從隊伍中拉出來的。

過橋受限制了，一些非廣東籍的“逃難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徑來。

這也許就產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國民黨少校堂兄對我這樣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會說廣東話，只好離開橋上的隊伍往深圳鎮裡頭走。那時羅湖橋邊上的街道兩邊，都搭著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說是旅店，專門接納從內地跑來深圳等候過香港的人。我有個朋友介紹的朋友住在鎮上，他把我領到一間木板房子裡頭，貼著耳朵告訴我，晚上就在這房子裡坐著等，哪兒都別去，會有人來找我的。

文 四期星 日六月九年六五九一元公

望相河隔 頭橋圳深 港來拒被人多許

境過人四准只人多百三天二第境入制限府港

呂福洪幾被拒絕進入本港 後經我方幫助才獲得成行
廖曉女在華僑大廈哭一晚
七歲的孩子被拒絕入境
伍玉娥只得含淚告別骨肉
不料母親也竟遭拒絕入境
英警藉口口音不像台山話
一婦人李樹芬難到香港來

【本報訊】據新華社廣州五日電：香港英國當局所謂平衡出入境辦法，在執行後的第一天時間內，已發生了許多使人十分憤慨的拒入事件。廣州市印刷工人呂福洪的母親正在香港東區醫院病危，他夫妻兩人帶着兩個小孩，三日早晨拿着一份寫着「緊急一面」的急電，氣喘吁吁地跑到了粵港邊境，準備進入香港。人類的同情心，使得一個抱病回籍養命的心情等候進入香港的人，都自然地讓步走前一步，便使這步步艱危的技術走到了隊伍的第一位，但是，香港的英國警察和護照員卻是迫使他繼續前進的心情逼了回來。以後，他在我方工作人員的幫助下，才進入了香港。

廖曉女在華僑大廈哭一晚
 三日晚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廖曉女，在華僑大廈哭了整整一晚。她的父母都住在香港，她的母親特意回鄉把她的弟弟帶到香港去居住，可是三日英國人只准她的母親和弟弟進境，她被迫獨自留在深圳的旅棧過了一夜，昨晚她的父親帶着她的弟弟在對岸，她的母親再次跑過來要她過去。她的母親好容易才找到她，又好容易才帶着她過去。她走過橋邊，這時在深河橋的兩岸，一邊站着父親和兒子，一邊站着母親和女兒，當他們快要會合的時候，站在中間的英國警察却無理地又把他們隔絕了。不管母親和女兒的再三訴說，她們仍只能憤恨地回到那個大廈來。

七歲的孩子被拒絕入境
 另一個同是在三日就到過深圳的婦人伍玉娥，她的丈夫在香港做生意，這次她回來要把三個兒女帶回香港，但是英國警察只准她把二個三歲和五歲的孩子帶過去，另一個七歲的孩子却不准進境。這個婦女同鄉的證件已經到期，旅費也用完了，她在橋頭焦灼萬分，英國警察的這種無理拒絕使她在橋邊的每一個人都感到非常憤怒，在橋邊的我方工作人員用了最冷靜的態度，安慰了這個婦女，並且設法替人幫助她把那個被拒絕進入香港的七歲的孩子帶回老家，幫助她克服了困難。這個母親在徘徊良久之後，才含着淚水和孩子告別。

不料母親也竟遭拒絕入境
 香港一家有名的商行與記行的經理的妻子楊美芬說，她從香港特地回鄉探親，要把她六十多歲的母親帶到香港去。昨天，英國警察同樣毫無理由地要把她們母女分開，只准楊美芬過去，却不准她的母親過去。楊美芬在交涉無效之後憤恨地說：「我的母親去不得，我也不去！」現在她們母女也暫時寄住在華僑大廈裏。

英警藉口口音不像台山話
 多少年來，我們就有許多個家庭是分開在香港和故鄉之間的。無理地限制香港和內地的往來，使深圳橋的兩岸都在滋長着一股憤慨和不滿的情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逃往香港的人員受到港英方限制。

大約後半夜吧，我看看錶，正是三點，聽見有人用兩個手指頭輕輕敲門。我把門開了一道縫，進來一個三十多歲漁民模樣的人。也不說話——不過說廣東話我也不會懂的，用兩個手指頭在我眼前擺了一下，然後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錢。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裡按了兩根金條，他就把手掌朝門外搖了兩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這簡直就像幹間諜工作的呀。外頭黑黝黝的，甚麼也看不清。我跟著他，經過了一條好像是鋪著石板的街道，又轉了幾道彎，前面便出現了一片蘆葦。穿過蘆葦叢，我便聽見水聲，面前是一條河。我想，這大概就是人家說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現在的河面寬，因為能行船嘛。蘆葦也比現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邊上輕輕拍了一下手掌，蘆葦裡就慢慢穿出一條船來。

那人在我背上趕緊拍了兩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還想回頭說甚麼感激的話，他已經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邊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撐船的——我這才看清原來是個女人——立起身來告訴我，說我沒事了，因為水是屬港英地界，共產黨沒法抓你了……

我就這樣偷渡到了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年，政府對於羅湖橋如此“放寬”，究竟是甚麼原因？

這是同當時毛、周對國內形勢的考慮分不開的。

20世紀40年代末，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兩大陣營相互敵視，幾無往來。羅湖橋便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極為珍貴的“對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這條“對外走廊”成為毛、周等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大陸財政拮据，糧食、生活物資的供應都趨緊張。軍政人員數目一度突破了900萬，政府要養活的從國民黨政府手中接收過來的舊人員就高達數百萬。另外，一些國民黨軍隊殘餘上山藏匿頑抗，放火，殺害共產黨幹部，嚴重影響新政權的穩定和國內的治安。

讓一些依然留戀蔣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節省財政開支，又有利於國內秩序。所以，中國政府採取了最體面的做法：從羅湖橋放人。

從 1947 年到 1950 年，究竟有多少所謂的“大陸難民”通過“對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計總數達 200 萬人之多。

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資本家，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有躲避共產黨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紳，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像唐炳源、王雲程、榮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從內地逃到香港的。

20 世紀 50 年代，在香港的調景嶺和摩星嶺的山頭上，曾出現大批數里相連的木屋，據說就是大陸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後來很長一段時期，“每年 10 月 10 日（國民黨政府的雙十節），這裡就變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風景”^{【1】}。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飯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國家，換來了一時的安寧。

二、“隔岸村慘案”

這是隔岸村後面的山上，一個水塘邊。6 位烈士，其中還有兩個女的，一個 18 歲，一個才 14 歲。手都被反綁著，臉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裡，背上的槍眼血跡未乾，地上留著一大灘的血。周圍的地上還有香港出產的煙蒂……

深圳，原意就是一條深的河溝。兩萬人口的小鎮，屬於縣府設在南頭的寶安縣管轄。鎮中一條十字形的老街，兩旁是兩層的廣式騎樓。每逢三、五、七日趕墟的日子，附近四鄉的農民挑了蔬菜、魚蝦集攏到小鎮上來了，廣式騎樓下人聲鼎沸、買三吆四，分外熱鬧。

清末有了廣九鐵路通過，深圳的位置便變得格外重要，它是國內通往

【1】見深圳市政協編《深港關係史話》。

境外的最後一站。

如果把中國比作一隻玻璃瓶，深圳就是瓶底。國民黨政府被打敗到台灣時，所有大陸想要去香港的人，都集中到這個瓶底下來了。火車站旁的羅湖橋邊上，搭滿了一片片的賭寮、妓寮……最高峰時，深圳鎮的常住人口達到 4 萬多人，來自全國 22 個省市、96 個縣。

1949—1950 年，深圳鎮市面上流行著 5 種以上的貨幣，包括人民幣、南方券（中共南方局發行）、港幣、銀元、銀毫。各種不明身份的人聚集、出入。各種貨幣的流行，加上寶安縣當地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對新生政權的敵視和反抗，共產黨在寶安縣的政權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1950 年 3 月，一支徵糧工作小組 6 人，在寶安縣西鄉的隔岸村被香港的國民黨勢力殺害了，這就是驚動了北京的“隔岸村慘案”。

當年的兩廣縱隊三團女兵，而今已 80 多歲的工作隊員鄔少慰，是至今唯一一位面對記者，還能較詳細敘述“隔岸村慘案”的人。

大約是冬天吧，我們在深圳領了任務，就準備下村去。我和彭振儒在一個工作隊。工作隊分了兩個組，我去了上川村，彭振儒他們組 6 個人去了隔岸村。

這樣搞了大約十幾天，我們組的任務完成了，準備回縣。我讓手下的一個小戰士去叫老彭他們一起走。那戰士回來報告說：組長，不好了，找不到老彭他們了。

我說，是不是上村裡訪貧去了？他說，恐怕不是。我便問，住地的情況怎麼樣？他說，床褥、被子很亂呢，像是有打鬥過的痕跡。我說糟了，恐怕遇上了頑固地主，趕快通知大隊。

隔岸村跟香港就隔了個海灣，很窄，上船就到。地主反革命要過海來搞破壞，是一眨眼功夫的事。

第二天一早，20 多人帶槍進入了隔岸村。村頭村尾地找，找了一個上午，也沒線索。一直到中午，才有戰士在山上喊：在這裡啦！

這是隔岸村後面的山上，一個水塘邊。6 位烈士，其中還有兩個女的，一個 18 歲，一個才 14 歲。手都被反綁著，臉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

裡，背上的槍眼血跡未乾，地上留著一大灘的血。周圍的地上還有香港出產的煙蒂……

“你要殺我，我必殺你！”

20世紀50年代初的深圳一帶，殺機密佈。

1951年2月，一張深夜貼到深圳戲院牆上的反動標語說，原國民黨寶安縣公安局長肖天來在香港許願：“捉一個村幹部賞300元，捉一個共產黨員賞2000元。”

隨之，靠近深圳河的長嶺村三次被襲。佛子坳木橋被燒，守橋民兵被殺。

寶安縣公安局內部的《敵情綜合》指：僅1953年3月份就“發現反動傳單3宗、國民黨旗1宗、燃燒炸藥1宗……”

“3月15日10時左右，新圍鄉大口村村民劉六，在村口米坑山牧牛發現松山掛著一面青天白日（該旗長9寸4分，橫6寸）反動國民黨國旗。”

“3月24日下午3時正，深圳火車站從新界過來的火車箱內發現放有

三、四月份敵人活動情況綜合

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較為突出的敵情，是發現有人用石擲我布吉大軍崗哨多次反動傳單3宗、國民黨旗1宗、燃燒炸藥1宗。四月下旬敵人則針對我農村抗旱搶收最緊張期間進行陰謀破壞活動數起。縱火1宗、挑撥逃亡，同時海面土匪活動猖獗。5月初旬敵人爆炸我鐵路1次。具體事實如下：

(一) 3月15日10時左右新圍鄉大口村村民劉六，在村口米坑山牧牛發現松山掛著一面青天白日（該旗長9寸4分，橫6寸）反動國民黨國旗，該旗用印泥機印的。

(二) 3月24日下午3時正深圳火車站從新界過來的火車箱內發現放有大小反動傳單38張（大20張、小18張，由鐵路公安所發現），反動傳單內容完成反共大氣實行三民主義，反攻大陸，打到蘇聯走狗等等」

(三) 3月24晚7時多，蔡屋圍治保主任蔡增蘇，捉獲路過蔡屋圍小學後門拾一本部仔，內有反動標語「毛不死會大亂。……共匪等等。」（其他字體已脫掉）

20世紀50年代寶安縣公安局的《敵情綜合》，顯示邊境鬥爭複雜尖銳。

大小反動傳單 38 張……內容是完成反共大業、實行三民主義、反攻大陸、打倒蘇聯走狗等等。”

“1952 年 7 月 31 日，肖天來的‘廣東反共救國軍’匪部 6 人，從新界潛入，槍殺了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

“1952 年 8 月 4 日，鹽田鄉南山村村民鍾天生、鍾煌友兩人上山砍竹子，發現外國香煙盒和罐頭盒。公安部門隨之前往追捕，全殲敵特 6 名，犧牲了排長陳德才和戰士唐生源。”

……

這種情況是不能夠長期下去的。“門”，得關上了。

1950 年 7 月，中國政府決定要對深港邊界實行封鎖，整頓邊防。

深港邊境大清理開始了。

三、深港邊境三道防線的建立

那第一個拿到出入證的農民，大概不可能想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此開始了，社會主義陣營在南方的封閉從此開始了！它將延續，並將影響到以後幾十年深港上空的風雲……

首先是：殺一批。

1951 年初，中共寶安縣委在《關於防特鎮反推動群運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 3 月 10 日前，一齊動手，將已批准的死刑犯公審控訴，殺他一批，不得遲疑。再檢舉，再收集，再請示，再逮捕，再呈報殺一批。各地殺人，必須大張旗鼓，以安定農村。”

除了臨時綁赴野外山頭外，當年寶安縣的刑場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南頭西門，即現在的南頭加油站附近；一處是深圳鎮的曬布嶺，即現在深圳中學背後。

據說由於隔岸村“反革命殺人”事件驚動過毛澤東，北京大為不悅，1950 年 6 月 30 日，寶安縣委特意給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寫信，稱：“毛主席：關於這裡鎮反，過去現在都做得不大好，1949 年解放到 1950 年底，共殺 3 人，地委說，你們寶安縣至少得殺 200 人……”

在鐵腕打擊“鎮反”，槍斃了一批“罪大惡極的土匪、惡霸”後，中共華南分局文件稱，深港邊境的敵我鬥爭形勢已大有好轉，可以對邊防實行大的清理了，以便下一步對邊界實行封鎖，結束長期以來“有邊無防”的狀況。

深圳邊防大清理由寶安縣委書記于斯夫、副書記李馨亭、三〇團政委宋雲舟等直接指揮。

深圳邊防的建立分兩步走。第一步：把“不可靠”的人員清理出邊境。

初時，公安派出所設在而今深圳老街大江南商城附近。街頭上，佩著木盒槍、穿著褪色黃軍裝的公安人員，操著東北或者山西口音，十分和氣地到每個居民家中進行戶口登記，詢問出身、個人歷史、來源。

經過逐人逐戶的戶口登記和嚴格的詢問調查，深圳公安部門再對鎮上人口進行“有選擇性居留”登記。

甚麼叫做“有選擇性居留”呢？就是留在深圳鎮上的居民，必須具備下列條件：祖籍本地或廣東省籍，身份清白，沒有同國民黨政府合作的經歷。外省遷來的一律退回原籍（由國家派往深圳工作的除外）。

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表現出開明的姿態：即使是敵對者，在清理出去時，也發給基本路費。第一批從深圳鎮被清理出去的人共計 351 戶、892 人。這中間包括來不及跑往香港，躲藏在鎮上的國民黨殘餘，也包括一些一直居住在深圳鎮的地富反壞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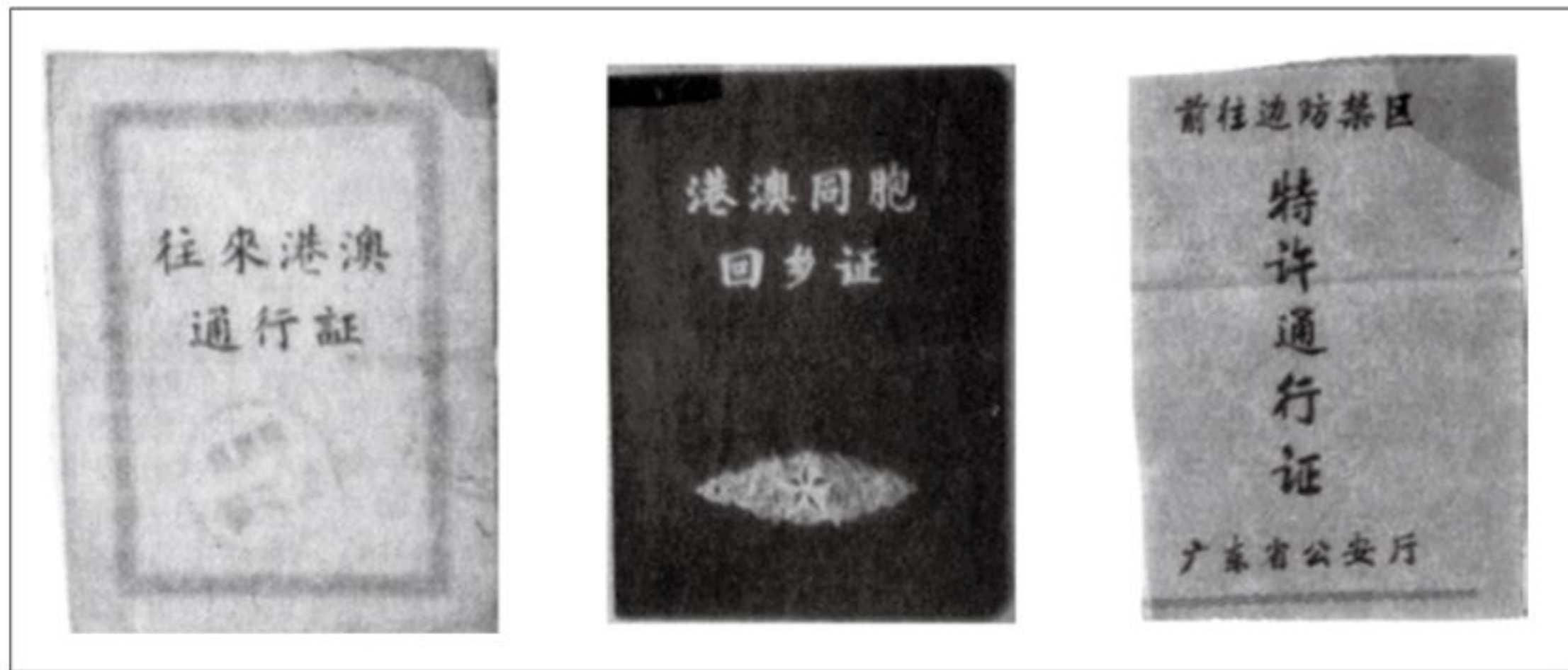
經過選擇，被允許留在鎮上的，基本上都是忠於共和國的“良民”。

但深圳是個特別的地方，即使是共和國的“良民”，也必須在嚴密的內控之中。這種內控，主要通過居民自身嚴密的管理組織來完成。

鎮上設有專管治安的派出所。每條街道都將 10 戶以上的居民組織起來，建立居民小組，居民小組中選定成份好、政治性強的積極分子擔任小組長，小組長直線與派出所“專幹”聯繫。

居民小組每五天開一次會，對號點名。會上各家各戶彙報五天來的勞動、學習情況。小組長細心聽取情況，遇有居民思想波動或者出現動向，從夫婦不和到外來不明客人，小組長都會深入家庭了解。當然，情況很快登記到派出所專幹的記錄冊中。

外地進入深圳鎮的人，必須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門簽發的邊防證件。到



進入邊防的證件

達鎮上後，要由戶主陪同上派出所登記，接受詢問和證件檢查，經簽字批准後才能留住。

經過這樣一番整頓，每條街，每個巷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已經在層層控制之中了，任何對共和國不忠的行為，都會碰響派出所門上的鋼鈴。

深圳，變“單純”了。

車站旁的寮棚、妓院、光怪陸離的舞場商店通通都拆除了，就連那條老街的青石板路也似乎變得乾乾淨淨、安安穩穩了。

完成了鎮內嚴密的控制網絡後，華南分局便開始著手第二步：建立邊防區，即在鎮外的邊境一帶建立一個隔開內地和香港的安全保護區。

最初的安全保護區包括三道防線：從北向南看，第一道是邊防線，第二道是禁區線，第三道是警戒線。三道防線的戒備步步升級，越來越嚴密。

華南分局在 1956 年的文件中稱，在寶安縣內劃出的邊防區，其指向是：東起大鵬灣，西至茅洲河；南從深圳河起，北至山廈。橫長 91 公里，縱深 19 公里。

任何外來人須持有由公安部門開出的邊防通行證，才能進入深港邊防區的第一道防線：邊防線。

通過了邊防線，再往南走，須持有由深圳當地邊防開出的特許證，再經哨卡執槍邊防軍驗證，方可進入第二道防線，即禁區線。

進入禁區線後再往南，即在距離邊境線（如深圳河）還有 50 公尺至

100 公尺的地方，劃有一條警戒線。這條警戒線常常是一條約兩米寬的簡易公路。越過了警戒線的人，再前行 50—100 米，就有可能到達河邊，即深港邊界線（主要是深圳河）。這裡是最高警戒區。

需說明的是，能夠進入第二道線，即邊防禁區的人員，除公務者外，為數已極少。凡是無手續而踏進了禁區的，便可視為偷渡，隨時可拘捕。

對於偷渡者，初時的命令是：制止不馴，或有武力反抗行為者，可以鳴槍警告乃至射擊。

三道警戒線，警犬槍彈，嚴密防守，層層警戒，深港邊境可謂戒備森嚴。

1951 年 2 月 15 日，廣東省政府公開發佈命令：從即日起，深港邊境“封鎖河口”。自清與英簽約以來、包括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兩岸群眾實際上存在的自由來往至此終止。那些私自進入三道防線，企圖從深圳河偷渡者，將被視為“叛國投敵”。

第一張蓋有鋼印的深港通行證明，於 1951 年 3 月 3 日上午發出，是由深圳鎮上的一位中年農民從派出所領到的。

據經事者回憶，為了表示“感謝”，當時派出所的人還特意向中年農民端茶遞煙，並贈送了獎狀。因為邊民“覺悟提高了”，不再是打著赤腳，想“過界”便“過界”了，能第一個規規矩矩地來辦證件的，當然是大大的“良民”！

那第一個拿到出入證的農民，大概不可能想到，如同數年後東德矗起了柏林牆一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此開始了，社會主義陣營在南方的封閉從此開始了！它將延續，並將影響到以後幾十年深港上空的風雲……

而一場中國人的劫難，一場偷渡者與“執法者”之間的血與火的大拼鬥，也將隨之開始！

第二節 血濺閘門山

—

“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一個民族要是內部對立，會給百姓帶來多少慘痛啊。現在，誰是誰非並不重要了。連戰都回來了，兩黨握手了。溫總理都要我們捐棄前嫌了，還有甚麼呢？重要的是中國人都記住有過的這一段慘痛的歷史，不要讓它再發生了。”

見到他的時候，這位當年三〇團的邊防軍戰士，已經年近古稀。他從深圳邊防轉業後也沒有走遠，一直在惠陽商業部門工作，1981年兒子來特區，他又跟來了。他說，這一輩子像是同深圳結了緣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問我，“你們記者也夠會鑽的。”

對於50年前的那一次“閘門山事件”，他記憶依然十分清晰，並且願意告訴我。

“但有個條件：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這段歷史雖然解密了，在他們心裡，還是惴惴不安的。

二

“那是 1956 年的 9 月，或者是 10 月吧，幾號我記不清了。當時我還是一個新兵。”王志剛（化名）說。

事情是這樣的。

我站崗的地方就在閘門山，就是現在從深圳往沙頭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說成夾門山，那是錯了。為甚麼叫閘門山呢？因為我們這邊的山離香港那邊的一座山特別的近，看起來就像一座閘門一樣。

那天大約是上午 11 點，太陽暖融融地照著，叫人昏昏欲睡。我覺得那時也怪，太陽都不像現在這樣烤人。我抓了槍在邊境線上走。

突然發現身後的樹枝在搖動。

“誰？”

“是我——”一個 30 多歲的漢子笑著向我走過來。我認出是部隊請來打石的工人班長老潘，潘子良。

“你來這兒幹甚麼，這是禁區！”我嚴肅地說。

“我來看石頭，那邊的石頭都打完了。”

“你不要過來了——這裡是警戒線了！”我警告他。

“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會逃。”老潘還在笑咪咪向我靠近。已經就要到我身邊了。

“你站住！要不我要鳴槍了。”

“怎麼這樣——”

潘子良的話還未說完，我剛把衝鋒槍朝天舉起想嚇嚇他，突然被身後的一個人抱住。

我猛地感到頭上被東西重重地擊了一下，便“撲通”倒在地上。

“嗶——”一聲尖銳的口哨聲，從山頭上的灌木叢中猛地衝下來三十幾個人。中間有婦女，還牽著兩個五六歲的小孩。潘子良大喊：“快——過河！”

“撲通”“撲通”“撲通”只聽得一片水響，一片水花。幾十號人跳進了

水淺得只蓋腳肚的深圳河。

就在這時，猛聽見山頭上“噠噠噠……”“噠噠噠……”的槍聲，衝鋒槍響了！

我對照著檔案材料看了，事情發生在 1956 年 10 月 6 日。

1956 年下半年，駐深港邊境的邊防部隊接到國防部命令，要在邊境旁的梧桐山腳下建一個大的國防工程，據說是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親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開坦克，於是要招募一批民工開洞。

但是，深圳鎮上的人大都只會做生意、開鋪子，不會打石頭，更不會砌石牆。砌地下的工程，得請外來的民工。

8 月的一天，有人給梧桐山下的邊防駐軍引來了一個江蘇口音的中年人，部隊領導一看，虎頭虎腦，像是有一把子氣力的。

“叫甚麼？”

“潘子良。”

“幹過活嗎？”領導問，關心是不是勞動人民。

“幹過的——在家專幹粗活。”那人說。

領導點點頭：“甚麼成份？”

“貧農。”

“嗯，把你的手給我看看。”領導說。

那人伸出手掌來，領導在上頭磨了磨，粗粗的，結了繭，果然是幹活人的印記。

“好吧。你留下來。”領導說，“以後你就是班長，打石民工班的班長，過兩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兩天以後，潘子良來到了東莞縣石龍鎮的一家旅店裡，他的四個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們是龔維衛、楊照業、王國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無法存身的國民黨軍、警、憲人員，而潘子良則是正規軍中被打散了的國民黨軍官。家鄉“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後，他們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陽一帶做泥水匠。誰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著一地，看看衡陽也無法呆，五人又從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贛南的一座山洞裡。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過，每天像野人一樣，到山坡上掰點苞穀、到山戶人家門上偷點糧食過。終於有一天，龔維衛在下山尋食時讓人發覺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麼走呢？”幾個人躲在農家防野豬的茅棚裡又冷又餓。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見過世面的，“咱們的人都去那兒了，共產黨管不到那塊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嗎？”

“去得了，從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龔維衛說，“有鐵路，我去做過生意的。”

潘子良說：“就一條河，過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過橋，現在讓共產黨封了。”他說的是羅湖橋，“我們早點行動就好了。”

他們很快到了布吉鎮，找了個小店住下。

潘子良帶了些乾糧，先去深圳鎮打探，打算摸到了虛實，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黑夜溜進了邊防線，平安到達了深圳鎮。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觀察，深圳河邊上邊防軍來往巡邏，鎮子裡走來走去到處是民兵。潘子良傻了：沒想到邊防警戒這麼嚴。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雲貴走，從西雙版納那條線逃緬甸了。”

正當潘子良準備往回走時，情況又變了。

潘子良到雜貨店買一包煙，發現一位軍人正好也倚在櫃檯上買煙，他很快發現那軍人口音中的江蘇味。

“兄弟敢麼是徐州人？”機靈的潘子良問。

“你怎麼知道？”那軍人馬上便來了興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說。

“啊，那不遠啊。”那軍人說，“你怎麼上這來了？”在南方這麼個邊遠地方能遇到江蘇老鄉，軍人顯然很高興。

“出來找碗飯吃啦。你知道，咱們家鄉日子苦啊。”潘子良遞上一支煙，“聽說香港那邊要人幹活，就想去幹份活。”

那人大驚，壓低了嗓子：“你怎麼還敢說這話！你是溜進來的吧。那

是幾年前的事，現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嗎？”

潘子良顯得“懵”了。

那江蘇軍人接著又問：“你沒辦邊防證的吧？”潘子良點點頭。

“我就知道你膽大包天。你還是快點離開這。我沒抓你算看你是老鄉了。”軍人說。

潘子良顯得可憐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乾捱餓。再說，咱老家都千多里地，怎麼回呀！出門靠老鄉，你給行個好吧。”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著他走，猛地推著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幹過力氣活沒有？打石頭。”

“打石頭？”潘子良心頭一喜，“打過啊，你們要人幹活？”

“會砌牆不？”

“會啊，我幹過這行啊。”

絕處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著人，你跟我去見我們連長，碰碰運氣。”

兩個小時後，潘子良回到旅店。龔維衛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為潘子良出甚麼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個朋友一合計：到深圳河邊上打石頭，那不是送個機會給我們跑嗎？

潘子良把人一一領到連長面前，讓連長挑。連長是個愛兵的，看著這一排精壯的後生，捶了捶龔維衛強壯的胸肌，顯然很高興，對那江蘇兵說：“挑得不錯嘛，我們全要了。”

“謝長官，謝長官！”五個人一個勁地鞠躬。

“你們說在哪兒打呢？”連長望了一下山頭問。

“長官說在哪兒就在哪兒吧。”潘子良回答，其實他早瞄中了一塊地方，對他的江蘇老鄉說過了。

“就在閘門山吧。”江蘇兵在一旁說，“那兒青石多，還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區呀。”連長有點不放心，但壓頭的任務更讓他著急。“都是貧農吧？”連長望了望勞力們問。

“都是！”潘子良帶頭回答說。

“貧農就好，你們要提高警惕。對面有時朝這邊放槍的。”連長說，“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們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興了，照著部隊的樣式行了個禮。

這時，連長皺了一下眉頭。

後來在追查責任時，這位連長回憶說：“我當時也奇怪，怎麼那傢伙敬起軍禮來，姿勢那麼正規啊？”不過他沒有再往深處去想，工程任務太急。

打石隊建立起來了，在從深圳鎮到沙頭角之間的山路邊，開始搭起帳篷，燒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駐軍供應石料。打石隊也很快發展到二十幾人。

潘子良看準閘門山是有原因的，第一，這兒離深圳河最近，地勢最有利。

從香港那邊延過來的山頭，同從深圳這邊滑下去的山頭，在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開僅僅幾十米，像留著一道閘門。淺淺的深圳河就從這“閘門”中間穿過去。

靠河邊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傾斜，有利於快速衝跑。

潘子良計算了一下，只要到達河邊，衝過深圳河，就是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時間。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這兒是邊防軍三排與二排接崗的銜接點，容易出現銜接上的時間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們，完全有可能抓住寶貴的“20秒”。

打石隊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維”。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這麼好的機會，不能只管自己跑。”龔維衛說，“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來，一起過香港去。”

楊照業對潘子良說：“也對，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來。”楊照業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猶豫了。他以前不是這麼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時，想的是如何保命。現在命保住了，大夥兒想法又多了。這渡河是件難事，危險性極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想的是讓五個男人先逃出去，在那邊定下來，找機會再回來接家屬跑。

但是，二姐夫說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動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懷著幾個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們能過去，分隔兩地，要再回來接他們，恐

怕就是一句空話了。”姐夫楊照業悲傷地說，“一家人這一輩子就這麼分開，讓他們在共產黨手裡捱鬥受苦，我就是過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紅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們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順道就去內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帶老婆一個人！”他對楊照業說，“孩子都不能帶的，記住了嗎？跑不動，要害事的。老婆接來，這兒是不准進的，都放在石龍鎮，有火車，來這很快的。等這邊的通知。”

10月5日，楊照業偷偷來找潘子良，告訴他一個消息：“家屬已經到了石龍。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裡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們領過來。”

“怎麼領？”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準備好。我到部隊去開招工的證明，開了馬上到石龍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後，我們走山路來與你們匯合，看準機會就從閘門山衝過去！”

楊照業想了一下，有個疑問：“是單個偷偷過河好，還是集體過河好呢？集體涉水目標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對於這個技術上的問題，潘子良沒有回答，只是說：“你先別問這個，聽我的。人到了再說。”

三

潘子良帶了龔維衛和任殿奎，拿到了證明，迅速到了石龍的車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涼了半截。

不但幾個人的老婆來了，而且跟來了四個孩子，一個十二三歲，三個才五六歲。

“叫你們不帶不帶的嘛！”潘子良生氣了。亂彈琴啊！哪有拖兒帶女去偷渡的！

但看見這些女人孩子，一身襤褸，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捱到這裡的。他又歎了一口氣。

這時，他的頭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咬咬牙，把四個小孩扔在石龍車站，讓他們自己討飯回老家去，大人則趕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猶豫了。當看見多時沒見任殿奎的孩子一聲“爸爸——”親熱地撲在任殿奎身上時，他的鼻子也酸了。

潘子良無可奈何地瞪了楊照業一眼：“全都是你們害的！現在是要退也沒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他對任殿奎說，“就看我們命大不大了。拼過了深圳河，你們一家人過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過，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時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著眼淚說要帶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緒不對，馬上安慰，“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條河嗎？有甚麼了不起？幾分鐘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們一家請我吃團圓飯！”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絲笑，情緒又上來了。

“寬不寬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點恐懼。

“不寬，就只幾米，水又不深，跨過去就是英國的土地，下水他們就不能開槍了。”

“我現在擔心的就是小孩，”龔維衛說，“怕他們哭。”

潘子良皺皺眉：“大人揹著，不管遇到甚麼情況，不能出聲，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聽好了啊，別到時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沒有聲息，但只有一個意思：放心吧！都橫了心了！

“上車吧！”

十幾人就這樣上了火車，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來以為憑邊防部隊的證明，派出所會給他們一行開出去沙頭角禁區的通行證。但是，那辦證的人是個老公安，他拿介紹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懷疑：“你不是招人到沙頭角打石頭的嗎？還帶些女人小孩去幹甚麼？”

潘子良笑著遞上一支煙：“是家屬，嘿嘿，去煮飯的。”

老公安用肘把遞來的煙碰開：“煮飯？小孩也會煮飯嗎？不行，通通回去——要探親也只能在深圳鎮上見。”

老公安拿出筆在紙上寫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進入邊防禁區。”撕下來遞給潘子良：“去吧，同意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著住宿證明，出了派出所。

大隊還在閘門山那兒等著呢，現在，管不了甚麼“禁區”不“禁區”，只有冒險領著這幫婦女小孩往禁區走了。

天昏黑，他們出了鎮子，就看得見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們提心吊膽，繞著山走，沿著梧桐山脊翻過去。

那天正好部隊殺了豬，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帶人避過了崗哨，爬過了梧桐山，來到了邊界附近。

楊照業早已領著一群打石工在草叢中等著了。

“到底來了。”楊照業看見潘子良領人來了，不知有多高興。其餘的人看到自己的親人來了，都歡喜得抱成一團。

“不許高聲！”潘子良制止團聚了的人們。他點著腦殼把大大小小的人清點一下，包括後來招來的打石工，一共是 32 個人。

“好的。”潘子良說，“大家都聽從我的指揮。”

現在，深圳河與對岸的香港已經歷歷在目了。“大家看見了嗎？”潘子良指著山下亮著燈光的鐵絲網說，“就是那——鐵絲網下面的那條河，就是深圳河。”

一條帶子一樣的小河，在昏暗中閃著白光，輕輕鬆鬆地向遠方流去。隱約看得見，山下邊有端著槍的邊防軍在走來走去。

河那邊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們就要勝利到達的地方！”

他說：“今天夜裡大家先躲起來，明天白天再過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現在夜間正是好時候啊，為甚麼不利用夜色作隱蔽衝過去。

“你們不懂，他們巡邏的重點就在晚上。白天這一線兩公里只有兩個

巡邏的，晚上就有十幾個，你穿針都穿不過去，等於是送死。”

潘子良用樹枝在地上劃著，把他的分析告訴大家：“我們現在的位置離河邊已經不到 1000 米了，靠河是一片灌木。明天衝河前我們可以接近灌木叢，到達離河 200 米甚至 100 米處。越近，當然衝河的時間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說。

“他們明天那班崗是早晨 8 點換崗，到那時候這一公里的邊防線，就只兩個人巡邏了。他們兩個人，要看一公里的蘆葦灌木叢，我看，怎麼都看不過來。”潘子良繼續說。

“我為甚麼把衝河的時間選在 12 點前的 10 分鐘？這是他們最放鬆的時候。因為已經站了快四個小時了嘛，快換崗了嘛。太陽又大，人最累。”潘子良說。

“我看錶算過了，他巡邏過去再轉身回來，到看清這邊發生的情況，大約需要 5 分 10 秒以上的時間。我們那時離邊界已經很近，5 分鐘還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過河才幾秒鐘。等他們回頭來巡邏到這裡，”潘子良手中的樹枝指著閘門山的山腳說，“我們已經衝過了河，他們想抓也來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們就不敢開槍了。”

大家不能不對這位去緬甸打過戰的連長投過去佩服的目光。

“好了，沒事了。現在，大家養好精神，睡覺去。”

所有的婦女兒童當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叢中睡了。打石隊的人全部回山下的營地，一切照常，以免部隊的人突然來訪發現。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現在山頭上。

“起來——起來。”大家起來時，發現潘子良輕裝打扮，綁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經站在一個小坡上了。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我們拼命的時候到了。”潘子良說。

大家都有些緊張。

“我把話給大家說明白了：像我們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給共產黨抓起來，進監獄、槍斃。反正一個字：死。只有拼出一條命來衝過去，才有一條活路，才能挺起腰來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顯得有些悲痛。

“我為甚麼要 32 個人一起衝呢？”眼圈有些紅，“有些弟兄還不明白。他一個哨兵再有本事，回過頭來，也抓不了我們 32 個人。就是開槍打死我們兩個，我們也能衝過去 30 個；打死我們 10 個，我們也能衝過去 22 個。值！”

大家一下子都靜悄悄的看著潘子良。

有女人在“悽悽”地哭……

“不許哭！”有人制止說。

潘子良說著眼淚也往下掉：“過河時男人都走在最後，我在最後的最後——我也許會死，要是我死了，我的兒子拜託各位了，他現在住的地方是 ×× 省 ×× 縣 ×× 鄉 ×× 村。各位將來好了，要還記得我潘子良，能回來把我兒子也領到自由世界去，給我多燒幾炷香，我就感激不盡了。”

一片死前的寂靜。

“記住，到了香港的人，將來好了，發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說。

幾個女人的哭聲由於被抑制而顯得格外悽慘。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覺到事情的危險，反而一點也不哭，只是緊緊地貼在女人懷裡，根本用不上原來準備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變得兇狠異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幹掉那個當兵的，然後大家聽我的命令，衝！照業，走！”

潘子良的分析失誤了，因為那次新兵王志剛沒有巡邏到一公里外的頂點處，就提前轉了回來……

四

煙捲燒起的青煙嫋嫋上升，那是從坐在我對面的王志剛嘴邊飄過來的。

“楊照業抱住了你的腰以後又發生了甚麼事？”

“不是很清楚了，後來告訴我是潘子良在我頭上打了一棒，當時我只知道，眼裡是一片金花，耳朵裡嗡嗡的，甚麼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後來，我依稀聽見噼噼啪啪的，像平時炒豆子的聲音，我馬上意識到

是槍聲，頓時清醒了許多，我知道那是開槍了。我想爬起來，可是爬不動。就有人來救我了。”

“你還看見了甚麼？”

“眼睛看不清，矇矓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過河來，男的女的都有。”“再後來呢？”

“再後來……”他似乎在搜尋著記憶，“我記不起來了，已經在醫院了。留下了這個——”他攏起頭髮，頭上有塊疤。

有一種說法是，當32個越境者一齊衝向深圳河時，可能是被槍聲嚇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於是又回過頭來，跑向北岸去抱小孩……

2009年5月，當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線索的香港老闆問詢文章意見時，兩鬢白髮，年近六十的他正忙著準備參加一個政協招待會，由於對特區建設作出的貢獻，他新近被評為“優秀投資商”。

关于宝安县閘門山边界发生
打石“工人”集体越境事件的通报

今年10月6日在宝安县閘門山东与香港交界地区附近曾发生一起
2名“打石工人”集体强行越境事件。这批越境犯当即为我边防哨兵
觉，在警告无效后，即开枪射击并有部分边防新战士越界十几公尺拦
和射击，已越境的分子和越境拖回被击毙的越境犯之屍首，計捕獲6
內男、女各3名（3个小孩不計）斃伤后拖回來的各1名，越境未
獲者24名，內有兩名重伤越境后即死去。射击時間約持續4至5分
鐘，消耗子彈231发，並有部分子彈落在英方界內。当我战士越境射
击时，对方边境碉堡（出事地点对面）曾架起机枪准备射击。在我停止
射击后不久，英方开来吉普車兩輛，臥車一輛，並在出事地点摄影观察
和檢獲我越境遺下的槍彈若干发，随后将24名已越境的分子全部运走。

“是的，是這麼回事。”他的聲音有些顫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緩緩撫摸著，眼圈都紅了。“謝謝你，謝謝你，記者先生，我已經很滿足了。”他摘下眼鏡來擦著眼睛說。

我發現老人的聲音在顫抖：“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一個民族要是內部對立，會給百姓帶來多少慘痛啊。現在，誰是誰非並不重要了。連戰都回來了，兩黨握手了。溫總理都要我們捐棄前嫌了，還有甚麼呢？重要的是中國人都記住有過的這一段慘痛的歷史，不要讓它再發生了。”

第三節 深港特工秘密戰——活擒劉立福

曾經是中國第一高樓的深圳地王大廈腳下，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一個不小的廣場，叫人民廣場。寶安縣的許多群眾大會就是在這裡舉行的。1956年7月29日，在這裡舉行了幾千人的群眾大會，由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特務劉立福死刑，當即押往而今的紅寶路地帶槍斃。

—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著花條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經過羅湖橋時因為帶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的行李而被帶到了調查室詢問。在調查室裡，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機關某人通電話的要求。

十幾分鐘後，一輛吉普車開來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帶去寶安縣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還有一位寶安縣公安局的領導。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戰友握著香港男子的手搖著。

香港男子說的是廣東的客家話。局領導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當時在場的偵察科懂客家話的小Z充當翻譯。

“4號同志叫我向你們問好。”香港男子說，“他叫我口頭帶來情報：劉立福為陳鏡輝收買，過河來爆破鐵路。國慶節前就可能從香港蓮麻坑一帶渡河。請你們注意防範。”

半小時後，寶安縣公安局的院子裡，有個工人在單車後尾搭著該名香港男子進入深圳火車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報機構不通過其他途徑，而是派人親自過河來送情報，說明此一情報的機密性。

陳鏡輝是甚麼人？劉立福是甚麼人？這位中年男子送來的情報說的是甚麼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立後，退縮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潛入大陸，策動對紅色政權的顛覆破壞。台灣海峽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國民黨勢力潛入大陸的最好通道。

當然，共產黨也不是等閑之輩。深圳河北邊早作戒備，佈滿眼線。據說，廣東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門的陪同下參觀羅湖橋時，問：“我們的地下線索在哪裡？”陪同者指著佈滿車站前的雜貨店、報攤、賣雲片糕的小販說：“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們的人。”

雙方的情報部門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據說，在香港，有人是專幹“販賣情報”這一行的：共產黨給錢，給共產黨弄情報；國民黨給錢，給國民黨弄情報。誰給的錢多，情報給誰。



20世紀50年代的寶安縣公安局局長李馨亭在辦公室向作者回憶深港邊境往事

當時，國民黨針對深圳河邊境的特工組織主要由台灣的“中委二組”直接指揮，首領是一個寶安縣觀瀾鄉人，名叫陳鏡輝。

雙方的“特工”雖然彼此從不見面，卻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組”頭目是誰，隸屬台灣的哪個系統領導，最近主要的行動目標是甚麼。陳鏡輝同樣也知道：河對岸那個對手叫李馨亭，是山東東明縣人，老家地名叫五霸鄉。甚至連李馨亭甚麼時候南下、老婆在哪兒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偵察員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師談戀愛……他們都清楚。

所謂高手過招，誰也不服誰，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個人員，我還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無聲地進行著。

1955年，台灣方面給予“中委二組”指示：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期間，派人偷渡過河去，炸掉廣九線的一段鐵路。

一旦鐵路癱瘓，按時駛入廣州和香港的列車突然停開了，消息會很快傳到國內外，這不僅會在廣州和香港造成恐慌，還能在國際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穩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裡放顆炸彈不行啊？以各位對寶安縣的熟悉，不說放顆炸彈，就是放顆炮彈，也只是濕濕碎（小意思）的事啦！”陳鏡輝端了一碗酒，繞場一周，敬著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眾弟兄一齊舉杯。

陳鏡輝在會上佈置任務的事，第二天就成為寶安縣公安局秘密會議上的討論題目。以致後來被捕的國民黨特工不能不搖頭感慨說：“還以為我們的內線厲害呢，你們的更厲害！”

但實際上，寶安縣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計劃的表層，“中委二組”的核心組織還沒有人打進去。這個計劃派誰來執行？偷渡走甚麼路線？手法打算怎麼樣變化？依然不清楚。

當時可以判斷出來的只是：執行人很可能不走羅湖橋的正常通道，而採取從深圳河邊蘆葦叢偷渡的路線。這是因為從羅湖橋以“港澳同胞探親”身份通過，必須接受嚴格的檢查，帶上炸彈不容易；而陳鏡輝身邊有不少寶安縣人，熟悉地形從深圳河一帶偷渡，較為容易。

讓李馨亭感到為難的是，邊防線這樣長，很不好防。過河就靠近鐵路

了，放個炸彈就是幾分鐘的事，對於熟悉邊境的人來說，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辦法當然是：掌握核心機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過河時就先抓住。

寶安縣公安局把得到更“進一步機密情報”的要求向上級提出來了。

真要感謝那位神秘的“4號”，現在，情報送來了，準確地指明了：人叫劉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蓮麻坑一帶。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辦多了。

至於送來情報的“4號”究竟是誰？這連當時寶安縣公安局的最高層也不清楚。也許就是前面說的代“4號”問好的中年人本人：“寬臉膛”、“三十多歲”。

當然，也許根本不是。

二

“劉立福。”偵察人員打開秘密檔案，細細尋找著那個準備過河來炸鐵路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須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檔案中記錄著。

“劉立福，男，寶安縣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關人員對劉立福的外相描寫，也在記錄中：

“20多歲，白淨面皮、面貌俊秀，有點像女人。人非常機靈、善變，行動詭秘。喜歡同女人說笑，好色。說話時喜歡用食指和中指併合打手勢。”

據說劉立福在讀書期間還被“中統”相中，學習過有關的諜報知識。

由於寶安縣的偷渡者過河之後，往往會找不到工作，國民黨的特工組織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發現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養，然後再派過來。

劉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陳鏡輝就把他網羅為準備送往台灣深造的“重點訓導對象”。

有趣的是，據說，當時中共在香港的情報人員也注意到了劉立福，開始還準備把他發展成為中方的諜報人員。當時有關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劉

立福不是死心塌地為國民黨服務，他可以腳踏兩隻船，為國民黨方面提供一般性情報，以掩護自己，而暗中應為我們提供更機密、更重要的情報。

但是，劉立福的一個叔父在鎮反時被共產黨槍斃，他反共立場很堅定。陳鏡輝用重金把他發展成“中委二組”的諜報人員後，他拒絕了中共駐港情報機構對他的“收買”。

對於這樣的危險人物，廣東省公安廳特別指示：一旦偷渡過河，立即利用機會，執行武力抓捕！

陳鏡輝選擇劉立福，當然還考慮到劉立福是寶安縣當地人，說話、利用地形，都有條件。反過來說，一個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邊界就會被監視。

但陳鏡輝萬萬沒想到，選擇寶安縣當地人，又給寶安縣公安局的偵察人員對爆破點位置的尋找，提供了一個可供判斷的條件。

情報分析人員認定，因為被派遣人一般會選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劉立福不可能選擇到深圳鎮或者龍崗鄉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險。所以，“中委二組”計劃的爆破地點，很可能就在劉立福長期生活過的廣深鐵路的平湖一帶。這就大大縮小了防範的範圍。

很快，在準備“過蓮麻坑便抓捕”的同時，寶安縣公安局還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應對：廣深線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強，變得水潑不進。

根據“4號”提供的情報分析，劉立福的潛入爆破時間，可能是在1955年的國慶節前後，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魚兒上鉤。

但是，時間在一天天過去，沒有動靜。

1955年的國慶節，寶安縣城裡開了慶祝大會，晚上舞龍燈。劉立福沒有來。

又過了幾個月，從香港那邊傳過來的情報說，沒有甚麼變化，劉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廳，同舞女們打牌、喝酒，看不出他有甚麼要行動的跡象。

是“4號”的情報有錯，還是陳鏡輝的計劃改了？

1956年2月的一天，羅湖邊檢站的監視哨突然報告：劉立福出現了，執香港居民身份證，正在海關接受檢查呢。奇怪，沒走蓮麻坑了。他怎麼還選擇了這麼一個時間進來？就是離五一節，也還有兩個多月啊！

“是讓他入境還是馬上抓？”電話那頭，偵察員小周悄悄的聲音。

“有沒有帶違禁物品？”公安局長問。

“沒有——甚麼也沒帶，就一個包。”

當然，這是個好時機。抓了他會省了很多後患。但是沒有“現行”，就是有血債的國民黨憲警，過境時也不能抓呀。

一時已容不得考慮那麼多了。人已在月台邊，再拖他的時間說不過去。

“先放他進來。”

當時的判斷是：劉立福必定是帶有任務來的，有任務就會行動，只要盯得緊，不怕他行動，行動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劉立福來到深圳鎮上後，甚麼也沒幹，在雜貨店買了一包香煙，在車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鐘。好像很無聊似的，漫步到攤上買了一份《羊城晚報》，突然轉身上往廣州方向去的火車。

車站旁賣報攤的王老頭，立刻把情況傳給了走過來買報的“港客”——偵察員劉志新。

這傢伙上火車是要到哪裡去呢？想幹甚麼呢？

火車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開。

寶安縣的公安機關，立刻通知在他的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圍和鐵路沿線加強警衛，等著劉立福回老家來。一邊派人跟蹤劉立福上了火車。

但是，劉立福沒在平湖下車，火車拐了一下，朝廣州去了。

劉立福一直到廣州才下車。

一下車，他身邊突然冒出來一個七八歲的孩子。

他領著孩子在廣州火車站轉了一圈，又突然跳上了火車，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

這傢伙在賣甚麼藥啊？他潛入過來的“任務”，難道僅僅是給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來領孩子偷渡的嗎？

打掩護，這小子不會那樣簡單。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甚麼呢？他會要在這個時間搞爆炸嗎？

不管怎樣，先上火車，盯住了他再說，別讓他跑了。

在劉立福後面的座位上，有四個高聲叫著打撲克的青年；在劉立福座

位前面的過道上，一個找不到座位的“農民”正將行李“橫擺”在過道上抽捲煙。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經心地欣賞窗外的風景。

現在，前後有7個偵察員堵住了劉立福，劉立福可說是插翅難飛了。當時的計劃是：到了深圳，先以“帶小孩偷渡”為名扣押劉立福，把他關起來再審。

但是，此刻，劉立福似乎一點警惕都沒有，火車剛出廣州站，他竟靠在長椅上打起盹來。躺在地板上裝睡覺的偵察員從地板朝上看，看得見劉立福懸著的兩隻腳和穿著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難飛出去了！

車過了石龍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

他沒下。

過了平湖就是布吉，過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

像從地上蒸發了一樣，一到深圳，劉立福就不見了！

座位上留下的是那個孩子。

三

當夜，香港方面的內線情報人員就報告說，劉立福此次過境，目的還不是爆破，是轉手另一個情報。本來要在平湖下車回老家，順勢觀察的。但在車上，他同偵察員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時候，發現了危險。於是不走羅湖橋，中途突然下車，臨時決定偷渡回去。現已回到了香港觀塘家中，窗口的燈已經亮了！

好個狡猾的劉立福！他在廣州火車站已經順利交接了情報，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轉的手。

“我們上當了！”

“一定要抓住劉立福！”第一次的恥辱讓偵察員們分外氣憤。

還好，根據香港方面的情報，劉立福並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動任務——節日爆破鐵路的計劃已經暴露。因此，照分析，他仍會再來。

又是兩個月過去。偵察員們等著。

1956年4月26日，寶安縣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報，劉立福將在五一節前夕過來，這次他的任務才真正露出陳鏡輝的底牌：爆破深圳的

平湖—布吉之間的鐵路。

絕密的命令下到了守衛邊境的三〇團部隊各崗哨，尤其是與蓮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邊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開槍。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帶回來！”

鐵路沿線也加強了崗哨，平湖—布吉一線的鐵路線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邏車來往巡邏。即使劉立福通過了邊境線，也根本無法靠近鐵路實施爆破。

這回，李馨亭把劉立福的破壞計劃再多作了一種考慮：萬一劉立福不走羅芳村渡河呢？萬一他直接走羅湖橋，作為港客回鄉合法入境呢，怎麼辦？

對劉立福來說，這樣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為“港澳同胞”，只要沒有“現行”，誰也不可以抓他。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藥，可能早已經有人先帶過來，藏匿在他家中或者甚麼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個好覺，然後突然在某個時候出現，到某個地方，取出炸藥，瞅著機會，飛快地靠近鐵路，在幾分鐘的時間裡完成爆破。

為了對付這一種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隊伍，將白泥坑村周圍的山頭、道路以及劉立福的家秘密包圍起來。

“我記得是 26 號下午開的會，27 號我就與葉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陳恩祺回憶說。幾十年的事情，至今還記得在哪一天發生，可見老偵察員獨到的記憶力。

“我們去的時候，民兵隊長還不以為然呢，”陳恩祺說，“還說，不會吧，劉立福人挺老實的呀，他怎麼會幹這個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條小路，是劉立福要潛回來必走的，十幾個民兵，還加上我們公安局的五個人，提前埋伏在路邊上。

雖然是四月份，天氣已經是悶熱難耐。尤其是夜晚，十幾個小時趴在草叢中，蚊子一團團地來圍攻人。“也許是太盼望抓到劉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沒感覺了。”老偵察員們回憶著。

“28、29、30——”他掰著指頭說，“我們就這樣在草叢中整整等了劉立福三天。沒來。”

“5 月 1 號晚，大約 11 點的時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處小

便，猛聽到筍崗橋方向‘轟——’地一聲巨響，爆炸了。”

“狗日的，給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沒有上白泥坑來！”

劉立福順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這是怎麼回事啊？他過境時也沒有被抓住嗎？

劉立福是怎麼爆破成功的呢？這在當時成為一樁轟動的疑案。

據後來偵破的情況，狡猾的劉立福突然不選擇他熟悉的蓮麻坑路線偷渡，而選擇了他不熟悉的從香港新界到深圳黃貝嶺的路線偷渡。那兒深圳河上有一段蘆葦特別密。據說，這條路線是他從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當時，我也早有一點預感，這傢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偵察人員說，“因為據香港方面情報，他應該在4月28日就已經離開了香港，就是說，我們有三天時間失去了他的蹤跡。對手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消失了這麼久，這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那麼，這三天中，劉立福到哪兒去了？

直到後來劉立福被抓獲，才揭開這個謎。

為了隱蔽行蹤，在到達了深圳方面的黃貝嶺後，劉立福哪兒都沒有去，就一直臥伏在酷熱的稻田裡，整整躲了三天！全靠乾糧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鐵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這樣，他憑著堅韌的毅力，終於得以在寶安縣公安人員的眼皮下消失三天，無法跟蹤。

“這個人好耐心啊！”老偵察員們至今還感歎說。

那麼，他又是如何接近鐵路而未被抓獲的呢？

其實，哨兵是有機會抓住他的。劉立福在4月30日時已經第一次接近了目標，即平湖的布吉橋一段。那是深夜兩點。那時，在嚴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動，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兩點半左右，負責埋伏的鐵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點了一根煙。據後來劉立福交代，就是這兩下紅閃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險，再次折回到隱蔽處。

潛伏在草叢中的劉立福發現，他的行動已經暴露。可能內部有共產黨的內線，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標，怎麼會突然有如此嚴密的監視，並且設有潛伏？

面對密密層層的潛伏哨，劉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經給陳鏡輝立了軍令狀。只有麻著膽子，炸！不管在哪裡，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於是他橫下一條心，抓住時機，還是要接近鐵路。

5月1日深夜，他離開了布吉橋，像蛇一樣滑到了深圳鐵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叢中苦苦等待時機。

由於兵力都抽去防“重點”了，這裡的巡邏要鬆弛很多。他悄悄等著：十點、十點半、十一點！

就在巡邏哨過去的幾分鐘時間裡，他突然竄上了鐵路，安放下了炸藥，飛快地點燃了引線……

清水河路段的鐵軌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藥炸翻了十幾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廣九火車停開，數千旅客滯留在香港和廣州車站。

香港、台灣的右翼報紙沒命地狂呼：“愛國志士英勇爆破”“共黨五一節一片恐慌”。

趁著人們的注意力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剛矇矇亮，劉立福已經按照原路，經羅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劉立福炸損鐵路被看成“中委二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灣國民黨情報組織的高度嘉獎。在慶賀酒會上，陳鏡輝高舉酒杯不可一世地稱：“我們現在有了一位可以來往深圳河如入無人之境的‘英雄’。”

當記者問他“英雄”叫甚麼名字時，陳鏡輝說：“我們暫時無法告知英雄的真實姓名，這要等到我們成功光復大陸以後。不過我們已給他一個綽號，你們可以在報上這樣稱呼他：‘飛魚’！”

當時負責深圳保衛的公安局副局長李馨亭，在1956年被免去了職務，調往廣東省龍門縣。

四

廣東省公安廳震動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氣”了！

最高國家安全部門嚴詞切峻，為此事專門成立的工作組趕到了深圳，帶來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簽署的命令。

“公司”（當時中南軍區公安軍司令部的代號）嚴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獲這條為大陸安全帶來巨大危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聲譽帶來巨大損失的所謂“飛魚”！

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不得已動用了香港“4號”。

正當“英雄”劉立福在燈紅酒綠的尖沙咀“泡”得暈暈乎乎的時候，他的死期也已經逼近。

一個月後，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廣州地下反共組織要加快行動，急需電台，著“飛魚英雄”劉立福立刻攜帶電台部件趕往廣州。此次成功後，他將不再在香港行動，台灣當局將提升他去台灣特工總部任職。

對於上司的器重，劉立福興奮不已。在“勝利”的狂熱中，他向陳鏡輝表示：3天內可以成功返回。“共產黨的防線”“不過是薄薄的一張紙”！

他，太驕狂了！

只有老練的陳鏡輝對劉立福的前往表示過遲疑，他曾向“上峰”提議“劉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嚴加防範。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嚴詞切峻，以“廣州情勢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誤”為由，催劉立福立即啟程。

二話沒說，劉立福稍加準備就再次偷渡黃貝嶺。

結局是這樣的簡單：當劉立福帶著電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



50多年前被稱為“飛魚”的國民黨特工劉立(又名劉立福)被判死刑的報導

劃過的路徑，剛鑽過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員按倒在地。

情報之準，令人驚異！

當時被抓住的有兩人，另外一個是劉立福的助手。他們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羅芳村附近一間電子廠裡。現在是一個籃球場，當時是一片蘆葦。

1956年6月，所謂的“飛魚”，終於在嚴密監禁下，以“反革命特務”罪，接受了廣東省中級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經是中國第一高樓的深圳地王大廈腳下，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一個不小的廣場，叫人民廣場。寶安縣的許多群眾大會就是在這裡舉行的。1956年7月29日，在這裡舉行了幾千人的群眾大會，由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特務劉立福死刑，當即押往而今的紅寶路地帶槍斃。

五

說到這裡，人們或許會想到另一個重要的人物——“4號”。

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他現在在哪裡？

“說實在的，我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是無名英雄。”

幾十年後的座談會上，深圳的老公安們，無不這樣謹慎地回答我。

對於“4號”，我可以告訴讀者的是：到20世紀90年代末，他已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開著一家不大的商場。有時也會到台灣的兒子家小住。喜好種花，他的蘭花據說還在香港某展覽會上展出過。

1999年，他在香港靜靜地去世，只有老伴陪著，葬禮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樣簡單無華。

他的兒女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輩子都是個生意人。只有大陸最核心的公安部門，才會用代號記著他的真實姓名。

當然，記錄諜報人員的那些冊頁，照規定到一定的年月就會被銷毀，是幾乎所有的世人都不能再記住的，包括他們的親人……

在香港的山頭上，有許多公墓，墓前立著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塊，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實姓名。

也許——連碑也沒有。

第四節 荷葉塘故事——一個地主後代的回憶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這張條，就說明你出來了，媽媽已經沒了，你的家也沒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趕快跑吧——媽媽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沒讓你們同你爸爸跑……”

得到他的允許，我公開這段故事。

1997年2月的一天，香港旺角一間酒樓裡，十分熱鬧，不大的酒樓上，熙熙攘攘擠滿了喝早茶的廣東人。

對面這位頭髮斑白的老人按輩分是我的表哥，名叫何增璜。原住湖南省桂陽縣的何家巷，20世紀50年代從老家潛到深圳，然後偷渡到香港。

“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我用小名叫他。還帶著縣裡請港台人士回鄉去辦廠的“拜託”。

“不回了，不回了。”他搖著斑白的頭，“回去做甚麼呢？甚麼都沒有了。”有些淒涼。

半天，他忽然問我：“石板街還在嗎？”似乎在想甚麼。“還有，我家後門園裡的石榴樹，還在嗎？紅紅的，這麼大——”他拿手比劃著，像當年爬在樹上摘石榴的孩童。

他想著他的家呢，這位離鄉幾十年的老人。其實，他哪還有家？他家



作者的表弟文嘉寧（左），曾在深圳白石洲下海偷渡時為狼犬咬傷、被捕，經多次涉險後逃到香港轉居加拿大。

所有的磚瓦，都早在大躍進中被拆了建煉鐵爐了。

我的心便不覺有幾分悲涼。

他忽然停頓了一下，靠攏我，緊張地問：“還有，荷葉塘呢？還在嗎？”他似乎很怕提起那個地方。

這是為甚麼呢？

—

我的家鄉在湖南的南部，是個小縣，名叫桂陽。

縣雖小，卻出了一個全世界都有名的偉大人物，那就是蔡倫。

也許是造紙的緣故罷，小縣城的水井特別多，水也特別清甜。

清清的小溪水，與長長的青石板街道平行著，構成了一道詩意的景觀，一同向南緩緩“流”去……於是一些人家的門檻邊，就會架上一道道彎彎的像橋一樣的磚拱，用來過人。月牙形的，別緻得很。

小溪的水流過了何家灣、七里街、洋行角……最後接上一片水塘。塘裡長滿了綠綠的荷葉，紅紅的荷花，都在夏天的風中一搖一擺，美麗極了。那便是大虎表哥問的他小時候抓魚的地方：荷葉塘。

“在的，在的。”我只好告訴他。

他噓出了一口氣：“啊，在就好——不要破壞了。”

50年前，美麗的荷葉塘附近，便是大虎表哥的家。

大虎家的房子很氣派，門額上題著三個字：家風第。

大虎的母親，也就是我的五表姑，出身官宦門第，她算起來，應該是曾國藩的重孫輩了。

五姑丈是在國民黨部隊中當營長的。大陸解放前夕，國民黨的部隊被打得七零八落。散兵游勇到處亂躲，五姑丈便失去了蹤跡。

那一日，已經是深夜了，五表姑突然聽到有人在窗口叫：“文琪、文琪——”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她一回頭，便吃驚地看見窗口上露著一雙眼睛：五姑丈回來了！

“哎呀，你還敢回來呀！”她趕忙開了門，把五姑丈迎進來：已經換了便服了。

五姑丈背靠著門，卻不進來：“快，收拾東西，快跟我逃！”

“逃？去哪裡？”

“香港——大虎二虎呢？”

“在床上。”五表姑指著熟睡中的大虎兄弟。

“快叫醒他們——人家還在山後頭等著。”“人家”指的是準備一起跑的城裡的幾個大戶。

據說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還有桂陽城裡“大北關”劉家兩兄弟、縣城姓李的國民黨黨部書記，還有一個少校軍醫。後來都住在香港的調景嶺，一輩子沒再回來。

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麼也叫不醒。“你別叫這麼大聲啊，外面聽見啦——”姑丈很擔心。

五表姑忽然想起，帶著孩子是逃不了的，便催五姑丈：“你逃吧，他們能拿我母子怎麼樣？又沒做壞事。”

話還沒完，就聽到有人擂前廳的大門——是民兵！

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後門推：“快跑！”兩人轉身就到了後門。

走到牆邊，五姑丈爬上了梯子，淚珠就掉下來了：“但願菩薩保佑你們沒事。今生不知還有沒有再見面的日子！”說完，翻身就出了後院的牆。從此跑了香港。

等兩個端著槍的民兵進來時，五姑丈已經逃遠了。

“為甚麼不開門？”民兵問。

“我沒聽見。”五姑扣著衣襟說。

但梯子是來不及搬了。

“呀——後牆還有梯子呢！”一個民兵在後院發現了木梯。

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關了一個月，從此成了日日被批鬥的對象。

我至今還記得五表姑被遊鬥的情形。

一長串衣衫襤褸的隊伍，從石板街道的盡頭上走過來了。隊伍中的人，用一根長長的麻繩串在一起，像孩子手裡的一串大螞蚱。民兵拿著竹片在後頭吆喝著：“走！走！”如同趕牲口。五表姑就跟在這行列中，胸前掛著牌子，上頭的紅叉裡寫著：地主分子陳文琪。

她低著頭走。頭髮有一半已經花白，身上的藍布衣卻十分整潔。

她的手裡拿著一根筷子敲著一個破熱水瓶。走幾步，後頭的押解人就在她的頭上拍一巴掌警告：“敲響點！”

於是，筷子敲著破熱水瓶的“念經”聲，便響得更高：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她自念。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她依舊自念。

“打倒罪大惡極的國民黨家屬陳文琪。”她還是自念。

有時母親隔著窗口，看著從石板街上走過的“地主婆”隊伍，會驚慌地關上窗子：擔心這“風”也會吹到我們家裡來。然後著急地對父親說：“文琪呀，怎麼舊社會的習慣還不改呀，都押著遊街了，還穿得那麼整齊，找死呀！”

父親不做聲，他本身就很危險。

遊街結束的當晚，大抵都是鬥爭會，由居民小組組織。

晚飯過後的時間，長長的石板路上，便迴響著鐵皮喇叭筒的喊聲：“各

家各戶注意了！今天晚上，在三廳屋開鬥爭大會。”

順便說一句，這種鬥爭會是可隨意舉行的，主要用來“抓革命、促生產”：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難、修馬路的任務完不成、“除四害”還欠著數字……那一定都是“四類分子”（地、富、反、壞）搞的“破壞”，可以搞一次“鬥地主”來“促生產”。

至於那天的鬥爭會鬥哪一個，也是隨意的。看居民組長的喜好而定，如同抓出關在籠裡的雞。

廳屋的地下用木柴架著，燒著一堆大火。火堆旁，密密麻麻坐滿幾十個街鄰。古街鄰居，年年結親嫁女的，如果照人們血緣看，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親戚：或是叔伯舅舅，或是表弟表兄。

但是，這些曾經親親熱熱，一張凳上嗑瓜子的街鄰親戚，開起鬥爭會來，個個像是有深仇大恨，爭著“大義滅親”！

“陳文琪站出來！”喊五表姑出來的，正是她的遠房表妹，居民小組長。

五表姑就站出來了，在一圈群眾中勾著頭……

火山爆發般憤怒的口號聲：

“打倒反動分子陳文琪！”

“陳文琪老實交代！”

“快說！你是怎麼放走偽營長老公的！”

“我上次已經交代過了。”五表姑回答，語氣很硬。

有人尖叫：“你同反革命老公有沒有聯繫？”

五表姑反問：“人都跑香港了，怎麼去聯繫呀？”

“呀，還不老實啊！”這裡“老實”其實是“馴服”的意思。

“這是要打！”就有人憤怒地叫著，正義地從隊伍中跳出來，對著五表姑就是一耳光！

“打得好！打得好！”人群中有人叫好——打人的正是準備入團的街鄰秀秀。

“端渣子來呀！”秀秀聲嘶力竭地叫著。

就有人端了一籬爐渣子進來，“撲——”地倒在地上，鋒利的渣尖向上朝著，像張著口。

“跪下！”秀秀在五表姑後頭推了一把，她便“哎喲”一聲慘叫，雙膝已經跪在了爐渣上，鮮血從她跪著的膝蓋邊——自然會有人把她的褲腿挽上去的——流出來。

終於，一個小時後，五表姑暈死在地上了。

於是，有人把關在屋裡的大虎二虎放出來，讓他們把母親揹回去。主持人也滿意地宣佈“鬥爭會很有成效”，大會結束，明天上水庫。

餐桌邊的大虎擦著眼淚對我說：“他們就是這樣折磨我無辜的母親。母親怕我們多事，晚上回來，還安慰我們兄弟說，沒啥，這年頭，挨鬥的人多呢。運動過了就沒事了，平安了。”

不過，五表姑的這個希望也破滅了，不久，小虎就出事了。

二

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所以他出的這事我前後都清楚。

那一天快放學的時候，教室裡突然進來了面色嚴肅的校長和班主任，而且後頭還跟了比他們更嚴肅的公安。

我很快感到氣氛不對。

“今天下午，有哪些同學進廁所了？”

問得太突然，被恐懼籠罩的教室中，幾十個小腦袋木木地豎著，像水面的一根根樁。一片死寂。

“聽見沒有——進了廁所的站起來！”校長氣憤得漲紅了臉。

我的身後站起來四個同學，其中就有小虎。

“你們都在那做甚麼了？”校長問。

“拉屎……”其中一個大點的怯怯地說。

要是平時，這種回答一定會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但這次沒有。整個教室靜悄悄地，緊張得像落下一根針都可以聽見。

“我也是。”

“我也是拉屎。”其他三個都說。

“拉屎？誰在廁所裡寫字了？”校長問。

四個學生都互相望著，沒有人承認。

“這是誰的？”黃軍裝公安拿出一張作業紙來，舉過頭頂，上面用鋼筆寫著幾個字：“苛政猛於虎也”。

這不是我們正學著的《孔子過泰山側》中的話嗎？

“還要頑固嗎？”這回是公安問，態度倒平和，眼光在四人中掃射。慢慢集中在小虎的身上，不動了。

“我……我，”小虎聲音在顫抖，“我，錯了——”

兩行眼淚從他臉上流下來。

“說得輕鬆，”公安說，“帶走！”

就有另外兩個公安跑上來，抓住了小虎，像抓著一隻小雞似的往教室外頭去。我聽見小虎在被架出去時叫著：“我不是啊，我不是啊——”

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後說的“不是”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說他只是隨意寫上的，並沒有“反動”的意思。

後來知道，是去了廁所的團支書到校長室報告的，說在廁所裡發現“反標”。那團支書後來被“錄取”到省城的高中。

當年學校的廁所很簡陋，只是一層木板樓，排著十幾個鋸出了糞洞的格子，用木板隔開。

“反標”——就是那張作業紙，被人貼在格子中的板壁上。

“作案”工具是鋼筆。字跡顯然是小虎的，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頁的作業本為證。

那時，我弄不清，孔子過泰山側幹嗎要說那些話？我更弄不清，小虎把那張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作業紙貼在廁所中，究竟有甚麼意義？

事情最後被定性為“反革命”案件。15歲的小虎被關進了監獄，接受共和國法律的刑判。

這究竟是無意的，還是“階級鬥爭情結”的發泄？今天想來，恐怕的確是後者。世上本應無“仇”，本應無“鬥”。仇恨卻因為煽動，你要鬥我，我也鬥你，越煽越烈。

小虎最後被判了十年徒刑。

但是，犯人才15歲，“階級報復”得要被證明“有人指使”才順理成

章啊。當然，“指使者”便是他的母親和哥哥了。

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時被捕，關押了半個月，追查同“反動標語”的關係。從此，17歲的大虎就被共和國“內部監控”起來了——照規定：凡不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如其直系親屬中有被無產階級專政“關、管、殺”者，他本人也就理所當然地進入無產階級政權的秘密“監視”之列。這在《公安條例》中稱為“十六種人”——直到後來宣佈“階級鬥爭”的錯誤才取消。

“你們進十六種人了，不能亂說亂動，知道嗎？”公安指著兩母子：“要互相監督，互相揭發。誰敢於揭發，誰改造得好，誰就早解放。”

三

香港的酒樓上，大虎在繼續往下說：“事情在慢慢起著變化，二虎關進去以後，一個夜晚，我剛修水庫回家，母親把飯端到我面前，看我吃著，突然說：大虎，你逃吧。”

逃？大虎一時還不明白她的意思。

“逃香港，找你爸爸去。”

大虎遲疑了一下，問：“不，我要走了，你怎麼辦？他們會找你的。”

“娘都快50的人了，他們能拿我怎麼樣？”五表姑說。

“不，我不能走。”大虎摟住了娘，“現在就剩咱娘倆了，要死咱娘倆死在一塊！”

昏黃的燈光下，大虎的眼淚滴落下來。

幾天以後，居民小組派大虎到離城20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庫。

這是個大晴天，清早起來，大虎吃了一碗母親準備的甜酒，揸起行李和錘子同幾個一起幹活的青年上路了。

陽光暖暖地照著，拱橋下的綠水輕鬆地唱著歌。

“走到那條石板路的轉彎處，也就是在離荷葉塘不遠的地方，突然我想回過頭去……看一眼我的母親。”大虎聲音哽咽，“我至今不知道這是為甚麼，平時我出門，全不是這樣的，難道這就是心靈感應？這時，我發現母親也站在窗口望我呢……”

“沒想到這就是我見她的最後一面。”

老人的淚水溢出了眼眶。

四

兩天後的傍晚，四個孩子到小城外的荷葉塘游水。昏暗中，有人看見水面浮上來一大塊東西，還以為是一段木頭，就用竹竿去捅。等游過去看時，才發現是一具屍體。

五表姑是抱著一塊石頭沉到塘底的——她學過游泳，擔心自己沉不下去。

沒有人看見她投塘。只是在前一天黃昏，有人看見她穿得乾乾淨淨，把門鎖了，提了一桶衣服，往荷葉塘洗衣去。

屍體扔在塘邊上，很久沒有人敢管。據說公安並沒有去——死的只是一個地主婆，用不著去的。也不會有人去追究她為甚麼會自殺，地主婆自



當年五表姑投水的地方——桂陽縣城南荷葉塘，面貌已非昨日。

殺是常有的事。

事情傳出去，小縣城中還是有了議論，都說是畏罪自殺。

“大約是還有沒坦白出來的吧。”革命人民懷疑。

“八成，那寫反標的事，同她也有關。”更有人肯定說。

得到凶訊的大虎是第二天才從工地趕回來的。公安局表現出人道，同意讓獄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槍跟著出來，看他的母親一面。

兩兄弟於是得以相聚。先是抱著母親濕漉漉的身子哭，後來是兄弟抱在一起哭，再後來是跪在地上哭。

兩兄弟求一位路邊的老奶奶為母親換下濕的衣服，這是做兒子的沒辦法做到的事。天上的烏雲聚積，兩兄弟求人的頭磕得地皮“嘣嘣”地響，天地動容！

街鄰都只是遠遠地圍成一圈看著，不敢走近，更不敢同他們搭話。

三天後，回到工地的大虎就從水庫上跑了，毫無牽掛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找他父親去了。

逃跑前他還打傷了一直盯著他的燒石灰的伙伴——在五位派去修水庫的青年人中，有一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務，要監視“十六種人”的大虎的“哥兒們”。

“我命大，過河很順利，也沒遇上警犬，很快就到了香港。”大虎說，“我明白了母親的意思：只有她死了，我才會下決心跑！”

當然，此後，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後家中發生的事了。兩地隔絕，沒有人會傳給他家鄉的音訊。

“你是78年才出去讀書的吧？”大虎哥問我，我點點頭。“後來我家的情況，你清楚嗎？”

我只好搖搖頭，我能說甚麼呢？

其實，“家風第”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後來改住了一戶姓葛的商業局的幹部。據說半年後，幹部的妻子無意中在舊的壁縫裡發現了一張紙條，是五表姑留下的，信交給政府了。是五表姑留給小虎的，其中有這樣的話：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這張條，就說明你出來了，媽媽已經沒了，你

的家也沒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趕快跑吧——媽媽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沒讓你們同你爸爸跑……”

那幹部的妻子是位小學教師，有文化的。她後來告訴別人：“到底是讀過書的，一筆好娟秀的字啊，豎著寫的！”

大虎表哥在東莞辦有三間電子廠，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陽縣裡的外經部門做了許多工作，想請他回家鄉去投資辦廠，幫助家鄉解決年輕人就業的問題。他始終沒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沒用。

2007年4月17日，大虎病逝於香港觀塘。

第五節 強扭的瓜不甜——寶安縣的合作化和“退社風”

“當我們有意識地按照理想塑造我們的未來時，是不是在醞釀著一個更大的悲劇？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反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一、新中國的集體化嘗試

1956年，武漢。

毛澤東輕鬆地浮在長江水面上。

大江浩蕩，滾滾傾往天際。好一派壯觀景象！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豪邁。

在他的心中，還有另一番壯觀的景象：一年來，全中國的形勢，真是好極了！

城市實現了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工業指標連續被突破……尤其是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帶來的大變化，那真是翻天覆地。

前不久，秘書送上的報告稱，直至1956年4月，全國的農村基本上都已經實現了合作化。幾億中國農民拿著申請書，敲著鑼打著鼓，高高興興進了合作社，走到集體化道路上來了！

真是太好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就在農村掀起了“土地改革”運動，把地主富農的田地財產都沒收過來，分給了那些窮苦的農民，人人有田可種，有飯可吃了。農民的生活比動蕩下的國民黨時候好了，人民群眾從內心擁護共產黨。

他又發動農民搞起了互助組。讓一戶兩戶、三戶四戶的農民“互幫”，貧苦農民相互協作，農具耕牛交換使用。

但是，好景不長，新的問題出現了。

土地分到農民手裡後，農村很快又出現了“分化”：那些勞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窮困的，寧願把手裡的地賣了，而勞力強的、富裕的農民想發家，又把窮人的土地買到自己手上來……土地往富人一邊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

原來，共產黨就是把土地送到農民手裡，如果任其下去，還是會窮的窮、富的富呀！

彙報的材料告訴他，一些窮苦的農民，是靠著互助組的鄉親把糧食借給他們度過荒年的；那些沒有勞力耕地的老人，生病在床的寡婦，是靠著互助組的鄉親替她們耕地下種的……

要這樣下去，那還革甚麼命，流甚麼血啊？這是誰都沒有想到的！

於是，毛澤東在中央的會上警告說，如果這個時候不拉農民一把，“農民會說我們共產黨見死不救！”

在中國，既要讓農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貧富兩極分化的路上去，是個難題。有甚麼辦法避免呢？

只有靠三個字：集體化。

這是一條不是哪一個人“富”，而是大家都“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麼，這條路怎麼走呢？

首先，把幾億農民都組織起來，組合到許多的集體組織中去。再進一步解決產生貧富懸殊的生產資料——土地問題。

發動農民把已經分下去的土地、耕牛、農具……再交回來，重新組織到“集體”中去。

只有這樣，地是集體的地、田是集體的田，打的穀子是集體的穀子，農具、耕牛……全都是集體的，農民一起勞動，一起分配，才不會有哪家貧，哪家富，哪家剝削哪家。

這樣就剷除了資本主義的土壤，消滅了“不平等”，最後就可以實現千百年來多少聖賢的願望！

他給中國的這個“集體”取了個名字，叫做“農業合作社”。

從個體到互助組，從互助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農民朝高處引。這就是集體化的道路。將來還要把農民引向集體化程度更高的社會：共產主義，最後讓農民進入丟掉小“我”，溶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這，就是毛澤東的集體化理想！

但事情並沒有如預想中的那樣順利。

1955年7月11日，頤年堂。

剛剛從農村調查回來的毛澤東風塵僕僕，便急著召見鄧子恢、廖魯言、譚震林、陳伯達等人。

“你們說農村的形勢那樣不好，農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麼嚴重嗎？”

鄧子恢：“的確是這樣的，主席。有些農村幹部強迫農民入社。農民思想不通，生產就沒積極性，莊稼也就長不好……”

“我剛從外地回來，怎麼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很好嘛，農民生產消極了？”

鄧子恢插言：“農民缺糧是真的。”

毛澤東：“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嘛。我調查了，是地主、富農們鬧的。他們對搞集體化本來就一肚子火。柯慶施對我說，有些人就是不願意搞社會主義。”

幾人都沒作聲。

“你們原來發展合作社的計劃太慢了，要改！”他把送來的計劃放到桌上，“下半年我們的合作社要發展到130萬個！”

“我看還是維持原來計劃的100萬個吧。慢一點好。”鄧子恢壯著膽子反對，“這不像我們土改，把土地交給農民，現在是要從他們手中收回

來，工作就不好做了。”

毛澤東沒作聲，繼續抽煙，聽。

鄧子恢越說越起勁：“大規模普及的條件也不成熟，前段時期試辦的那些合作社，有些連會計都找不到……有些地方，把農民的棺木、老羊皮襖都拿來入社了……”

鄧子恢越說聲音越大。

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還有理！”

他把煙頭按滅在煙灰缸裡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

當然，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他同陳伯達談起過多次，這在同鄧子恢爭論時，沒有去展開——那就是，不僅防止貧富分化必須搞集體化，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逼著你不能不搞集體化。

就在此前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重工業的目標制訂了。這中間遇到一個問題：發展重工業就得要糧食、要棉花、要原料。這些原料從哪兒來？只有從中國農村這個大倉庫中來。照新中國成立初年農村的狀況：薄地、耕牛、水車……農民吃的都不充足，拿甚麼去支持五年計劃？

說白了，用甚麼辦法來讓地裡快點多打糧食、多生產棉花、多出油料來支援工業化呢？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靠農村快點實現合作化，靠集體化來促進生產發展！用一句經濟學上說的話就是：用改變生產關係的辦法來促進生產力發展！

這個道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說過的：18世紀手工工廠的生產力，正是通過“分工”創造出來的！祖師爺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引用過。

通過發展集體化來提高生產力，蘇聯的集體農莊就是這樣做的，而且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1952年蘇共第十九次大會上，馬林科夫就宣佈：通過集體化，蘇聯已經使小麥的產量比1940年增加了48%。長期困擾俄國人最嚴重的“吃”的問題，就是在集體化中解決的！（後來證明，這個增長數字是虛誇的——作者）

毛澤東身邊的“秀才”陳伯達更是力主這一經濟觀點。毛澤東在批覆

山西省關於辦合作社的報告中，更特別提醒劉少奇、薄一波等人注意社會主義可以創造高速度的問題：

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廠手工業階段，即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廠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的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1】}

不加快辦合作社的步伐，不靠改變生產關係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你鄧子恢的農村工作部張著個巴掌，拿甚麼去支援工業化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屆六中全會。

毛澤東在會上指出：“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鄧子恢同志犯了錯誤。”他指出，全國農村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實現合作化！

這比原來劉少奇設想的花二十年的時間先搞機械化再搞集體化的速度快了幾倍！

一個“加入農業合作社”的熱潮，隨之就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滾起來了！

到1956年5月止，全國91.2%的農戶都入了合作社，到11月底，更增加到96.1%。

毛澤東決定繼續擴大戰果：又把矛頭對準了城市集體化！

按照中共中央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應於1967年完成，結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1年！

從農村到城市，雙喜臨門！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全國山河就都“集體化”了，真是飄在南海裡的一隻小漁船，也是農業合作社的了！

但是，毛澤東也許沒有想另一個問題：亞當·斯密的手工工廠例證，能不能運用於20世紀的中國農村實踐？18世紀的英國赤貧無產者，與20世紀有田有地的中國農民，對於搞“集體化”會有怎樣不同的心情？

離開了中國的實際，強行快步走“集體化”的道路，必然導致“隱性反抗”——消極怠工、生產效率低下，種種惡果的種子已經埋下了。

【1】見《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1期第9頁。

那是後話。

而他的“大辦快辦”合作社，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已經開始。

現在，我們離開萬里長江那個浩大的背景，去找一個小“點”看一看。

在遙遠的南方，在“合作化”的高潮被掀起，一片敲鑼打鼓之後，深圳河邊的那個小縣——寶安縣是怎樣的？

當那些無奈地牽著老牛的農民、拿著“申請入社”的紅紙，強作歡笑走進合作社的大門時，毛澤東可能並不知道，在這一些之後，在發生著甚麼……

二、寶安縣的反“退社風”運動

他們一邊敲鑼打鼓，給老牛披紅戴花，朝掛著“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邊卻在眷念著剛剛睡暖的炕頭、剛剛墊足了青草的牛欄……

寶安縣的歷史檔案，記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寶安縣農民的生活狀況。寶安縣 80% 以上的土地權都集中在少數人——地主階級手中。

民國時期的中國，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這就決定了社會處於極大的不合理與不安定之中。沒有土地的寶安縣的大部分農民，生活必然貧困。

正是這種貧困導致了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否定。

以一例為證：

寶安縣橋頭村農民林嘉福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畝田，一年只能收穀三十五擔。除交租二十擔外，每年還要交“文田穀”二十斤、“巡丁穀”九十斤、“保長穀”一百五十斤、“族房穀”十斤、“徵兵穀”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福最後拿到手中的，只有不到三擔穀子。就是說，不到其實際生產的十分之一。一年一家人只有三個月的口糧。

三四月，青黃不接，是地主向農民盤剝的最好時機。農民不忍一家老小餓死，高利向地主借糧。往往是借一還三，甚至借一還四。

在這種情況下，戰亂中的國民黨政府還要向農民徵收壯丁穀、保甲

穀、靖安穀等等苛捐雜稅。

種種盤剝之下，寶安縣農民一年的收入，大約是其收穫的一成到兩成。這樣可憐巴巴的收穫，怎麼養活妻子兒女？

為窮困所逼迫的農民常常走上絕路。

資料記載：“林嘉福在此情勢之下，只得帶著一家老小七口出去討飯，七十幾的老母親不忍心拖累兒女，出門前上吊而死。妻子和小兒子餓死在去東莞逃荒的路上……”

有此遭遇的寶安縣農民，在民國時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數。

蔣介石政權在農村的失敗，農村的貧富懸殊，農民的窮困境遇，正是中國共產黨獲得農民擁護的“立政”基礎。

共產黨來了，改變了這一切。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點25分，在今天的深圳劇院原址，寶深軍管會主任劉汝琛莊嚴宣佈：深圳解放了！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這是多麼大的喜訊啊！群眾自發地湧上街頭，敲鑼打鼓，燃放炮仗慶賀。

如同當年在解放區開展的，使得後來的解放戰爭獲得了廣大貧苦農民支持的土地革命一樣，新生的共和國政權在廣大農村發動土地改革，鬥富濟



1949年，解放軍工作隊進深圳，人民政權獲得高度擁護。

貧，把集中在農村少數人手中的土地，拿來分給在農村佔大多數的貧苦農民。

1950年6月，寶安縣人民政府向人民宣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沒收地主的生產資料和多餘的房屋。徵收祠堂、廟宇、寺院、學校和團體在農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人民政府真正地實現了農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均貧富”。共產黨，真正獲得了貧苦農民的心！

寶安縣的“均貧富”是分成這樣幾步走的：

第一步，鎮壓反革命。首先把農村的反動勢力打下去！

1951年3月9日，寶安縣政府分別在深圳、南頭、西鄉召開群眾大會，判決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槍斃了大匪特首領林強、劉色風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寶安縣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槍斃180人。反動階級的氣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隊進入農村“訪貧問苦”、“串連扎根”。

一隊隊背包上掛著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隊進入了農村。他們大都來自底層的勞動人民，與窮苦的“階級兄弟”吃一鍋飯，睡一張床。貧苦農民把他們當成了“貼心人”。

第三步，把農民組織起來，跟地主階級勢力鬥爭。

怎麼把農民組織到一塊呢？甚麼是農民的共同點呢？那就是他們在舊中國同樣受地主豪紳的壓迫、充滿著對國民黨舊社會的怨恨。

共產黨在農村廣泛開展“憶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訪貧問苦”，一次次的“訴苦大會”，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農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國民黨”身上，農村的組織堅強了。窮人的心緊緊地同共產黨連在了一起。

第四步，農村工作隊順勢發動組織農會，並開始了中國農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劃分階級。

怎樣劃分階級呢？

有關資料記載，1951年寶安縣的土改工作隊剛進入農村時，無法分清階級，曾用過一個最樸素的方法：穿爛衣服的就是貧雇農，誰家壁上掛著臘肉臘鴨的就是地主。

同一個祠堂姓氏的子孫，按照經濟狀況被分成：貧（雇）農、下中農、上中農、富裕中農、富農、地主等多個成份。前三者為人民政權的“依靠對象”，富裕中農為“團結對象”，富農、地主為“專政對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國農民，從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階級。

為甚麼要劃分階級呢？

有了階級的劃分，陣營就分明了，鬥爭的對象才能清楚，才能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人，進入“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鬥爭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聯網上的年輕人常常不解為甚麼“鬥地主”：地主和農民有深仇大恨嗎？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為甚麼還要“鬥”他們呢？

事實上，鬥倒地主的過程，不僅是一個把地主階級的威權打下去的過程，更是一個新生的政權在農村獲得道德支持的過程。

做牛做馬的貧苦農民翻身了，而當年壓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階級被鬥倒在腳下了。是共產黨來了，讓他們揚眉吐氣，當家作了主人。

在大會上被批判鬥爭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窮苦農民上台控訴“地主階級的罪惡”，群眾的情緒被調動起來，口號喧天，群情激憤。

打倒少數，贏得大多數，新生政權更加穩固了。

勇敢的農民衝進地主的高牆大院，強迫地主交出賬本、地契，然後一把火燒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農會的指定一一分給農民。

寶安縣的歷史記錄充滿了激動：“那些蓋滿官印的田契，從此隨著整個封建剝削制度的滅亡而焚燒殆盡！”

我在寶安縣土地改革有關的歷史資料中發現了一張圖，圖中的說明寫著：“1951年5月29日，寶安縣舉行土改沒收典禮大會，做成豬欄形狀的地主欄設在主席台的右邊。低眉順眼、垂頭喪氣的地主被一個個押上來，被定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頂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則蹲在地主欄的前面。獻田契儀式開始，地主們一個接一個上台，向毛主席像叩頭謝罪，然後雙手向農民代表獻上紅紙包著的地契……”

毫無疑義，20世紀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後，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20 世紀 90 年代，深圳作家蘇偉光、楊宏海主編了一部《深圳民間歌謠》，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寶安縣農民的話，記錄了土地改革後農民喜悅的心情：

我名叫亞福，今年五十六。
想起解放前，住個茅寮屋。
著個爛衫巾，食個鹽傍粥。
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不忘共產黨，永遠過幸福。

可惜的是，中國農民的這種歡天喜地的心情並沒有持續太久：不久，為了“帶領群眾走集體化道路”，一場聲勢浩大的合作化運動捲地而來，交給農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

人民對共產黨那種感激的心情，從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寶安縣的合作化運動來得很快，一開始曾讓人感到突然，人們原以為集體化是多年後的事，1953 年底，寶安縣委在試辦了第一個合作社——新橋農業合作社後，還在文件中得意地認為速度已很快了：“這樣，5 年時間內，我們就可以實現全縣合作化。”



20 世紀 50 年代寶安縣的一幅“鬥地主”大會漫畫：地主向人民認罪

可是北京一聲號令，全國的合作化突然加速！隨著毛澤東批判鄧子恢等的“小腳女人”，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站在“革命的對立面”。

根據“中央的精神”，寶安縣的“5年實現合作化”一改而變為：“一年內全縣實現合作化”！

加快速度的要求從天而降，“揠苗助長”當然就出現了：入不入社，被說成了“是跟國民黨還是跟共產黨”的問題。不肯入社的農民被五花大綁推上台批鬥，以殺雞儆猴！

成效當然也很快出現，資料顯示：到1956年初，寶安縣就從僅新橋1個試驗合作社猛地增加到86個合作社。到1956年5月，更是建立了265個農業合作社。

僅僅5個月功夫，寶安縣那些剛剛有了土地的農民，又把土地交了出去，變成了“社員”，轉眼就兩手空空！

當年把土地交到農民手上，農民感謝黨感謝毛主席。現在又把到手的土地交回到集體去。他們一邊敲鑼打鼓，給老牛披紅戴花，朝掛著“合作社”招牌的大屋走，一邊卻在眷念著剛剛睡暖的炕頭、剛剛墊足了青草的牛欄……

這種對“私有”生活的追求，深留在中國農民心中，哪是一年半載可以改變的？當然一有機會，又要表現出來。

1957年，當城裡發動“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右派分子紛紛“向黨進攻”的時候。寶安縣農村“反社會主義”的勢力也抬頭了，其表現就是：農民普遍要求退社。

寶安縣的歷史檔案顯示，在這場“退社風”中：以龍華鄉為例，全鄉九個合作社，就有五個散了；南頭鄉的十一個合作社，有三個散了，有五個正在動搖，真正還頂著堅持要辦的，僅有三個社。

布吉區山廈鄉的社員黃錦平說：“我怨恨入了社，你叫毛主席來也搞不通我的思想！”

新圍農業社的幹部堅持著不讓農民退社，誰要退，不給退犁耙。這讓一部分農民憤怒了。有人一聲呼喊便組織了一個退社團，團結了幾十個要退社的群眾，圍住了合作社幹部吵。

退社團提出的條件有：把田地全部重新再分，包產到戶，誰都有份

(包括地主富農)；要讓老農當家；要恢復油糧自榨自食，不要再搞統購農民的油糧……

如果不同意退社，不讓他們牽老牛回家，就要搬幹部家的桌椅床鋪，有人乾脆坐在幹部家吃飯不走。

“退社風”越颯越兇，變成了找共產黨的“算賬風”！

檔案記載，龍華鄉的地主黃××要討回土改時分的房子，說：“你們住了我的房子是白住嗎？”強要合作社交納340元房租。

黃田社的地主林達明在趕墟時遇到分了他田土的貧農林占禮，扯著林的衣服問，你耕了我的土地到要甚麼時候才還？老實的林占禮說不是我分的，是共產黨要我分的。林達明不讓走，讓林占禮答應歸還解放前借的舊賬港幣8元才算甘休。

這分明是一股“反共”風！

農村嚷“退社”，城裡右派嚷“共產黨下台”，對於這一切，能夠任其下去嗎？必須打退城鄉階級敵人的反撲！

1957年的春天，毛澤東發表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的反擊運動，猛烈地開展起來。

一般人都熟悉共產黨在城市發動的“反右運動”，而對於農村進行的反“退社風”卻知之不多。

我們來看看，寶安縣農村是怎麼“反退社”的。

寶安縣的農村“整社”，即反擊“退社風”運動，是在1957年8月後進入高潮的。

“整社”方法同“反右”類似，先讓農民提意見，搞大辯論，讓各種意見都發表出來。再根據辯論劃分階級隊伍。組織群眾，對暴露的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反擊。

據稱，最初在寶安縣農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風反右”還難。雪片似的向縣委飛回來的報告都稱：“大辯論搞不起來。”

農民開會不積極，喊了半天開會，稀稀拉拉就來十幾個人。拿張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煙，聽幹部講，就是不吭聲。

開了一晚的會，煤油都燒過半盞燈了，還沒有人肯說共產黨一個不字。

為甚麼會這樣呢？

原來此時的農民已有了“參照物”。

我查了一下寶安縣開展農村反“退社風”的時間，其時為 1957 年的 9 月到 10 月。此時，城市的“反右”鬥爭已經先開展起來，凡是向共產黨提了意見的右派分子，正被揪了出來批判鬥爭。

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經嘗盡了苦頭，寶安縣的農民有“前車之鑒”，不肯講話了，是情理中事。

工作組十分著急。群眾不說共產黨的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怎麼好開展“鬥爭”呢？不“鬥爭”一些人，合作化怎麼能繼續走下去呢？

於是做細緻的工作：農民不開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們開口的辦法——在這點上，城市的“整風反右”為農村的“反退社”積累了經驗。

一位老工作隊隊員回憶說：“經驗就是啟發式運動，就是由貧下中農、幹部帶頭揭問題，把反動的話引出來。”

有關這類的資料，留下來是不多的。我有幸找到了記錄寶安縣農村“大鳴大放”歷史的，1957 年惠陽地委（當時寶安縣屬於惠陽地區）農村工作部所編的《東江在前進》一書，書中有一篇《和平社大鳴大放鬥爭的經驗》的文章。其中介紹了寶安縣和平農業社“大鳴大放”是怎麼做的。

“寶安和平社大鳴大放大爭搞了 15 天，有 273 人鳴放了 729 條意見。”

“鳴放”熱情分明很高。

那麼，和平社又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

首先是召開黨支部會議，解除顧慮。其次是隊、組長、貧農要帶頭鳴放。不管（群眾）提甚麼意見都可以講。不對的意見要沉住氣聽下去，不要立即反駁。

估計到反動力量主要會從以下幾個方面向黨“進攻”：一是攻擊合作化後生活今不如昔、糧食不夠吃；二是工農懸殊大；三是物價太高；四是集體不如單幹。所以，要在這幾個方面充分作好“應戰”準備。

應戰的準備是這樣做的：

“以隊組織為核心，每隊準備一個（人），駁斥（一個）謬論。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隊收集合作化後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黃耀中全家 5

人，每人每月吃了 34 斤米；黃伯如說，全隊現有 54 支水筆（鋼筆），20 把電筒，解放前只有偽軍官才有一支水筆。”

當“反擊”的材料準備充分後，“大鳴大放”會就可以召開了。

開會前要反覆講清不打擊報復，解除顧慮。號召群眾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引導”是循序漸進的：第一晚“一般都是由幹部、貧農先帶頭發言。都集中在領導方法、生產安排（這些不很要害的問題）上。社委隊長當場要表示接受批評……”

通過第一晚的“放鬆”後，第二晚，一些心懷不滿的人便會蠢蠢欲動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導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合作化優越不優越？統購統銷好不好等方面。”

真正的交鋒這才開始。

政府徵購是否太重？檔案記載，富裕中農黃觀生、黃和興說：“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 43 人，增加口糧 2 萬斤。”但上交的任務不減，糧食當然不夠吃。除非“減少公餘糧才滿足口糧需要”。

早準備好的人們是如何“駁斥”的呢？

貧農童田生起來發言說，不能因為我們困難就要求國家減少徵糧：“一個社減少 2 萬斤，全省全國那麼多社，不知要減多少多少。這樣軍隊、工人吃甚麼？唯一的辦法還是靠我們自己增加生產。”

第二個問題，農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黃觀生說：農民“年年口糧 220 斤，生活沒改善”，“同志（工人）白雪雪，農民烏黑黑。”

“貧農黃秤生拿出一包黃金龍香煙說，你們看看這是甚麼（農民都能抽香煙了）？誰說生活沒改善？”

農民黃亞居說：“過去 100 斤穀子換 100 斤鹽，現在 200 多斤才換 100 斤鹽，是政府剝削了農民。”

“貧農黃秤生說，政府只向農民收點公糧，不從鹽、煙、酒多收點稅，哪裡有錢建設社會主義？大家可以去惠州看看建設糖廠要多少錢？”

那時，鄰近的惠州要建一個大糖廠，看了回來的農民無不讚歎祖國的

大建設好。“叫苦派”沒說的了。

第三個問題，是單幹好還是集體好？

說單幹好的人說：“入了社，我比以前幹的還多了，收入還沒增。”

“今日是有得做冇得食。還不如以前給地主打工好，三餐飽飯熱烘烘。”

說集體好的人反駁說，舊社會我一家流浪討飯，進了合作社我才有吃有穿。誰說合作社不好啊？

“社主任廖偉榮說，大陂頭的水利，過去（單幹力量單薄——作者）打架也搞不成（為爭水利村與村械鬥——作者），只有轉了高級社，才修得成。2000多畝旱田變成了水田。”“增產了8萬多斤，這不是集體的優越性嗎？”

“你們說合作社這不好那不好，難道國民黨還好些嗎？”

反駁者的最後一句發言很有殺傷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馬上不再說甚麼了。

沒發言的富裕中農一看不行了，便紛紛附和著說社會主義的好話。

南頭社的富裕中農求饒說：“大家不要計較過去的意見啦，都係坐一條船啦，我們以後積極生產就是。”

“我哋（們）再不敢話（說）退社啦！行不行？”那些發了言的社員感到後悔了。

貧下中農說，哼，你們放了這麼多天的毒，就這樣甘休了嗎？不行！沒那麼便宜！

那些提了意見的富裕中農，尤其是地主、富農，後來被一個個揪出來，在武裝民兵的押解下，戴上“攻擊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再一次“鬥地主”，遊村、遊田垌……

最熱鬧的算是南頭的一次反擊“退社風”大遊行了。被牽出來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繞著南頭鄉的田垌轉，排了一里多路長，“隊伍到天黑還沒繞南頭城一個圈”。

與此同時，寶安城鎮的“整風反右”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共有882名教師被集中到深圳鎮學習。在積極分子的“帶頭”下，很快出現了“鳴放”的高潮。文教衛系統“頭5天就有863人鳴放了4485條意見，貼出了180658張大字報。運動結束後統計，平均每人寫大字報258張。”我不知道這個統計數字是否有水分，如是這樣，寫大字報之多堪稱驚人！

由於大字報寫得太多，令當時深圳鎮上所有的文具店裡的白紙都一售而空，文教局只好派汽車到惠州拉紙。

我們看看，深圳鎮上後來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都寫了些甚麼話呢？

縣食品公司有人貼了一張“豬肉倒海”的漫畫，說 1956 年公司豬肉管理不善，落鹽過少，霉爛了 1500 多斤，全部倒進了海裡，是浪費。

縣醫院有人貼大字報，說 1953 年醫院買了一套價值 9500 元的人工呼吸器，誰也不會使，結果積壓四年多，浪費了人民財產。

此兩個寫大字報的人後均被劃作右派。

大鵬小學教師何志超被劃為右派的“罪行”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理由是：“因為那段時間經常買不到豬肉，（他）對一個叫胡瑜的同事發牢騷：‘每天有四兩酒，四兩肉，誰做皇帝都一樣。’胡瑜發火柴點煙，劃了幾根都劃不著，何志超又說牢騷話：‘亡國火柴。’”

何志超因此被劃為“極右”，送勞動教養。1979 年 3 月 7 日，寶安縣委為他平反時，他已於多年前病死在勞改場中。

南頭中學教師黃錦瑞被劃為右派的罪行是“辱罵毛主席”。

怎麼“辱罵”的呢？

“大鳴大放”期間，黃錦瑞說：“（共產黨幹部）拿橡皮包鋼絲做的鞭子，抽人傷骨不傷皮。北京這麼遠，你能向毛主席訴苦嗎？”黃錦瑞參加過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三青團”，他的話很快被積極分子彙報。專案組定性他為“誣衊偉大領袖拿鞭子抽人”。

黃錦瑞在被劃為右派後送羅田水庫勞動改造。他不能忍受這種“欲加之罪”，於 1959 年上吊自殺，用死表示了最後的反抗。

1957 年寶安縣的反擊“退社”和“整風”的運動，是在槍聲中畫上句號的。

1957 年 8 月 4 日，鬧退社最厲害的庫坑鄉舉行大會，鬥爭地主分子葉孝忠。罪名是串連農民退社，妄想“挖空社會主義牆腳”。葉孝忠是國民黨時期的土豪劣紳，本來民憤就很大。一時會場上群情激憤，口號聲震天，到會農民一致同意槍斃。

葉孝忠被五花大綁，還想辯甚麼，早被人按著頭，押上了一輛牛車，

跳上三個揹著長槍的民兵，兩個公安。老牛一開步，會場上立刻有人帶頭喊口號：

“堅決鎮壓地主分子葉孝忠！”

“誰反對合作化就叫他滅亡！”

“合作化就是好，就是好！”

口號聲落的時候，遠處傳來一聲清脆的槍聲——後來有人形容：“就像炒豆子的聲音”。

全場猛地死一般沉寂。

中國的農民明白了，順著共產黨說話比說真話好。他們開始學會了用兩副面孔做人。

新的政權與人民之間出現了裂痕，這可以從偷渡逃港群眾的成份中看出。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為新政權的“敵對者”，地、富、反、壞，蔣介石遺留在大陸的國民黨餘部。而1956年後，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現了新政權的“受益者”：貧農、下中農、共產黨員、農村幹部……這顯然同城市的反右，農村的強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風”有關。

但是，這些“光明下的陰影”，是很難呈送到高層的辦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覺”的。

“退社風”被打退了，上報的材料寫著：“寶安縣上下出現了一片人人走社會主義路，個個愛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寶安縣委的一份總結材料更不無得意地稱：“人民群眾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團結、堅定、意氣風發。真是黨指向哪裡就奔向哪裡！”

材料的最後歡呼說：“全縣人民正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

而事實，是這樣的嗎？

中國，在離真理越來越遠……

“1958”就在前面、“大躍進”正在前面、“大煉鋼鐵”熊熊的爐火正在前面。

一段更為危險更為狂熱的歷史，就這樣等候在前面了……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節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對當政者來說，政策的變化，可以在一分鐘之間。而對於那些顛慄在狂風暴雨中的普通百姓來說，簡單的一分鐘也許就決定了他們的一生。

芸芸眾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歡離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與淚的悲劇，就在這一“放”一“收”的歷史中產生……

有人對 1957 年寶安縣的反“退社風”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頭也不會喝。”

寶安縣那些被強迫入社的農民，還有那些被鎮壓、被批鬥的人們以及他們的親屬，在無法改變的現實面前，比起內地的農民來，多了一條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直被定為“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並且認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陸政府在政策上有甚麼過失，而是外部台灣、香港的美蔣特務煽動的結果，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結果。逃港者，就是“叛國”者。

從某種意義上說，30 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說是中國政治穩定與否的

晴雨表。

我在筆記上，用紅色的波紋線詳細標明著 30 年來深圳河上偷渡的情況。

波紋線在 1952 年到 1956 年的一段，變化是平緩的，沒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記錄上，甚至出現過“0”的記錄。

很明顯，國民黨在大陸的勢力基本被消滅，一部分持不同政見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國內政治清明，人民群眾滿意。政局穩定。

這個態勢在 1956 年下半年後出現了明顯的改變：紅色波紋線在 1957 年後更突然急劇動蕩，隨之上升。毋庸置疑，這表明國內政治鬥爭開始激烈，一部分群眾對政治、經濟的狀況不滿而開始“背叛”。

紅色波紋線節節上升，開始是每月偷渡幾十人，接著是每月出現數百人，到了 1957 年的 6 月以後，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 7 月的幾千人。

這就有點反常了。

如果僅僅是因為不滿入社而引起逃港，它應該是斷斷續續的，不應該形成集中的大規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銀柱”彷彿在提醒我，這後面有個甚麼事情在推動著逃港。

難道在 1957 年的六七月份，寶安縣發生了甚麼事？

我在堆積如山的有關寶安縣的歷史資料中尋找著，企圖找到打開疑問的鑰匙。我堅信，造成一個月幾千人規模的大逃港，不會沒有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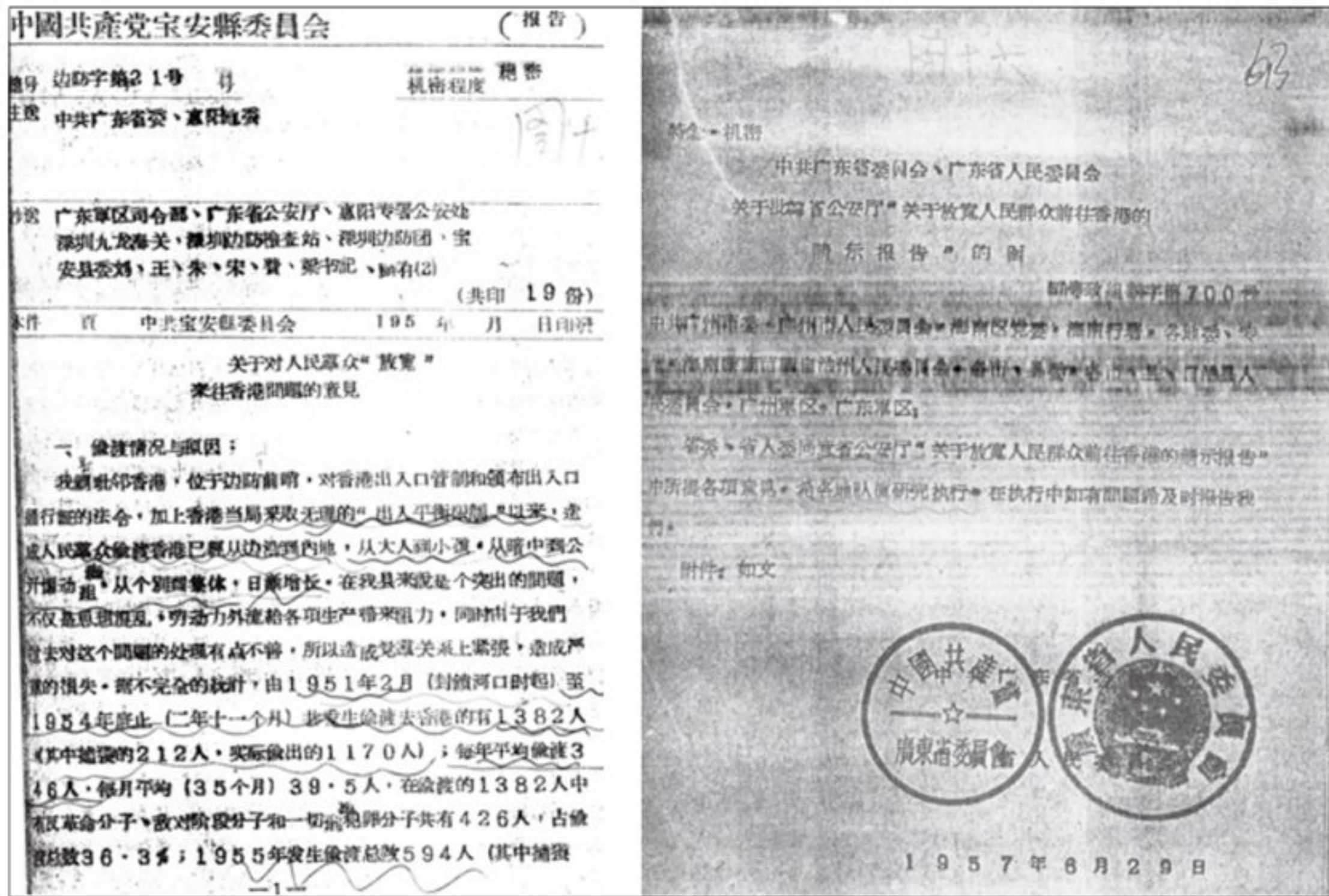
一份由中國共產黨寶安縣委員會所發的《邊防字 21 號》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這是 1957 年 6 月 8 日，由王志任縣委書記的中共寶安縣委，向中共廣東省委和惠陽地委呈遞的一份報告，報告題為《關於對人民群眾“放寬”來往香港問題的意見》。

我仔細地翻看了這份文件：果然不錯，看來，1957 年六七月群眾逃港高潮的形成，與這份文件有著某種聯繫。

這份文件主要談的是深圳河上偷渡的事，內容分為：偷渡情況的分析、矛盾的性質和意見及我們採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談到群眾偷渡的原因時，報告中的認識同習慣的把逃港看成“叛國”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觀點。



1957年，寶安縣要求“開放河口”的報告（左）和廣東省委同意“開放河口”的批覆

報告稱：

由於英方的堅持，1956年3月以來，中英雙方實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過來多少人，深圳這邊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過去。由於要求去香港的人數大大多於香港來大陸的人數，寶安、東莞、惠州一帶成千上萬要求去香港的群眾，探親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眾選擇“偷渡”這條路。

報告說：“對於人民群眾去香港的問題，採取放寬還是繼續從嚴呢？我們認為放寬較好些。”

報告大膽提出了設想：“目前國內尚不能完全消滅災荒和失業，我們既然不能包起來，去香港打工這條路就不應該堵死。”

在這裡，作者把“逃港”改了一個好聽的名詞，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聰明。報告還認為，與其造成群眾與政府的對立，不如把“出港打工”

的這道門打得更大一點，更“放寬”一點。“這樣，就可將矛盾轉向英帝國主義”，對群眾、對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這份報告沒甚麼，而細看則柔中有剛，內含著要求對港政策改變的潛台詞。

那麼，廣東省委是怎麼樣對待這份報告的呢？

廣東省委很快就批准了這一報告，同意“放寬”。

廣東省委為甚麼會同意“放寬”？

進一步說，寶安縣委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突然向上面提出要“放寬”呢？

這是個甚麼樣的時候？

看來是農村政策出現了問題。農民對強迫入社不滿，整風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群眾對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寶安縣委難以控制局勢，只好請求上級“放寬”讓一部分群眾去港。

這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解釋。

但同時另一個反過來的解釋是：群眾逃港越多，應該只會促使寶安縣把邊防卡得越嚴，為甚麼反倒“鬆”了？

放寬政策是為甚麼出台的？

是不是有一件突發的事情，讓寶安縣委無法“卡”下去，從而有理由要求上級把政策“放寬”？

終於找到了。

也許 65 歲以上的廣東的老百姓會記得，1957 年的三四月，對於依靠田裡的收成來填飽肚子的廣東農民來說，是一個難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運動，整風整社，開會鬥爭；一方面是青黃不接，糧食緊張，群眾沒飯吃。粵北地區更有甚之。

1957 年春，粵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大的水災，致使數以萬計的農民失去了家園，大批農民自北往南避荒。當時，廣東的南部，寶安、惠陽一帶沒有受災。於是，流浪到廣州一帶的成千上萬的災民，又像潮水一樣流向廣東南部。

廣東省委（56）字第 131 號文件《中共廣東省委批轉寶安縣公安局“關於外省、外縣居民大量流落邊防區的專題報告”》稱：流亡到深圳邊防線上來的災民，手裡拿著鄉裡、社裡開的證明，拖兒帶女、哭哭啼啼，成



關於群眾流落邊防區的報告

千人圍聚在羅湖橋海關一帶，口口聲聲要到香港去“投親”。說如果不讓他們去，就躺在羅湖橋上不起來。

都是沒吃沒喝的貧下中農、階級兄弟，邊防軍也不好硬性驅趕他們離開。

那時，從香港來往內地的旅客，都要在深圳羅湖橋下車換車。深圳鎮上災民集體要飯的情景，被“港澳同胞”看得清清楚楚。不少右翼記者搶著拍照，港台的報紙上立即登上了“粵北大饑荒，數萬難民南逃邊境”、“共黨政權料難維持”的醒目標題。

對於災民流邊，當地部門十分為難，因為數萬群眾來邊，無論在治安上或者在食物的供應上，都成了問題。於是向上反映這種情狀：“由香港返來的同胞看了十分難過，買東西給她們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響。”希望引起上級的重視並儘快解決。

這種情況，立即引起了當時的廣東省委的高度重視。

有關資料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的：

自2月1日至4月6日，據不完全統計，（湧來深圳的流民）計有21縣3個市。揭陽縣十六區美德鄉王印莊等5人帶有小孩2個，已餓得骨瘦如柴。東莞縣石鼓墟青乙鄉婦女吳玉帶著三個小孩捶胸大哭，想去香港。高呼：“冇得食餓到死。”^{【1】}

顯然，上報文件是有意披露群眾在羅湖橋邊、迫切要求去香港的淒苦情狀的。

按照往常的做法，那些擅自進入邊防、而且在“影響著共和國形象”的人，是要被強行驅趕離開羅湖橋的。但是，這一次有關方面卻顯得格外的“寬鬆”，竟沒有提強行遣返群眾，在一些場合反而站在流浪群眾一邊說話：“既然人民群眾有了困難，我們難道能見而不管嗎？”

這樣，在強迫入社而導致群眾逃港的情勢下，本來就希望上級“放寬”的寶安縣委，由於災民事件的出現，找到了更多的向上級要求“放寬”的理由。

上級，即廣東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寶安縣委的要求。

20天後，即1957年的6月28日，廣東省公安廳便向廣東省委、省人委上呈了報告，稱已經研究出了“放寬”的具體措施，請求省委、省人委批准。

很快，一天以後，即1957年的6月29日，廣東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轉了廣東省公安廳的報告。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對外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寬”，就這樣出台了。

批覆稱：

省委、省人委同意省公安廳關於放寬人民群眾前往香港的請示報告中所提各項意見希各地認真研究執行。在執行中如有問題請及時報告我們。

中共廣東省委員會
廣東省人民委員會
1957年6月29日

【1】見廣東省委（56）字第131號文件《中共廣東省委批轉寶安縣公安局“關於外省、外縣居民大量流落邊防區的專題報告”》。

批覆稱廣東省公安廳提出的意見即是“放寬”。放寬的範圍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門的地區，包括廣州、佛山、珠海等 11 個縣、市。”“在珠江口以東靠近香港的地區，包括惠陽、汕頭兩專區的各有關縣，允許群眾自由選擇沿邊、沿海的適當地方出口。”

這中間，寶安縣邊防開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頭角區的梅沙、鹽田，福田區的沙嘴、沙頭、石下、沙尾，南頭區的白石洲、後海、粵海門、灣下、蛇口等地”。

在這些地方，群眾只要向村治保主任申請，即可辦理證件，“憑證件到自己認為方便的地方外出”。

除非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一、有現行反革命活動；二、正在執行管制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三、專案偵查的對象，“均可批准其出口”。

這就是年紀在 65 歲以上的寶安縣人，至今記憶猶新的所謂“57 年大放河口”！

如果不是因為後來某種原因的打斷，文件所設想的還將“正式放寬和取消入港限制”本來很有可能成為廣東省委的下一步政策。

但是，誰也沒想到，文件下發不久後就突然被收回！這是因為情勢的發展，突然變得不可控制！

“開放河口”的秘密文件還剛剛在縣一級傳達，還沒有到基層去，“可以自由去港了！”“邊防軍秘密引路出去！”的消息不知怎麼就突然傳遍了寶安縣，接著飛快地傳遍了惠陽地區、廣東省。

風集雲匯，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廣東各地成千上萬的群眾，黑雲一樣湧到深圳河邊上來了。

寶安縣委在 1957 年向省委政法邊防部、省公安廳、軍區司令部等呈遞的報告中驚呼：“自今年 7 月以來，我縣群眾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況是解放以後從未有過的，其中尤以 7 月份最為嚴重。由個別到集體、有組織……”

“從東莞乘火車經我縣平湖下車，最多的 7 月 14、20、21 日，每天成群結隊集結邊境偷渡，每天晚上均有 1000 餘人。”

“一個突出嚴重的問題，已經從邊防到內地，從大人到小孩，從暗中到公開煽動，日益發展成嚴重趨勢。”

“福田上沙農業社第一生產隊，15 個男人中竟外逃了 13 人，不久，連剩下的 2 個也跑了。”

“沙灣鄉團支部 26 個團員中，除了 6 個表示不會逃以外，有 20 個團員在準備外逃。”

“集結在鄉府和派出所要領通行證，未達到要求就無理謾罵我幹部。”

邊境的鐵絲網邊湧滿了群眾，邊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種告急的彙報不斷從邊境發到寶安縣委、省政法邊防部甚至中央的桌案上。

彙報材料稱，有情況表明，群眾的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內地，湖南、廣西農村已有數縣得訊的群眾準備湧港。

港英當局也慌了。香港的報紙驚呼：“共產黨偷放河口，難民潮水湧港！”“中共違背中英對等原則，出入平衡被破壞。”所謂對等原則，就是每天港英方進入大陸多少人，大陸才可放出多少人到香港。

不良的國際影響出現了：英國的本土主要報章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深港邊境“難民湧入香港”事件。英國政府立即向北京發出了“照會”。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驚呼：“如不迅速採取措施，後果可能十分嚴重！”

北京也緊張了，直接質問寶安縣委是怎麼回事，命令“從速反映情況”。

在難以控制的形勢面前，廣東省委、寶安縣委，都不敢再走下去。

1957 年 10 月 6 日，寶安縣委政法邊防部向上級提交了題為《關於放寬群眾去港及外流情況的總結報告》。

在回顧了幾月來的邊境“放寬”後，不能不提出要採取鐵腕措施，重新封鎖邊界，一邊又再拾“階級鬥爭”的法寶，號召寶安縣的群眾起來：“堅決打退外逃風”！

報告稱：“凡是地主、富農及反革命分子自己偷渡，或為首積極參與煽動組織偷渡，帶渡引渡者，經查證實後，一律依法逮捕懲辦。”

“凡是放棄正當生產，專門進行引渡帶渡的，不論其甚麼成份，一律逮捕，予以判刑。”

“雖屬基本群眾，經教育不改的應判處管制或逮捕法辦。”

“凡屬無合法證件進入邊防區的，可由當地民兵扭送當地公安派出所

拘留審查……”

深圳河邊的鐵絲網下，荷槍實彈的部隊增加了，有行動的地富反壞分子，如參與偷渡逃港，可以被判刑，以至槍斃！

一時，正在惠寶公路、平湖鐵路沿線潮水一般湧向邊界的滿懷熱望的群眾，惶恐地停住了腳步。

潮水在寶安縣北打了一個圈後，又逐步向北退去。

……

有人曾評議過中國農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這次逃港潮來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幾天的時間，深圳河邊境就恢復了平靜。

1957年年底，寶安縣委關於1957年的邊防工作總結似乎鬆了一口氣寫道：“一年來，在上級公安機關的指揮下，依靠邊防軍和廣大群眾，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偷渡風，終於被刹住了。”

發生在1957年深圳河邊的第一次大逃港，除了在蔡屋圍經常開大會的廣場上，留下了片片監禁、槍斃地富反壞分子和偷渡犯的佈告的殘頁外，只是把更多的痛苦留在了人民的心頭。

對當政者來說，政策的變化，可以在一分鐘之間。而對於那些戰慄在狂風暴雨中的普通百姓來說，簡單的一分鐘也許就決定了他們的一生。

芸芸眾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歡離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與淚的悲劇，就在這一“放”一“收”的歷史中產生……

第二節 三十年牛郎織女：文素巧尋夫

自願立寫離婚書。□□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長主婚與文□□結婚為夫妻。本人因謀生關係移到香港現居法國十餘年，而受環境所迫，未能歸家，使之夫妻有名無實。為免誤人青春，故此自願題（提）出離婚。從今日起，與□□巧脫離夫妻關係，雙方後男婚女嫁各有自由雙方並無干涉。特立離婚書為憑。

立寫離婚書人 □□健

於法國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

寶安縣牧牛山的山下有兩個小村子，靠北邊的一個叫向北村，靠南邊的一個叫向南村。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領導說是向南那不是向到香港去了嗎？要改。於是改成了超南村。後來，文化大革命來了，說是超南還不夠革命，要改。於是又改成了平南村——當然是針對香港的。倒有點像古小說中“平南王”的味兒了。文化大革命完了，到了改革開放年代，說還是改回去吧，於是依然叫向南村。

事情要回到 20 世紀 50 年代。

那時村村興掃盲，上面很關心，鄉裡派了小學的老師，逢墟日的晚上來給大嫂子、姑娘們上課。“人、手、牛……”地把著手教。向南村的學員多一些，因此夜校的老師說：“向北村的婦女都集中來向南村上課。”

向南村姑娘文素巧（化名）與向北村的大嫂子吳水容是同桌。吳水容每晚回家還要走好幾里的夜路，所以每到夜裡，總有一位腼腆的小夥子拿著一支電筒，忠實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她。然後，又默默地拿電筒照著田埂小路，護著水容回向北村去。

有一天，文素巧忍不住逗水容：“那小夥子是誰呀？怎麼那麼俊呀？”誰知水容“咯咯”地笑了起來：“傻女——我老公在河那邊呢，那是我弟弟。”

看見低著頭不做聲的文素巧，吳水容反倒“哈哈”笑起來：“怎麼樣？長得挺俊氣吧，看上了？那你就給我做弟媳婦呀！”

猛地，19 歲的文素巧心中像是被鼓槌錘了一下，“撲通撲通”地跳起來。偏偏鄰座的小媳婦撩她：“你們看啦！臉紅了，臉都紅了呀！”

誰知道呢，就是因為這麼一次無意的玩笑，促成了一段姻緣。向北村的英俊小夥吳立健（化名），同向南村漂亮的姑娘文素巧結婚了。

那是 1957 年 9 月的一個夜晚，文素巧清清楚楚地記得，當鬧洞房的人散去，留下了滿地的糖紙和瓜子殼的時候，立健輕輕地走近了自己新婚的妻子。

“巧巧。”他叫著她的小名，巧巧低著頭，故意不理他。她在等待著那幸福時刻的來臨。

“你——會同意嗎？”丈夫問。

新娘子溫柔地看了一眼丈夫，雖然不言語，那意思已是說：“都說你傻呀——你真傻。”

丈夫的眼睛在緊張地看著新娘子，但是卻猶豫著，充滿了不安。

文素巧只把頭靠上丈夫的懷裡，不說話。

吳立健終於大了膽子：“過幾天，我想去南邊找活。”

文素巧一驚，她沒想到丈夫說的是這個：“你是要——”她用手指著靠南的窗戶，意思是：逃港？

吳立健連忙向她擺擺手：“現在不叫逃港了，大放河口，叫自由探親了。這邊

搞合作社了，田都要交公。以後做甚麼都不行了。要再不走，以後就沒機會了。”立健停了一下，“當然，如果你不答應，”他看著美麗的妻子，“我就不走了。”

“真的不抓了嗎？”猛地，她發現自己最關心的倒不是眼前這個男人想做甚麼，而是這個男人做甚麼最安全。

“真的，這是政府准許的。還來了文件呢。”立健說。

巧巧“咚咚”跳著的心才平靜了些：“隨你。”

立健高興了：“等我過香港發了財，我就來接你過去。”

說心裡話，巧巧壓根兒是不願丈夫走的，才剛剛在一起啊，就要分開。但是丈夫要做甚麼，巧巧能反對嗎？

妻子的頭在丈夫懷裡扭動著，“我就怕你過去變心，好多人過去都變心了。”

立健溫柔地靠近巧巧耳邊上：“你還不相信我嗎？我要變了心——”丈夫“啪”的一下掰斷了一截筷子。

第二天，左鄰右舍來家裡坐的時候，大家都議論開了去香港的話題。尤其是一班年輕人，恨不得馬上就到香港發財去。來吃喜糖的還有邊防軍的幹部，提到這事，連他們都笑著說：“也許是吧，反正我是不會抓你們咯，哈哈——”

村裡的人私下在議論著，乾脆就在香港租一排房子，也像在這兒搞生產似的，男人出去幹力氣活，女人都在家做飯做手工。每年春節，男人賺足了錢，開一條大船——回家來看老婆孩子！

兩天後，立健告別了新婚的妻子，同村裡的一幫青年高高興興上了一條大船。全村的人都到海邊來送行。

立健他們這次倒不像是“逃香港”，像是早晨起來，揹著鋤頭去合作社田裡上工似的。有人在船上放了撲克象棋——邊打撲克邊開船。

大船輕快地消失在大海遠方……

二

就在一班年輕人坐船去香港不久，村口的大樹上突然貼上了佈告。人們驚惶地傳播著：“不准過香港了！”

巧巧已經識得字了，她看見那紅鮮鮮的圓印上印著的是：寶安縣公安局。

佈告上那大意是，不能隨便去香港了，已經跑了的要勸他們回來。村上的船都到鄉裡登記，一隻也不准隨便下海。誰要是再到香港去，就得抓起來，那就是“偷渡犯”了。

巧巧望望大海，真的，大鵬灣冷清了，碧藍碧藍的大海一望無際，再看不到一片帆影。

怎麼說變就變啊？

“怎麼辦呢？”巧巧想，這樣一來，立健怎麼辦？

她放心不下。

不過，巧巧又想，丈夫說了的，無論怎麼樣，他都會回來接她，倆人一起過香港去。啊，那時可就是偷渡了呀，偷渡就偷渡吧，只要同他在一起，就是給邊防軍抓去，也值得。

是的，丈夫是天底下最有辦法的人，他會有辦法來接巧巧去的。

巧巧等著，等著丈夫的消息。

等啊、等啊，兩個月過去了，連個音訊都沒有，原來同丈夫約好的，只要一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寫信。是村幹部卡了信嗎？郵局的信照例是要先由村幹部拆的。不會，生產隊長就是她家的堂叔。

難道，難道……他們在半路遇到不測了？

巧巧很快想到前兩天，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從海的那邊飄過來三具偷渡者的屍體，是屋後的三公公說可憐，拿了兩床蓆子把屍體包了，埋在海邊的小山包上……後來，村裡的地主王桂生被掛著牌子遊了田垌，因為他公開對別人說，那三個人是被邊防軍開槍打死的，說還在海邊聽見槍響。

啊，不會，不會的。丈夫出去的那天，天清氣朗的。那時候還可以去香港的，是有佈告的，巧巧看過的，邊防軍不會開槍的，不會。

巧巧的心啊，就像十五個吊桶打水。難怪人家都說，女人是最沒出息的，還是要有男人在身邊。

牧牛山下的巧巧，窗口是向著南開的，每天晚上，她在窗口點上一盞燈。巧巧向南望去：夫啊，夫啊！你在哪裡呀？你在做甚麼呀？

正當巧巧快絕望了的時候，一個喜訊傳來了：同立健一起走的旺狗來信了！

巧巧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忙跑進旺狗家裡。

旺狗媳婦一臉神氣：“進廠啦！這天殺的！還是高鼻子的廠子呢！先在手錶廠，管倉庫，現在快要做到拉長了，這天殺的！”

可是，我的丈夫，我的立健呢？他怎麼樣？

巧巧緊張得不敢問，只說著要看信。

這信確實是旺狗從香港寄回的，可是巧巧通篇找遍了，連“立健”兩個字都沒有。

她神情恍惚地邁出門，還聽見旺狗媳婦在後頭的粗嗓子：“巧巧——你別急啊，我明天就去信給你問。”

旺狗媳婦還真是講信用的，她叫人寫的信，第三天就發出去了。

照理說頂多半個月就能收到回信，但是，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巧巧不知往旺狗媳婦家跑了多少趟了，希望旺狗來信告訴她立健的消息。可是旺狗媳婦的回答總是：“沒有信。”

旺狗真的沒有來信？

這可奇怪了，好好的，為甚麼旺狗也不來信了？

其實誰都知道，事情就是瞞著巧巧一人。旺狗的信是來了，只是他在信中叮囑：“千萬不可以告訴巧巧，立健人是過來了，但後來跟著龍仔去法國開餐館，突然發病，死在法國了。”

他死了，立健死了！

這叫善良的旺狗媳婦怎麼跟巧巧說呢？一起出去的人，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巧巧的丈夫卻沒了。

一天，巧巧很冷靜地登門來了：“旺狗嫂，你不必瞞我了，我已經聽說了。”

巧巧的話叫旺狗媳婦吃了一驚：“傻妹妹，你聽說甚麼啊？”

“但我不相信，他不會死。我不信他們說的話。”巧巧說，“我要過那邊去，去找我老公。除非我親眼看見他死了！”

“甚麼？你要過香港去，現在去就是偷渡了啊？你不要命了？”

巧巧眼裡早流出淚來：“要是他真死了，我還要命做甚麼？”她掏出手絹來“嚶嚶”地哭起來。

癡心的女人啊，丈夫勝過她的生命！

“封了河口了，你怎麼過得去呀？”旺狗媳婦說。

“封了我也要走。我自己划著小船過去。”巧巧說，“要是邊防軍抓住我，我就告訴他們，我是去找我的丈夫，看我有沒有罪！”

水容說：“去吧，你去我也去。我陪你去找。死活都得找到他！”

三

真是蒼天也憐有情人，機會果然來了！

雖然上頭這禁那禁，村裡的人哪個心裡不還是向著南邊？這回，村裡有十幾個年輕人在向北村借了一條大船，準備要跑香港，還是團支部書記春山帶的頭。

這事情露不得風聲，是喊走就得走的。

那天中午，得了消息的村民都往海邊上跑，幾分鐘就上了船，水容得的消息晚，上得船來時，船都要開了。看看船中的十幾個人，黑狗、貓仔、春山媳婦……都在，就是沒巧巧，真急死人！水容求著船老大：“慢點，慢點——還有巧巧呀！”她“撲通”跳下了船，濕著兩個褲腿上岸找巧巧。

“巧巧，巧巧——”水容到處喊啊，到處找，找過了巧巧家，又找遍了村前村後，只有緊閉的門兒，冷清清的牆，就是找不到巧巧——唉，那時，勤快的巧巧正在山上打草呢。

船開了，打草的巧巧回來，只能癡癡地望著茫茫無人的大海……

“我要走，就是死，我也要找他去！”面對著越來越空曠的大海，巧巧流著眼淚發誓。

機會又來了。

有一天，村裡來了一個補鞋的鬍子老頭。有人在她耳邊上說：“別看這個老頭啊，他有本事，領過幾撥人過去了。你就找他。”

鬍子二叔答應了！巧巧拿了5元人民幣、提了一桶油給他，鬍子二叔便答應划船送她過去了，錢都沒收，就收了油。

他們約好在海邊一片蘆葦地裡等。過了蘆葦地，就可以下海了。

已經是夜裡十點多了。鬍子二叔和巧巧分頭接近了那片蘆葦地。

這裡已經是警戒地段，巧巧從來沒做過這種事，躲在沙丘後頭，心裡好緊張。忽聽見有人大吼一聲：“誰？”接著就是拉槍栓的“嘩——”聲。巧巧一頭鑽進了蘆葦地。她聽得很清楚：那是民兵隊長六六的聲音啊！六六在反偷渡的批鬥會上是最積極的。

完了，落在他手裡。還會有好事？她躲在蘆葦叢中，氣都不敢出，就聽見有人走動的腳步。

天啦，不要挨近我才好啊！

近了、近了……就在他的腳邊了。

她被一隻粗大的腳碰了一下：天啦！她仰起頭來，六六的眼睛正瞪著她呢，她的心頭一冷。

“狗仔——”他聽見六六在朝遠處呼喊。

“完了！”巧巧癱在了地上。

“這邊沒事——我們過海角頭去吧！”六六若無其事地對狗仔說。

她聽見人腳踩著沙地的“沙沙”聲，遠遠地去了……

啊，啊，好人六六！好人六六！巧巧這輩子忘不了他。

原來人心都是一樣的啊！

出了蘆葦地，鬍子二叔一把拉著巧巧就往海邊奔，三下五下就撐開了船。

巧巧是幸運的，她們的船順利地繞過了邊防軍的巡邏艇，很快，香港城市夜晚萬家燈火的場景就出現在眼前了。

直到登上了香港的岸邊，巧巧的一顆“嘖嘖”跳動的心才平靜下來。

好了，終於來到立健在的地方了！

四

香港真大啊！

巧巧手裡捏著水容的母親給的一張紙條，滿街找。

她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先去找水容：找到了姐姐水容就一定可以找到立健。

按照地址，她真的找到了水容住的地方。這是荃灣的一間閣樓。原來

這香港，一間樓中要住好幾戶人家的。喲，這裡的人穿得那麼闊氣，怎麼住的還趕不上咱村子呢？

樓梯彎彎曲曲的，黑黑的也沒有亮燈，她終於將紙條上的號碼對上了門牌：A—3 號。

門上一把大鐵鎖！

聽見插門聲，隔壁的門倒響了，從鐵門的縫間探出一位老太婆的頭來——香港人是不隨便開鐵門的。

“你找那個大陸女嗎？”那老太婆把她通體“審查”了一遍，足證沒有“危險”後問。巧巧點點頭。

“搬走了。”

巧巧一下愣了：“搬去了哪裡？”

老太婆擺擺手：“不知道。”接著鐵門“呼”地關上了。

巧巧感到頭“轟”地一響。

找不到水容，她怎麼辦？到哪裡去尋丈夫？

還有唯一的一條路，那就是希望能找到旺狗。

巧巧的運氣還算好，她終於在一家工廠的倉庫裡，找到了正在搬貨的旺狗，一身汗水，原來他並沒有當上拉長。

旺狗支支吾吾地半天也沒說清楚：“是啊，立健是同我們一起上岸的啊，後來……後來就離開了我們，說是到碼頭上打工了……”

啊，原來他沒有死，我的丈夫沒有死啊，他在碼頭上啊，她太高興了。

“你就再沒看見他？”

“沒有，這兒的人都忙著掙錢活命，誰也沒聯繫了。”

啊，碼頭，香港這麼大，哪個碼頭啊？這怎麼找啊？

巧巧幾乎走遍了香港所有的碼頭，在街頭來往的人群中分辨著，在一個個揹著箱子的苦力中尋找著丈夫的面孔……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看不到，看不到自己的丈夫。

這以後，為了找尋丈夫，她給人做過保姆，在街頭賣過針線活……

最怕的是警察查身份證。香港的大街上隨時有警察巡邏，發現偷渡的馬上抓起來“打界”回大陸。蹲在街角落的巧巧，大凡看見穿制服的就發

瘋似的跑。從此落下個症：聽見皮鞋聲就怕，看見掛肩章的人心就驚！

有人對她說：“這麼大個香港，你往哪兒找啊，你還是回去吧！”

回去？我怎麼能回去啊，找不到他，我一個人活著又有甚麼意思？

巧巧想起丈夫掰斷的那截筷子：為了這樣忠心的丈夫，不說我巧巧吃點苦，就是死，我也值得啊！

但是立健啊，立健，你在哪裡啊……

一天深夜，她正在街角用篾蓆搭成的窩棚裡睡覺，篾蓆被一隻大手掀開了，接著她看見眼前一雙可怕的大皮鞋！

她還沒來得及尖叫一聲，就被揪上了囚車，關進了偷渡者的“難民營”。

一天以後，她與幾十個偷渡者被一輛大卡車拉著，送過了深圳河。

對於這個“打界”回來的的女人，中國方面的收容人員看了向北村送來的保人材料後，沒有送她去勞教營，也沒有體罰她。

“甚麼成份？”

“貧農。”

“幾次？”問的是逃跑的次數。

“我就這一次。”

收容所的所長，是村裡二寶的舅舅，他看了看巧巧那副老實的模樣：“記住，偷渡是犯法的喲。要是再跑，就會送去韶關了，再跑，就送到河南襄陽。回不來了的。知道嗎？”巧巧老實地點著頭。

“走吧。”所長揮手說。

五

這是一個黃昏，她回來了，千辛萬苦尋夫的巧巧又站在牧牛山的山頂上了。

山下是隱隱約約的牧牛村，生她養她的地方，卻像是她的牢籠。

看得見深圳河對面香港閃閃點點的燈火，看得見河邊那一長絡逶迤的鐵絲網。立健啊立健，你在哪裡呀！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

回到村裡的巧巧變了，變得像另一個人了。

她變得沉默寡言了。下地便下地、割禾便割禾。晚上早早的把門兒關了，燈兒熄了，上床……床前還隔著放張條凳——孤身女人擔心壞人。

“新寡”的生活是多麼難熬啊，每當看見別人夫妻雙雙揹著鋤頭下地，她總是遠遠地挪在後面，不去看。

下田插秧，每當有男人湊過來同她說話，哪怕是十八九歲的小兄弟，她也會找岔轉到隔壁田裡去。

別人抱著胖乎乎的孩子在村中晃悠，她會隔著窗羨慕地偷看著。只要村中有人生孩子，她總是趕去忙裡忙外，從別人的歡樂中，擠出屬於自己的那一絲絲甜味來。

時間，一年年過去。

有一天，旺狗媳婦對她說：“巧巧呀，你還是找一個吧，你還年輕，一個人這樣過多難啊！”一邊點著前面一個人的背影說，“我看他就很好。”

旺狗媳婦說的不是別人，就是巧巧常常感恩在心的民兵隊長六六。

“他也挺可憐的，媳婦扔下他死了，身邊還帶著個一歲的孩子，又要上工又要給孩子喂飯。上月人家介紹的那個附寮村的，一見他家這樣的情況，掉頭就走了。唉！”

是的，六六的情況巧巧也不是沒看到，她仍然時時記住蘆葦叢中放她的恩情。

這以後，要是六六上工了，她就會悄悄地溜到他家：孩子放在門角邊的穀籬裡，聽話，也不哭。巧巧給孩子換了尿布，熬了米粉，把家裡弄得熨熨帖帖，悄悄把門又掩上，出門去。

回到家裡，把門關上，她感到心口裡一跳一跳，也不知自己是做了好事還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要是叫別人撞見了，那不又要風言風語了嗎？

管它呢，六六難啊，巧巧想。

有一天，當她正把米粉鍋子從灶上拿下來時，門“吱吱”開了。是六六進來了。一時倆人都愣住了，站著。誰也不知道說甚麼好。

半天，還是六六結結巴巴地開了腔：“巧巧，你要是不嫌棄，你就來我家……”

猛地，巧巧感到心頭一陣猛跳，紅著臉就衝了出去。

夜，來臨了。巧巧又在窗口點起那盞燈。

海，在遠處發出“嘩嘩——”的浪聲。

燈影中，她的眼睛裡彷彿出現了兩個人：一個是立健：秀氣、腼腆；一個是六六：高大、結實。一個遠在他鄉，音訊渺渺，一個近在眼前。

“不——不。”巧巧突然感到，她是這樣愛她的丈夫，她不能失去他，沒有他，她不能活。

她像風一樣地跑到了旺狗媳婦家，把一袋磨好的米粉交給旺狗媳婦，突然往地上一跪：“拜託你了，嫂子，你幫幫六六，帶帶孩子，替我還了他的恩吧！”

六

牧牛山上的紅葉呀，紅了又謝。牧牛山下的稻子呀，黃了又黃。又是五年過去了。

六六娶的新媳婦都又生下細仔了。細仔長大了，都會叫巧巧“孀”了。

立健啊立健，你在哪裡，你怎麼還不回來？

有一天，在村頭分紅薯，旺狗媳婦發現巧巧挑不動了，忙去幫她擔上肩，歎了一口氣說：“唉，要你老了怎麼辦啊？”

巧巧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是啊，老了怎麼辦？她得有個孩子，哪怕是抱一個。帶在身邊，心裡踏實，有個依靠。

對了，鄰村的親戚最近在路邊揀到一個半歲的女孩，把她抱來吧，又做了件好事，又有個安慰。於是巧巧抱來了養在家裡，給她喂米糊，逗她張嘴笑，給她取了個名叫“月月”。

月月一天天長大，從抱在懷裡到學會走路，到翹出兩支小辮兒，巧巧身邊有人了。

寂寞得像死一樣的水潭，似乎又有了一絲微波。

月月上初中了，長得像一朵花了。

有一天，月月在看鏡子的時候，巧巧本能的伸過頭去，想看看自己。

發現那是一朵花和一截老樹啊——自己的頭上已長出了幾根白髮了。

啊，啊，我老了。

月月大了，終歸要出嫁的，到頭來，還是我一個人啊。

等床上的月月熟睡，等皎潔的明月掛上海空，巧巧又在窗口點上那盞燈，望著大海，她在想啊，想：難到永遠是一個人，永遠是一個人啊……

一年過去了。

十年過去了。

二十年也過去了。

大鵬灣的潮水啊，一波接著一波，梧桐山上的雲啊，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你們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他的去處啊……

吃食堂、煉鋼鐵、文化大革命、“四人幫”垮台……一幕幕政治風雲，在她眼前掠過……

一根根的白髮添滿了巧巧的鬢角。她還在守著、守著……

這已經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初了。

深圳辦特區了！這個消息傳遍了大鵬灣畔的山山水水。

很快，生產隊改了，變成了向北公司。村裡的地都不再種了，從河那邊過來了香港人，他們租了地辦廠，一幢幢工廠立起來了，湖南的、江西的、四川的……一群群青春活潑的女孩子像潮水般地湧來打工了……

現在，人們都不再叫她巧巧、巧巧姨，而是叫她巧巧阿婆了。

她不再下田幹活，說準確點，是再也沒有“田”下了！每年坐在家中就可以分到上萬元紅利。

有錢了，巧巧生活上不愁了。但是錢又有甚麼用啊？人都老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啊？

巧巧常回憶起年輕時同鄉親們一起幹活的時光，在田裡說啊、笑啊，偷偷把水滴在同伴的頸窩裡……那時沒錢，但有快活，現在能買回快活嗎？能買回時光嗎？還有，能買回人——買回我的立健，我的丈夫嗎？

他在哪？他到底在哪？他死了嗎？難道旺狗沒向她說實話，他真的是死了嗎？

不，他不會死，我的丈夫怎麼會死呢，我要等他，等到梧桐山崩塌、

等到南海的水乾……

——
1995年冬，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傳遍了向北村：偷渡出外30多年的吳水容回來了！

這個消息，是公司的總經理，也就是六六打電話告訴她的。

巧巧的腿有些發軟，額頭上沁出了汗，如果沒有趕回來的月月的攙扶，她真是難以走到吳水容住的賓館門前。

等了30多年的巧巧，腿都打顫了，她真的等老了！

兩姐妹抱在了一起。啊，水容姐啊，你也老了，你也老了啊！

以前粗布赤腳的水容呀，如今你穿的是旗袍、坐的是洋車，還抹著口紅，好洋氣啊。

老姐姐啊，你還記得嗎？記得當年咱們一起上夜校，一起學識字的事嗎？哎呀，那時你那腳板上的繭有多硬啊，夜裡走路踩在田埂上都不用穿鞋啊。

這一切不都像做夢麼？

當人們都散去，屋裡只剩下老姐妹倆時，巧巧終於鼓足了勇氣問：“水容姐，你說實話給我，他呢？他……還在不在人世？”

七

那天，準確地說，是30多年前，1957年的那一天。立健和旺狗乘的船一點風浪也沒有遇到，很順利地就到達了香港。

他們只知道，大陸這邊的解放軍是不抓了，但香港的警察抓不抓呢？

奇怪，香港海上的巡邏艇遠遠地看著，也不過來。

他們還是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停，把船駛到了一處山崖下。

這裡是一片荒山，四周也沒有人。選擇的時間不錯，已經天黑了，是上岸的好時候。

旺狗碰碰立健的手朝一座山崖奔去。

看看沒人，兩人悄悄地往崖上爬。等他們往崖上一探頭，媽呀，崖上面有兩個挎著槍走來走去的英國兵。

他們正要往草叢中躲，一個高大點的分明看到了他倆。這時，只要那個“鬼佬”走過來十步，他倆就只有舉手了。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們聽見那“鬼佬”用生硬的中國話喊：“上來吧，上來吧，不抓你們。”

立健和旺狗以為是聽錯了，但那兩個英國兵還在向他們揮手：“上來啊——不抓你們——”

後來才知道，英國人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香港要勞工。

“起來，立健！”旺狗突然神氣起來，拍拍身上的泥說：“走——這是咱們中國的地方！”

他們就這樣順利到達了香港市中心。

香港工作好找，他們很快進了一家手錶工廠。一日三餐都在廠裡。二十幾個人擠在一間用破貨櫃改裝的“房間”裡面，連窗戶都沒有，香港天氣熱，悶得像蒸籠。可第一個月發下工資來，立健竟拿了200多塊！這是在家裡做一年的錢啊！

拿著一疊鈔票，立健喜呆了，巧巧有錢了！

按照同巧巧約好的，在租住的黑暗的貨櫃裡，他弓著身子，趕快給巧巧寫了第一封信。

命運這個東西多麼奇妙啊，本來，如果這封信寄出去了，巧巧收到了，兩個人的後來可能是另一個樣子：他們夫妻可能就像許許多多的偷渡家庭一樣，巧巧在河北邊幹社會主義的“公社”，立健在河南邊幹資本主義的“工廠”，每月給巧巧寄錢過去，過年回寶安“探親”……

可是，就在立健拿著給巧巧的信要上街寄時，有人跑到“貨櫃”來告訴他：“外面有人找你。”

來人不是別人，是早就逃到香港來的同村的小兄弟。

“龍仔——是你呀！”立健發現，當年村裡一起玩大的小伙伴西裝革履，變得洋氣十足了。

“是的，我做老闆了。”一番親熱問候後，龍仔拉著他進了一家咖啡館。

一聽說是給老婆寄錢，龍仔說：“慢點寄——我先給你說件事。”龍仔攔住他，又問：“如果有一沓錢放在這裡，”龍仔點點桌面，“你願拿嗎？”

怎麼這樣問？誰不想發財啊，立健傻傻地點了點頭。

“那就好，我帶你去發財！”

立健不明白：賣白粉呀？

“傻瓜，我才不幹那犯法的事呢。我帶你去法國。”

“法國？”立健嚇了一跳。

“對，開餐廳，當老闆。”龍仔說。

立健又把這位當年看牛的小伙伴從頭到腳地打量了一下。

“法國人的錢，好賺。我在那裡開了一家中餐館。”啊，是這樣。

“我得從香港進貨。”龍仔說，“普通的醬油啊、醋啊、乾貨啊……拿到那裡燒出來的中國菜，價格就是十倍、幾十倍的翻。你要願意，就同我一起幹！”

立健很矛盾，他想著巧巧。

“嗨，你呀！”龍仔說他太老實，“出門的人，誰不是家裡放一個，外面住一個？還是金髮碧眼的。”

立健想的可不是這，他擔心的是：“我去——能幹甚麼呀？”

“做廚啊，就到我店裡去做廚。”

立健搖搖頭說：“我不行，我哪能做中國菜呀，平時做菜都是我姐……”

“傻瓜，外國人哪知道甚麼叫中國菜呀？只要是扁鼻子的中國人，繫個白裙，往那一站，就認你是中國廚師。切碎了，下了鍋，就是中國菜。”

他心動了。心想，到賺足了錢，風光了，再給巧巧一個驚喜。

然而，事情並不像設想的那麼順利，立健來到法國不久，龍仔的中餐館就倒閉了。

分手的那一天，龍仔把一疊錢放到立健手心裡，無奈地說：“我也顧不上你了。立健，是我害了你。你拿了這個錢買機票回去吧。”

但是，立健怎麼能回去呢？就這樣一文不名地像個流浪漢回向北村去？去見巧巧？他拿甚麼臉見人啊？

“還有一條路。”龍仔說，“附近有一家職業介紹所，那裡有個老華裔，我介紹你去他那裡，也許可以找到活幹。”

職業介紹所的老華裔挺熱情：“別急，老鄉。總能給你找個謀生的地方。你每天來這兒等著吧。”老華裔安慰他。

夜色落在巴黎城中，立健孤身一人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人家窗口，燈

火輝煌，一家人幸福團聚，他鑽進公園的灌木叢中，墊兩張報紙棲身……

白天，他來到介紹所，坐在長沙發上等招雇的主人。來介紹所要雇工的人倒不少，但看看沙發上坐的是個華人，都搖搖頭走了。

是的，誰會要他這個語言不通的華人呢？

他只有對天祈禱，但願有人看上他，哪怕讓他去做搬運、掃地、清理廁所……甚麼都可以。

上帝似乎有意在安排一段命運：讓吳立健在法國扎根，讓巧巧一輩子癡心的苦等。

奇跡真的發生了！

有一天，他迷迷糊糊在沙發上睡著了，他聽見耳邊有一個聲音，一個銀鈴般細小而好聽的聲音：“Bonjour.”（法語：你好）

眼前站著的是兩母女：一個五六歲的金髮法國小女孩，在女孩旁邊是一位美麗的法國中年女子。

立健簡直是跳了起來，一下燃起了希望。

但是那位法國太太對他審視了一下，一聲沒吭，牽著女兒，走了。

又沒戲。別做夢了——立健又閉上眼睛打瞌睡。

“起來，起來！”不一會，老華裔過來了，捅著他，“老鄉，你的好事來了。”

原來，這是一個剛剛失去了男主人的法國家庭，愛麗沙的丈夫是個司機，不久前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

也許一個家庭真的太需要男人的存在了，而一個外鄉人和他誠實的面孔更叫人覺得可靠。愛麗沙決定替華人吳立健申請留下來，幫她做一些粗重的家務活。

最先，立健的工作僅僅是幫助兩母女收拾花園、清理房屋。愛麗沙和艾妮出門時，他牽著艾妮的手，充當母女倆的保衛者。另外，收拾完桌上的刀叉後，教艾妮學幾句中文……

就是在對艾妮的教習中，這個牧牛山下的中國青年，也慢慢學會了用生硬的法語同兩母女交流了。

幾個月後，愛麗沙對立健說：“如果你願意，可以長期留下來。”

又是一個月色溶溶的夜晚，藉著丁香花的陰影，愛麗沙溫柔的身體主動靠近這個俊秀的中國青年。她輕輕地抬起頭，那是一句所有的年輕人都難以抵禦的請求和命令：“你可以吻我——”

吳立健的心中，真是太矛盾了，這……這叫我怎麼辦？

後來吳立健在回憶中說：“那一刻，我的確想到過巧巧，想到我今後怎麼辦……但是，在生活面前，我投降了。”

立健啊立健，這個時候，就是在這個散滿丁香花香味的夜晚，地球的那一頭，牧牛山頭的太陽正在升起，勤快的巧巧正踏著露水去割草，她在村口遇到鬍子爹，商量著要去香港找你啊。

啊，世上的事情是這樣的難料！

這以後，英俊的吳立健就同比自己大 10 歲的愛麗沙結婚了。

八

“巧巧啊巧巧，你不要慌，不……要恨他……”水容說。

她看見巧巧的身體在搖晃，她趕忙扶住了她。

啊啊，你是那樣的絕情啊，你知道我在這邊是怎樣苦苦等你嗎？

三十年啊三十年，我等你，年輕的我等成了滿頭白髮了呀。

“他——他——還說了甚麼嗎？”

就像是一個人到了最後一刻，還希望著奇跡出現，巧巧眼巴巴地看著水容這位大媒人。

你是媒人啊，你是我們倆的牽線人啊，他說了甚麼？他還在想念我嗎？

可是水容搖搖頭：他甚麼也沒有說。

巧巧再也沒有想頭了。

不過，她還有個想法。

啊，我不怪你，你就是在那邊成了家，我也不怪你，是生活讓你這樣的。

牧牛山還在，老屋還在，你掰斷的筷子還在，我就守在這老屋裡了，我守你一輩子！我沒有更多的願望，我只希望你能夠回來，回來讓我見你一面。對我說一句，你沒有忘記我，讓我沒有白等你。說完你就可以走。

我還是你的巧巧，你還是我的立健。就這一點了，行嗎？

水容沒說話，她用眼神告訴巧巧：立健是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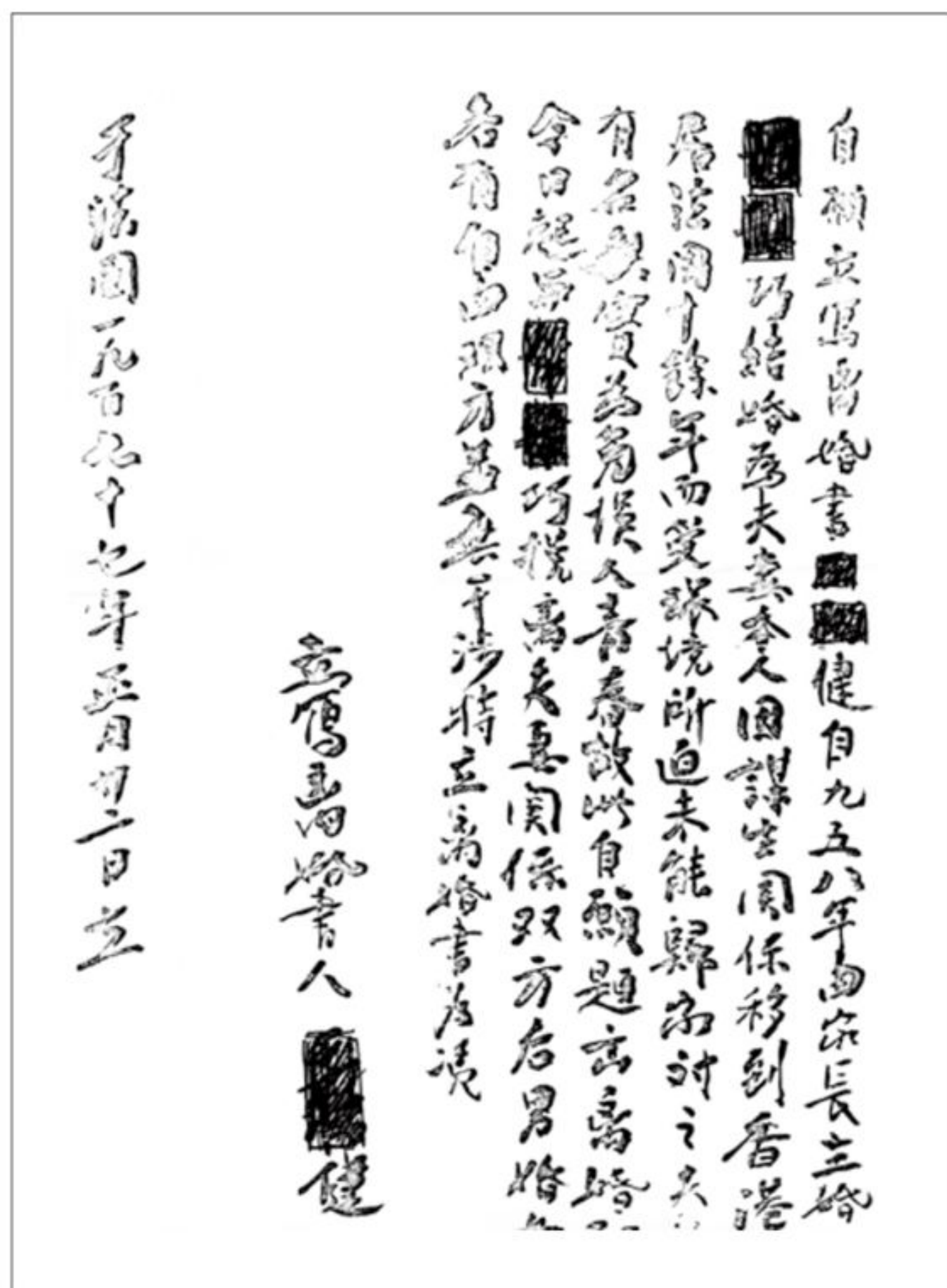
其實，就是在巧巧那次找到她閣樓上時，水容就在隔壁的鄰居家。但是，當時她剛剛得到立健與愛麗沙結婚的消息。

她怎麼好說出來呢，她這個媒人怎麼好意思見巧巧呢？

這以後，立健在那邊做了父親，曾來往法國和香港做生意。也許因為在心裡放不下巧巧，他一直沒有加入法國國籍——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

時間一天天過去，年青英俊的吳立健一天天老。他不僅成了法國人，也做了外公了。他才終於下定了決心。

吳立健請求水容：“老姐啊，都這麼多年了，你還是告訴她吧，讓她別等了。她也苦啊。把那東西給她吧。”



吳立健給文素巧的退婚書

水容拿著那樣東西，就像是一塊沉甸甸的鐵。她太矛盾了！

立健在電話那頭說：“姐，我就求你，做件好事吧。總不能欺瞞她一輩子啊。”

又是許多年過去了，在多次催促之後，吳水容終於下了決心。

她回來了。她回來就是要做那件 33 年都想做，但又不忍心做的事。

“巧巧哇，你不要哭，不要哭啊……我給你看吧……”

她拿出了一個手絹包。打開手絹，裡頭是一張紙。

這是立健逃港後的第 20 年，就是 1977 年寫給文素巧的“休書”。

自願立寫離婚書。□□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長主婚與□□巧結婚為夫妻。本人因謀生關係移到香港現居法國十餘年，而受環境所迫，未能歸家，使之夫妻有名無實。為免誤人青春，故此自願題（提）出離婚。從今日起，與□□巧脫離夫妻關係，雙方後男婚女嫁各有自由雙方並無干涉。特立離婚書為憑。

立寫離婚書人 □□健

於法國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據後來文素巧的姐姐告訴我，“休書”中所說與文素巧結婚的時間是“九五八年”是錯的，準確地說應為“五七年”。

九

我得知這個故事是在 2000 年，當時我正在採訪研究特區婦女問題的一個報告會。會上，文素巧 43 年不嫁等丈夫的故事，是作為一個反面教材，在婦女們中進行宣傳教育的。與會者一致譴責從一而終的封建禮教對婦女的精神毒害後，似乎都持批評文素巧的態度。

我感到事情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簡單，決定尋找文素巧，聽聽她本人是怎樣說的。

費盡周折，我終於找到了文素巧的電話。“00852，啊，香港，她最後

還是去了香港！”

“嘀——嘀——”香港的電話是種特殊的聲音。電話通了，我屏住了呼吸。

“邊個（哪位）？”從遙遠的空中，傳來一個有些蒼涼的老女人的聲音，是寶安縣人的粵語。

啊，是她，天啦，這就是我千辛萬苦要尋找的文素巧啊！

我不知該怎麼介紹自己。我們從來都不認識，我還擔心說到我是記者很可能會把她嚇跑。

但是，我又不能不說真話。因為，最後她還是會知道的。

我鼓起勇氣，也許是找不到太好的理由，所用的都是慣用的套話。我說報社和區政府都很關心她，都很同情她的那段身世，希望她能回來，我們見一見。

那頭突然就沒有了聲音。

她大概在猶豫、在回憶、在斟酌……

終於，那頭傳來了聲音：“還說那幹嘛？不說了吧，記者。都是過去好久好久的事情了……我都記不清了。”

“沒關係，你過來吧，我們會幫你慢慢回憶、整理。對後人也是筆財富。說明還是改革開放好呀！村子裡的人，旺狗、旺狗媳婦……都會來的，他們都在等著你呢。”

這回等的時間更長一些了。

半天，那邊傳來聲音：“我看還是算了吧，我都是快進墳墓的人了……”

我還想再堅持。她似乎在哀求我了：“我的心已經乾涸，記者……對不起了。”

我還能再說甚麼？我還能為了自己的需要，再去揉碎可憐了一輩子的老人那顆破碎的心嗎？

我緩緩地放下了電話。一切都安靜了……

文素巧就這樣從我的、也從幾乎所有人的視線中消失了，如同傍晚天邊的一抹暮霞消失在夜空……

就像這世上許許多多的小人物一樣，他們匆匆走過這個世界，身上那些辛酸的故事，只能由他們自己嚼碎了，自己咽下……

第三節 逃港的廣州女大學生

那些疲憊不堪的偷渡者，在飢餓、恐慌之中，抱著無窮的希望，於千難萬險之後，登到了山頂，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燈光，一派輝煌的景象。那種即將獲救時的驚喜、緊張、興奮……陡然一齊襲來，那是何等的高興和幸福啊！

他們太興奮了。

而就在這種神經極度的興奮中，他們忘記了懸崖就在腳下！

—

現在是 1996 年的 7 月，即 1957 年大放河口後的第 39 個年頭，我與萬冠平老伯同坐在蓮塘村邊的一株大樹下。他當年是蓮塘村的生產隊長，而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

村口的下面看得見邊境。

香港很快就要回歸，河邊的崗哨實際上已形同虛設。以前邊界是不讓靠近的，現在那兒變成一片菜地。從湖南、四川……各地請來的菜農都在“禁區”悠閑地澆菜，與站崗的戰士分享著三五牌香煙……一片平寧景象。

四圍青山、半壺清茶，一抹晚照。聽白鬚老人遙話當年，真有點“古



20 世紀 60 年代蓮塘村萬冠平（右）與知識青年李美媚（中讀書者）在毛澤東思想夜校門前

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味道。

“一聽說放河口，內地就全亂啦。”萬伯搖著蒲扇說，“也不知怎麼一下就來那麼多的人，四面八方，潮水一樣。廣州、惠州、韶關……哪裡的都來了。傻啊，一群一群的，圍著村子轉，找不到口子出去呀。我就叫民兵給他們帶路。”

“帶路？”我問，“你不怕上頭批判。”

“不會。”萬伯說，“上頭也是睜隻眼閉隻眼。”

萬伯喝了一口茶：“後來不是不讓過了嗎？但不聽，還是來。就發動民兵抓。有些胡亂撞著就撞到你家裡來了，就像一群給趕得沒處飛的雀子，還跪著哭著求你。看著真難受。當時我還是民兵隊長啦，叫我也去抓。你能不去？唉，好多事說來心疼啊。”

我知道已經觸到他記憶最深處了。

“哪件事是你最難忘的？”我竭力想喚起他的回憶。

他露出難過的神情，忽然扭過頭：“看見那裡嗎？”他的蒲扇指著北面的一座山峰問，“那兒叫甚麼？”

那不就是深圳人人熟悉的梧桐山嗎？為了這部書，我不止一次爬上這座深圳最高的山峰。

“不是，我說的是那。”他站起身來，拿蒲扇柄指著，“在那山尖旁邊，下邊有一個最險的懸崖。看見了嗎，那叫甚麼？”

我手搭涼棚往上看，那是一個突兀的山峰邊的一個懸崖。我搖搖頭，說不出名字。

“那叫鷹嘴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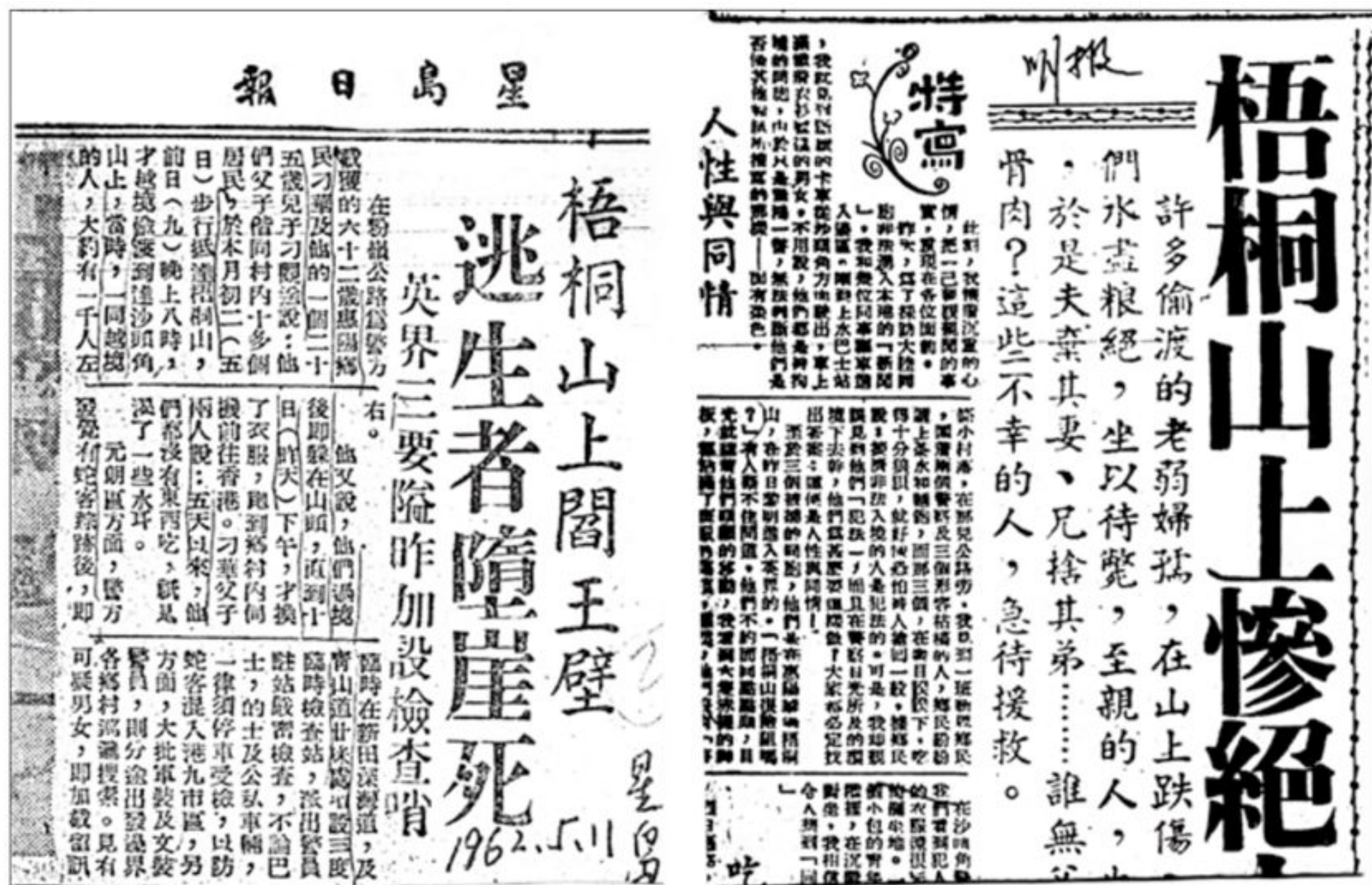
啊，是它！我猛然想起香港的報紙上披露的，逃港者經常提起的梧桐山上可怕的“老虎嘴”。

“是的，也叫老虎嘴，香港報紙還叫它閻王壁。當年，好多從南邊跑過來的人，夜黑看不到路，就是從崖上摔下來死的。”他說。

“你見過？”

“見過，多啦。”

不知是不是過分的渲染，傳說當年逃到梧桐山中的人，飢餓、疾病纏身，為了獲得最後一口活命糧而搶奪……鷹嘴崖下的屍體，一個挨著一個，上面的死了，下面的還在抽著氣。



港報關於梧桐山“閻王壁”的報導

“慘啊！”他露出十分淒慘的面色：“有時上山，猛然就會發現草叢中的死屍，我就順手拿鋤頭刨了坑，把人家埋了。”

他停了一下：“好吧，我給你說吧。那件事，就是發生在鷹嘴崖下面的。”那是在“大放河口”後不久……

二

海邊的氣候就是怪，平常又溫暖又濕潤的，可一到乾燥時，就乾燥得不行，常常引起山火，也不知那濕潤的海風都到哪裡去了。所以，梧桐山下的蓮塘村，安排有專門巡邏防山火的人。

“當時村裡派了我做防火員，每年給我記一百工分。”萬冠平老伯說。

那一天下午，準確說是傍晚了，大約五六點鐘，天色昏昏暗暗的，已經不大看見人了。我下了工，還想在山上割把柴回去，遠遠地看見鷹嘴崖下的山腰中升起了一縷青煙。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有人失手，把山草點燃了。

我趕忙撕開喉嚨喊人：“起火了——快來人呀——”我這一喊，周圍還在山上幹活的村民，都丟下手上的活，你呼我喊都往鷹嘴崖下跑。村裡的鑼聲也響起來了。提桶的、拿盆的，人們都急著朝山上跑。

眼看著滿山遍野的村民上來了，我猛然一想：奇怪了，現在還不是乾燥時候呀，草還濕著呢，怎麼就發山火了？

怕是有階級敵人搞破壞！

我便警惕地抓起了路邊的一根木棒，朝起火的地方跑。

火舌在灌木叢上空旋轉著，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響。被燒化的草葉像一隻隻蝴蝶飛舞……

“快啊！”人都上來了，幾個年輕人衝在前頭，我領著一幫青年衝進了大火中。

“你說我發現了甚麼？”萬伯問我。

“我看見一個女學生。安安靜靜地坐在火圈子中央。頂多就二十歲吧，大火燒出了一個圈子，圍著她，熊熊的，可就是沒燒到她。”

“火是她放的？”

三

林瑋（化名）從小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女孩子。

1950年，做商人的父親逃到了香港，他是去“避一避”共產黨的，以為早晚還能回來，所以把妻子和女兒留在了廣州。

留在廣州的林瑋很爭氣，1956年上了廣州的名牌大學。

1957年上半年，學校號召給黨整風，向領導提意見。系裡派下任務來，每人給黨提的意見必須在五條以上，誰提得多誰就是對黨忠心。

提甚麼呢？她絞盡了腦汁，也盡是些雞毛蒜皮的意見，比如系領導架子大，見面不理人啦；公私合營後，家裡住的房子太窄啦……之類的意見交給了團支書。

誰知，就因為提了這些意見，不久有消息傳出，說這次“大鳴大放”，班上有四個同學被內定劃成了右派，其中還有一個是女的，原因是對黨的公私合營政策不滿。

班上資本家出身的人，除了兩個男同學，還會有誰呢？難道是我？

林瑋害怕起來。這時，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給父親打電話，問父親怎麼辦。

正是這個電話，改變了她的一生。

郵局的電話亭是一間間的小格間。

“孩子，你來得正好，爸爸正要找你。”爸爸在香港那頭說。

爸爸反要找她？

“聽著，不要急——周圍沒有人吧？”爸爸說。

“沒有。”林瑋看看四周，都是用玻璃板隔著的，在小格裡打電話，外人是聽不到的。

“最近深圳放寬了，邊防不設崗，想過香港的人都放行。這事他們不宣傳的。你趕快抓住機會，過河來。”

第二天一早，踏上往南去的火車，她才發現，車廂內的人格外多，大多數是年輕人，都拿著小包和簡單行李，而且都是到深圳下車的。

這還用說嗎？

快到黃昏時，火車到達了靠近深圳的布吉車站，再過去一站就是深圳了。忽然，列車員走過來說：“下車，都下車——列車不開了。”

大家一下子愣了：“為甚麼不開？”

列車員：“上面來的通知，深圳那邊不讓車開去了。”

滿車廂的人都急了：“怎麼回事啊？”

趴在車窗上往下一望，布吉車站邊站滿了人，都是從深圳退回來的。

有人敲著車窗玻璃：“下來吧，不讓去香港啦。”

“共產黨改口啦。”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車站裡，成千的人都不知道何去何從。

人群中有人議論：“不讓過，我們自己過。”

“我們上梧桐山，走小路！”有人提議。

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說：“我知道路，上了梧桐山，下面就是香港！”

“走——上梧桐山啊！”有人呼喊著。

人群便像一股潮水，朝山上湧去。

此時的林瑋，已經身不由己了，她一想，回去了也要捱“批”，不如隨著人群去闖。

天色已黑了，山上的路又陡又滑，分不清哪是草、哪是石頭，高一腳低一腳地往前走。

猛地聽見遠處有人歡呼的聲音：“到了——到頂了啊！”

那聲音，夜裡聽來多麼清晰，多麼激動人心啊。

“香港——”山頂上一個激動得有些顫抖的聲音，“香港呀！”她看見前面有人在跳起來呼喊。

“我們看到香港了！”到了山頂的人叫喊著。

林瑋抓住了一把樹枝，拉著身體上了一個斜坡。

猛然，她好像聽到前面有滾動的聲音，像一塊很大的石頭滾下山去了。

原來是一座懸崖，好險啊，差點沒掉下去！

往下一望，呀，山下，南邊天空一片光芒，像白天一樣。那是甚麼？像是天上的繁星，比繁星還要多啊，原來那是燈光啊，香港的燈光，只隔著一條窄窄的深圳河，那麼輝煌燦爛啊！

啊，香港，爸爸在的地方！她太高興了，太高興了！

突然，她感到腳下的石頭在滑動，猛地，她的身體像一個車輪，朝幾百米的山下滾了下去。

她從懸崖上掉下去了……

四

據她後來對人說，她醒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從手錶上的日期看，她已在山上暈死一天了。

她發現自己是在一棵小樹旁邊，一棵長在懸崖上的小樹把她攔在了半山腰，救了她一命。

太陽正在朝西去，暖暖的陽光照著，雲雀鳥兒在附近的灌木叢中調情唱歌。四周靜極了。

人群呢？喧嘩聲呢？那滿山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啊，她記起，大家說好是要下山過深圳河到香港去的。

猛然，她聽見不遠處有人呻吟的聲音。

下午的陽光照得眼睛迷迷糊糊地，她看見離她一百米遠的草叢邊，有一個滿身是血的人在呻吟。

還有人摔下懸崖了，我要去救他！

她正準備起身，猛地感到左腿劇烈疼痛，這才發現，左腿的小腿骨已經折斷了。沒有出血，只是青紫的一大塊內淤，不能動了。

不能，不能停，在這空曠的山上，得有伴，得跟“人”在一起。

她本能地向那位“同伴”爬去，有伴就好！

“你醒醒！”她搖著他的肩膀。這人不知是從哪兒來的，胸前的口袋上還插著一支水筆。

然而，她失望了，就這十幾分鐘的工夫，他已經不再呻吟，頭歪在胸

前：死了！

猛地，她又看到，崖中間的石頭上，還掛著一具屍體，血糊糊的頭都破了！可能也是晚上摔下來的。

真叫人害怕。

“喂——有人嗎——”她拼出了最大的力氣，用手合著喇叭朝著大山喊。哪怕就是一位砍柴的農民聽見都好。

“喂——有人嗎——”山野響著回聲。

沒有回答。

空曠的山野，一片死寂。

突然，她明白了，自己已身處絕境。

現在，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待，等進山的農民，來砍柴啊打獵啊甚麼的，能偶然發現她。

太陽一下山，四周就變得冷颼颼的。

就在離她五十米的地方，突然間串起來一簇簇的藍色火苗，一閃一閃。林瑋突然明白，這就是書本上說的“鬼火”。

“喔——喔——”她突然聽見一種更恐怖的聲音，有時拉得很長，有時又十分短促。這聲音一會兒很遠很遠，一會兒又好像逼到灌木叢邊上來了。

她記起外婆小時候講的故事，說那是“鬼”的聲音。鬼同人不同，叫起來是沒有後音的。這一想，林瑋的毛髮都豎起來了，她壯著膽子大喊：“打——打——”用木棍死勁敲動樹枝壯膽。突然聽見一陣翅膀的撲騰聲：哦，原來是一隻貓頭鷹。它飛走了。

她再也不能睡，再也不敢睡。越是怕，越是不敢睡。直到東方露白時，她再也支持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等她醒來，已經是又一個山中的傍晚。

現在，她可以看見山下的村莊，還有村莊上空升起來的炊煙。她甚至看見了山下的那些黑點，那是晚歸的農人。

“救命啊——”“救命啊——”她拼出最後的力氣叫喊。

空曠的大山依然迴響著“救命啊——”的回聲。

離得太遠了，聲音太微弱，山下的人根本聽不到。

無論如何，再不能過第二個夜晚了。沒有水，食品也不多了，這樣下去，要麼就是被野獸吃掉，要麼就會餓死在這裡。

猛地，她碰到一個東西。

五

她碰到一盒火柴。

火在呼呼地燃著，救火的群眾慢慢都圍了過來。大家都來看這個圍在大火中的女孩。

說到這兒，萬伯似乎回到了當時的情景中。

“那女孩，一點兒也不怕，我想她是在等我們來抓她。你想，好奇怪啊，怎麼大火圍成一個圓圈在燒，樹啊、草啊，都燒光了，可就是燒不到她呢？”

後來火是被撲滅了。林瑋是萬冠平和兩個青年用樹幹做成的擔架抬下山去的。

“好瘦啊，抬在手裡，也就八九十斤吧。怕是餓乏了。”

萬冠平搜她的包時，發現有三樣東西：一張學生證、一個打碎的瓶子、一盒火柴。

“算她聰明，救了自己一命。”

“後來呢？”我問。

“可能是太久沒吃了，一見我們就問，阿叔，能不能給點東西吃？我就說你先到我家去好不好？我就叫老婆給她做了一大碗麵條，她呼嚕嚕都吃了下去。”

“她說了些甚麼？”

“她反覆向我解釋說她是好人，說包裡還有她的學生證。說本來快入團了，是她父親害了她，讓她走了這條路……”

“她不擔心公安會來押她走嗎？”我問。

“那倒不擔心，她就想有這個結果。”

晚上八點左右，公安到村裡來了。給林瑋戴手銬時，她一點都沒反抗。

“臨走時，我老伴還貼著她耳朵說：孩子，我們送你去公安也是沒辦法，你別恨我們啊，唉——”

夕陽中，萬冠平老伯滿是皺紋的臉上分明泛上來一絲痛苦。

“萬伯，你算是救了她一條命啊。”我說。

“你還說我救命啦，”萬伯搖搖頭說，“就這，後來搞‘四清’的時候，還說我是同情右派啦。”

萬伯低聲說：“那女孩子是個右派——她是害怕運動才逃港的。聽說後來還判了刑。”

六

林瑋是判刑了嗎？這倒給了我找到她的希望，因為現在應該早平反了，可以通過法院的檔案找到她的去向。

1996年炎熱的7月，我在得知故事後，從深圳趕到了廣州。

大學的老人事處長早已經退休，找到他時，卻依然十分熱情。

“是有這個事，我還記得一點：送回來後，通知我們去領人。定性是反革命縱火案。她看見學校的人來了就哭，說她有罪，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還要求不要告訴她的媽媽。當然，這哪可能啊，人很單純。”

“現在呢？她人在哪裡？”

我想，她到現在，最多就六十多歲吧。

“可以查查的，檔案應該還在。”老處長肯定說。

“沒有，沒有了。”年輕的女幹事不知是對這些事情不屑一談，還是擔心會洩漏“黨的機密”。

她又把我上下看了一下，說：“是放火的嗎？死了，早死了。”那女人一邊往她孩子的書包裡塞中餐，一邊淡淡地說：“我這裡沒檔案，你去韶關勞改場找吧。”

我感覺，她是在推脫我。

“沒問題，可以看啊，都在這裡。”韶關某勞改農場，已變成一個鄉的種養場了。一位農場幹部從玻璃櫃中拿出保管好好的厚厚一疊卷宗，“看吧，有乜（啥）——都四十幾年的事了。”

終於找到了！林瑋在勞改場的檔案。

這就是大學生時候的林瑋吧？穿著一件花格子的衣服，戴著一副眼

鏡，鏡片後頭透露出不諳世事的目光。

我拿出了相機，老幹部馬上把卷宗合上說：“同志，照相不行——”

“她的確是死了，就是死在場裡的。你看，這裡——”老農場幹部指著犯人的最後結語說，“62年4月15日，病卒。”

她大概死在大饑荒的年月。

“其實，她原來在校評語還是很好的。”農場幹部指著檔案念道，“積極上進，忠於黨和人民……政治評定給了她乙上嘛。學校對她也不錯，她的那些言論根本就沒有追究。也算不上。她自己害怕，精神緊張，逃港了。”

那位大學老處長也說過類似的話：“她其實沒有被劃右派，要劃的是另一位女學生。”

七

林瑋的故事完了，有一個疑問卻還壓在我的心裡。那是我在梧桐山頂留下的疑問。

在所謂的“閻王壁”我看到懸崖並不怎麼陡險，更不像香港報紙說的是“驚心動魄”。如果稍加留心，是不應該摔下去的。

可是，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摔下崖去呢？

天黑？人累？飢渴？緊張？還有甚麼原因嗎？我在懸崖邊上走著，想著……

站在梧桐山脊遠望，隱隱約約，看得見落在地平線上的香港望不到邊的高樓大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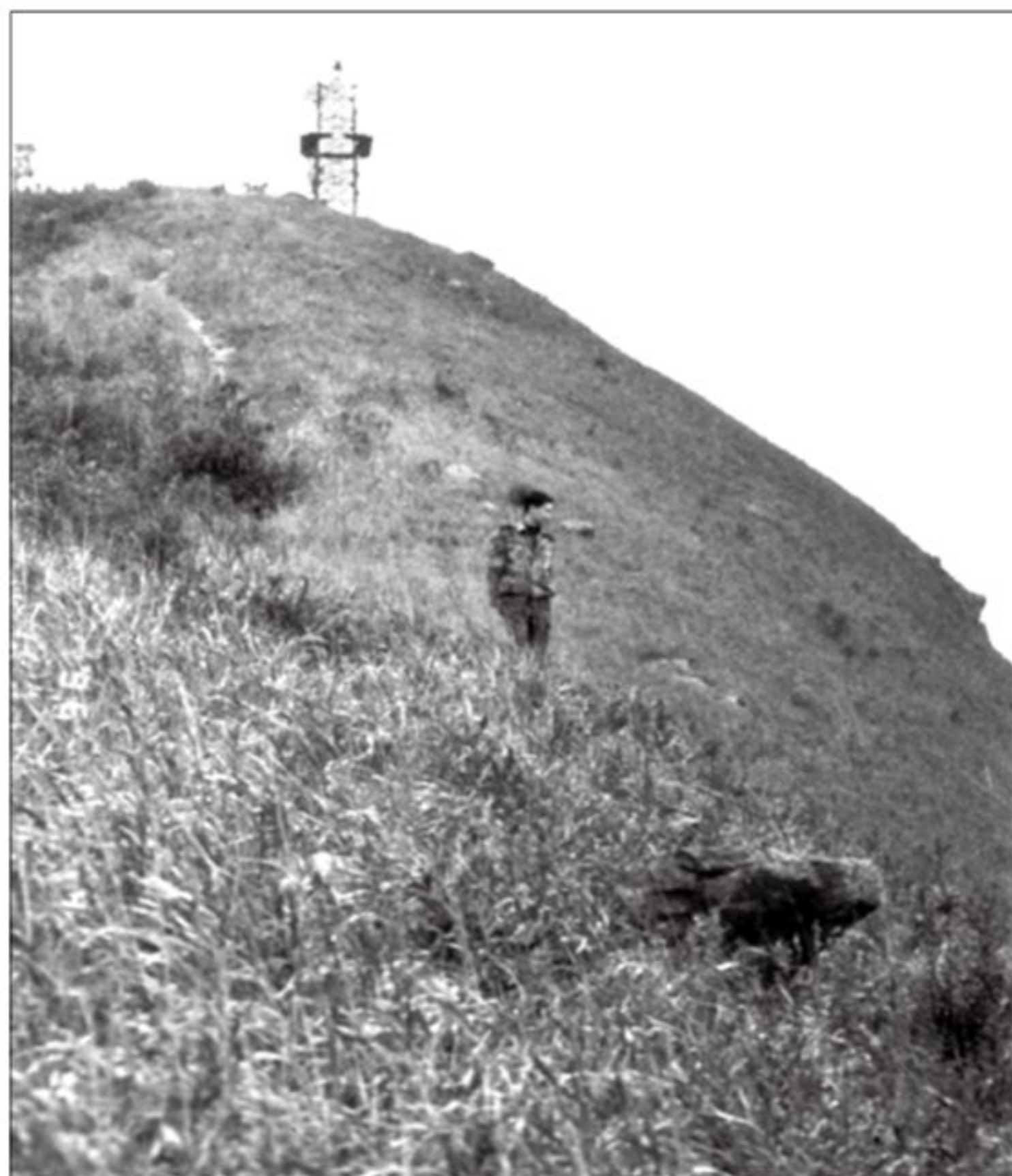
我猛然明白了。

那些疲憊不堪的偷渡者，在飢餓、恐慌之中，抱著無窮的希望，於千難萬險之後，登到了山頂，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燈光，一派輝煌的景象。那種即將獲救時的驚喜、緊張、興奮……陡然一齊襲來，那是何等的高興和幸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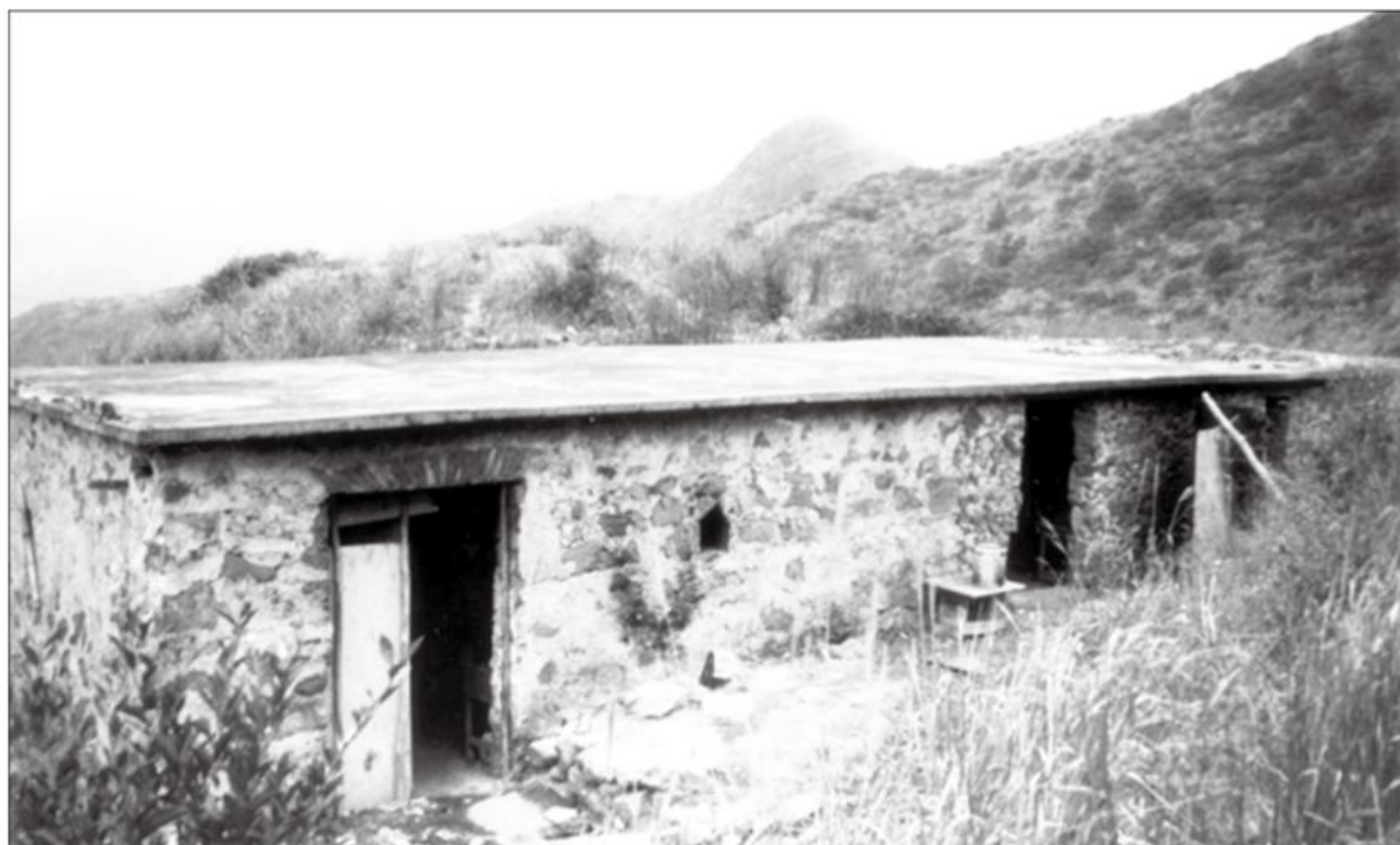
他們太興奮了。

而就在這種神經極度的興奮中，他們忘記了懸崖就在腳下！

悲呼，當年苦苦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們！



從梧桐山上看“老虎嘴”並不太險峻



20 世紀 90 年代仍留在梧桐山上已荒廢的邊防軍人住所

第四節 “木腦殼” 八次逃港傳奇

“你們別找我——我不信共產黨，也不信你們國民黨，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們讓我過幾天安靜日子吧！”

那年頭，寶安縣曾有個出名的人物，大名劉水生，小名“抓不怕”。據說他的“逃港”次數最多，創了記錄：逃了抓、抓了又逃，一共是 12 次。

他的成份好，貧農，父親是土改根子，說他是階級敵人，掛不上邊。說他是蛻化變質，“那你們共產黨怎麼教的？”公安局也拿他沒辦法。直到第 13 次“偷渡”深圳河，打了招呼的邊防軍便半睜半閉眼：“過去吧”。他才成功了。

我有些納悶，偷渡 12 次都不能成功？

人們告訴我，這就像人臉上長了塊疤，劉水生偷渡出了名，到哪兒都認識。所以他只要一動腿，馬上就有線報說那個“抓不怕”又來了。

這事情成了寶安縣的一段笑話。

我一直沒有找到“抓不怕”，據說是早死了。但是我見到了另一個人物，小名叫“木腦殼”，他也是逃了抓、抓了逃的。是個“跛子”。前後偷渡也達 8 次之多。當然也有人說是 7 次，最後一次不算的。

“木腦殼”的原名叫做賀德林（化名）。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是七十幾的人了，腳的確有點跛。他跛著腳怎麼還能跑 8 次呢？

於是女生中又是一陣笑，笑得德林紅著臉跑了。

時間一長，德林就感到，身邊好像多了一雙眼睛在“保護”他。他的心裡亂亂的。

又一次，星期天回來上晚自習時，德林發現課桌的抽屜裡多了兩個紅雞蛋。老實的德林叫著：“誰的——誰放到我這來了啊？”

“哈，做好事還沒人認啊！誰的？誰的？”滿教室的女同學都笑開了，扭著腦袋找人。

有的說要偵破，有的說索性把蛋分了，全班同學一人吃一點點。整個晚自習課堂像一鍋粥，都亂套了。

班長玉英氣紅了臉，走過去奪下德林手中的蛋：“交老師去！”

玉英剛走，就有女生“吃吃”笑著說：“哈哈，怕是玉英家的老母雞找錯了窩，下到德林的抽屜裡了吧！”

滿教室又是一陣大笑。

德林開始走神了，上課再也聽不進去了。玉英的成績也在下降。

有時台上老師在講課，德林瞟過眼去看玉英時，發現玉英也在瞟自己。嗨，這課簡直沒法上了！

到了級末，兩人都有三門補考。

“我下學期不想讀了，玉英。”放假的時候，德林在坪裡等著玉英，猛著膽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她。

誰知玉英回過同樣的話：“我也不想讀了。”投過來溫柔的一瞥，“現在不是號召青年回鄉生產嗎？咱們都回去算了。”

“那你說我們回鄉——好嗎？”

“好啊，當農民為甚麼不好啊？”玉英說。

“那我……”德林沒有敢說，其實他是想說：“那我回去了，還能再看到你嗎？”

他倆不在一個村子的。

玉英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我們是鄰村，地都連著呢，割禾插田都可以見面。還沒了那多管閑事的人。”玉英眼睛向左右瞟了一瞟。

最後這句話說得很輕。但是，這回玉英的意思，德林都聽進去了。

“那我回去了。”德林一下子高興了。

“欸——”玉英叫住德林，“你回去怎麼找我啊？”

“不知道。”德林摸著腦殼。突然又說：“啊，我知道了。”

“怎麼找？”見德林突然聰明了，玉英高興地問。

“我天天到鋤把丘去望你。”鋤把丘是德林家分的一塊靠玉英村子的自留地。

玉英用手指點了一下德林的腦袋：“木腦殼——那你就望吧。”

二

傻傻的德林天天到鋤把丘去鋤地，伸長著脖子，盼著玉英從村子裡出來。可是盼來盼去，就是見不到玉英。

他在想，玉英說了的，叫我望她，她一定會來的。

父親看他扛了鋤又要出去，說：“德林，你是怎麼啦？鋤把丘的地你不是鋤過了嗎？你是失魂啦！”嚇得德林的腦袋縮了回去。

玉英啊玉英，你怎麼沒影了，說話不算數的啊。

那時候，寶安縣裡的電影隊，常來鄉裡放電影。一到天黑，周圍幾個村的男女老少，細仔們揸凳子、阿婆們夾蒲扇，都來牛古村門前的大坪裡看電影。

電影剛放了一半，德林就聽見身後頭有個女人的聲音：“嗨——好專神呀！”他回頭一看：呀，這不是玉英嗎？

她今天特地打扮過吧，真漂亮啊，花格子的衣服，長長的辮子上還打了兩個花蝴蝶呢。

“你怎麼來了？”德林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問。

“我怎麼不能來啊？”玉英好像有些不高興呢，“我來看電影！”

啊，她根本就不是為了我來的。德林心中冷了一截。

可他又聽見玉英問了：“那你是在這裡做甚麼呀？”

“等你啊，啊，是看電影！”德林慌慌亂亂的，玉英掃了他一眼，他嚇得趕忙說實話：“是等你。我老等你來，你老不來。”

玉英故作不懂地問：“來哪裡啊？”

“來鋤把丘啊。”德林說。

“我到那裡去做甚麼？”

“你說的呀，你說過的到鋤把丘啊。”

“我說了嗎？我說了嗎？我哪裡說了！木腦殼！”玉英辮子一甩，腳一蹬，生氣地走了。

正好幾個同村的小夥子走過來了，問：“那女的是誰？”“怎麼脾氣這樣大啊？”

有人插嘴說：“不就是榕樹下村的唐玉英嗎？是好漂亮啊。難怪福貴會託人上她家說媒呢！”

甚麼？說媒？德林急了，直追問：“你說甚麼？給誰說媒呀，給福貴？”其實是逗德林的。大夥們都笑了：“哈，德林啊，你急甚麼，你心中有鬼啊？”

德林感到心裡像蟲子在爬，亂麻麻的。他聽不出同伴是在逗他。他在想，要是玉英她爹真答應了怎麼辦？幸好電影快“勝利”了，小夥子們都在解放軍的衝鋒中歡呼，他趕緊走開，往人堆外去找玉英。

“嗨——”忽聽見後面有個聲音，把他嚇了一跳。他一看：面前站著那個“蝴蝶結”。

“嗨，你呀，讓我找得——”德林擦著額頭上的汗。

“過來。”英英在向他招手呢。德林魂都快沒了，趕忙過去。

“拿著。”玉英那聲音很細很細，細到雖然周圍滿是人，卻除了他倆，誰也聽不見——戀愛的女孩子就有這本事。

玉英遞過來的是一個摺疊好了的小紙條。

人堆中暗，等德林拿到星光下去看時，玉英早已經不見了。

紙條上是德林熟悉的歪歪斜斜的筆跡：“明天晚上吃了晚飯，我在鋤把丘的榕樹邊等你。”

“啊！”德林簡直要叫了起來，他是飛回家去的。

那是多麼美好的鄉村夜晚啊！湛藍湛藍的天空，像一面擦得透亮的藍鏡子。藍鏡子上懸掛著一輪白晃晃的月亮。月光啊，那麼透明，乾淨，照在地上，像是灑著了一層白白的鹽。

月光太亮了，周圍的村落啊，山坡啊，樹木啊，甚至田裡游蕩著的小魚兒，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致你會懷疑：這是不是夜晚啊？這是白天吧？

風在輕輕地吹過，大榕樹的樹葉在悄悄私語。遠處的田裡，傳來“呱

呱——”的蛙聲。

兩個年輕人，第一次靠在一起了。

“你說，你在學校是不是就有我？”玉英問。

“你怎麼知道了？是有。”德林傻傻地抹著腦殼說，“你把我攔住那陣，我就有你了！”

“那你為甚麼不追？”

“追？”德林不理解，“你都沒跑我怎麼追啊。”

玉英氣得鼻孔裡“哼”了一聲：跟這個木腦殼說“新名詞”那是白搭。不過，反過來，玉英愛他的正是這點：實在。

“那你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時來這等我。”玉英罰他說。

“可以，可以。”德林說，“我家有鐘。”那年頭說自家有鐘是挺光鮮的。此後，他們就有了約定，每逢趕墟日子的晚上，都到大榕樹下來會面。終於，有一次，德林猛著膽子說：“玉英，你要是不反對，我就叫人去說媒吧。”

玉英說：“都還沒到年齡呢。明年吧，明年我們就都 20 歲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 1957 年。20 歲德林被合作社派去鄉裡修水渠。一天中午下工，廚房的炊事員告訴他，有人來找過他，是個女的，兩個蝴蝶結，很漂亮的。德林一猜就是玉英。

“她說甚麼了？”

“沒說，看樣子很急的。她說下午還會來找你。”

玉英一定有事。

下午，德林正在挑土，遠遠看見玉英來了。

“德林，你把擔子放了。”玉英一把把他拉到一旁，“我問你，你給我說一句實話。”

“甚麼事這麼緊張呀？”

“你真的願死活跟我在一起嗎？”

“願啊，當然願。”德林傻傻地眨巴著眼睛。這是怎麼啦？

玉英說：“告訴你個消息，邊防開口子了，不抓人。你跑不跑？一起去香港。”

德林聽明白了：“逃港？”

玉英說：“這不叫逃，是准過去了。聽說就給三天。趕緊走吧，在這邊，我們一輩子也別想過好日子。”

只要跟玉英在一起，到哪兒都行：“行啊，我聽你的。”

玉英說：“你就光知道聽我的，到香港去過日子了，你自己願不願意嘛？”

“我當然願啦！”德林想，跟玉英在一起過日子還不願意？

“你還不能給別人說，自個兒走就行了，知道嗎？”玉英老擔心德林“死心眼”。

“我知道的。”德林這才注意了一下工地，發現好像已經少了一些面孔，“唉呀，都在走人了，咱們要快呀！”

玉英說：“那就抓緊行動，你去拿兩件衣服，帶兩包人丹。”

“幹甚麼用啊？”

“天氣熱了，容易中暑啦。”

“還要甚麼？”

“不要了，越少越好。那邊甚麼都有。我還得準備幾塊錢。你先走。”

“怎——”

“你就直接從這下蓮塘去。對，別走羅湖橋，那兒不讓過。走蓮塘村山下面的那個口子。記住了嗎？那裡是留著讓過人的，不抓。”

“知道了，走蓮塘村的那個口子。”

“記住，不見不散。”玉英再吩咐。

“知道了，你快走吧。”

玉英轉眼就不見了。

德林趕忙回到工棚，包了兩件衣服，飛腳就出水庫。炊事員老頭問他：“德林，急著幹嗎去啊？”他說：“家裡人病了，請了假。”

三

上了去梧桐山的小路，他就發現，路上的人一個接一個，都是帶著乾糧，提著衣服包裹的人，都往邊境口子去。

原來，人們都知道了！

德林到了蓮塘村時，人絡繹不絕。還有抱著孩子的婦女、由人攙著的老人。有全家出動拖兒帶女的。德林這才懊悔，當時要把父親和妹妹叫來就好了。

蓮塘村的人真好，還把水桶裝了涼水，放在村口上。德林又累又渴，從水桶中抓起瓢來喝了一瓢，又拿一瓢潑在赤腳上，涼快！

這裡就是蓮塘村口。

路邊有一塊大石頭，德林把它搬過來，拿汗巾在上面掃了兩掃，坐在路口等。

人群一撥撥地過去。

一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

這玉英是搞甚麼呀？要去這麼久？

路上也有他認識的人，都說：“這不是牛古村的德林嗎，還傻坐著幹嗎啊，快些走啊！”

德林的心動了一下，但馬上想，玉英說了的，她說了會來。要我走了，她找不到怎麼辦？

其實，那一頭，玉英也等德林等苦了。

玉英到了南頭，找到弟弟，姐弟兩人馬不停蹄，抓了兩件衣服就往邊境口趕。

她說的蓮塘村的那個“口子”，就是下面的羅芳村開的“邊境出入口”。德林沒弄懂，在蓮塘村邊的路口死等。

趕到邊境口的玉英，在人流中到處找人，到處叫：“德林——”弟弟四仔也幫著喊：“德林哥——”

出入口邊人山人海，人越湧越多。哪裡找得到？

四仔說：“姐，你別動，我上邊境口那邊找找就來。”

哪知弟弟剛走，人流越湧越大，根本就站不住，玉英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就被裹挾著湧出了檢查口。

“四仔——德林——”玉英沒命地喊。

等她能站住腳，定定神，發現崗樓上站的已經是英國大個子兵。

站崗的英國兵用生硬的中國話對她說：“小姐，你不能在這裡停留，

你必須馬上離開！”

這時，他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姐姐——”啊，人流中，是四仔過來了。

“怎麼樣？”玉英很急。

“還是找不到，姐姐。”四仔拿衣服抹了抹脖子上的汗水說：“說不定他已經過來了。”

“不會的，他不會過來，他人傻。”

玉英對著河對岸死命地喊：“德林——德林——”

“我要回去，讓我回去！”

“小姐，請你馬上退回到香港地面，否則，你可能因為偷渡被刑拘！”一位執槍的華人港警走過來，用中國話對她說。

湧過來的人群——已經由不得玉英了——眨眼間就把他們推到了香港的新界。

這時，太陽已經下山了。

同樣的時刻，老實巴交的德林，還坐在河北岸蓮塘村口的石頭上，望著落山的太陽死死地等。

其實，蓮塘村的路口離出入口的路口，就只幾里路。

猛地，德林心中湧出一個解釋，一個唯一的解釋：玉英一定是出事了，一定是發病了！

他擔心得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趕快去找她！

此時，在德林的心裡，甚麼過境，甚麼香港，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的玉英！

“玉英——玉英——”他真情的呼喚聲在夕陽映紅的山坡上迴蕩。

他離開了村口，逆著人流往回跑。

找遍了玉英住的村莊，可哪裡還有玉英啊？

這是怎麼啦？這是怎麼啦？他不信，不信玉英會騙他！

那晚上，他坐在床上怎麼也想不通。找不到玉英，他也沒心思跑香港。

兩天後，當邊境口的閘門因為上級指示重新關上時，德林想再返回出境口已不可能。一對現實中的牛郎織女的分離生活，從此開始。

“你們約好的麼，德林？”村口上，村裡的伙伴逗笑他。

“是約好的啊。”德林抱著腦袋說。

“你沒記錯地方吧？”

“沒記錯，是她自己說的。”

“是她那邊有男朋友吧，那麼漂亮。”

“不會，不會。”德林著急了，“你們不要亂說。”

正在這時，有人來找德林，是中心小學的董校長。樣子很急：“德林，你快來，有急事。”

趕到學校的辦公室，董校長一把將門關了，指著桌上的電話說：“你坐下，玉英等下會給你電話。”

甚麼？玉英給我打電話？

“鈴——”電話響了。

德林還從來沒接過電話，拿起話筒來手都在發抖。

“這一頭是聽的，拿這頭。”董校長把他的手掰過來。

聽筒裡一個熟悉的聲音，呀，同平時說話的聲音一模一樣。

“是德林嗎？”

“是的，我是德林。”

那邊開始掃機槍了：“木腦殼啊，你在哪裡啊？”

“我在小學。”

“我問那天你在哪裡？”電話裡的玉英又生氣了，“你沒行動嗎？”

“我行了動啊，我坐在村口石頭上等的。”

“你呀——我說的是蓮塘村下面那個出境口啊！”

德林這才知道搞錯了。

“那怎麼辦？”他又請示玉英了。

“怎麼辦？你又問我，能不能問問你自己？”那邊的玉英在發火。

“我——”

“你不來，我要嫁洋鬼子了！”玉英氣他。

德林簡直要急哭了。

“玉英，你等我，你別嫁，我一定要過去，我一定會去找你，你等著我啊！”

賀德林找唐玉英的漫長歷程，從此開始了。

四

靠近深港邊境的祠堂村，有幾十畝雙季稻田。今年由於幹部抓得好，田肥下得足，稻子長得飛快。到十月份，都長到了齊人腰高。有老農說，熟啦，可以收割了。

齊腰的稻子，是偷渡者最好的隱蔽。賀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是在現今的深圳福田區祠堂村的那片稻田中隱蔽的。

一個星期之前，德林收到了玉英從香港寄來的信。他們成份好，治安主任是德林的表叔，信是不拆的——要是有問題的家庭，治保主任是可以隨意拆看的。

玉英告訴德林，傻瓜，我真會嫁洋鬼子嗎？我是那號人嗎？我是死活都在等著你的呀。

德林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玉英告訴他，現在羅芳村是防偷渡的重點，可別走那。祠堂村可以，稻子已經長上來了，埋得住人了。你上墟買肥料去過的啊，就在下步廟附近。

信中還詳細告訴德林，從觀瀾鄉到福田鄉該怎麼走。她就擔心德林又搞錯。

玉英叫德林從祠堂村走是對的，祠堂村外就是深圳河，河邊上有執槍的邊防軍巡邏。從村子到深圳河之間是一片稻田，只要在稻田裡等到天黑，就有機會靠近深圳河。巡邏的邊防軍是有限的，只要邊防軍走過去了，就可以直奔深圳河下水。

“我就在這邊河岸接你。”

這是德林接信的第三個晚上。

這邊玉英已經買通了新界種菜的農民，乘夜到了河邊一家菜農的小屋中。小屋雖然離邊界還有距離，但已經可以看到祠堂村的稻田了。只要德林穿過稻田、下水、過河就到了港方。穿過菜地，玉英已請了摩托車等

他。跨上摩托車，就甚麼事都沒有了，可以直奔香港市裡去了。

玉英通過窗口朝祠堂村那邊望，村子裡已經升起了炊煙。她擔心，也不知道德林有沒有到達河邊上。

這邊，德林的行動也很快，暮色剛剛降臨時，他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匍匐在稻田裡了。

草叢中的蟲子在輕輕地叫著，一隻小青蛙甚至跳到德林的頭上來了。遠遠地，村裡有人扯著聲音喊小孩吃飯……

又是一個小時過去了，應該是黑麻麻的時候了，怎麼天就是不黑啊？

呀，糟了。德林罵了一句娘，他沒想今天是農曆十四，出月亮了！

朦朦朧朧的月光照在稻田裡，甚麼都看得清。這還怎麼跑啊？嗨，要早衝出去就好了。

現在，動，還是不動？要是玉英在就好了。德林朝河那邊看看，看不到玉英。

就在這時候，有兩個人向這片稻田走來，還揹著鋤頭。這麼晚了還會有農民下地？

啊，是稻子快熟了，大概是來放水的。放乾田裡的水，第二天好割稻子。

嗨，早不來遲不來，真倒霉！放水口也許不在這丘田裡，德林想。

誰知道，有一個竟然走到他身邊的田裡來了。德林慌了，一緊張，身子就不自主地動。

“誰在那呀？黑黑一團的。”德林就更篩糠了，弄得稻葉子沙沙地響。

“誰？”他聽見一個警惕的聲音。

“老四，快過來呀，田裡有人！”他聽見有人喊。

當祠堂村邊的稻田裡傳出狗的吠聲、“抓偷渡”的人聲和鐵籠的火光時，那邊的玉英跺著腳：完了！

這回她看見德林了，被人從稻田裡揪了起來，在一陣火把人聲中向村裡走去。

唯一讓玉英安慰的是，抓走德林的不是邊防軍，所以沒碰上警犬。

五

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這樣結束了，被送到了蔡屋圍旁邊的一排竹棚裡——收容站關押拘留。

第一次關的時間不長，才一天多，表叔派的保人很快就來到了深圳墟。收容站的人看看來人帶的證件也齊，鄉政府還來電話說是初犯。加之那一段偷渡的人也多，竹棚也有些不夠用。

所長揮揮手：“回去吧，小夥子，在家安心生產，下次別跑了啊！”叫他簽了一份“不跑”的保證書，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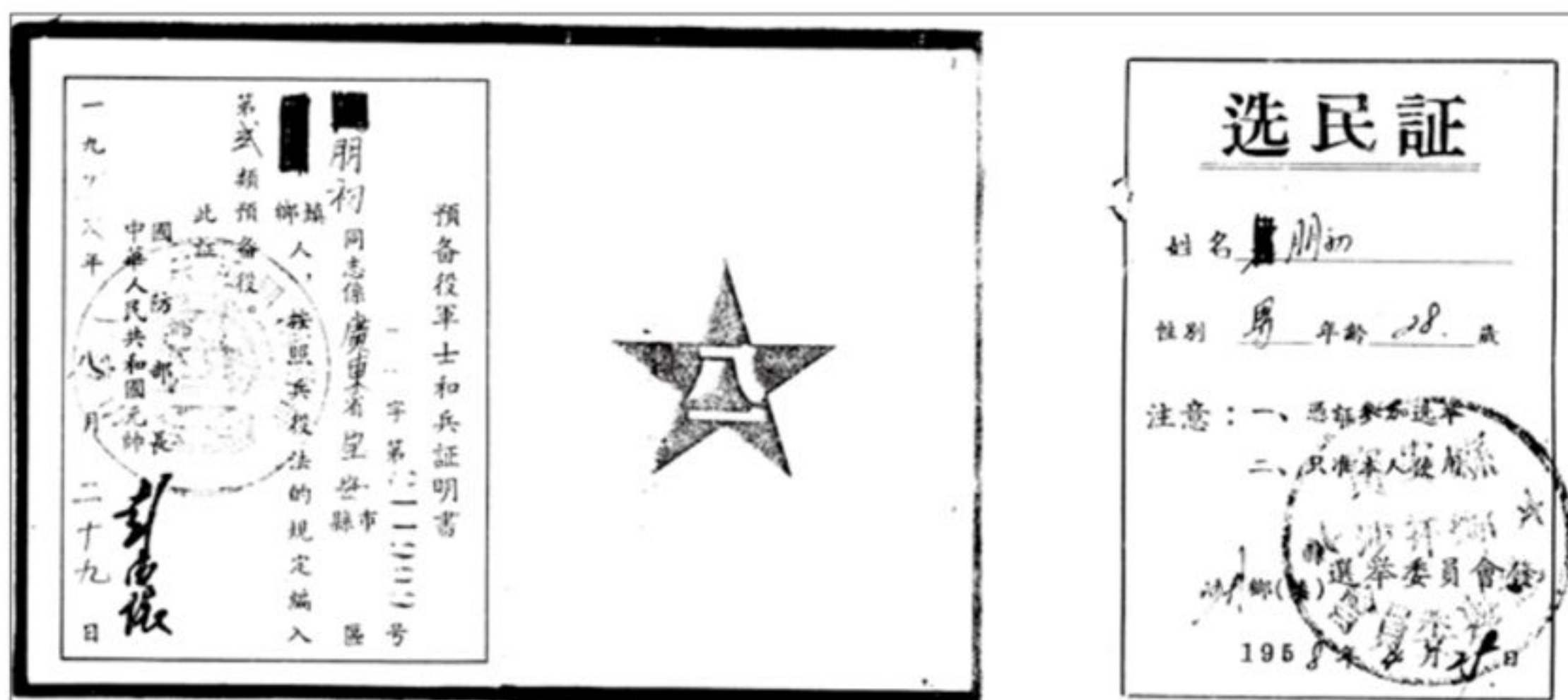
本來，德林是個怕事的人。但這人啊，就怕起心，只要起了心，就甚麼也不怕了，肯定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在我訪問過的老寶安中，要麼是從來沒跑的，要麼是跑過多次的，很少有抓過一次之後就不會再跑的。

德林的第二次偷渡是準備從現在的福田白石洲“買船”跑的。

年紀大的寶安縣人也許還記得，1958年時，某鄉有個叫張朋初的合作社主任，是個復員軍人，1957年偷渡到香港後，被特務機關收買，派回寶安縣來做了內奸的事。

那已經是1958年收割完稻子的時候了。

一到農活閑下來，就常走親戚。德林有個表兄在沙井，德林便到表兄家散心。三杯土酒下了肚，對座一位表哥的朋友，自我介紹是復員軍人，



逃港組織者張朋初的軍人證和選民證

二十七八模樣，開始煽起香港的好處：

“那可是大城市啊，北京還沒它一半大！兩層樓的汽車，電燈是通晚都不熄的呀，有錢，夜晚白天一個樣。”他噴著酒氣說。

“人家吃的是甚麼？天天都是海鮮魚翅，不種田的，也沒田。天天在家看小電影（電視）、吹空調。”他又說。

德林覺得這人好勇敢，見識好廣。表哥附著耳朵說，他叫張朋初，跑了香港又回來。是知道你跑過沒跑成，才專門來同你說這事的。

“怎麼樣？德林，還有大貴，你們還跑不跑？”大貴是表哥的名字。

“跑啊！”表哥說。

“跑！我死了也要跑。”德林激動地說，他想起了等他的玉英，“我未婚妻還在那呢。”其實也沒訂婚。

“我知道的，”張朋初說，“大貴都同我說了。這叫幸福愛情，德林，你就等著到香港去抱美人吧！”

“哈哈——”大家都笑。

酒喝完時，五六個年輕人就商量定了，誰都不許聲張，也不准給親人打電話、寫信，等候張朋初的通知。白石洲有下海的漁民，是張朋初的內線，他先去掛鈎，安排好後帶人過白石洲。然後乘夜黑駕船過去，對面的香港元朗轉眼就到。

“上了岸，那邊有人接嗎？”德林想到的是沒法通知玉英了。

“不要接！”張朋初說德林太老實，“過了以後，會有安排的，就在新界青山住一晚。起身到九龍再找廣洪油漆工會，第二天就安排你上班當工人，穿制服了。”

當工人！德林看見過惠州糖廠那些穿制服的，好威啊！

但是，德林萬萬沒有想到，張朋初回來是帶著“任務”的。國民黨組織命令他先殺死治保主任張丙球後，再帶人逃港。而在十多個要求偷渡的群眾中，有一個就是公安局的內線。

張朋初的一切都在寶安縣公安局的監控之中。就在德林趕到白石洲，準備登船前5分鐘，張朋初和十幾個偷渡群眾全部被埋伏的公安和民兵抓獲。

這一次情況嚴重了，張朋初被關押判刑，後來送到湖北的襄北農場改

造。其他的逃港群眾雖說是無辜，但也必須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了。

德林被拉到水庫“強制勞動”了三個月。也是因為成份好，判了他“無罪釋放”。

六

有人說，一個女人，有時可以決定一個男人的一生。德林就是這樣。

回到老家牛古村後，德林不但沒給“教育”成功，反而更加堅決了，滿腦袋中只有一個字：跑。

下田插秧吧，他的頭也扭在路上，看有沒有陌生人“上路”。到深圳墟挑化肥吧，肥料往籬裡倒，眼睛望的卻是深圳河邊的稻田：稻子又長到半人高了，又遮得住人了，唉……肥料倒出了一地。

鄉裡辦了一個書店，本來德林是不看書的，這回他沒事就往裡頭鑽，專找地圖冊看。他也弄明白了，香港在哪裡，深圳在哪裡，河在甚麼位置。

賀德林看地圖冊的事，很快有人反映到村裡的治保會，新的治安主任本來同德林的表叔就有隙，便開始注意他了。

每次團員開會，新治保主任都敲著桌子說：“有些團員啊，這裡有問題，”點點頭，點點頭，“都兩次了。現在我看還不太安心，這樣下去很危險呀！”

這是在說我呀，德林想。頭次聽還有點緊張，聽多了便不當回事了。要說你說去吧，我未婚妻在那邊，我就是跑！

“要開除就開除吧，這個團員我早就不想當了！”後來德林連團費也不交了。

從那以後，他又跑了三次，一次從大鵬灣“買船”，碰上巡邏艇；一次從現在蛇口海上世界附近的海面跑，一次從沙頭角跑，都沒成。蛇口那次遇上了警犬，差點沒把小腿上的肉咬去。

前後五次不成，就有人勸他了：德林，別去了，掛上號的人了，走不出去的，就在村裡做農算了。玉英雖好，但去了那邊這麼久了，還能不能看得上你啊？這半年也沒來信了。

就有家裡人開始為他物色對象。德林人老實，長得又俊氣，雖說名字

上了“偷渡冊”，但寶安縣的姑娘們是不當回事的，有人還把“不會跑的男人”看成“沒本事”。

俊秀的姑娘還真不少，可德林一口一個“你們別瞎操心”。“我的未婚妻是唐玉英。”把別人姑娘家弄個大紅臉跑了。

又是一年過去了，玉英還是沒音信。村裡人都說，玉英可能在那邊“找”了。

那一天，天快黑，要下工了，德林還在田裡趕著牛犁田。鄰居的孩子在田頭上喊：“還不上岸呀，你家來客了！”

德林剛進門，一個打扮時髦的女人就撲過來，趴在他肩上。德林定了定神，藉著昏黃的燈光，才看清是玉英！

玉英哭著，也不顧周圍有人，竟敢親德林的臉：“我害苦你了，德林，是我害苦你了！”

周圍的人趕忙走開。

玉英過去以後，開始在一家酒樓端盤子。她人能幹、潑辣，又長得漂亮，老闆很快看上了她，提她管樓面。現在，還在酒樓當領班，一月都拿400元了！在牛古村，做兩年才當她一個月啦！

德林這才打量了一下玉英，燙了頭髮，大花格衣服，完全變樣了，像個闊小姐啊。

德林心裡有股十分複雜的滋味。

“你的頭上還有香水香呢。”德林說。

玉英的頭在德林懷裡蠕動著：“哪是香水呀？”白白的手指點著德林的腦袋，“那叫洗髮露。”

“玉英，你不會變吧？”德林記起書上說的“資產階級思想”，心裡想香港那麼多老闆，那麼多有錢人。

“香港就全是壞人啦？”玉英撒著嬌說：“這輩子，要變就變你的老婆！”把德林聽傻了。

玉英摟著德林的脖子，聲音低而堅決：“今晚我不走了，我就要做你的人！”

他太感動了，他太幸福了，想不到玉英是這麼一個重情的女子！

這溫存的第一夜德林怎能夠忘懷呢？

煤油燈發出暗暗的光。小小的泥磚屋裡，有股淡淡的泥土的味道。玉英先是深情脈脈地看著德林，看著，慢慢地伸出了手指，解開了德林的領扣，解開了他胸口上的扣子，然後細膩的手在德林堅實的胸脯上摸著摸著……

他，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啊，她的手指在往下移，移到了德林的腰上，移到了德林的褲帶上。

啊，她真膽大啊，她解開了德林的皮帶。

這時，德林明白了：她是真的要……

一股不知從哪兒來的力量像山洪爆發，德林猛地死死地抱住了玉英，抱住了那個柔軟的、正在顫抖的身體……

接著，他聽見玉英發出的可憐的求饒似的聲音：“……啊，輕，輕……”

但是，此刻的德林已經完全沒有了控制，他渾身大汗，他哪裡還聽得見玉英的哀求，他發瘋似地就是要達到目的！

只聽見玉英“哎喲——”一聲。德林感覺天地洞開，然後是他的一聲死命的喊叫，接著他便像爆發過的山洪一樣，癱倒在床上……

他迷迷糊糊地像是要睡了，這時，他看見玉英的頭在向他靠近。她手裡神聖地捧著一塊白色的手絹，一塊從香港特意帶過來的高級手絹，向他展開……

雪白的手絹上，開著一朵鮮紅的花：那是玉英的。

他聽見玉英在他耳邊悄悄說：“看見了嗎？我是你的了！”

七

第二天，玉英一定要同德林去下地。下地的時候玉英問他：“那次在祠堂村，你都到河邊了，怎麼就不過來呀？”

德林擔心說害怕玉英會罵他，就說：“有月亮。”

玉英說：“有月亮又怎麼樣？你到了河邊，就可以下水了啊。”

“那河裡有船，運沙子的。”德林說，“一喊，邊防軍下水就會把我抓了。”

“木腦殼啊，水是屬港英界的，邊防軍不能下水抓人的。”

啊，是這麼回事啊！

回來探親的玉英滿了七天期，便回香港了。德林還像從前那樣，日日夜地，他倆暗暗定下了計劃。

而今的深圳羅湖區靠火車站的地方，有個五星級酒店，叫做富臨大酒店，旁邊還開有一個中式酒店叫做僑社。僑社酒店可以說是深圳最靠南的酒店了。早年細心的住客會知道，如果誰違反酒店規章，大著膽子推開向南開著的一扇小門，就會發現，幾叢蘆葦的下面，就是界河——深圳河。

深圳特區開辦以前，這兒周圍是一片深圳鎮居民的平房。

每天上午，僑社食堂的採購員就要上老街的墟集買菜。有時菜買得多，採購員的菜籃子盛不下，又懶得挑，就會叫賣菜的農民直接把菜挑進僑社的廚房來。

這是 1962 年的一個上午，是德林第一次偷渡後的第五個年頭，他已經跑過六次了。



深圳華僑旅社後門鐵絲網下面是邊境深圳河，原來河邊是一片蘆葦，對面有港英方的碉堡。

他挑著籬筐，一頭大蒜芹菜，一頭黃瓜，進了僑社的廚房。炊事員早已經混得很熟了，拿起秤就鈎上了籬筐。

“黃瓜四十七斤，三四一十二……”炊事員撥動著算盤。

“大蒜芹菜多少？”

“你秤吧，多少就是多少，老熟人了。我去解個手……”德林起主意了，轉身就往後面去。

“上樓去吧，”炊事員指指樓上說，“那裡乾淨。要不你就出門拉蘆葦裡，那邊。”炊事員指著靠河的門。

真是天賜良機！

德林轉過一間房，往前走兩步，打開一道門，門前是幾叢蘆葦。撥開蘆葦，深圳河就在眼前。對岸香港的菜地，種著一樣的青菜，隔著就幾十米啊！

他突然聽到那炊事員在後頭喊：“德林，德林——”他大概想起公安局“不能讓外人進入此地”的警告，慌慌忙忙在後頭追。

這時的德林，已不是當年的德林，哪還管得後頭的呼喊，他一個箭步衝出了蘆葦叢，像兔子一樣朝河邊上飛奔。

“站住——站住！”蘆葦叢裡突然站出來兩個穿軍裝的人——潛伏哨！

深圳河就在一米遠的地方了，他已經看得見粼粼晃動的河水。他記起玉英的話，縱身往水裡一跳。

就在他停在空中的一剎那，槍響了。德林感到小腿上一熱，他已經掉在河裡了。

他猛然一下子放心了：下水了，勝利了！他拼著最後的氣力，朝南岸游去。

這時，他聽見對面英方的崗樓上，有英國兵用生硬的廣東話在向他喊：“槐，槐（快）。”

但這個時候，兩個邊防軍人也一躍下水，向他包抄過來。很快到了他身邊，一人架著他的一隻胳膊，強把他拖上了北岸。

對面石崗樓上發出一陣“抗議—抗議—”的不滿聲，有華警在樓上大喊：“違反！違反！”但是，那年頭，違反協議又怎麼樣？邊界上多少事情是按了協議辦的？

靜靜的河面上只留著一汪紅色……

德林被一輛飛馳而來的公安車接走，送進了醫院。一個月以後，當他在兩個公安的押送下走出醫院時，他跛了。

八

腳雖然跛了，但事情並沒有完，這回再顧不得是“根正苗紅”了，德林被送去韶關的農場煮飯，勞改兩年。

兩年後，當英俊偉岸的德林拖著消瘦弱小的身子，脅下夾著拐杖再次回到牛古村時，看到一個叫他永生難忘的畫面：

破舊的泥屋已經變成了一幢貼著瓷片的新房，門上貼著紅對聯，房中坐著新娘玉英，她在等著勞改犯新郎回來結婚。

玉英毫不隱諱地在村中說：“有人不守協議，打斷了我老公的一條腿，我要補給他一個老婆。我還要替我老公辦香港紙（香港身份證——作者註）過那邊去，看看誰活得更好！”

1963年，賀德林以香港親屬的名義，被批准去香港定居。這次，他是通過羅湖橋大大方方過境的，但他一再催促推他過橋的妻子快點，說一看見深圳河的水心裡就發虛。

他是留下心理恐懼症了。

據說，兩口子在香港建立了家後，台灣的國民黨機構曾經多次找過唐玉英，希望她能到台灣去。希望她能在電台上，向大陸同胞控訴共產黨。

唐玉英的回答是：“你們別找我——我不信共產黨，也不信你們國民黨，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們讓我過幾天安靜日子吧！”

兩夫妻到香港後，不久就隨新開的酒店去了巴拿馬，德林學會了做廚師。兩人退休後又回了香港。1995年，老兩口商量，還是葉落歸根，回去的好。那時他們村還沒大開發，那些荔枝林都還在，兩人就在荔枝林中建了棟小洋樓。

老兩口身體都很好，一兒一女在香港住。我是在2003年見到他們的。找到他們時，玉英阿婆坐在牌桌正中的位置，她精神得很，麻利地搓動著麻將。村幹部指著在圈外背著手看熱鬧的一位老頭說：“那就是德林

公。”德林身材瘦高，背有點彎了。

村幹部又附在正“麻將”得緊張的玉英阿婆耳朵邊，用客家話說：“阿婆，有記咋（者）找你，放一哈（下）啦。”

玉英阿婆抬起頭來，望下我，吩咐伸著脖子在後面看的老公：“去給記者倒杯茶啊，只會站著啊。”

德林阿公“呵呵”地笑著答應，跛著一條腿一瘸一瘸就去拿茶杯。“不用，不用”，當我拉他的手時，感到七十多歲的老人，還是那樣有力。

我一直等到麻將結束，德林公倒的茶都涼了，才等到玉英阿婆講了以上的故事。村幹部說，德林公不善言辭，講不好，還得請玉英阿婆講。

兩年後，也就是2005年，我去觀瀾開會，順路再去看看兩老，德林公已經不在了。

“是的，去年3月走的。”玉英阿婆淡淡地說。坐的仍然是牌桌正中的位置，圍成一圈的那幾個牌友頭髮在變白。玉英阿婆“嘩嘩”搓動麻將的手，也不像上次麻利了。

“病？也沒甚麼病的，人到時候了嘛。”她依然搓著麻將，並不哀傷，就像告訴你一個人出遠門了似的。也許，到了這個年紀，就是這種感覺吧。

臨死前，德林抓著玉英的手，想要坐起來說最後的話。玉英就扶著他坐起來，也抓著德林的手不放。兩個60年的有情人，眼對著眼，知道相守不離的伴侶，這回真的要分離了。

德林還想說甚麼，但說不出，只是拿手指無力地朝窗外頭點了一下，又在自己心口上點了一下。

玉英懂了：“老頭子，你是說會在那邊等我，是嗎？”

德林微微地點點頭。玉英把德林放平了：“我也快去了的，老頭子，你等著我。”

說著，玉英阿婆便把臉貼在德林滿是皺紋的臉上，也流淚了。

“這回你別再搞錯啊，我的木腦殼——”玉英的老臉上滿是淚。

德林臉頰動了一下，好像在點頭，走了。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節 “六二”大逃港為甚麼會發生

一、歷史怎樣讓毛澤東失誤——從莫斯科會議到“三面紅旗”

毛澤東登上了火車，迎著撲面而來的真理之風，告別了武漢、告別了長沙、告別了那些嘮叨的親人、朋友，不會再回頭了！

他將更加堅定、更加頑強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幹出個樣子來，讓一切支持或者反對他的人看！

1957年11月7日，莫斯科。

這是一個格外寒冷的日子，但所有的蘇聯人都感到十分振奮，因為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全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正在莫斯科召開。

其時，正是社會主義陣營最為強大的時候。在經歷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及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風波之後，社會主義陣營重新恢復了團結；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大國，卻因為蘇伊士運河問題正陷入矛盾中。就在上一個月的14日，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人類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這樣一個“東風勁吹”的全球氣溫下，選擇十月革命40週年之日來召開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是為了體現社會主義陣營的空前強大和團結。

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首腦，包括匈牙利的卡達爾、波蘭的哥穆爾卡、東德的烏布利希、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還有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首腦，全都集中到莫斯科來了。

真是盛況空前！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二大國家，中國代表團和毛澤東本人，受到了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領袖們普遍的尊敬。

當蘇聯共產黨與波蘭共產黨意見不統一時，無奈的赫魯曉夫曾請毛澤東出面去說服哥穆爾卡，毛澤東以其高超的領導藝術，讓所有的代表團都放下分歧，坐到了會議的桌邊來；在各個代表團對蘇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草案》產生分歧時，是毛澤東派遣了鄧小平、陳伯達、胡喬木等人重新起草《莫斯科宣言》草本，並最後成為讓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首腦都認可並簽字的《莫斯科宣言》。

毋庸置疑，中國代表團和毛澤東本人顯現出來的魅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作為東道主首腦的赫魯曉夫。以致當時的中共代表團成員楊尚昆在回憶的日記中記錄道：

“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許多意見是主席提出來，經過協商，他們（指蘇共——作者）接受了。”

大凡公眾場合，只要毛澤東一出場，立刻會獲得超常熱烈的歡迎。楊尚昆的日記中記下了那些動人場景：

今天主席（指毛澤東——作者）出現在紀念會上，大受歡迎。全場起立。講話中不斷的鼓掌，講完了全場又起立……其餘各兄弟黨代表講話，都是鼓掌沒有起立。^{【1】}

夜晚，克里姆林宮裡燈火輝煌，蘇共中央在這裡舉行熱烈慶祝十月革命 40 週年的酒會。

雪亮的燈光下，赫魯曉夫聲調激昂：“我們的目標是：約在 15 年內，鋼的產量達到一億噸、煤七億五千萬噸、石油三億五千萬噸！”

【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31 頁。

這是一個追趕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的宣戰書！

反響極為熱烈，全場起立，掌聲如同雷鳴一般，響了近半分鐘！

毛澤東也在鼓掌人之中。

但是，他一邊在鼓掌，一邊在考慮另一件事。這位血性的湖南農民的兒子，是不甘落人之後的！

就在赫魯曉夫發表講話後的第三天，毛澤東主動要求會見了英國共產黨領導人波立特和高蘭——顯然，他有話要說。

“15年後，英國的鋼產量能增加到多少？”在談過了兩黨的關係之後，毛澤東突然關切地問。

“英國政府計劃是兩千五百萬噸，頂多三千萬噸吧。”高蘭說。

“啊，”毛澤東意味深長地點了一下頭：“我們中國今年有520萬噸，再過5年，可以有1000萬噸……中國在15年後，將超過英國。”^{【1】}

他的手掌習慣地在胸前掃過，如同掃去眼前的一片灰塵。

高蘭驚詫了，落後的農業國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先進的工業國英國，這未免太樂觀了。看著面前這位信心十足的戰友，高蘭高興之餘不由得有幾分擔憂。

高蘭的擔憂已經沒有用了。“中國要向英國挑戰”的消息，已像一陣風傳遍了世界。成為全世界，不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的頭條新聞！

當然，腔調是各不一樣的。波蘭、捷克、朝鮮……的報紙雖然一片叫好，字裡行間卻能看出隱約的擔憂。一家波蘭報紙說：“我們如同相信自己一樣，相信中國兄弟不會沒有力量去達到自己的目標！”太平洋西岸傳出的是一片噓聲。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直截了當地說：“毛澤東的計劃是不冷靜和不負責任的！”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估量毛澤東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個人是毫不懷疑的，那就是毛澤東本人。

堅強的毛澤東主意已定。11月21日，他率中國代表團回到中國。僅隔11天，經過授意的劉少奇就在代表中共中央致詞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表達了中國趕超英國的決心。

【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35頁。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乘風破浪》的社論，用強烈的信心鼓舞中國人民要用“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毛澤東決心掃除黨內那些“阻礙前進”的不同思想，給“猶豫不前，小腳女人走路”作風的人“打預防針”。

1958年1月3日和4日，他在南寧點名批評了提出不可“冒進”的總理周恩來。指著提倡“快”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持文章《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只好回答：“我寫不出來。”毛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1】}

為了獲得“高速度”，竟然在公開場合批評自己的親密戰友，這使所有參加會議的中共高層人士都感到“突然”。他們都隱約感到，一場大的“高速”運動即將到來。

1958年5月1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懷仁堂召開，正式通過了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95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鋼產量翻一番的重大決策，即從1957年的鋼產量535萬噸增加到1958年的1100萬噸。

事情還在不斷加溫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與王鶴壽敲定攸關中國建設前途的“1100萬噸鋼”時，又從河南省傳來一樁更令毛澤東興奮不已的新鮮事——人民公社出現了！

在農村，將集體化的程度再往前推一步，把幾個甚至十幾個農業合作社聯合起來，組成更大的人民公社。除了所有的田地、牲畜、房屋……都交集體所有外，還建立公共食堂、託兒所、敬老院……農民在一起開餐，一起下地，吃一樣的飯，過共產主義的集體化、軍事化生活！

當河南省委負責人向毛澤東彙報人民公社的好處時，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欣喜：“好麼，好麼，人民公社好。”

第二天，“人民公社好”就被作為偉大領袖對新生事物的評判詞，赫

【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71頁。

赫登上了河南的報端。

1958年7月底，全國鋼產量累計才380萬噸，到年底只有153天了。在這樣短的時間裡要再完成700萬噸鋼，達到1100萬噸的目標，是不可能的事！

8月17日，在北戴河，毛澤東把主管計劃和工業的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叫來問情況。當他們彙報到全國鋼鐵生產的進度時，謹慎的毛澤東已經感到1100萬噸有完不成的危險。

他想起了自己對世界說過的話。他完全明白完不成任務會是怎樣的一種後果。

每當碰到困難時，這位一直靠緊緊依靠群眾而走過了無數艱難險阻的領袖，這次想到的依然是人民，是群眾的力量。

1100萬噸，從哪兒來？只有從群眾運動來，只有從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中來！

依靠1956年發展起來的那種分散的、千把人的農村合作社是幹不起大兵團作戰的，是創造不了“高速度”、“超高速度”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迅速地走“高集體化”的道路，把原來的農村合作社做成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

還是搞合作化時候的老辦法——用改變生產關係的方法來促進生產力發展，向“集體化”規模來要“經濟高速度”！

兩天後，即8月19日，毛澤東宣佈說：“現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錯誤。”他對河南等地的“創造”一錘定音：“我的意見是叫人民公社！”

一開始，他還想慢一點，“先搞試點吧”。但是如同1956年一樣，車輪一動，下面就層層加碼，車速越搞越快，擋都擋不住。到1958年9月，風起雲湧，才個把月時間，全國就冒出了兩萬多個人民公社，90%的中國農民都成了公社社員！

驚人的相似，又出現了1956年那樣的情景，又是人民群眾敲鑼打鼓慶祝，又是群眾代表慷慨激昂上台表決心，說偉大領袖路引得好，“千年的理想實現在今朝”，口號震天。

當心有狐疑的毛澤東匆匆從北戴河趕回中南海時，各省紅彤彤的“報喜”早已擺滿了他的案桌：僅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中國就提前“進入共產主義”了！

人們的熱情使他失去了慣有的謹慎。他太高興了，說：“我們叫高山低頭，它敢不低頭嗎？我們叫河水讓路，它敢不讓路嗎？”

一語之下，幾千萬人上山煉鋼鐵，近億人上山找鐵礦。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店停業，大煉鋼鐵。中華大地上高爐林立、火光衝天、通宵達旦。領袖與人民“共同上陣”，盲目狂熱，卻又幹勁衝天。

這裡，工業鋼元帥“升帳”；那裡，農業頻傳“捷報”。

“稻穀畝產三萬斤！”

“徐水縣小麥畝產 12 萬斤！”

“一顆大白菜重 500 斤！”

少年時代就在田中割禾、插田的毛澤東，會不知道稻穀畝產三萬斤，就得把稻穀在一畝大的田裡墊幾寸厚？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好，好”，他卻笑著，甚至在公開場合說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有些問題一直讓人不解，這些明顯的浮誇，怎麼能逃過這位一貫“精明卓絕，洞察秋毫”，曾經戰無不勝的統帥的眼睛呢？

其實，毛澤東心裡比誰都清楚：中國沒有先進的科技，沒有現代的設備和資源準備，只有一個優勢——六億人口，失去了群眾，拿甚麼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所以一定要保護群眾的熱情，哪怕有些話說過了頭，有些事做過了頭，也得把勁“鼓起來”而不是“打下去”！

當然，他又不愧是有過長期指揮作戰經驗的統帥，在熱烈鼓動和保護人民群眾熱情的同時，他的頭腦卻始終保持著某種程度的冷靜。

在河南，他問跟著他攝影的胡秀雲：“小胡，你說說，這事情有甚麼問題沒有啊？”他想，自己身邊的人，說的應該是真話了。

“你們到農村走過的啊！人民公社到底怎麼樣？”他顯得有些著急。

“我也說不清。”胡秀雲說，“反正我看婦女倒是挺高興的，吃大食堂了，不用做飯，解放了。”

“你是不是也給我吹牛啊？”毛澤東看著胡秀雲，有點不信，“大鍋炒的菜，就是不如小鍋炒的香嘛。群眾會喜歡？”

事情太大了，年輕的胡秀雲也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毛澤東到底是要

她說人民公社、大食堂好，還是要她說不好。

“我……也有點納悶，”胡秀雲說，“怎麼晚上畝產還是 400 斤，一到早晨，就成了 1000 斤了？”

毛澤東望了一下旁邊主管農業、此時也被鋪天蓋地的喜報數字弄暈了頭的譚震林和廖魯言說：“你們查查，有這麼高嗎？這到底是放衛星，還是放大炮啊？”^{【1】}

實際上，毛澤東對自己也沒有十分把握。他決定親自出去找他的老同學、老同鄉、老同事了解情況，盼望能聽到一些反面的話。往下一段時間，他到過許多地方，包括上海、安徽、湖南等地。

應該說，如果沿著這條路再走下去，他總可以有機會探尋到問題的本質。

不少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常常會提起發生在這段時間中的毛澤東與老友李達的會見。

誰知一到武漢，兩人一見，竟然發生了頂撞。李達進房劈頭就問：“潤芝，‘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他指的是湖北鄂城縣委門口貼著的一張標語。

毛澤東一愣，怎麼問這個？雖然是一張標語，點到的可是中國問題的要害，即他最關心的“群眾熱情”。

“那要看怎麼看。這個口號有兩重性。如果講的是發揮人的主觀能动性，”毛澤東有些不悅，“就是有理的。”

李達是個認真的人：“這是哲學上的錯誤啊！這樣把群眾熱情捧到天上去，脫離了實際，國家不是要亂套了嗎？”他急於要改變這位“親密朋友”的看法，以免“下面太熱”，禍及黎民。

“如果現在談兩重性，就等於肯定這個口號。”李達變得更加激動。

毛澤東也不相讓了：“肯定又怎麼樣？否定又怎麼樣？”

李達說：“現在人們頭腦發熱，主席（他不稱潤芝了）你腦子發熱一點，下面就會不得了，就會燒到 40 度、41 度。中國就會遭難了！”

【1】《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頁。

“遭難？誰遭難？”毛澤東愣了一下，他想發火，但忍住了。

一看勢頭不對，一旁的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趕忙過來打圓場：“二位不要爭了，這個標語由省委負責去處理好了。”

毛澤東緩緩吐出一口煙，輕輕把煙灰彈進煙缸裡，他已經不言語了，看了一眼臉還漲紅著的李達，他選擇緩和。

但倔李達還要進攻：“不行，要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問題！”意思是讓毛澤東的思想轉過彎來。

甚麼？毛澤東吃辣椒的性格，一下子被激活了！難道要我毛澤東認錯？要我向你作檢討？太過分了！

有學者曾經指出，研究毛澤東不能不研究毛澤東這個“人”。就是說研究他的特殊的性格，一種湖南人的、從曾國藩“紮硬寨、打死戰”就開始了的“寧折不彎，越壓越倔”的性格。

李達也許沒好好想想，他與毛澤東辯論時，是甚麼環境。

北面，幾千公里之外，那個一年前還相約“共同超越美英”的社會主義盟友——赫魯曉夫，在各種場合不點名的譏笑毛澤東的“承諾”是“一張廢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

東南面，那個被壓縮在台灣，曾是他手下敗將的蔣介石，隔著海放言“共產黨自亂其局”，譏笑毛澤東“根本不懂經濟”。

歷史，這時正把所有的譏笑、所有的批評、所有的壓力，包括善良人們的規勸，都集中到這個“不信邪”的人身上。

李達鐵骨錚錚的“進諫”適得其反！

迎面而來的真理之風，反與這位鋼鐵般性格的領袖擦身而過！

毛澤東登上了火車，迎著撲面而來的真理之風，告別了武漢、告別了長沙、告別了那些嘮叨的親人、朋友，不會再回頭了！

他將更加堅定、更加頑強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幹出個樣子來，讓一切支持或者反對他的人看！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三輛高速的“列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他的驅動下，義無反顧地向前狂奔……

多災多難的中國啊，多災多難的小民，包括多災多難的深圳河，它們正在走近那個永銘史冊的“苦難三年”。

二、狂熱的深圳河

在一片暴風雨般的掌聲中，縣委第一書記王志走上台，發表了豪情萬丈的講話。宣佈“從今天起，全寶安縣的人民，已經踏上共產主義的通天路了”！

上面的雷聲推動著下面的雷聲。乘著北方來的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號角在深圳河邊吹響了。

1958年5月，寶安縣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寶安縣委向全縣人民發出了“堅決貫徹總路線”的號召！



寶安縣人民加入人民公社

照例，在開展運動之前，要來一個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記載稱：書記動手，全黨動員。所有的宣傳工具，包括全縣的報紙、廣播站、劇團、電影隊……全部出動，要掀起一個千軍萬馬的大聲勢！^{【1】}

照縣委的安排，巴掌大的寶安縣要成立一個一萬人的“總路線宣傳隊”，就是說，按計算，每五戶就要出一個人，上田頭上街頭去做宣傳員！

氣勢如虹，一呼百應。僅僅開會九天後，上報資料就稱，30萬人口的寶安縣就成立了文藝宣傳隊290個！從六七歲的娃娃到五六十歲的老頭老太太，30個寶安人中間就要有一個人繫上紅綢扭秧歌、打腰鼓，搞宣傳。

一時深圳墟的街頭上，農村的田壟上，村邊的大樹下……到處張燈結綵，處處紅旗招展，萬家歡騰。

在強烈的宣傳風下，普通幹部、群眾的腦袋也開始發熱，荒唐的事情一個接一個地出來了。

最先別出心裁的是深圳鎮的人，在面對蓮塘村的路邊上掛上一條一米多寬、十多米長的大標語：“總路線萬歲”。蓮塘村的人不相讓了，立刻組織百人隊伍，在梧桐山頭上也鑿出了半畝大一個字的“總路線萬歲”五字，說讓深圳鎮的人出門“抬頭就嚇一跳”！

沙井鄉另有新招，命令所有的打漁船都拉上“總路線就是好”、“大躍進萬歲”的紅幅，開到香港水域去打魚，讓英帝國主義看了“膽戰心驚”；還有人說，香港的革命人民看了，年內就會起來，成立一個“香港人民公社”，香港可以提前歸還中國！

“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東方的霞光萬丈高。”

熱情還要更高！幹勁還要更大！要開展一個人與人、社與社、縣與縣之間的大比武、大競賽！

1958年9月5日，惠陽地委在海豐縣召開“比武大會”（當時，寶安縣屬惠陽地區）。所謂“比武”者，就是比較誰提出的指標更高，誰的“牛皮”吹得更大！

東莞縣的口號是押韻的：“膽量似悟空，幹勁賽武松，決心超愚公，苦戰三個月，不壓海豐（縣）不算英雄！”^{【2】}

【1】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2】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惠東縣口號富有想像力：“賽海豐、超惠陽、嚇倒惠州！不嚇跑寶安不算英雄！”^{【1】}

而寶安縣的氣概更大，口號更為響亮，接連用了三個“以”：“苦戰百天，以武松打虎的幹勁，以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聲勢，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壓倒惠陽，橫掃東莞、海豐、博羅……稱雄惠陽地區！”^{【2】}

一些荒唐事也出來了，當時各代表團都住在地區招待所。寶安縣代表團中有人提出，把挑戰書貼到各個縣委書記睡覺的門上，“讓兄弟縣委起床後勾著頭出門”，以示決心。

隨之，“衝破天”的實際行動開始。

《萬豐村志》記載，寶安縣曾放出過“水稻畝產超萬斤”的“衛星”。

平時畝產就幾百斤，最好的年成也難收到 1000 斤，怎麼一下就畝產萬斤呢？他們是這樣做的：把 10 畝接近收割的水稻拔出來，集中到一畝田中“密植”，檢查組一到就收割，萬斤畝產就出來了。稻子太重，就用繩子捆綁防倒伏。哪知稻子太密，捆綁太緊，大面積發熱腐爛，結果變成了一片爛草泥。

檔案記載說，寶安縣發出了競賽口號的第三天，就傳來喜報：“長嶺社苦戰了一天兩夜，積肥 65 萬擔！”^{【3】}

一個千人合作社，一天兩夜積肥六七十萬擔，已屬超人，但還有更超人的：“長嶺社 60 歲的老人吳松生，學習總路線後，七天積肥 579571 擔。”^{【4】}

這數字是鐵板釘釘記在寶安縣的歷史檔案中的。

照這樣算，這個 60 歲老頭一天就得積八萬擔肥，這就是叫他一個小時挑走 3000 多擔肥！天方夜譚！牛皮吹到這地步，真是活見鬼！

奇就奇在這裡：在那個時代，被“熱風”颳暈了的人還不在少數。我採訪的當年那些“風中者”，不少都說，奇怪，當時我們竟也沒懷疑，我們自己也說過頭話、說牛皮話，這是事實！

“太熱了，熱得人都摸不清方向了！”

有沒有冷靜的、正直的人，對這種“放大炮”的行為表示過懷疑呢？

【1】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2】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3】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4】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有的。上川社的幹部黃發權就是一個。

歷史，是鐵面無私的，寶安縣的歷史檔案，是從反面記載這位原本堅持著“真理”立場的好幹部的。

“上川社的生產隊長黃發權指責總路線說，針無兩頭利，要多快就不能好省。”“這樣浮誇，早晚得翻船。”“他還誣衊積肥放衛星說，那是放大炮。假的就是假的。”……

結果可想而知，黃發權很快就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圍剿”、批判。

“反擊右傾保守”的大字報貼滿了黃發權的家門上、牆上、甚至吃飯的飯桌上。一張批判黃發權大字報是這樣寫的：“黃發權，你真保守，次次開會帶頭溜。提出早播不接受，如果下次再咁（這）樣，我們社員要趕你走。”

好漢不吃眼前虧。在那種氣氛下，誰還敢堅持下去呢？

“在群眾的熱情幫助和教育下，黃發權認識提高了，終於服輸。”

一顆正義的火種，就這樣熄滅了！

“保守勢力”既然不能抬頭了，反面的聲音聽不到了，狂熱的人當然會更狂熱！

1958年9月，惠陽地委向寶安縣發出要求，要在3個月內完成700噸鋼鐵的任務。

寶安縣的群眾會種田、會打魚、會扯風箱打鐮刀，但煉鐵鋼爐是甚麼樣，誰都沒見過。怎麼變得出700噸鋼鐵？

於是開動腦筋“找竅門”，手板心裡也得要煮出飯來！

寶安縣委發號召：各家各戶，把不用的鋤頭、犁耙、鐮刀……凡是沾了“鐵”字的，都找出來，收到公社去煉鐵。完不成任務的社隊，開批判會作檢查。

上川社群眾開大會。幹部親自帶頭上台表態，生產隊長黃萬喜“現身說法”：“現在是人民公社了，吃大食堂了。還要甚麼鍋，煮甚麼飯啊——拿過來！”

“好！”台下的老婆應聲而上，左手家裡的兩口菜鍋、右手一口飯鍋。

“從明天起，我家就是共產主義的了，不再做飯了，大家看著！”

“咣——咣——咣——”黃萬喜家的三隻鍋都砸在石頭上。

於是全場呼口號：“向黃萬喜學習！”“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完成 700 噸鋼鐵決不收兵！”

發動群眾就是快，光明公社通過這些辦法，在兩天內就收集了“鋼鐵” 6000 多斤！

“南天門公社分片包乾，當天夜晚，群眾通曉送廢鐵，天亮以前，收到廢鐵 24000 斤。”

11 月 6 日和 7 日兩天，全縣就收集廢鐵 86000 斤。

但是，光有廢鐵還是不夠的，還要把廢鐵煉成鋼。

全民煉鋼運動在 1958 年 9 月後開始席捲寶安縣。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在深圳、鐵崗等地方建成高爐 400 多座。

平心而論，憑小小一個寶安縣有限的人力、財力，三個月建了 400 多座小高爐，這得益於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組織力量和絕對服從的行政權威。

“咱土包子要有志氣，開動腦筋，煉出洋鋼鐵！”

要煉 700 噸鋼，光是廢鐵當然不夠。縣委一聲令下，千軍萬馬上山找鐵礦！



寶安縣煉鋼

據統計，大躍進期間，寶安縣發動了 30 萬人（次）“上山找寶”。就是說，30 萬人的寶安縣，前後幾乎能上山的都上山了！

於是，機關幹部停班、學校停課、商店關門……

寶安人，認慣了稻穀、認慣了魚蝦，就是不會認礦。於是從廣州請來了“鐵師傅”，在全縣的大會上傳經送寶：“帶黑色紋的是磁鐵礦、帶紅色紋的是赤鐵礦……”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小學的教師、深圳灣的打漁人……都來識別礦苗。

成千上萬的人在寶安縣的山頭上找礦。

青年突擊隊員文正德保留的一本日記中，記錄了當年上山找礦的革命熱情：“寶安縣幽靜的山溝裡，到處是爆破聲、錘擊聲，吃在山上，睡在山上，通宵達旦、狂風冷雨，數日不眠是常事。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願意奉獻出鮮血乃至生命……”

另一位青年突擊隊員勞風雷這樣向我描述當年的情景：“我們四個男女，白天找礦，晚上就睡在一張大床上，也不是床，就是架著的板子。哪分甚麼男女？中間放一個隨身的水壺隔一下，睡到早晨起來，水壺裡的水都沒蕩出來。那時候啊，我們腦袋裡只有一個字：鐵。甚麼邪念都沒有。”

也許今天的人讀到這，都會覺得它荒唐，但我要告訴我的讀者，在我採訪的人中，沒有一個人不對這段生活充滿懷念。

這是怎樣的一個瘋狂而又純情的年代啊！

寶安縣的戰績是：“僅僅兩天的苦戰，就打了礦石 477 噸，礦砂 47 噸，錳 1200 噸。”^{【1】}

中國大煉鋼鐵的部分鐵料，就是這樣通過收集廢鐵和群眾上山找礦石獲得的。

煉鐵還要燃料呀，寶安縣本身就缺燒的，靠甚麼來煉鐵？

於是發動幹部、學生、社員上山砍樹。

檔案記載：“全縣各鋼鐵基地發動 8872 人上山砍柴燒木炭。”^{【2】}一些村子漂亮的“後龍山”上的樹木被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難再。

到 1958 年底，寶安縣共“生產了鋼 1225 噸，生產了鐵 700 噸”。都

【1】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2】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 2005 年版。

堆放在火車站的倉庫邊，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這些由全縣人民發瘋般熱情煉出的鋼和鐵，後來就這樣聽憑雨打風吹的堆著。究竟作甚麼用，沒人知道。後來作了怎樣的處理，也沒人知道。

付出的代價和熱情如此之高昂，對其結果卻如此的不屑於問！

寶安縣大躍進的另一個重點是水利。

從寶安縣興修水利這件事上，史家們也許可以看到除了毛澤東的指導思想外，產生人民公社在當時某種客觀上的原因。

寶安縣的地勢北高南低，水都流到海裡去了，從來缺水，所以，必須修水利。

要興修大的水利工程，首先碰到的是人力問題。

1958年9月之前，寶安縣農村的組織單位還是農業合作社。要靠一個社幾百、上千勞力來興修大的水庫是無法想像的。即使水庫建成了，一個兩



修水利

千人的社也用不了一個水庫的水。而且，水庫的水渠怎麼走？經過鄰近社的田土怎麼協調？水利問題聯繫極廣，這不是一個“小合作社”能解決的。

於是，在經濟生產的需要下，寶安縣的農村組織形式發生蛻變：

寶安縣檔案載：“從水利運動開始，首先從勞動力的使用上突破了原來的社界、鄉界。後來在資金、勞力的使用方面也打破了社界和鄉界，進行大協作。”^{【1】}

就是說，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在那種大躍進、高速度的生產要求下，是必然要出現的。

事實上，當時的寶安縣幹部、群眾早就有人提出，如果要大修水利，縣裡就應該出面，把幾個或多個合作社的農民聯合起來。但是，眾多的人一集中，又出現新的情況：幾千人要吃飯，就得有大的食堂；幾千人要修工具，就得建修理廠；幾千人中有負傷、病痛，就得有醫院……這些不僅涉及勞動力數量的問題，還涉及農村統一領導和調撥的組織形式問題。

於是有人提出索性搞“統一的社”，把幾個社聯合起來，“三社合一”、“五社合一”。一個大社就可以“分工”，甚麼都有，有農業、有工業（修理工廠）、有其他行業（醫院、商店……），以方便生產調配。

這樣就出現了工、農、商、學都有的綜合型農村組織。

有學者在論述東方中國的封建王朝時指出：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需要高度集中的組織力量，這是中國大一統的皇朝為甚麼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這是否印證了由毛澤東在中國倡導的“人民公社”的必要性？

老人們對於當時的情況還記憶猶新：“有了這些，修水庫就方便了。工具修理廠、百貨供銷店、郵電局、小銀行、縫紉店甚麼都有，都設在水利工地上，扣子掉了都有專門的人綴，很方便……”

我調查人民公社產生的基層原因時發現，在寶安縣，辦大社的要求的確首先是由群眾提出來的。當時還有婦女抱著孩子到鄉政府吵，要求解決“怎麼帶孩子”的問題。

1958年夏，寶安縣的428個農業社自發組成了261個大社。有些地方更組成了一個鄉的“超級”大社。

寶安縣的農村人民公社，就是這樣上下結合出現的！

【1】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而今の深圳市最高的的建築叫地王大廈。50年前，那是一個廣場。1958年10月1日，慶祝寶安縣全縣實現公社化的大會，就在這裡舉行。

其時，有20萬人分別在寶安縣的深圳、南頭、新橋、觀瀾、松崗、沙河等地舉行集會，鞭炮鑼鼓震天，獅子麒麟翻滾，慶祝全縣實現了“公社化”！

當時，全縣成立的人民公社有：南天門、超英、超美、光明、紅色、紅旗六個，每個名字都帶著濃厚的時代特點。

在一片暴風雨般的掌聲中，縣委第一書記王志走上台，發表了豪情萬丈的講話。宣佈“從今天起，全寶安縣的人民，已經踏上共產主義的通天路了”！

隨著震天的口號，王志也抑制不住滿心的喜悅，他要求為大會賦詩一首，話一出，下面又是一陣雷鳴般的鑼鼓和掌聲，大家都歡迎王書記賦詩。

王志臨場而作的原詩，至今還留在寶安縣的史冊上：

“人民公社力量大，幹起活來笑哈哈。

生有養來死有葬，有吃有穿不用怕。”^{【1】}

賦詩後振臂高呼：人民公社好！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上台賦詩的，還有幾位身份特殊的農民，他們是來自羊台山下不窩村的農民。

寶安縣有些偏僻地區的山民、漁民，自古與世隔絕，不與外界交道。據說有一群由內陸逃亡來寶安縣一帶的人發展而成的“蛋民”，長年隱居海上、山中，其語言、長相都格外不同。現在，人民公社的風暴，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在這個大集體中來了。

幾乎與世隔絕的羊台山下不窩村的這幾戶農民聽說辦公社了，特地派了代表下山要求入社。他們用特殊的語腔，合唱了一首自編的山歌。其歌詞也記載在史冊上：

“公社歌聲篇連篇，歌聲衝上九重天。

仙女聽歌心思動，情願下凡做社員……”

當然，歌詞肯定是經過了“秀才”們潤色的。這些長年在山中生活的“仙女”，是不是真的就願意“下凡”，看法不一。但當時這些山民的確是這樣做了，除了少數冷靜的人覺得是被“逼”外，寶安縣絕大多數的群眾

【1】參見《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公共食堂

是自願加入公社的，沒有捆綁、也沒有強逼……這是事實。

心理學家認為，在一種特定氛圍下，人的從眾心理可以讓人拋開冷靜的思維。更何況，即使有反對的情緒，有 1957 年反“退社風”的前車之鑒，誰又敢表現出來呢？

但如果把這種行動判斷為人民群眾“自覺”的“熱情”，並且支持它，甚至鼓動它，那就錯了；如果把這看成中國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的程度，那就更是錯上加錯！

由“中國烏托邦”所導致的惡果，很快就在地平線上出現了……

三、從“反瞞產”到“大饑荒”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須迅速予以解決。

事情在起著變化。

從 1959 年初起，各地有關缺糧、缺油、缺菜，甚至缺肥皂、缺火柴的報告就一份份地呈到中南海的案頭上來。

毛澤東感到很奇怪，去年明明是個豐收年，怎麼才幾個月就缺起糧來了？怎麼連日用品都會缺呢？就連肥皂火柴也生產不出來？

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撐開肚皮吃，農村剩餘的一點糧食已經吃光了。“浮誇風”瞎吹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糧食吃不完”，造成了收購部門錯誤地“高估產”，把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糧都徵走了。一些農村一開春就揭不開鍋！

大搞煉鋼，一切都給“鋼鐵元帥”讓路，把日用品的生產部門都給“壓縮”了。現在，連生產足夠的肥皂、火柴都有困難！

糧食缺，發行糧票；布匹缺，發行布票；肥皂火柴缺，發行肥皂、火柴票……啥都缺，啥都要票。

這是為甚麼啊？毛澤東找不到原因，他說：“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

他徹夜難眠，銜著煙，對著夜空沉思。

據說，這個時候，一份來自廣東的報告，使他恍然大悟。

《毛澤東傳》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正在這時，一個材料送到了他手裡，是廣東省委轉發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1】}

這個材料使毛澤東有兩個方面的發現：

第一，他發現了人民群眾心裡對他有意見，人民公社搞早了，群眾在搞瞞產了呢。

所以，他看後說：“謝謝五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

【1】參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版。

情推動了我，所以，我就想一想……”【1】

不久，人民公社真的“退回去”了。雖然還掛著“人民公社”的牌子，但實際上搞的已不是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基本退回到1956年的農業合作社狀況，“以生產隊為核算基礎”了。

薄一波在回憶文章中認為，如果沒有這次“退卻”，“我們的事業有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

第二，他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全國的形勢，遠不是原先想像的那麼嚴重——有人瞞產。

於是，他在作出了一個正確判斷之後，又作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農民缸裡還有糧！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的報告。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須迅速予以解決。【2】

一個全國性的“反瞞產”運動，很快“颳”了起來：強令農村幹部、群眾交出糧食。

當年“反瞞產風”究竟有怎樣的惡果，各地不一，我們只能用“十分嚴重”一詞來作形容。

以下引用的是《陶鑄與反瞞產運動》中的內容，可見廣東當時的情況：

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一個又一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穀場。他在曬穀場，只見稻草不見穀。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一撥拉，“嘩”，大堆大堆的穀，金黃金

【1】參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2】參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黃，可喜人吶……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只一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裡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志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沒有那麼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的。”^{【1】}

廣東省委對於能否反出糧食來，已經產生了懷疑。因此，在佈置“反瞞產”的同時，再三交代下鄉人員，要先作調查研究，甚至避開縣社幹部，直接到農民群眾當中，摸摸真實情況。派到四會縣的同志彙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一戶農家看見熱氣騰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裡煮的是甚麼。女主人看見來人，搶先一步，擋住了爐灶，又粗聲粗氣地嚷道：“看甚麼？鍋裡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轉念一想，忽地轉過身去，順手掀開鍋蓋：“要看，給你看個夠。”反瞞產工作隊員看了鍋裡煮的，確實是野菜。

這年三四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彙報和掌握的材料，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

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減免不切實際的高徵購。報告還說，再反下去，會使矛盾更加尖銳，後果不堪設想。

有了這個教訓，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作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

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賠禮、道歉！”

在政治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陶鑄要求發言。毛澤東立刻制止說，陶鑄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檢討，你檢討得已經夠多了呀！不要再檢討了。^{【2】}

【1】 林里：《陶鑄與反瞞產運動》，載《中外書摘》2001年第9期。

【2】 林里：《陶鑄與反瞞產運動》，載《中外書摘》2001年第9期。

第二節 逃港：饑荒中的出路

一、毛澤東嘗到了“苦果”

這個教訓是深刻的，應該把我們犯的錯誤，立下碑來，刻在縣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員會的門口。讓我們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記這個血的教訓！

1960 年的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鐵，一個國家的國力已經消耗殆盡。

這也許是毛澤東一生最困難的時期之一。

“三面紅旗”僅搞了兩年時間，農業大幅度減產，全國的糧食已減產了 600 億斤，農民吃的油減產了一半，養的豬減產了三分之一。農民每年的平均消費只有 65 元！

儘管如此，農村幹部還在逼著農民多交糧食。

安徽省的鳳陽縣 1959 年實際總產只有 10960 萬斤，剛好夠全縣百姓一年的口糧，卻要上交 5974 萬斤糧食。交去了糧食，農民沒了口糧，只好吃草根、樹皮，甚至連觀音土也挖來吃了。

人們因食品不足，營養不良，普遍發生浮腫病，導致大量非正常死

亡。公開報道的數字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減少了1100萬，問題突出的信陽地區這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了100%。^{【1】}

無論願望如何美好，事實都證明，搞“三面紅旗”、搞國民經濟大躍進實在是一場大躍退、大災難。

毛澤東終於明白了：一場大的災難正在降臨中國！

他接過周恩來差人送來的有關全國大面積災情的報告，憂心忡忡地拿起筆來，在上面作了批示。最後，把原來的文章題目圈掉，重新給文件起了個醒目的題目，以便發給他的戰友們去：《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2】}

放下筆，他長歎了一聲。在庭院裡轉了一圈，又回到了房中。

1961年冬，北京的雪特別大，蓋滿了昆明湖邊的柳梢，蓋滿了菊香書屋的瓦背……他在窗前望雪沉思。

在中南海的圍牆外，在莽莽中國的原野上，成千上萬的生靈在這奇寒中被凍死、餓死……

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會議，通知了包括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

會議上，毛澤東談到了自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該是我。”

“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佔多少的問題。”

“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不是有一齣戲就叫《霸王別姬》嗎？”如果我們的黨員堅持不聽群眾的意見，那麼，“難免有一天要霸王別姬就是”。

劉少奇的報告更加直率。他說：“這三年的農業生產有相當大的減產。原因在哪裡？原因不外兩條，一條是天災；還有就是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我問農民，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頁。

【2】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43頁。

最近媒體公開的材料還表明，劉少奇曾在大會上激動地表示：這個教訓是深刻的，應該把我們犯的錯誤，立下碑來，刻在縣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員會的門口。讓我們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記這個血的教訓！

這時，會場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會場中有人喊：“劉主席萬歲！”“少奇同志萬歲！”

當然，無論是“劉少奇萬歲”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頗有些刺激的話，對於毛澤東來說，不會是愉快的”^{【1】}。

1961年1月30日，對於中國人民、對於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這天下午的會議上，這個倔強的中國共產黨領袖，終於直面自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諾言。在鐵的事實面前，他終於說：“要趕上和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但是，他的這個覺悟已經來得太晚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其時，早已經在整個中國蔓延開了……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我蓋上1961年寶安縣的檔案時，感到額頭上有點汗。寶安縣小小一些縣幹部，就敢叫“打開國門、對港開放”，這可是要坐牢的呀！

2000年的3月，我在查閱寶安縣的舊檔案時，發現了一份寶安縣委呈遞給廣東省委的報告，要求省委允許寶安縣組織群眾將柴草出口去香港換肥料。時間是1961年6月9日。

為甚麼要搞柴草出口？

這份毫不起眼的報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報告是這樣寫的：

【1】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6頁。

省委：

我縣大鵬、葵涌、沙頭角等邊沿公社……面向海，背靠山，出產柴草很多。為積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晚造糧食生產豐收。（我縣）迫切要求自行組織柴草出口換取肥料。既不影響國家外貿計劃收入（據說現在香港居民柴草是靠從澳洲等地進口），也不影響內銷。好處很多。約 250~300 市斤松柴換一擔化肥。一年換回一萬擔化肥，邊沿公社農業生產用肥料完全解決。

報告還特別強調了：“採用物物等價交換，不發生貨幣關係，不收入現金”以示清白。

事情有些蹊蹺。

據我所知，當時中國的對外聯繫（當然包括對英國管理下的香港的聯繫），是被嚴格控制的。所有的對外貿易都是由國務院統一管理。

既然這樣，地方要自行出口，同帝國主義“發生關係”，那就是犯“天條”的事，輕則免職，重則判刑。這種“犯天條”的事，寶安縣委如何敢碰？照說，廣東省委也沒有這麼大權力“批”呀。

意外的是，當我翻到檔案的下一部分時，發現就在接到報告不到兩個月，即 1961 年 8 月 2 日，廣東省委竟同意了寶安縣委的要求：允許寶安縣的農民自行出口柴草到香港去賣。

陶鑄和他的同事，為甚麼膽子會這麼大？

我注意到這個時間：1961 年 6 月。

那麼，1961 年的 6 月，這是個甚麼時間呢？

5 個月前，就是 1961 年 1 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就是說，開始從大躍進的熱度中清醒過來了。

1961 年 2 月，毛澤東在同浙江、湖南兩個省的領導人講話時說，公社太大了，這個隊不知那個隊在幹甚麼，貧富不均，這怎麼會有積極性？食堂問題，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適合當地情況……

他特地藉 5 月 14 日給張平化的信告訴全黨：一切問題都要走群眾路

線，和群眾商量，然後共同決定。

他身邊的戰友們思想也都“解放”了，也敢衝著人民公社說話了。

4月1日，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調查，回來後對毛澤東直白地說：“食堂沒有優越性，要散。”

5月7日，周恩來在河北邯鄲調查後，向在上海的毛澤東發電報說：“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都願回家做飯。群眾迫切要求恢復高級社的評工記分辦法。”

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的順義、懷柔調查後寫的報告說：“政策要調整”，“平均主義害死人”。

原來，這是一個毛澤東正在“向後退”的時期。也是一個他身邊的戰友敢於大膽發言、邊遠的封疆大吏們也敢於自作主張的時期。

為了度過饑荒，各地背著中央搞土政策。對於各地出格的事，中央也睜隻眼閉隻眼：只要能度過荒年，你們就看著辦吧。

於是，安徽、湖南等地在搞田土承包；廣東則打起了香港的主意；而深圳河邊呢，就開始“賣柴草”了。

在研究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時，專家們常常碰到這樣一個規律：每當面臨困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便會有所“放鬆”，而各基層政府呢，便抓住機會，極力向上級要求更多的“權力”。這就是所謂的“上面鬆一鬆，下面攻一攻”。上面鬆了，下面又再攻！

但是這次“攻”非同一般，這次，“伏筆”埋在後頭……

廣東省委一批“同意”，縫隙一開，寶安縣的要求又接上來了！

既然給“柴草”網開一面了，為甚麼不給“人”也網開一面呢？既然“柴草”可以過河，“人”為甚麼不可以過河啊？

果然，就在廣東省委同意寶安縣委出口柴草後不到一個月，即1961年的8月27日，寶安縣委給廣東省委“要求放寬邊境”的報告便上來了。

這個報告的名字比較長，叫做《關於適當放寬邊防管理政策，切實解決邊防地區人民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寶安縣委提出了讓人自由去香港的要求。以下是報告的要求和理由摘要：

寶安有28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歷來有下海捕魚的生產習慣。56年

封鎖邊境後，強加群眾接受，不准群眾下海捕魚生產，剝奪了他們生產的權利……帶來了嚴重損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隊……合作化時代一年下海捕魚搞副業收入14萬多，去年僅收入1.4萬元……勞動力逃跑到香港的有250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隊與群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抗情緒。

全縣有2萬多華僑，6萬人在港澳。過去正常情況下一天有二百多人來往香港。56年封鎖邊境後，每天只准許出入兩個人。丈夫有病，妻子不能去伺候。結婚了的夫妻長期得不到同居。父母在港逝世，兒女不能出去料理喪事。有些婦女公開大罵我們：我丈夫在外另娶，你們政府要負全部責任。

由於我們剝奪了群眾的生產的權利，生產下降、大批勞動力逃亡，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邊防部隊連青菜都買不到吃。

注意，這份報告把偷渡外逃的根本原因，歸結到是因為“我們剝奪了群眾的生產權利”，可謂直率而大膽！

附：
關於適當放寬邊防管理政策，切實解決邊防地區人民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的報告

(一)

貫徹六十條以來，邊防地區與內地一樣，生產、政治形勢大有好轉，穩定了生產關係，人心舒暢，生產積極，逃亡減少，甚至有相當一部分逃亡基本群眾經過教育後，自覺歸來。如西沙公社翻身大隊原隊公社化前25戶174人，58年後全部逃亡到香港去，到現在已回來的有21戶103人，另有外調漁民13戶81人到翻身大隊居住。早造生產丰收，晚造生產比往年全面，看來大有希望。但如何根據邊防地區特殊條件，調動各方面積極因素，提高和恢復人民群眾生產和生活水平，這還是貫徹六十條以來未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邊防地區群眾為發展生產，提高生活水平還受到了諸多限制，甚至有生產權利，意見很多，反映強烈，比較突出是：

一、寶安有28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全縣22個公社，有14個公社的社員歷來有下海捕魚生產習慣，56年封鎖邊境後，強加群眾接受，不准群眾下海捕魚生產，剝奪了他們生產的權利，給邊防地區生產帶來了嚴重損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隊歷來有下海的生產習慣，全隊有五百多個勞動力，合作化時代一年下海捕魚搞副業收入14萬多，去年僅收入1.4萬元。因為減少收入，勞動力逃跑到香港的有250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隊與群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抗情緒。如大鵬公社管理隊生產隊長蔡興，過去一面下海生產，一面組織領導群眾保衛邊防，工作抓得很出色，一年捕獲偷渡犯和革命叛徒各分子幾十人，59年春被評為縣的反革命鬥爭積極分子，被群眾

1961年8月27日，寶安縣委要求放寬邊防與香港進行經濟往來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 (批復)

發文 粵 字 第 111 號 機密程度

主送：寶安縣委

抄送：省委政法委員會、港澳工委、外事小組、農辦、省公安厅、民警總隊黨委、財辦外匯局商業科、水產科、農業科分黨組、佛山地委、廣東軍區黨委

事由：如文

收文機關批辦：

寶安縣委：

8月29日報告悉，省委原則上同意適當放寬邊防地區農業商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保障邊防地區勞動人民下海過境生產的正當權利，以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黨和群眾的關係。但進出口放寬後，仍應加強對幹部和群眾的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我們同意你們關於組織縣委邊防委員會，以加強對此項工作領導的意見。

下海過境生產，原則上對幹部要嚴，對社員可寬一些，交售產品仍應以國營為前提，必須按照合同完成上調和交售任務。物資交換和小額貿易，對生產者可適當放寬，但要嚴禁小商小販的非法活動。以

1961年9月25日，廣東省委同意邊境“放寬”的批示

最後，報告提出要求：

除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凡是公社社員經當地批准，都可以自由出境生產。但漁民不要上岸，民兵不要帶槍。

開放邊境口子，讓農民自由出境。允許農民與香港做小額的貿易。

最後，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放寬邊防管理制度後，黨群關係一定能得到迅速改變。”

有理有據，振振有詞。

我蓋上 1961 年寶安縣的檔案時，感到額頭上有點汗。寶安縣小小一些縣幹部，就敢叫“打開國門、對港開放”，這可是要坐牢的呀！

這報告是誰弄的？而更叫人難理解的是，廣東省委在 9 月 25 日竟然“同意”了寶安縣的要求。

以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為甚麼要批示“同意”？它的背後，有著怎樣的內情？

第三節 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

一、“陶鑄派我去寶安”

所以派你去，這情況一定得改變過來，一定要讓老百姓有碗飯吃——當然，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蠻艱巨。

“陳記者，你一定要去找找李書記。”

當我還是推著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單車，走在寶安農村的山間小道上時，不管在哪裡，一聽說我在採訪寶安的歷史，從坐在大班台邊的股份公司的總經理，到“嘩嘩嘩”推著麻將的農婦，幾乎所有的人都會用這句話來提醒我。

他們話中的李書記，就是 20 世紀 60 年代出任寶安縣縣委書記的李富林。“小陳，你別寫錯了。”李富林在東山賓館接受採訪時說，“富裕的富、雙木林的林。”他笑著說：“文化大革命時，大字報寫成李福臨，說我父親想發財，哈、哈、哈……”

1923 年 10 月，我出生在山西省歷城縣。抗戰時期，我們那兒的年輕人都鬧著打東洋，我就上了太行山，跟著八路軍整天在山溝裡轉。到抗戰

勝利時，我已是河南新鄉地區的區委書記了。

1949年南下，部隊從武漢一直往南打。我們簡直是跑步前進，不幾個月就過了韶關，連裡的文書告訴我，要這樣下去，再有一個月，就到海邊了。啥是海？我沒看過呀，我就叫警衛員拿出地圖來給我找。找了半天，就在海邊上找到了寶安縣，沒想到，那地方就是後來給我這輩子留下記憶最深的地方。

廣東解放後，領導就對我說：戰打完了，李富林，你不在部隊了，你下地方去吧，現在是搞建設，你要好好幹。這樣，我就留在了廣東。

合作社的時候，我已經是東莞的縣委書記了。到1958年，又當上了佛山地委的農村部部長。

農村部部長不是管農村嗎？經常要下去，我身體又好，整天赤著腳在田埂上跑，所以對下面的各個縣的情況都很了解。領導問起來，子丑寅卯答得都順當，也許正是這一些，陶鑄看上我了——當時他是省委書記。

1958年底，也許是1959年了吧，有一天陶書記給我打電話說：“富林啊，你明天到廣州來一下。”

我就去了。

“富林，派你到海邊去——怎麼樣？”陶書記一見面就對我說。“哎——坐下呀。”他向我壓壓手。我站著，依然是當年當兵的作風。

我沒吱聲，因為我還沒弄明白，“去海邊”是啥意思？“就是去寶安縣——去做七品官。”陶書記開玩笑說。

“首長指哪裡，我就打到哪裡。”派個縣委書記也親自過問，可見當



李富林在廣州東山賓館向作者回憶當年，十分激動。

年寶安縣的重要。

“嗯，好。那地方又重要，又複雜，難搞，知道嗎？”

陶書記好像有很多話要對我交代。

“富林啊，那兒可是咱們去香港的最後一道關口啦，重要啊。人家就在河邊上，你說句話人家都會評三道四。那裡的老百姓不是長著一個腦子，是長著兩個腦子，一個社會主義的，一個資本主義的，不好領導。外逃，這你是知道的，全國全世界都出名啦：每年少則幾千、多則幾萬人偷渡。總理都問過我幾次了，說陶鑄啊，這事怎麼就老治不了啊？”

他停頓了一下，把頭仰起來，搖搖說：“真丟人，丟社會主義的人，也丟我陶鑄的人。”

他繼續說：“經濟上呢，更是糟透了。一個多好的地方啊，田裡一年收三季、南頭的荔枝、沙井的蠔……吃甚麼沒有啊？這幾年讓運動搞得沒飯吃，田也荒了，人也跑了，留下來的，吃野菜、番薯根根過日子。”

說著說著，陶鑄好像動了感情：“河對面，人家資本主義的孩子吃著牛奶麵包，我們的孩子瘦得像顆秧，還在唱社會主義好，還沒跑，還在跟我們共產黨走。多好的老百姓啊，我們虧待了他們！”

“前些日子，我到那裡視察，老百姓給我說了個事，說沙頭角對面有人給這邊扔糖果，我們的孩子撿了想吃，娘走過來搥了孩子一耳光，把糖果又扔回到界碑那邊去。哪個孩子不是娘的肉啊，富林，就這麼好的百姓，我們還忍心讓他們跟著我們受罪嗎！”

我發現陶書記眼裡有白花花的東西在動——他是個文人氣質很重的人。“所以派你去，這情況一定得改變過來，一定要讓老百姓有碗飯吃——當然，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蠻艱巨。”

他在房間裡踱著步。

我說：“陶書記，你說的我都聽明白了，我不會給你丟臉的！”

臨走時，他特別叮囑我：“你們那是個特殊的地方，我總在想，是不是該給你們開點小灶——就是搞點特殊政策。你先做吧，有問題直接給我打電話。”

從陶書記屋裡出來，我感到信心百倍。

但是，當我踏上征程，車越往南開時，我的心情就變得越沉重了。我就知道陶書記為甚麼會說這事“蠻艱巨”了。

一路上，一頃頃的良田在荒蕪，走十幾里也沒看見有人。我特地在路邊一個村莊停下來討水喝，目的是看看裡面的究竟。一個打著赤腳的五六歲的孩子，搖搖晃晃提著一個水罐出來，他大概因為飢餓而站不太穩。我問他：“爸爸呢？”開始搖搖頭，後來把手向南指——意思是去香港了。又問：“媽媽呢？”又把手向南指，還是去香港了。

“家裡還有誰？”父母都跑了，這麼大的孩子，誰帶啊？我這才發現，一個白髮的老阿婆在門後邊偷偷望著我們。這可能就是家裡剩的唯一的大人了。

我們都穿著中山裝，一看就是共產黨的幹部。從老人那警惕的、帶點敵意的眼光中，我感到不寒而慄。

我突然想起當年在太行山打遊擊時，老鄉們是怎麼給我們領路打鬼子的；是怎樣寧可自己捱餓，也把糧食藏起來留給我們的。變化真大呀！

可怕呀，人民已經不再信任我們！

資本主義怎麼就那麼大的吸引力呀？我們真的就不行嗎？

汽車還沒進深圳鎮，就聽見樹上的高音喇叭在唱著“快板詞”：“木薯渣好，木薯渣好，木薯渣全身都是寶……”

我下車就問縣廣播站長：“喇叭裡說甚麼呀？甚麼東西有那麼好呀？”

廣播站長苦笑著過來說：“木薯渣，就是木薯的渣渣。嘿嘿，沒有吃的了，連木薯都沒有了，所以縣委決定，瓜菜代，發動老百姓用木薯渣代替主糧。”他大概還想聽到我的表揚，接著說：“這十大好處，是我剛剛總結出來的，準備在全縣推廣，詞還不順口……”突然看見我陰沉的臉。

“還十大好處呢，好個屁！”我發了火，“就發動老百姓吃這個東西呀，不害臊，丟社會主義的臉！”

第二天，我就下到全縣各地去摸情況。真是不摸不知道，一摸嚇一跳。黨內的浮誇風、冒進風，真把邊境的農民害苦了。

小陳啊，我給你說兩件事吧，你看看我們幹了多少傻事，是怎麼把好好端端的群眾給逼得逃港的。

二、東莞和寶安的民兵排長為甚麼逃港

1960年的5月，有兩個民兵排長在同一天逃港，一個被抓住了，後來還被判了刑，是東莞塘廈的，叫梁五貴；另一個跑脫了，是深圳鎮附近的，叫莊大龍。兩人都是參加過全省民兵模範大會的代表，很出名的。

“白背心”的故事

球賽打了一半，情況就不對了。所有圍著看球的觀眾的眼睛都盯住了梁五貴的背脊看。

全場猛地一靜。

全場的人都在看甚麼，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貴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顯出四個字來：“反攻大陸”！

20世紀60年代初，梁五貴是東莞塘廈鎮的一個民兵排長。他有個愛好：打籃球。上中學的時候，常引得場外的姑娘們眼睛跟著他。他也不找老婆，他說：“我已經找到愛人啦，我的愛人就是籃球。”

有一回，軍區的首長來東莞視察，臨走留影。別人站在首長身後都兩手貼褲縫，筆直筆挺，他卻一定要抱個籃球。縣武裝部的老齊很生氣，叫他扔了，他硬是不肯，誰知軍區首長也是個愛籃球的：“他要抱著照就抱著照吧，毛主席說了，鍛煉身體，保衛祖國嘛！”

誰知後來，這梁五貴就因為打籃球出了事，差點兒丟了性命。

那時節，蔣介石正叫喊“反攻大陸”，海峽兩岸，打不完的攻心戰。還搞“海飄”，就是把宣傳品放到海水中，利用潮水的漲落將“一定要解放台灣”、“打倒國民黨蔣介石”的標語飄到金門島去，或者將“反攻大陸”、“大陸同胞團結起來推翻共黨暴政”的標語飄到廈門來。

說來有趣，那時國內連吃飯都困難，飄到金門去的“宣傳品”竟還帶著一紮紮的貴州茅台、北京果脯、甚至張小泉剪刀……說是“拯救苦難中的台灣人民”。而台灣方面飄過來的也都是好東西：一袋袋的白麵、一鐵盒一鐵盒的豬油、餅乾、牛奶糖……有點像相互送禮了。後來“海飄”不夠“過癮”

了，又發明了“空飄”。西風起的時候，大陸一方的漁民民兵將標語繫在風箏上，放到對面的金門島上去；東風起來，台灣一方將標語繫在氣球上，放到廈門來。如同金門一樣，香港的國民黨組織也往寶安、東莞放氣球。

那時，政府有嚴格規定，餓死不為五斗米折腰。凡是國民黨反動派飄過來的東西，撿到了一律要交公。眼睛看到了的，不但要被查問“那些東西”的來源，有些公社的紅頭文件還寫著，要給看到宣傳品的群眾“洗眼”。

這一天，梁五貴正在山頭上鋤地，就看見藍天中飄忽忽地飛過來一個白白的東西。“他媽的，又來了，國民黨氣球！”梁五貴正罵著，果然就聽得“啪——”地一響，掉下來許多餅乾啊、香煙啊，還有男女的衣服褲子，有的落在地裡，有的落在荊棘叢中。

民兵排長首先盯住看周圍有沒有斗膽拾了反動物品的人，沒有。他便罵咧著，一邊從地上、荊棘中撿空飄過來的物品，準備上交公社武裝部去。

梁五貴把所有的東西都交到武裝部去了，只有一樣沒捨得上交，那是兩件白色的運動背心，太漂亮了，他捨不得。

公社書記大大表揚了梁五貴的思想覺悟高，還通知他再上一次縣裡的先進民兵會，吃三天“甌蒸飯”。

事情就壞在這三天的民兵會上。

民兵會散會的前一晚，照例要進行一場籃球比賽，梁五貴高興極了，又有了表現機會，他特意穿上了那件白色背心上場。

球賽打了一半，情況就不對了。所有圍著看球的觀眾的眼睛都盯住了梁五貴的背脊看。

全場猛地一靜。

全場的人都在看甚麼，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貴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顯出四個字來：“反攻大陸”！

人們都嚇壞了！事情來得太突然，所有的人都只敢看，不敢喊出第一聲。

在公開場合顯示反動標語，那是要殺頭的！

覺悟得最早的還是老齊，他像一頭獅子竄到梁五貴的身邊，用身體擋住了“反標”，用東北話罵了聲：“兔崽子！”然後高聲宣佈：“比賽停止，都回去！”

最後的結果當然可想而知——梁五貴被五花大綁起來。他被脫光了上

衣，反吊在屋樑上，審問是怎樣成為“美蔣特務”的。有人在旁邊用木棍抽他，每一棍下去，人就在空中擺動一遭，屋樑就發出一遭“吱吱——”的聲音。他就痛叫一聲：“是白背心呀，是白背心呀——”那意思是，他不知道，拾到的時候還是一件空白背心的。

他被解下來，暈死過去了，一盆涼水下去又活過來。

從此，梁五貴就落了個“白背心”的諱名。

後來，梁五貴被送到看守所。好在他成份好，加上的確是無意，他們公社書記也是個愛籃球的。梁五貴關了二十天，放了，其實沒判刑，但民兵排長當不成了。每日下地還有“內控”監視著他。

誰知這小子還不安分，1962年大逃港時，拉著“內控”一起逃往香港。後來香港報紙說一個東莞的民兵排長拉了一個民兵班逃香港，那是國民黨吹牛的，不對。

紅樹林田邊燒肉的故事

結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來民兵排長莊大龍。原來他也夾在群眾中吃了肉，躲了。

深圳的濱海大道邊，有一個地方叫紅樹林，聽說而今男男女女假日常去那地方。紅樹林靠著深圳灣，海灣的堤邊長滿了紅樹，落滿了白色的水鳥，對面就是香港的高樓，風景好看得很。

幾十年前，那裡是一片荒涼的海灘，海堤內是一大片稻田，稻田的盡頭有一個小小的村莊，叫做上沙村。如今還在的。上沙村的人常在堤下幹活。香港隔得近，從稻田裡伸直腰就可以看見那邊的高樓大廈。到落潮的時候，兩地似乎就更近了。有人形容：要逃港啊，趕早起來上堤，到了香港，還能趕上喝早茶。

只是海堤上有巡邏的邊防軍人，你上不了堤的。

上沙村的人卻不同，可以上堤。因為他們有下海證，可以到海灣中打魚，賣給香港的漁船，只是不准上香港的岸，上了就是“偷渡”。香港的漁船也帶著這邊缺乏的物資，如肥皂、衛生紙等，偷偷在海上賣給大陸漁民。就是不敢帶到大陸的岸上來，上了就是“走私”。

那年頭，人民公社不許私人養豬，食堂又沒油水，幾個月甚至成年沒肉吃，年輕人肚子裡的油都刮盡了，“肚慌慌”哪忍得住？於是有個叫蝦仔的，拉了幾個膽大的青年，到香港船上買了十斤豬肉，想著可以飽食一餐。

蝦仔不敢進村，更不敢進家，怕被說走私。幾個人一商量，乾脆就在稻田邊上燒著吃算了。於是，在田邊上拾了樹葉、抱了稻草，偷偷摸摸躲在堤下面，拿樹枝掛了燒豬肉。

誰知颯的是南風，肉在架上燒得“吱吱”冒著油，香味直往深圳這邊吹。

“這是甚麼香啊？”在田裡割稻子的青年人都聞到了。

“呀，是油香。誰在燒肉？”有人鼻子靈。

“是蝦仔在燒肉啊！”有人歡呼起來，鐮刀、打穀機也不要了，歡呼雀躍著都圍過去了。

“好啊，你們獨食啦！”

“我們也吃一點——人民公社大食堂，哈！”

有搗蛋的年輕人便拿樹枝當筷子插過去。

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飢餓是甚麼滋味了。天天喝著地瓜湯的，誰抵得住誘惑？先是年輕仔搶肉吃，年輕媳婦、年輕姑娘在田裡偷偷往遠處看一眼，不好意思，又低下頭鋤地。到後來，那香氣越飄越濃，如何抵擋得住？接著就有中年人、老年人，最後是“穆桂英戰鬥隊”的媳婦，再最後年輕閨女們都丟了鐮刀、打穀機跑過去。

“啊——好香啊，”

“我們也來吃一口。”

這樣一來，田裡沒人割禾了。正好福田大隊治保主任李華保帶了民兵路過，一看，大罵：“人都到哪裡去啦？他媽的，又是蝦仔做的好事！”

治保主任帶了幾個持槍的民兵趕到：“好啊，你們吃走私肉！”把柴火踩滅，把肉提了走。又警告說：“蝦仔，你下回再搞資本主義，讓你上公社！”就是關起來的意思。

這下子可惹怒了群眾：“我們吃口肉也犯法啦？”

“還讓不讓老百姓活啊！”

蝦仔也不怕：“老子貧下中農，怕你？把肉給我放下！”

雙方僵持起來，幾十個群眾同幾個民兵對峙，雙方你推我推，竟然打了起來。於是，治安主任便吹哨子，召喚武裝民兵趕過去抓人。

結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來民兵排長莊大龍。原來他也夾在群眾中吃了肉，躲了。後來追查的時候就說，莊大龍立場不穩，怎麼民兵排長還吃走私肉呢，要革他的職。他一氣之下，索性逃港了。

“這是我到寶安縣遇到的頭一樁事。”縣委書記李富林回憶說，“唉，那年頭，人家想吃口肉，也是肚子太餓了，有多大的罪啊？”

三、“不行，我們得去找省委”

謝金祥又站起來了，邊點著煙，邊向我走來。

“大夥放心，”謝金祥給我接上火，“李書記肯定會去的”，他把點好的煙伸到我嘴邊，顯然在“將”我的“軍”啦。

這些事情雖然是給處理了。但我的心裡，依然像懸著塊大石頭，黨群矛盾這麼尖銳，我擔心啊！

當夜，我又趕回縣裡，召集縣委委員在我的辦公室開會。我開頭說了幾句，意思是黨群矛盾很大，要想辦法把農村政策放寬些，特別是多給群眾自留地。不然，群眾沒吃的，都在點我們的背脊骨罵，我們不知道，還當群眾多擁護呢。

開始我還當心寶安縣委保守，誰知一看我這一把手也提要“放寬”，縣委們那情緒就像火苗蔓延開來。

“李書記，你跟我們想的一樣，就是政策搞得太死了呀！”

“書記說對了，要農民不跑，就應該讓農民多搞點自留地。有地，就能絆住農民的腿。”

“咱也不用管他中央的7%了，多給農民點自留地。”當時按規定農民只有7%的自留地。

“李書記，你是搞過土改的，你還記得土改那年頭不？”說話的是附城公社的書記謝金祥，早聽說他是最敢說話的。

“那時就是因為土地歸了農民，生產上得多快啊。到了秋收，家家都釀米酒，工作隊過路都過不了，都攔住往家裡拖。現在呢，為吃肉的事差點要同群眾幹起來了，這像話嗎？”

“農民的自留地多了，會不會出資本主義呢？”我故意問。

這一問，摸不準我的心思，大家又縮回去，沒人發言了。

“大家說呀！”我催。

唉，你看，當年的黨風就是這樣，都跟著一把手的態度轉！

“你要聽實話還是假話？”又是謝金祥挺出來。

“當然是實話。”

“不定罪的？”

“講，我這屋裡不定罪。”我說。

“好的。”謝金祥從桌邊站起來，“咱們天天這主義那主義，下面都快餓死人了，光喊社會主義好能填飽肚子嗎？”

下面便有人說：“老謝說的是實話，農民就是這樣想的。”

謝金祥說：“要我說實話，我主張把土地都分回給老百姓去。就像搞土改那樣。要是老百姓分了田地，還混不到飯吃，我敢這樣，”他把手掌

李富林與他的“鬧復辟團隊”

（此照片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為“寶安縣常委反黨小集團罪證”）

前左起：劉正義、李馨亭、李富林、葉明華。後左二起：鄧任其、楊克、王發、吉鳳亭



放在脖子上，“砍我腦袋！”

這不是公開嚷分田嗎？他真的很大膽！這位為民請命的公社書記，幾年後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鬥瘋了，最重要罪行之一就是 60 年代的這次“大鬧單幹”。

“說得好！”下面的人都應和。

“老謝講得對，我投他一票！”站起來補充的是沙井公社的書記劉斌。

“我們是打漁的，話說得粗，李書記你別在意。”劉斌說，“李書記，就一條，你允許我沙井的漁民自由下海，產品允許去那邊賣，我們就擁護你！你要是還照老的搞，老百姓就不會擁護你，我也不會擁護你！”

他激動起來：“香港又不是馬來西亞，為甚麼我們自己國家的地方不能去！”他是從馬來西亞回來的共產黨員。

“劉斌，你敢給縣委上交嗎？”有人故意鼓動。

“敢啊，怎麼不敢？李書記，只要你鬆口，讓我搞獨立王國，劉斌敢拍著胸脯：一年就叫沙井富起來，第二年後，每年給你縣裡交二十萬！”

二十萬，那時是個天文數字啊！

“哈哈，李書記，劉斌要給縣裡蓋招待所啦！”有人說。

會場氣氛又輕鬆、活躍起來。其他發言的縣領導，有要求放寬出入的，有要求進口化肥的……都涉及一些敏感的政策性問題。

有的說，咱可以先在蓮塘搞個試點，試試放寬老百姓出入，上面要批評咱就收；有的說可以在船上同香港人做生意，賺到的錢交給縣財政，一年百把萬沒問題……議論紛紛。

我暗暗在想，小小一個寶安縣，為甚麼幹部的膽子這麼大啊！

“算了算了，”劉斌搖搖手說，“我看鬧來鬧去都沒有用，毛主席也聽不到。要想搞得長久，還得李書記上省裡去反映，拿政策來。”

大家都看著我。

“總要給點特殊政策吧，咱這是邊防呀。”大家慫恿我。

“李書記是陶書記的紅人，李書記要出馬找陶書記呀，保險有準。哈哈。”他們給我戴高帽子了。

原來是要我去“搞政策”？我沒吱聲，光抽煙。

其實，我沒吱聲是在想著怎麼做。

這時，我記得，謝金祥又站起來了，邊點著煙，邊向我走來。

“大夥放心，”謝金祥給我接上火，“李書記肯定會去的”，他把點好的煙伸到我嘴邊，顯然在“將”我的“軍”。

我白了他一眼，銜了。

“哈，李書記，這煙你接了，就是答應了啊！”謝金祥忽悠我說。

我抽了一口煙：“謝金祥，你別給我耍花花，我知道你在給我抹光油。該做的我會做。”

我濃濃地吐出一口煙：“我同意大夥意見，明天就去找省委。”

“哈哈……”達到了目的的縣委們都歡呼著笑了。

四、從陶書記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富林啊，這個問題蠻大呢，只能試著來呀。要麼這樣吧，我們一邊開會研究，你們一邊先搞，只做不說嘛，我們也裝著不知道，好嗎？要碰上問題我再出面替你撐腰。

當夜我就想給陶鑄打電話了，太晚，拿起話筒來又放下了。

我的心情很複雜。

寶安縣的幹部反應這麼強烈，是我此前沒有想到的。而下面群眾同黨和政府已經發生對立。這些情況上面不知道，北京更不知道，可我在邊境上看得清清楚楚。

我是親身從北往南一直打過來的，那時候戰無不勝，原因是甚麼？是人民擁護我們，支持我們啊。老百姓給我們推車、給我們喂傷員、把自己最後的一粒糧食拿出來支援前線。我們勝利了，為甚麼群眾倒反過來跟我們對立了呢？為甚麼不跟共產黨走，要往資本主義跑呢？

我想來想去，弄明白了一個道理，當年人民要跟著共產黨走，是因為相信共產黨能給他們帶來好日子。可是新中國成立了，沒過幾年好日子，穿衣要布票、買油要油票，連飯都沒得吃了，他們怎能不跑呢？



陶鑄像（轉摘自鄭筆楓、舒玲《陶鑄傳》）

說來說去是個經濟問題嘛。

不行，得把這情況對陶書記說！

天一亮，我就叫司機開了車往廣州去，我要去說真話，向陶書記說我的心裡話！

“甚麼事呀？”陶書記正在小島賓館開會，在電話裡跟我說話。

“嚴重的事，陶書記！”

“甚麼事這麼嚴重啊，天塌下來了啊？”陶書記學著毛主席的語氣。

“差不多，共產黨這樣下去要完蛋！”話一說出口我又有點緊張，對省委書記說得這麼直，這話是要被打成右傾的呀。

“嗯？你了解到甚麼了？”電話那頭沒有批評，語氣反倒變成商量的了：“真有那麼嚴重嗎？富林，說出來我聽聽。”

“有啊，書記。”我的膽子大了，“有肉也不讓老百姓吃，都要造反了！”我就把情況簡單向他說了。

“中央不是來了60條嗎？”陶書記說，“政策要退，要退夠。以後不吃食堂了，不搞公社核算了，還可以有7%的自留地，農民自種自收。政策放寬多了，你大膽發動大家搞啊。”

“7%遠遠不夠呀，書記。”我說，“寶安縣得有特殊政策。這裡是邊境，旁邊那個資本主義吸引力大得很，要想留住人，沒有特殊政策，怎麼

吸引人？你來 60 條，來 80 條都不行！”我發牢騷說。

“你想怎麼樣？”

“放人自由進出！”

電話那頭停了一下，沒聲音。看來，對我提出的這個要求，陶書記在思索。

“你是想……開口子，對不對？”

怎麼一說他就明白？難道省委也交流過這個事情？我便說：“是啊，應該適當允許老百姓自由出入，讓他們上香港去弄些食品、日用品等回來。他們都有親戚在香港的，擺著個食品店在旁邊，幹嗎還要讓群眾餓肚子呀？”

他似乎在思考甚麼，半晌，他說：“你同縣委的人商量一下吧，先拿個方案來，我們好考慮。”

電話中的陶書記似乎又考慮了一下，接著說：“不，你明天來我這裡一趟吧，我們當面交換一下想法。”

第二天是個陽光燦爛的好日子，我到省委撥通陶書記的電話，說又要開一天的會，“你先回去，改時間再談行不行？”

我一想不行，這一拖又不知到甚麼時候，得立馬找到他，最好直接上他家去。那樣好說話。

我知道陶書記家在哪。上樓時我有點緊張，不說一聲就來了，怕挨罵。

我一按門鈴，開門的是曾志同志——陶書記的愛人：“喲，是富林啊！快進來。”帶點湘南口音，態度挺好。

進到客廳就聽見書房裡的陶鑄的聲音：“好啊，李富林，你後門鑽到我家裡來了呀。”

曾志對我使眼色，悄悄說：“別怕他，他就這樣，喜歡說笑話。要說甚麼，你儘管說。來，喝茶。”她給我沖了茶便回到後廳去。

陶書記就出來了。

我壯著膽子說：“陶書記，我可不是來走後門的，這個要求不提，是對黨不負責任呀。就像我在電話中給您彙報的，老百姓就差沒造反了。”

“嗯，怎麼你也用這個字眼？”陶書記在思索，“陳毅元帥在我這裡也這樣說。真有那麼嚴重嗎？”

我說：“寶安是廣東省的門面，說大點，也是中國的門面，得做出個漂亮的樣子。”

“對啊。”陶書記點著頭。

“目前老百姓要吃沒吃，要用沒用，偷渡成風。原因就是一個，經濟上卡得太死，要放寬。”

“嗯。”

“我們研究了兩點，一個是對農村經濟的，一個是對邊境管理的。對於農村經濟，要把生產的主動權放到農民自己的手裡去。為甚麼公社集體養豬就是養不好，老百姓叫集體的豬是‘兩頭尖’？因為豬不是他自己的嘛！為甚麼田裡幹起活來積極性不高？因為土地不是他自己的嘛！只要多把一些權力交給群眾，積極性馬上可以起來，糧食就能增產，老百姓就能有飯吃！”

我偷偷注意陶書記的表情，該不會說我右傾吧。還好，在聽。

“你是說中央 60 條的 7% 還不夠，是嗎？”陶書記問。

“不夠啊，陶書記，起碼要允許我們翻一番，讓農民留 14% 的自留地。這樣農民就可以解決吃飯的問題，起碼不會餓死人了。要想農民生活再好些，就得把自留地再擴大些。”

陶鑄問：“搞 14%，違規的啣！”

我說：“我們是邊境嘛，中央要問起來，你就打傘說廣東搞的還是 7% 嘛。要查出 14% 來，你就說粵港兩地的差距太大，要穩定邊防嘛。”

陶書記向我微微一笑，可能心在想：還遮瞞三部曲呀，李富林呀，你外表老實，心還蠻“鬼”的嘛。

“嗯，還有甚麼鬼點子呀？”陶書記問。

“寶安不是人都往香港跑了，弄得田多人少嗎？我有個辦法，集體種不了的地，號召農民把它種起來，自種自收。以前荒地不准群眾種，寧可荒著，誰種誰是資本主義，還開會鬥人家，那是做蠢事嘛。以後誰種的地多，要表揚！還有，集體養不過來的豬、雞、經濟作物，就讓群眾去弄，交一部分給隊裡，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用。老百姓的生活問題就好解決了。”

陶書記仔細地聽著。

“我敢保證。如果你允許我這樣幹，寶安縣的生產馬上就上去，上交

國家的糧食，不在廣東省數第一也要數第二。”

這個決心讓陶書記樂了：“富林，你這是誇海口吧。一個人都快跑光了的縣，你還想搞出個全省排頭呀？”

我說：“陶書記，我敢誇口當然敢負責任呀。”我又拿出“物資利誘”說：“曾大姐和斯亮她們不是愛吃紅薯嗎？以後寶安增產了，我每年給你挑最好的送兩擔來，紅心的，甜啊。行不行？只要你答應。”

陶書記樂得“哈哈”大笑了：“別送了，別送了，富林，能讓省委的人上你寶安吃兩頓飽紅薯，我就知足了，大家都餓呢。嗯，可以。還有甚麼？第二個想法。”

陶書記答應了！

我的膽子更大了：“第二個想法就是放寬邊境。要放寬群眾來往深港，放他們過去做生意。”

“這——”陶書記對這事很警覺，不表態。

我說：“我知道，這是大事。”

難怪陶書記這麼緊張。所謂“邊防無小事”，針尖大的事都能引起國際反響。前不久，一個美國水兵在香港度假，不知怎麼開著小艇就進到沙頭角附近的海面上來了。誰知潮水一退，擱了淺，被我們抓了。我到省裡請示。書記說，老李你傻啊，抓了個燙手的山芋了。放又放不得，丟面子；懲罰呢，又怕把問題鬧大，很難辦啊！據說當時陶書記還打電話到中央，要聽總理的意見。現在說到放寬邊境的事，要是那邊“抗議放人”，引起了國際糾紛怎麼辦？陶書記當然謹慎。

我說：“所以要給您彙報，看行不行啊，我哪敢作主呀。”

“是啊，富林啊。”陶書記說，“我們這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呀！”

我說：“不是我們寶安要在太歲頭上動土，是的的確確群眾有困難，不讓他們出去是我們不對。我算了個數，我說出來，書記看是不是有道理，您可以批評，批判也成。”

陶鑄說：“甚麼數啊？”他攤開了筆記本，“你說。”

我的話匣子打開了。

“寶安縣有多少人？實際數字 28 萬，可在香港的寶安縣人有多少？20

萬還有多。就是在外頭的同寶安本身的人差不多是一對一了。都是些甚麼人啊？丈夫、父親、兒子、舅舅、表兄……在寶安，哪家哪戶都有人連著香港的親。人家總要見面呀，親人見面還不允許人家嗎？可是我們呢？出入平衡，就是說每天香港進大陸來多少人，就允許多少大陸人到香港去。當然這是英國人做的壞規定。您想想看，中國有幾千個縣，一天才允許不超過 50 個人出去，按這樣輪到我們寶安縣，一年才准批四個半人去港。每年寶安要求出去的人呢，上萬。這要等多少年？人家夫夫妻妻、子子女女就在家裡等著？您讓人家等到死呀？您說不批人家去有道理嗎？”

陶書記沒作聲，認真地記著。

“丈夫害病了，妻子不能去看；父親要死了，想叫兒子去見最後一面，不准去，你說人家跑不跑？人家跑了就是偷渡？派狼狗追人家、對天鳴槍嚇人家、抓住了關人家……哪朝哪代哪個國家都沒有的道理啊！”我越說越氣憤。

陶書記在記著，飛快地記著。我感到他聽進去了。

“你想要怎樣搞？”陶鑄突然停下手中的筆，臉上的表情也有些愠怒。

“我想搞‘三個五’，就是邊境的小額貿易。具體說就是允許邊境的老百姓一個月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帶五斤重的物資過去，包括蔬菜、雞、蛋、魚等等，每次可以帶價值五元的物資過來。這樣寶安人就有出去的機會了，不是‘非法探親’了。還可以弄點香港的物資，生活好點了，人家也就不會跑了。”

陶鑄停下筆：“這個想法很大膽啊。”他在筆記本上打了一個圓圈後說，“但也很現實。從根本上解決群眾偷渡問題的辦法，還是要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放心了：“那麼，書記的意思是我們可以這樣幹？”

陶書記停了一下：“你等等，我叫陸熒來一下。”陸熒當時是省委的副秘書長，管外事的。

不一會兒，陸秘書長就來了，看見我，點了一下頭。陶書記把情況給他說了，之後，問陸：“現在寶安縣要求在經濟政策上給放寬，同時，給他們‘三個五’的政策。你的看法怎麼樣？可不可以上常委會研究？”

“我看可以。”陸熒看了報告說。

“有甚麼外事上的障礙嗎？”

其實我來之前就同陸秘書長打過招呼，所以陸熒一直在旁搖綠旗：“我看行，如今是休養生息時期嘛，要穩定邊防，給些特殊政策是必須的。”

我馬上跟進說：“如果省委同意，那就請以省委的名義發一個紅頭文件。”我想，要是把我們的要求作為省委的文件發下去，就有了“後背山了”。

陶書記考慮了一下說：“別這樣，一發紅頭文件阻力就多了，弄不好給誰送到中央去，那又給斃了。”

他沉思了一下：“富林啊，這個問題蠻大呢，只能試著來呀。要麼這樣吧，我們一邊開會研究，你們一邊先搞，只做不說嘛，我們也裝著不知道，好嗎？要碰上問題我再出面替你撐腰。”

只做不說，好辦法，陶書記開綠燈了！

“行！”這還有啥說的，我樂了，起身出門，打算連夜趕著回縣。

我的那批“忽悠”我的弟兄們，還在等我的消息呢。

五、最早的“對外開放”是這樣搞起來的

寶安縣“三個五”政策的實行，可視為後來辦經濟特區的“史前戲”。中國第一步的“對外開放”，也就是這樣出現了！

1961年6月9日，中共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遞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報告後，1961年8月27日，中共寶安縣委又向廣東省委遞呈了《關於適當放寬邊防管理政策，切實解決邊防地區人民群眾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必須解決的問題的報告》。

報告中劃出了開放地區的範圍：第一步先開放沿海一線的大鵬、葵涌、橫崗、沙頭角、布吉、附城、沙頭、南頭、蛇口、西鄉、福永、沙井、松崗等十四個公社和沙河農場。後一步再開放龍崗、平湖等八個公社。

當時的決心已很大，準備在開放了沿海之後，還要進一步開放整個寶安縣！

廣東省委在研究了一個月之後，即1961年的9月25日，同意了這一要求。《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批覆）發文（61）（四）字第111號》中說：

寶安縣委：

省委原則上同意適當放寬邊防地區農業漁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

(一) 開放地區，以邊防線為界，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在邊防線以外的大隊，不得直接進行小額貿易。

(二) 出進地點，目前可暫以羅湖、文錦渡、大鏟、沙魚涌、沙頭角、沙頭、蛇口七處為特定地點。

……

(四) 社員個人攜帶出口的物品……進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為限。嚴禁販賣販買和其他違法亂紀行為。

每月去港來往不得超過五次；每次每人帶出的農副產品價值不超過 5 元，帶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過五市斤或價值不得超過 5 元。

這就是有名的對外開放“三個五”。

這就是說，由於 20 世紀 60 年代的困難環境所迫，當時的寶安縣實際上已經存在了一塊實行與內地不同的經濟政策的“特殊地區”。

寶安縣“三個五”政策的實行，可視為後來辦經濟特區的“史前戲”。中國第一步的“對外開放”，也就是這樣出現了！

當然，對於要不要“放開邊境”的問題，即使在當時的廣東省委內部，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認為不可放得太急、太寬。在省外也可能有過一些不同的意見。

這可以從以下的一些動向得知：

1962 年 1 月 28 日，寶安縣委又向主管外事的副省長魏今非上呈了一個報告，解釋允許“群眾攜帶物品進出”的原因。

魏今非副省長在回文中，特意在“同意放寬”的同時，說明此政策：“主要是對邊境地區的一種照顧，這不是增加開放口岸，也不是允許小額貿易。”

這些話，是魏今非為了保護“放寬”，對付可以想像的各種非議而說的，還是他內心的想法，難以定論。

魏今非還在回文中準確地劃明了開放地區為：“限於與香港、九龍交界的邊境線起，深 20 華里以內的地區。”

1962年1月20日的廣東省委發出的文件指出：“省委認為可按魏今非同志1961年11月3日所提的四點意見辦理，省委在1961年9月25日批示的有關規定，應即停止執行。”

這種對“放寬”問題前後有伸縮的說法，還出現於其他寶安縣委的有關文件中。可見這一段時間，對於這種有限度的“開放”，黨內外兩種認識、兩種觀點的交鋒從上到下都是很激烈的。

儘管如此，“三個五”還是得以保留。獲得了部分開放的群眾，對於新政策都充滿了感激。至今，老寶安們在回憶時，無不說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寶安縣最好的時光。

寶安老人黃景章回憶：“政策一放寬，生活改善了，人民的積極性大提高啊。邊境上，來來往往，耕作啊，買賣啊，寶安縣農民個個笑呵呵合不攏嘴。不到一年，老百姓不僅吃上了米飯，喝上了糖水，還可以抽到香港的‘三個五’（香煙）啦。”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寶安縣就有了第一批過河來做生意的香港商人。這應該是1950年後，最早踏入大陸的第一批境外商人。可惜現在由於無法找到確切的資料，已無從得知這批商人和企業的名字了。但可以肯定這段史實是存在的。李富林在回憶中說，初時公社幹部還不敢公開接待這些港商，縣委為他們壯膽，公開表態說：“公社不敢接，縣委接！”寶安縣委還開出證件，讓港商在縣委樓裡進出。

1962年底，寶安縣的經濟情況已有了較大改觀，李富林在黨代會上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在三到五年的時間裡，把寶安縣建設成商品糧、水產、鮮果、肥料、遊覽的五大基地！”

“後來還真的給陶書記送了紅薯嗎？”我開玩笑地問。

“那是說笑話的。”李富林說，“不過那時省委大院的可沒少來我這拉過紅薯。當然，同現在不一樣，就是拿了條板凳，也是要給錢的。嗨，那是多麼叫人高興的日子啊。”老人沉浸在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段的回憶中。

“那傢伙，地裡種的紅薯都吃不完啊，五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那時周圍的縣都困難嘛，坪山一帶的老百姓，沒吃的，都跑到我們縣的地裡，看見紅薯就刨——坪山那時屬於惠陽縣。告狀告到我這裡來了，說李書記怎

麼辦？惠陽的群眾不講理，抓不抓？我說，抓啥？讓人家刨嘛，紅薯這東西倉庫放多了裡容易壞。好傢伙，我這一開口，來了千多人，烏雲一樣湧到我們的地裡來刨紅薯。我們縣裡的同志還笑著幫他們往袋裡裝紅薯啦。”

稻穀也是大豐收。那年人均完成了差不多 500 斤。還真的拿了全省第二呀。第一是番禺，只多我們幾十斤。

1960 年寶安上交稻穀的任務是 60 萬擔，我完成了 80.2 萬擔，除去各種開銷，還留有 10.2 萬擔，幹甚麼？我留在倉庫裡打了埋伏。這都是後來修深圳水庫給農民的補貼糧呀。那時，不是過苦日子嗎？海豐縣餓死好多人，書記蔣瑞智去求陶書記想辦法。陶書記說，你去找李富林吧，他那裡有糧。

我給了他 5000 擔糧食，讓他自己派汽車來拖！

我敢說，即使在國內最苦的 1961、1962 年，就全縣來說，我也沒讓寶安老百姓過太苦的日子！上面還來了記者，在《人民日報》頭版發了個報道，叫“風景這邊獨好”。好了，寶安的名聲傳出去了，一次在省裡開會，陶書記高興地把我叫去，滿臉堆笑地敲著報紙：“行啊，富林，都上頭版啦！”我說：“有啥呀，沒有你的支持便沒寶安的今天。”陶書記開玩笑說：“算了吧，是你開後門有成績嘛。”我急了：“書記，你可別這麼說，你是按政策批，我是按政策幹的啊，紅心薯的事，我還老記著呢。”我記起承諾。“算了，”陶書記說，“你那包地瓜乾，老曾收到了，斯亮她們說好吃，甜死了。我還吃了幾塊啦！”老曾說要我謝謝你。我說，別謝他，他還從我手裡拿了政策哩！哈哈，就這事叫你來的，去吧——”“哈哈”，我們都輕鬆地笑了。

第四節 陶鑄下令：把崗哨撤了

一、大饑荒旋風颳過神州大地

我們廣東減少幾十萬人沒有甚麼了不起。這樣做，既能夠解決我們的困難……等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可以再回來嘛。這樣不叫偷渡。

在特殊政策下，寶安縣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從全國、全省來看，饑荒的形勢卻越來越嚴峻。

1962 年的 3 月，一份報告遞到陶鑄的案頭。報告說，據不完全統計，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 8 縣，已經出現嚴重饑荒。已經有 9468 戶農民斷糧，731 人出外逃荒，25 家賣小孩。甚至有一家男人因為無法養活孩子而自殺。

可怕的饑荒已像瘟神一樣傳遍南粵大地——

1959 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只有 177.58 億斤，比 1958 年減產 15.71%。1960 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 61.250 億斤糧食，等於他們 8 個月的口糧。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餓得走投無路的人，只好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番

薯藤，以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飢不擇食的人開始吃起觀音土來。

1962年廣東省缺糧情況的統計數據

| 地區 | 缺糧人數 | 缺糧數量（萬斤） | 斷糧戶數 | 斷糧人數 |
|----|---------|----------|-------|--------|
| 廣州 | 301517 | 970 | —— | —— |
| 海南 | 301517 | 600 | 5307 | 19195 |
| 湛江 | 1650000 | 2500 | 39576 | 139146 |
| 肇慶 | 213869 | 495 | 1482 | 4080 |
| 佛山 | 163433 | 500 | 497 | 1530 |
| 韶關 | 52201 | 1000 | 367 | 1373 |
| 汕頭 | 647613 | 1200 | 13679 | 53198 |

某學者不相信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真的像西方學者所估算的，餓死了3000萬人，“當時中國才約六億半人口，要是餓死了三千萬，每二十人就餓死一個。這似乎不可能”。但是，他又指出：“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嚴重的饑荒迫使飢民吃觀音土、野菜……充飢，大批的人餓死，所謂的‘大躍進’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正是在這種大饑荒、人民群眾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領導人，對於歷來被看成“叛國投敵”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認識：與其讓老百姓在國內餓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條生路！

當時，中央有文件，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對於“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堅決“收容、遣送”回去。

廣東省卻不同，不是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鼓勵走投無路的農民出外找一口飯吃。允許地方開具證明，讓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對於廣東的逃荒者來說，“出外”意味著甚麼呢？哪裡是最理想的去處呢？無疑是衣食豐足的香港了。

與此同時，1962年中央號召各省壓縮城市人口，疏散到農村去。大批廠礦、中技學校停辦。據稱，1962年的頭5個月，僅東莞縣“壓縮精簡”了的人口就有8773人。

無疑有不少人把香港當成了最好的去處。各種流落者集中湧向深港邊境。

在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開了一個口子。

而此時，廣東一些思想開明的領導，更在各種場合表達了對逃港的“新思維”。陶鑄就在公開場合表示：

“我們廣東減少幾十萬人沒有甚麼了不起。這樣做，既能夠解決我們的困難……等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可以再回來嘛。這樣不叫偷渡。”

時任廣東省政法委員會主任的寇慶延則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甚麼人民要偷渡？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另一個是）香港300多萬人口，其中200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裡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叫人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

“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

深刻、睿智，實事求是，在那個年代，地方領導能說這種話，的確是很大膽了！

針對中央要求各地壓縮城市人口，中共廣州市委的一位領導在大會上表達這樣的看法：“去香港也是壓縮城市人口的出路之一嘛。壓縮人口，首先是回農村，其次是上山下鄉，再就是去香港。”

後來有人評論，這批中共幹部能夠有這樣開明的認識，一方面是出於困難的情勢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樸素的人道主義感情——共產黨打天下，不就是要讓人民群眾不餓肚子嗎？

一篇文章在寫李富林為甚麼會同情逃港群眾時，說：“李富林從小家境貧苦，兩個姐姐餓死，全家人逃荒到山西。因此當他當上了‘父母官’後，他認為天下第一要議，就是讓老百姓吃好飯。”

吃飯，吃飯，為了老百姓有口飯吃，各地對去港的限制，明顯地放鬆了。

1961年7月20日，廣東省公安廳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局長會議，放寬了群眾出港條件：

“在毗鄰港澳的惠（惠陽）、東（東莞）、寶（寶安）等6個縣市，允許一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

1962年3月，廣東省的邊防工作會議決定把“來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

局下放到公社、大隊”。

把去香港的審批權力下放到公社、大隊，就相當於說想走的群眾都可以走。哪個公社、大隊幹部會願意鄉親坐在家裡等死呢？

群眾紛紛拿著由公社、大隊開具的證明，像一股股黑流，湧往深港邊境……

二、中英士兵持槍對峙

“聽說 62 年那次的大外逃，比 57 年那次還厲害？”我牽起話頭。

“是的，厲害多了，”李富林說，“內部材料的統計是總人數不下十萬吧，當然主要還不是寶安的，還有東莞、惠陽、廣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腦兒都湧到寶安縣來了。弄得我們寶安縣怎麼也撐不住，亂了。最後寶安縣的人也跟著逃！”

有彙報材料說，各地像潮水一樣湧來的群眾，把深圳鎮的街道擠得水泄不通。鎮上所有的店舖都只好關門，蓮塘村附近的邊界鐵絲網都被推倒……

“62 年大逃港的最高潮是在哪一段？你還記得嗎？”

“應該在 5 月初。”老人的記性很好，“好像是 5 月 5 號開始大放寬吧，沒一個月就收緊了。”

李富林的話印證了筆者查閱的材料。1962 年 5 月 5 日開始放寬，而全面大堵截是從 5 月 22 日開始的。真正“放寬”只有半個多月。

“你還記得引發那次大外逃的直接原因嗎？”這是“六二”大逃港的關鍵。

“直接原因？很難說有甚麼直接的原因吧。”他思索了一下說。

“你還記得那次陶鑄去沙頭角的事嗎？”

“沙頭角……”老人似乎在回憶著，“你是問 1962 年對吧，哦，是有一次，他去過沙頭角，是為解決與香港的糾紛去的。但很難說就是‘六二’大逃港的直接原因吧？”

“對，就是那次。你給我說說那件事好嗎？”我緊張地追問，擔心老人有甚麼顧慮。

沙頭角事件

這時，我們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兩邊，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槍實彈。你想，有多危險呀，就是面對面，只相隔幾米遠。英國兵和我們的士兵，眼瞪著眼，只要誰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來了。

有關“六二”大外逃的直接原因，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但李富林是當時的縣委書記，他的看法是比較接近歷史真實的。

他看了看我，深深地喝了一口茶：“好吧，我說，你記——”

沙頭角那地方，一直多事。一條街分成了兩半，中間有一塊光緒年立的界碑。街北邊是我們管轄的，街南邊是英方管轄的。你知道，兩邊相隔那麼近，小孩子滾個鐵環，也常常從中國滾到了那邊去了。偷渡當然就更容易了。所以外交啊、邊防啊常常出事。我們一直為這個事情頭疼。

那陣不是過“苦日子”嗎？我們這邊物資供應緊張，英國兵明明知道，可巡邏的時候還故意嚼著口香糖，抱著餅乾桶，在界碑邊搶啊，笑啊，做給我們看。引得我們這邊的一些小孩子饞著嘴跟著，父母拉都拉不回。

“媽的！黃毛佬，這不是欺負人嗎？”沙頭角的書記曾福每次向我彙報這事都忿忿不平，“是不是搞他一傢伙啊，李書記？免得他們那麼囂張。”我每次都勸他忍著點，避免出事。

後來，曾福又給我打電話了：“李書記，黃毛佬不是人，越搞越猖狂了！”我問他甚麼事。他說：“他媽的，敢過界碑這邊來給小孩派糖了！抓不抓？”

我也感到英國人實在太猖狂，但想想，這涉外的事情，亂搞不得的，就叮囑：“別亂動，我過去看看再說。”

那時寶安縣委的配備是很好的，我都坐美國“別克”車，內地的縣級幹部一般是沒有的。當然，這同當時我們的外事活動多有關。

等我趕到沙頭角，英國巡警已經走了。小孩的家長把糖果拿出來，遞給我：“你看這——李書記，還有英文呢。我崽沒吃啊。”

當時，沙頭角的群眾情緒很激憤，尤其是孩子父母們，感到自己的兒女受外國人嘲弄了，很丟臉。孩子的叔叔拿了槍桿子來見我，蹬著腳嚷：“吊他媽，老子一槍崩嚟佢（他）！”

說實在的，我心裡也很氣憤。咱中國人受了外國人一百多年的氣了，如今我們生活困難，他們還在奚落我們！

那時候，英國人搞出的那個“對等”原則，老百姓也都知道的。不讓他們過去，早就窩著一肚子氣，這一來，火氣就更大了。

“李書記，”曾福領著一群人過來，“你發命令吧，再來派糖，我就開火了！”

“你瘋啦！”我瞪了曾福一眼，“不能開火！打死人怎麼辦？外交糾紛啊，脫得了殼？”

不過，在臨上車的時候，我還是丟給了他一句話：“懲罰懲罰那幾個傢伙還可以。”

一天以後，曾福給我打電話來了，很興奮：“李書記，他媽的，懲罰了！”電話那頭傳過來“哈哈”的笑聲。

原來，幾個英國巡警故伎重演，又到界碑邊來給小孩發糖果了。曾福他們早已經找好了幾個小孩，埋伏在街對面店舖樓上，“啪、啪、啪”數彈齊發，果然打中了一個巡警的眼睛。

“李書記，哈哈，那兩個小鬼，真準啊——”曾福在電話中高興得很。

我也想，反正是小孩幹的，他英國政府找誰去。要問起來，就說小孩調皮。心裡也暗自高興。

“出了氣就行了啊，不要老沒完啦。”我又叮囑他們。

但是，事情還真沒完。

那幾個吃了英國糖的小孩，在學校裡讓同學們說笑，說吃了英國糖就會生“英國仔”，抬不起頭。家長也窩著氣，說一定要親手揍那幾個英國佬一頓才甘心。群眾議論紛紛，情緒很不穩定。

不出兩天，我又接到曾福的電話：“李書記，打了，解恨呀——”

“怎麼回事？打人家了？”我趕緊問。

原來，那兩個散糖的英國佬又出來了。這邊的人早釣著他們的線呢，等他們一到界碑邊，那小孩習過武的叔叔，衝過去就是兩拳頭。兩個英國兵“哇哇”叫著，逃進了對面的商店裡藏了起來。

“不過，現在有點不對了——”曾福說，“來了好多鬼佬，像是要打

架，李書記，你來不來呀？”

我感到事情有點複雜：“還能不來嗎？”便在電話中罵人：“叫你適可而止，你偏要闖禍！”

我急忙叫司機：“快，沙頭角——”

到沙頭角一看，情況果然不妙，兩個被揍的英國兵叫來了二十幾個英國兵，吉普車也開來了，端著槍，在界碑邊“哇哇”亂喊亂叫，把槍對著天，好像要開槍。

當時縣委副書記曹若茗也一起去了，他是管外事的，懂英語，我問他：“他們叫些甚麼？”曹若茗說：“抗議！要我們交出打人的人來。否則就要衝過來！”

我衝對面說：“來呀！衝呀！我看你們有膽！”

這時，我們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兩邊，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槍實彈。你想，有多危險呀，就是面對面，只相隔幾米遠。英國兵和我們的士兵，眼瞪著眼，只要誰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來了。

事情真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了！

我一面給陶書記打電話，彙報情況，一面叫曹若茗趕著往北京周總理辦公室打電話請示——甚麼？你問寶安縣怎麼能往總理辦公室打電話？這你可不知道了。那時有個規定，有關外事情況，寶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層聯繫的。所以，別人說寶安縣早就是“通天”了的。

傳來的指示是：“保持冷靜，千萬不要發生衝突。正在進行外事調解。”

當時我們這邊有一個班的士兵，都荷槍實彈，便叮囑他們不要隨便動，等指示。

大概到了夜裡 11 點多鐘，界碑那一邊的鬼佬，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全撤走了。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勝利了——”

“毛主席萬歲！”

“打倒英帝國主義！”

看來是上面的外事部門，通過香港甚至是倫敦做工作了。

我於是下令：“撤——”。

我們一個班的戰士也撤下來了。

事情過去了，我鬆了一口氣。看看錶，已經是第二天的4點多了，這才開了車回深圳去。

三、大軍區政委親令撤崗哨

陶鑄似乎很生氣，把茶杯一放，站了起來：“說得對！英國人有甚麼了不起！一個彈丸之地，放十萬人過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電話，通知邊防來人，把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沒有完，沙頭角的事傳到省委後，大約是第三天吧，也許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說陶書記來了。陶書記去沙頭角看了，很生氣，已經在鐵路外賓室等你了，讓你趕快去。

我一進去就看見陶書記臉色陰沉沉的。

“富林，你來了，好，你說說，事件到底是誰的責任啊？”

“當然是他們！”

“怎麼要打人家呢？”

“書記，你不知道，那傢伙本來就盡做壞事，群眾不懲罰一下，他們更囂張。”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陶鑄沒作聲了，呆了一會，問：“你們對事情有甚麼看法？”他又轉過頭去，掃了一圈，問同去的縣委的人。

“英國佬太欺負人了！”有人憤憤不平。

“老百姓都在說，新中國抬頭做人了，怎麼還在受英國鬼子的氣？”

“我們每年反偷渡，替他們保平安日子。現在好了，他們把日子過安穩了，反倒拿咱們開心，放他幾萬人過去，看他香港吃得消？”

陶鑄似乎很生氣，把茶杯一放，站了起來：“說得對！英國人有甚麼了不起！一個彈丸之地，放十萬人過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電話，通知邊防來人，把崗哨撤了！”

甚麼？撤崗哨？李富林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嚇了一跳，所以遲遲

沒有動作。

“陶書記一看我還在猶豫，便大聲說：‘聽見嗎？叫你去你就去呀，把團長、政委都叫來！’

“當時在深港邊防的有三個團：邊防3團、布吉野戰軍42軍6團、黃貝嶺42軍還有一個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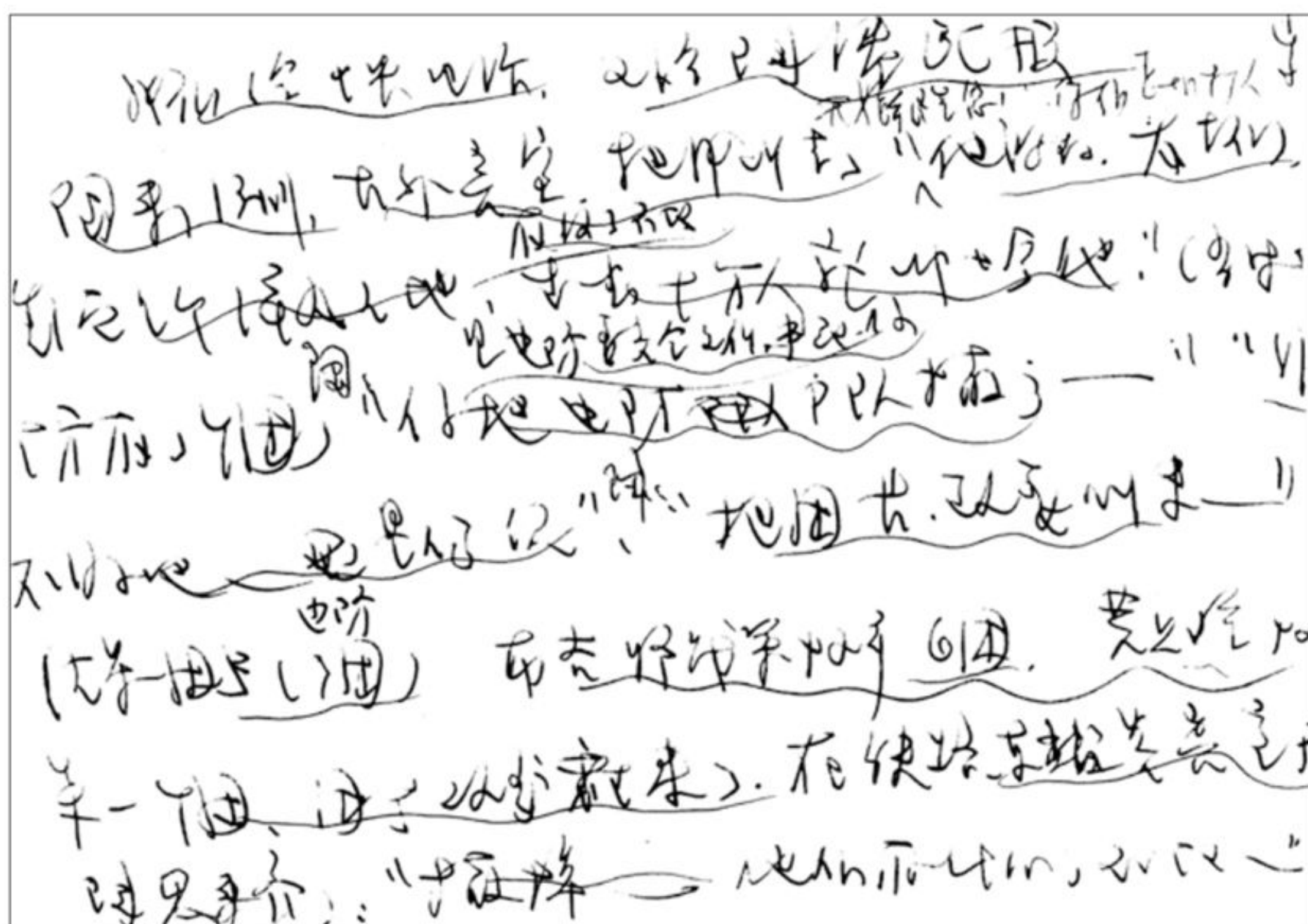
“我還是不敢動，這個事情太大了，這個電話不好打的，就說：‘陶書記，你是大軍區政委，還是得你打才行吧。’

“陶鑄說：‘你不是這的邊防委員會主任嗎——算了，我來！’說著，拿起了電話。

“不一會，幾個團長政委都急匆匆趕來了。包括6團的李庭格、3團的魯山江、還有一個政委姓宋。

“陶鑄看人來了，就說：‘英國人欺人太甚，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不行，你們回去，明天就把崗哨撤了！’

“當時大家都傻眼了，但這是大軍區政委親自下的命令，誰敢不執行？”



作者記錄李富林口述的原稿

會議是下午開的，到第二天，深港邊境耕作口的崗哨果然都撤掉了。

老百姓到耕作口一看，呀，撤了，馬上喊起來了：

“放人啦——”

“可以走啦——”

這種消息，沒有腿，可比長了腿跑得還快。一傳十、十傳百，很快，省內省外都傳遍了。

幾天之後，人流湧來了，廣州的、韶關的、梅縣的、挑擔的、扶老攜幼的……村莊裡、馬路上到處是人。都沿著鐵路線走，因為沿鐵路不會走錯。

——

關於當時的情形有人寫文章做了詳細描述：

“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衝過邊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過去的人確實留下來了，這樣又帶動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一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6月1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兇。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達11547人，東莞縣外逃人數達27197人；增城2458人。其他縣份，如台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據《廣東省誌·公安誌》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地的部分縣、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達4977人。每天集結在寶安、深圳一帶伺機進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

——

“你認為，62年的逃港潮就是這樣起來的嗎？”

30多年後，回憶起這段歷史，李富林內心仍難以平靜。

他考慮了很久。

“當然有關係，但我想，沙頭角事件還僅僅是個表面現象。其實並不那樣簡單。”李富林不愧是個有長期工作經驗的基層幹部，“我也在想，陶書記打過那麼多年的仗，是個精明透了的人。他怎麼會一時衝動就開口，說放十萬人過香港去呢？事這麼大。”

“你是說，放人過去，可能早研究過了，不僅僅因為沙頭角事件，是另有考慮，對嗎？”

“我不敢肯定，只是這樣想——”

“你認為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那時正好是三年困難時期，老百姓沒吃的，粵北餓死了好多人，與其讓老百姓在國內等著餓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於這種考慮，也就是出於人道而放人吧。”

李富林說的真是陶鑄或更高領導人當時的想法？

表面“出氣”，實為“放人”，這是不是“沙頭角事件”後，睿智的陶鑄真實的意圖？

“六二”逃港潮中的深圳

“一、二、三”隨著上千人有組織的吶喊，“轟——”地一聲，幾十米長的一段鐵絲網被推倒在地上。邊境線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衝啊——”隨著驚天動地的喊聲，滾滾人流湧過了邊界……

1962年5月前後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在短時間內湧入寶安縣深圳河邊，小小的深圳鎮不堪重負，頓時陷入一片恐慌和騷亂中。

這麼多的群眾，要吃要拉……開始，政府還一天發兩次稀飯，後來人越來越多，不敢再發。一發就亂，就搶。

為了安全，鎮上的商店大都關門了。

一些難以忍受飢餓的外來人群，如同洪水淹過了深圳鎮周圍的蓮塘、長嶺、沙頭角、皇崗、沙頭、水圍等村莊，把一些地裡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萬人腳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眾甚至威脅敢於干預

的民兵說：“你還敢干涉我？老子繳你的槍，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們洪流般衝進村裡，有人敲門要吃的，不給就打人。

謠言更是滿天飛——“太平有個高級軍官帶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懷視察福建，被接到台灣去了！”——“惠陽縣委書記跑了！”……

寶安縣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眾中了解情況，部分意見被記在報告中：

“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這裡（深圳戲院）算了。”

“生產隊的耕牛都殺了，現在就是想回去也無耕牛了，怎麼活？不如再去拼命（指衝邊界）。”

“邊個（誰）攔我，我就同邊個（誰）去死了——”

報告還稱：“大量的群眾麋集在深圳鎮邊的梧桐山”，“他們有組織、有指揮，當總指揮的是一名大學生”。

“黃昏以後是‘衝邊界’的好時候，逃港群眾相約等到昏暗的時候一同衝下山去。”



大陸逃港群眾蜂擁香港。這是被香港警方在邊境截獲後的逃港群眾，無奈地等候發落。

大陸饑民滿佈邊境山頭 約六七千人進英界

**一批抵港離
找尋香港**

【本報訊】據悉，大批饑民湧向邊境山頭，企圖越境。據報，這些饑民多係因饑而逃，現已聚集在邊境山頭，企圖越境。據報，這些饑民多係因饑而逃，現已聚集在邊境山頭，企圖越境。據報，這些饑民多係因饑而逃，現已聚集在邊境山頭，企圖越境。

“大多數是 17 至 40 歲的青壯年，有男有女。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四尺多長的木棒。他們的總指揮說，在衝到邊界時，不論誰阻撓我們都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誰後退就要用棍打誰。”

“在沙頭角，邊境橋頭連續兩個晚上發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並肩的示威之態，強迫民警開閘。”

……

大逃港的嚴峻形勢上報到了省裡，當時的省委書記趙紫陽帶著省公安廳及李富林等寶安縣委的人，迅速趕赴深港邊境處理。他們躲在邊境的山頭上觀看動靜。

深圳蓮塘、羅芳村一帶，大概集中了兩三千外逃群眾，當他們衝過邊防線，靠近邊境線時，鐵絲網攔住了他們。



港報報道驚呼“中共大量放人出境”

有人就喊：“倒掉它——”，於是山搖地動的一片高呼聲：“倒掉它——”

“一、二、三”隨著上千人有組織的吶喊，“轟——”地一聲，幾十米長的一段鐵絲網被推倒在地上。邊境線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衝啊——”隨著驚天動地的喊聲，滾滾人流湧過了邊界……

趙紫陽把望遠鏡放下，搖搖頭說：“簡直就是淮海戰役了！”一臉的無奈。

形勢已經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時也堵不住了。

四、“欽差”密訪香港

全部是謊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們這邊好得多，只要你幹活，就能有飯吃。我接觸到很多偷渡過去的人，哭，卻沒一個說後悔的。

這時，一位中央黨報的記者，秘密來到了深圳河邊上。他叫連雲山，《人民日報》軍事組組長。

“那時深圳發生了大逃港事件，當時的說法是美蔣特務策劃的偷渡行為。我也這樣認為。”他回憶說。

當時官方發有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對香港是這樣描述的：

-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 二、香港黑社會橫行；
- 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
- 四、香港自殺者是有數的；

……

連雲山想，既然這樣，為甚麼成千上萬的群眾還甘願拋家別舍往地獄裡跑呢？他決定要過境到香港那邊看看。

在廣東省公安廳派人陪同下，連雲山來到了寶安縣。那時，全縣正在

一片逃亡風的恐慌中。中央記者到邊境來，這就如同“欽差”下來了。縣委對他特別的客氣。

“縣委書記李富林心情很沉重，情緒很低落。他讓農村工作部的一個同志陪我前往邊境。”

“公安部門為我辦了一個過境耕作證，化名叫李進山。一位會當地語言的公安科長（後來了解此人是公安局偵察科長周水君），陪著我隨著逃港的群眾，從大鵬灣的一個耕作口過境。到了九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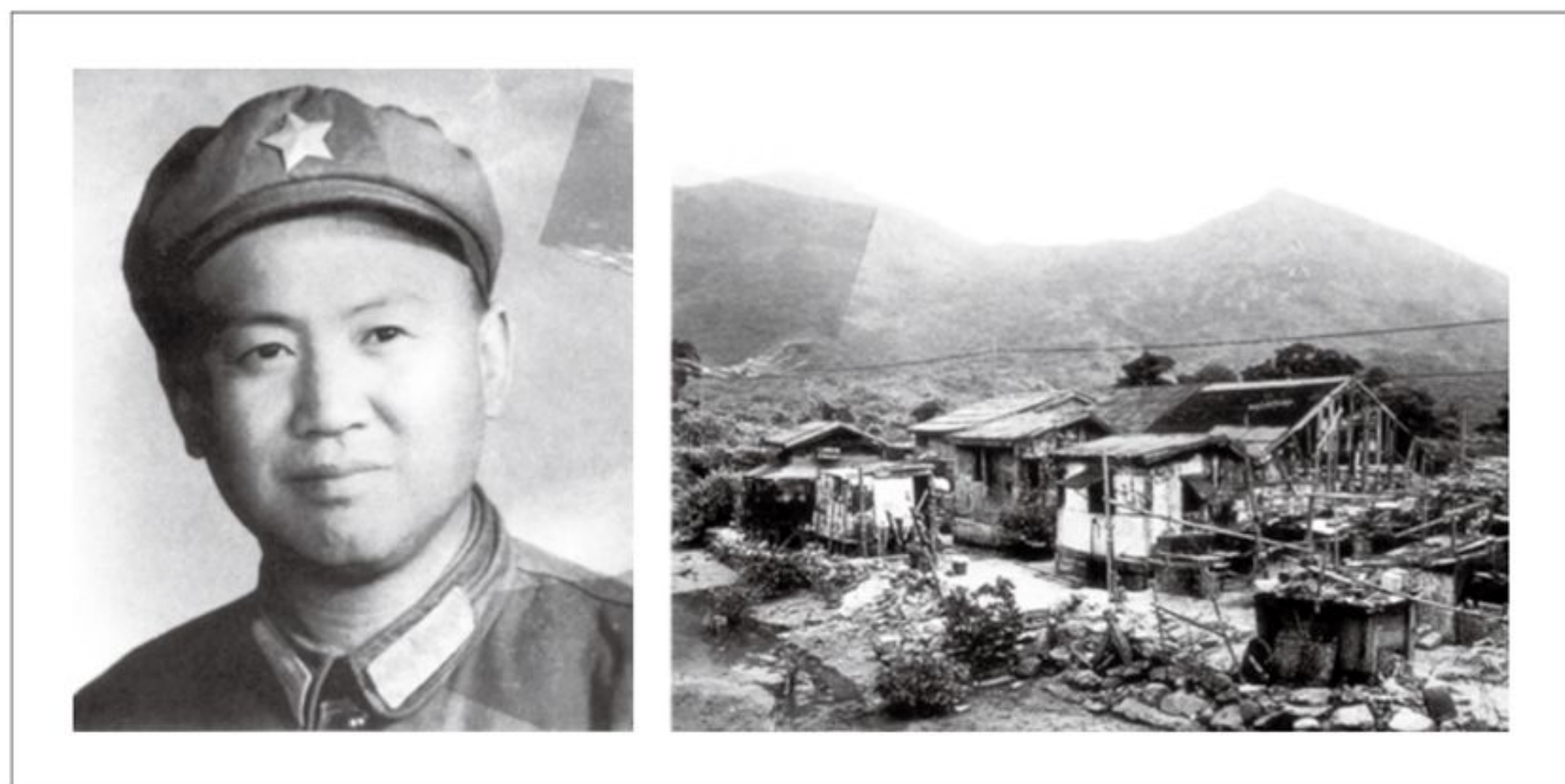
“我看到逃難的深圳邊民在山腳下用塑膠布搭成一個個窩棚，到處都是，跟他們聊，他們就哭，說我們也是黨員、貧下中農啊，說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間地獄呢？當自己用眼睛看過了以後，連雲山驚異了。他說：“全部是謊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們這邊好得多，只要你幹活，就能有飯吃。我接觸到很多偷渡過去的人，哭，卻沒一個說後悔的。”

於是連雲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國內所宣傳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陸人民高出了許多倍。大陸的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

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連雲山。

“回到縣委招待所，有一個多星期，我閉門不出。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



希圖為民請命的《人民日報》記者連雲山；連雲山看見逃港群眾就住在這些棚屋中

邊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蔣特務的挑動，地富反壞策劃內應的結果，是別人的生活比我們好群眾才跑的，可是我們還在欺騙，說資本主義是人間地獄。”

“群眾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災害、集體吃食堂等造成，而實際上是一個政策問題。只有從我們宏觀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找原因，才能解釋。”

在連雲山離開寶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請到縣委小食堂吃飯，一個勁檢討自己，說是工作有錯誤，才造成群眾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卻老瞪著連雲山，像是話中有話。

連雲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擔心自己這個“欽差”回京後“告狀”，把大逃港說成是寶安縣的責任，便說：

“這能怪你嗎，你作為縣委書記，你不知道嗎？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嗎？那也叫水深火熱？誰是水深火熱？你這裡飯都沒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熱？真是瞎說八道。”

李富林說：“老連呀，這話別人說可以，我就不能說呀。”意思是，連雲山可以說，他回北京了，可以把這個真實情況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沒辦法了，我就說：‘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說甚麼，對不對？我只說幾個字好不好？說你寶安縣負不了這個責任。是政策問題，行不行？’”

“當時李富林感動得就差沒哭出來了，眼睛都濕潤了。他說：‘老連啊，我感謝你，感謝你能理解。’離席時，我說咱們今天就說到這。這麼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說不能說，還都是個問題啦。”

連雲山決定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向中央報告。希望中共中央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歷史，調整政策。

“我先後寫了四篇內參，給了當時的《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寫了大概四個內容：一個是香港的情況；第二個是大逃港的深層次原因，責任不在寶安縣，也不在廣東省委，是我們政策上的問題；第三個講了重新認識香港的問題；第四個講了解決的具體措施，比如取消糧票，實行自由貿易制度，從樟木頭到寶安這個地方，建立一條政策優惠區。

“他看過後，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話。他說：‘我都不知道情況有這麼嚴重。’我擔心他會給我扣帽子，幸好沒有。說他也得想想。

“過了幾天，他又找我，說恐怕不能發表，建議我去新華社找找人，看能否通過新華社送上去。要送給中央的最高一級領導。

“我找到了新華社內參組組長夏公然，我們的私交關係不錯，在朝鮮戰場上一起呆過。我就約他到宣武門一家烤肉館吃烤肉，那裡人不多、說話安全。他看後嚇了一跳：‘哎呀，你是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呀，我給你送了，連我也是反革命了。’送不送？怎麼送？他拿著考慮了好幾天。”

連雲山也不能不為事情的後果擔心：“頂多把我關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壞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個農民出身，我家連個保長、甲長都沒有，拿我也沒辦法。”

但是，送給誰呢？連雲山回憶說：“夏公然說，就送一個人，送鄧小平吧。他說鄧小平不整人，不說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夏公然在他的遺著中也回憶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當時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過他反映到總理處。”

報告送上去後，情況怎麼樣呢？連雲山和夏公然都很著急。等了半年多，沒甚麼反應……

但是，實際上，一些“改變”在暗中演化著。

夏公然在他的遺著中回憶，內參送上去以後，國內情況發生了變化：

“從這以後，相關政策悄悄開始鬆動，記得當時總理對大陸出逃的難民有一個放寬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屬實，周恩來的這個指示，就不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寶安縣的鬧“開放”的縣級幹部們“一馬”，也“放”了陶鑄、寇慶延等一批支持“開放”的廣東省的領導“一馬”。

“鬆動”還表現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變化的，是大陸通過香港買糧食一事。”夏公然的遺著指出買糧食是一件對中國的老百姓很要緊的事，是對中國後來渡過大饑荒起過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國是基本上不向外國進口糧食的，提倡“餓死不吃美國糧”。國內老百姓沒吃的，又要面子不進口糧食，大批人餓死是必然的。自從政策允許從香港進口糧食後，外國糧進入國內，饑荒才得到一定程度

的緩解。許多嗷嗷待絕的飢民才得以活下來。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甚麼也沒有發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風，在愈演愈烈。

五、廣州火車站告急

與此相同，在深圳河邊上，守衛深港邊防的部隊增加到一萬多人。那場席捲天地、數以十萬人計的大外逃，硬是被上萬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給堵了回去……而給予寶安縣的“三個五”政策，也在不久後叫停。

當然，最初的試驗性“開放”——給予深港邊境範圍內的“放寬”和“搞活經濟”政策，也就同時剎車了！

就在深圳河邊上發生群眾大逃港事件後，廣州發生了大批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我們也要去香港！”

1961年9月，寶安縣放寬邊防地區群眾出境的政策傳到廣東省內外，碼上加碼，口風就變了。

1962年年初，一個“謠言”悄悄在各地飢餓的老百姓中傳開：“女皇誕辰，香港大開邊境”，“內地居民只要願意去，不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

飢餓的廣東瘋了，所有聽到這個消息的地方都瘋了！

一時間，廣州整條白雲路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驚全國的廣州火車站“六六大逃港事件”。

有關1962年廣州車站的大騷亂，由於當時禁止報導，所以能得到的資料很有限。後來偶然在收容所的檔案櫃中發現了一本在邊境被抓捕的偷渡者的日記，其中有幾頁記錄了1962年5月以後廣州車站大騷亂的情況：

1962年5月17日

晴。……排隊買火車票的人驟然增多起來，都是往南去的。而且買

的票多數是到平湖的（買到靠近深圳的平湖站不用邊防證）。明眼人一看就都知道是想跑香港的。上面都沒說不可以，下面怎麼不跑啊。售票員也不問。

單位昨天也開了會，叫大家注意可能有意外情況發生。

……

1962年5月22日

晴。……天氣越來越熱，排隊要去香港的人也越來越多。從窗戶望去，火車站坪裡的長隊排到了汽車站那頭了。甚麼人都有。廣東各縣的，還有外省來的，衣衫襤褸，好像是叫花子那樣的……滿街上都是拖兒帶女的外鄉人，見了你就伸手要吃的。

聽說海珠橋那邊還發生搶吃的，公安都去了。情況很混亂。老媽叫我和華仔不要出去。

……

1962年5月30日

晴。……火車站上人山人海，到處是人。

……

1962年6月1日

……情況還在變化，今天，整條白雲路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堵塞了。火車站坪裡，恐怕有一兩萬人。有些地方，買票的群眾出現起鬨。車站召開了緊急會議。這樣恐怕會出事呀。

……

1962年6月4日

……今天果然出事了。成千上萬的旅客，因為買不到去深圳的票，就衝進車站去，自己爬上開往香港的火車。聽說有爬牆的，有砸破了車窗玻璃往車上爬的，有狂呼亂叫、強行要上車的。運輸秩序完全亂套了。車也發不出去。現在還停在車站上。結果，開往北京、上海……哪裡的車都開不了。大堵塞。

戴紅袖章的民兵也出動了，一排排來了好多。車站坪裡也亂了套。我們樓下的小店都嚇得關門了。連車站旁邊的樹上都爬著人。

我們上班也上不安了。誰還有心上班？都是議論去香港的事。有些人也打算跑。聽說車站已經向省委緊急報告，要求派解放軍、公安維持秩序。我看可能會抓人……

日記到這裡就突然沒有了。可能後來作者本人也行動了。

對於廣州火車站出現的騷亂，幾乎所有的目光都望著廣東省委，看省委如何動作。

京廣大動脈堵塞，各地告急的電話電報雪片似地飛來。中央嚴辭追問……

而實際上，此時的廣東省委，對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措施，一時也舉棋不定。

1962年6月5日，省長陳郁家中氣氛沉悶，屋子裡坐滿了廣東省的領導，包括陳郁、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廣州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李廣祥等人。

陳郁首先打破僵局，說：“鐵路派出所來電話說，已經聚集了兩萬多人了。場面很混亂，警車都給放火燒了。孫樂宜的處境很危險。我擔心他出事。”

陳郁說的孫樂宜是當時廣州市的副市長。由他直接指揮處理火車站事件。

孫樂宜帶著一隊民警，開著廣播車，放著高音喇叭，企圖驅散坪裡的群眾。結果被群眾團團圍住。雙方相持之下難免衝衝撞撞。聚集的群眾乘機起鬨說民警打人。上百人一聲吼，把廣播車也掀翻了。有人拿來了汽油，劃亮火柴，汽車霎那間燃起滾滾大火。幾十個民警趕來制止，反倒被群眾抓走了三個。

群眾對幾個民警進行了“審問”。被告知：“不准你們干涉老百姓的行動”，這才放了。

現場發現了一些可疑的人。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現場拍照、錄音……

“這是有人策劃的。背後有人。逃難的群眾不會組織得那麼好。”陳郁說。

“沒錯。很清楚嘛，這是一起有組織、有策劃的行動。可能有港台情報組織插手了，”林李明說，“目的就是要搞亂我們嘛。”

“問題是現在怎麼辦？”趙紫陽說，“老孫圍在裡頭出不來了。要是群眾動手打人就更糟。”

這時，社會上已有人給政府提意見，說政府太軟，燒警車，打公安人員，這已經是敵我矛盾了，要求趕快派軍隊——戒嚴。

大家都有些猶豫。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情。

“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甚麼矛盾，”趙紫陽說，“港台特務插手畢竟還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還是老百姓沒飯吃，要跑香港。還是要以勸說為主吧，免得事情擴大。”大家定不下主意。

正在這個時候，電話響了。

陳郁放下電話：“好了，陶書記從廣西趕回來了。”

剛下火車的陶鑄聽了情況，一錘定音：“現在還甚麼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車都燒了，還人民內部？”

會議決定，立即調動部隊，實行戒嚴。

1962年6月6日，滿載全副武裝的解放軍的汽車，一輛輛開進了廣州市，把車站包圍起來。首先封住了車站兩頭，許出不許進。然後開始清場。往外驅趕群眾。

廣州火車站事件中，進駐車站的解放軍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阻攔。當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列隊進入時，衣衫襤褸的百姓，驚惶惶四散奔逃，如鳥獸散。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留。1600多叫花子一樣的逃荒群眾進了收容所後遣送回原籍。

如同一地的落葉被秋風掃去，僅隔一天，即1962年的6月7日，廣州火車站的車站坪裡，已是冷寂寂空無一人。

據有關資料顯示，對於“去香港”的問題，北京嚴令廣東收縮：“迅速處理群眾外逃問題。”

國務院指示，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

與此同時，在深圳河邊上守衛深港邊防的部隊增加到一萬多人。那場席捲天地、數以十萬人計的大外逃，硬是被上萬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給堵了回去……而給予寶安縣的“三個五”政策，也在不久後叫停。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亂！最初的試驗性“開放”——給予深港邊境範圍內的“放寬”和“搞活經濟”政策，剎車了！

六、總理致電：趕快收

深圳河邊的“放寬”政策起於1962年的5月，“緊縮”於1962年9月（實際上從5月22日已開始），正好在這個波谷的“轉折”時期，無疑同這個國內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

這場初啟的“鐵幕開放”，中共高層為甚麼要突然剎車，從而推遲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這也許會成為將來史家們研究的課題。除了外逃之風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還同當時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著關聯。

有文章說：

“幾乎同時，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6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國際輿論一時譁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做法。”

此外，1962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層對於形勢的認識有著一個“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層總結了人民公社、大躍進帶來的負面影響，比較強調在政策上的“後退”“放鬆”。一月份還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檢討工作中的錯誤。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等人更是主張“包產到戶”。

1962年的上半年，黨內比較一致的聲調是：“退”，“放鬆”。新上任的中央財經組長陳雲甚至主張，為了讓老百姓吃上飯，啥辦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後“棄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話說：“現在是國際歌唱的，全靠我們自己。”

兩個月後，陶鑄在寶安縣放開了邊境。

緊接著，下半年形勢就因為毛澤東的“認識改變”而發生了變化。8

月 26 日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時，風向一改之前“緩和”的調子，提出要批彭德懷、習仲勳等人的“翻案風”。

9 月 24 日毛澤東更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狠抓“階級鬥爭”的問題。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經清楚了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1】}統一了認識，即立即轉入“緊縮”。

深圳河邊的“放寬”政策起於 1962 年的 5 月，“緊縮”於 1962 年 9 月（實際上從 5 月 22 日已開始），正好在這個波谷的“轉折”時期，無疑同這個國內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開的。

直接在深圳河邊工作的共產黨幹部，是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的呢？李富林回憶說：

“究竟中央為甚麼要收，上面的事情，我們說不清楚。就是聽說要堵截，不能放人了。”“這事是趙紫陽親自來佈置的。從放到收，也就是很短的時間吧。”

李富林飲了一口茶，繼續說：

“其實，要不要放人，一開始，我們中間就有不同意見。加上放人以後，群眾一亂來，一衝，事情就朝反面的方向發展了。

“英國外交部向中國提抗議。周總理問陶鑄怎麼回事。陶書記那時在長沙嘛。說是放些人出去也好，沒吃的了。總理說那不行，限你半個月，趕快收！”

“陶書記急了，趕忙打電話給趙紫陽，讓他把群眾動員回去。電話中說得可急了：‘制止不了，你自己也別回來了！’

“趙紫陽帶了人到了深圳後，就召集我們在現在的新園招待所開會，東莞、惠東……周圍好幾個縣的公安局長都來了。決定要重新封鎖邊界，堵截偷渡。大家要當第一位的任務來抓。”

為了迅速解決逃港問題，首先決定立即切斷逃港的源頭。

一、從湖南到廣東之間的鐵路、公路，分段設卡。比如從湖南郴州到廣東韶關設卡；從韶關到廣州設卡；從廣州到深圳設卡。幾道卡下來，把人流的源頭卡住。

【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32 頁。

二、從惠陽方面加調部隊過來，加強邊境防守。對留在深圳尤其是邊境附近山頭上企圖逃港的群眾，一律清散回去。向群眾解釋，不是我們不讓去，是英國人不同意你們過去。

三、增加遣散的人手和車輛。廣州鐵路局負責每天派出火車到深圳送人。

四、邊境恢復崗哨。凡以後再行偷渡者，被抓獲後要給以嚴懲。

於是，從 1962 年 5 月 22 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員。從 5 月 22 日至 7 月 8 日止，共遣送了 51395 名外流人員回鄉。

此後，廣東很多地方規定，只有憑單位證明，才能購買到寶安的車船票。邊界基本不能去了。

與此同時，時任中共東莞縣委第一書記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區的基層領導，開始向轄區師生、群眾做工作，分析當前國際形勢，表明政府正在積極地採取措施克服困難，重新安排群眾生活，同時指出外流香港並非出路，何況香港當局派出大批軍警，見一個抓一個，根本過不去。

6 月 19 日，東莞縣委發出指示，對再參與外流的國家機關幹部、教師一律開除公職，是黨員的一律開除黨籍；對參與外流的農村基層幹部，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停止職務的處分。



1958 年，時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中穿對襟舊棉衣者）在廣州清平街與群眾抬土，形如普通市民老大爺。（轉摘自鄭笑楓、舒玲《陶鑄傳》）

2009年2月11日，家屬把李富林的遺骨撒向大亞灣。（馮宙鋒等攝）



關於遣返工作的進度，當時的邊境支隊有詳細的執勤記錄：

1962年5月22日：滯留邊界群眾人數大約一、二千人

……

1962年5月25日：今日邊境滯留群眾大約二、三百人

……

1962年6月17日：今日拘捕偷渡者五人……

到1962年的年底，寶安縣政府的總結材料已稱：“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經取得了勝利。”“深港邊境的秩序恢復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風潮就這樣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次風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官方說是幾萬，但據調查，應該是三十萬左右。這些來自全國各地逃出的飢民，僥倖到達了衣食豐足的香港，保全了飢餓之軀。有些人後來更以自己的艱苦奮鬥，創造出一份可觀的事業。這些謀福之舉，同那些冒著危險，頂著壓

力救人性命的人們的勇氣是分不開的。

為民謀命者理當青史留名！

“誰都不懷疑，如果不是陶鑄等一批思想開放的共產黨人，毅然放人民一條生路，廣東省乃至其他地方將要餓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來的領導人這樣說。

七、我對“六二逃港潮”的基本估計

（一）高峰時間

“六二逃港潮”的高峰期，約在 1962 年的 5 月 5 日—22 日間發生。

這兒似乎有一個疑問，即批准寶安縣放寬邊境，是在 1961 年的 9 月 25 日。為甚麼群眾逃港的高峰期並沒有發生在寶安縣“放寬邊境”的時候，卻發生在半年多後的 1962 年的 5 月呢？

應該指出，“放寬”並沒有引起寶安縣群眾的大逃港，在放寬半年的時間中，寶安縣的經濟活躍，群眾逃港的數量是下降的。“六二逃港潮”中的數以十萬計群眾，主要不是來自寶安縣的，而是來自外省、外縣的饑荒中的群眾。

（二）人數

究竟“六二”大逃港中逃過去多少人，目前公開了的官方檔案的記載是難以相信的，目前能看到的廣東省最大膽的文件對“六二逃港潮”人數的估計，也是“十多萬人”。數字顯然會偏低。

在當時“哪個縣跑的人多，就是哪個縣的階級鬥爭沒抓好”的情勢下，誰願意把真實的逃港數字上報，等著挨批呢？

逃港人數究竟有多少？包括被攔截回去的、路上死亡的、逃港成功的、到港後被再遣送回去的、到港後又移民他國他地的……這些到今天恐怕很難得到準確數字了，只能是估算。

我們知道，從中共封鎖河口、禁止自由去港的 1951 年到中英簽訂協議，香港不再接收逃港者的 1980 年的 30 年中，香港人口增加了 272.6 萬。除去自然增長的人口和中國政府斷斷續續批准的合法手續來港人口

外，30年中香港人口中的逃港者的人數，估計在百萬以上。

此數字沒有把被攔截回去的、路上死亡的、到港後被再遣返大陸的、到港後又移民他國他地的等等的逃港者人數計算在內。如果以2個逃港者中至多有一個成功者，即使將“多次逃港”因素考慮在內，100萬的逃港成功者背後，真正的“行動逃港者”，可能在200萬人以上。

所以，史稱30年的逃港事件為“百萬大逃港”，顯然不是過分之辭。

1962年的逃港潮中，究竟有多少人成功地成為了香港居民呢？據可得到的資料，普遍認可的人數應在6—8萬人之間。那一年，成功者中另有不小一部分去了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加上逃港失敗者（被攔截、路上死亡、被遣返……）約莫10萬人以上。所以，以“六二逃港潮”為標誌的大逃港，逃港的群眾不會少於20萬人。

（三）逃港群眾的範圍和組成

逃港的群眾（指沿寶安縣路徑逃港的群眾），來自廣東省的大部分縣和一些市。還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廣西等全國12個省、62個市（縣）。

當然，最主要的逃港者來自廣東，而廣東省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地域：

東面：惠陽、潮汕、海豐、陸豐等縣市；

北面：東莞、廣州、英德、韶關、江門、肇慶等縣市。

（西面的台山、中山、陽江等縣市的逃港群眾，大部分選擇從珠海逃往澳門。）

逃港群眾的組成成份以農民為主，其中也包括部分的城市居民、學生、知識青年、工人、幹部，甚至軍人等。從政治成份看，普通群眾居多，也有共青團員、共產黨員，甚至中共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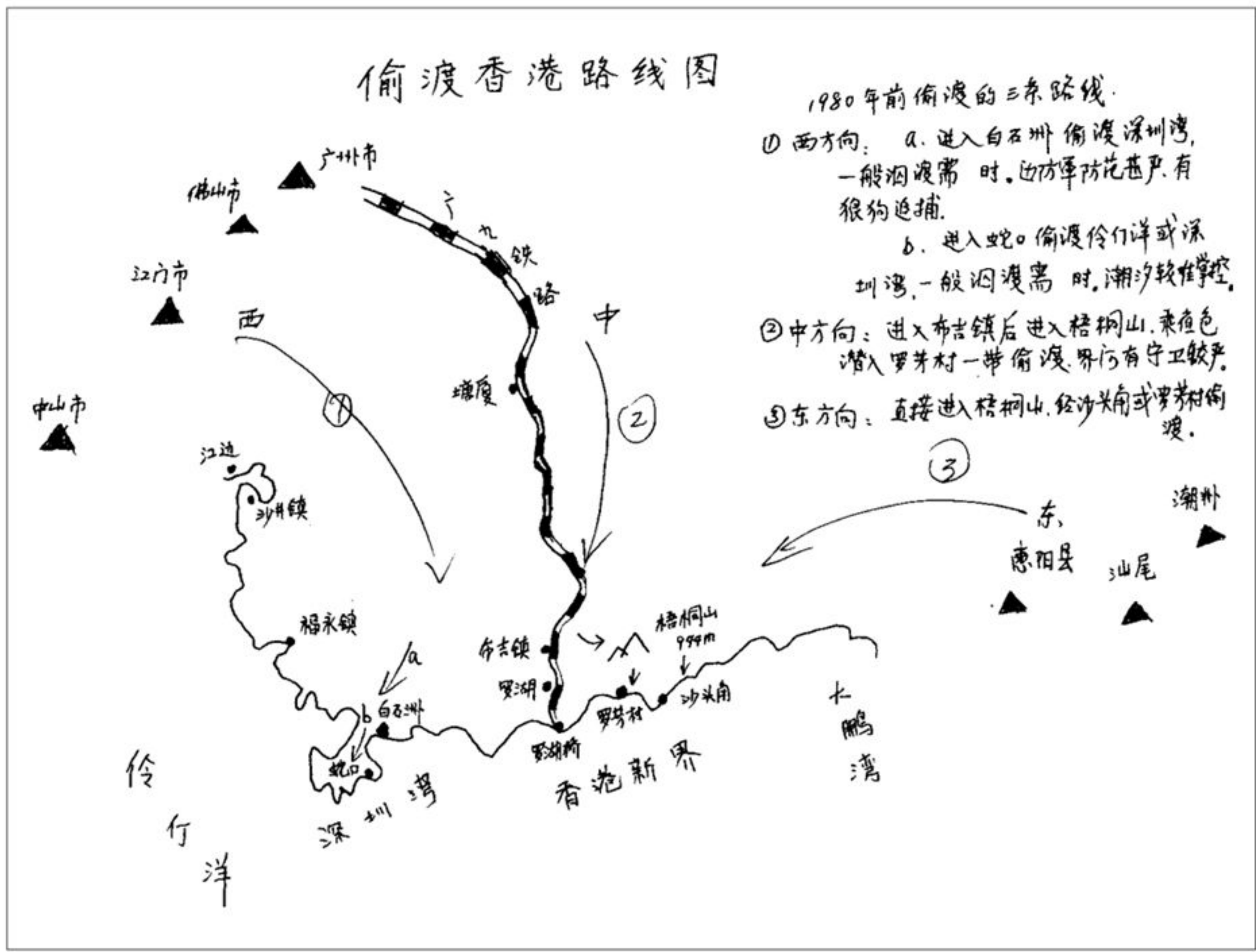
（四）偷渡主要路徑

陸路：逃港者進入寶安縣後，進入梧桐山，下山後經蓮塘村，從羅芳村、長嶺村等邊境過港。

水路：1、逃港者進入寶安縣後，進入福田鄉白石洲一帶，經海邊躲過巡邏哨，從深圳灣泅水過海入港。2、逃港者進入寶安縣後，進入蛇口、南山一帶，從後海灣——如今的深港西部大橋一帶泅水過海入港。

（見下頁偷渡香港路線圖）

偷渡香港路线图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 在境外的影響

第一節 湧過邊界的洪流

一、被塵封的歷史

不過，這些寶貴的資料多少年來，都被冷落在這間小閣樓上。登記本顯示，數十年來，光顧它們的竟然只有兩個人。悲哀！

長沙，湖南省圖書館。1995 年的 6 月，為了寫深圳的大逃亡，我回到老家的圖書館，查閱剛剛解密的歷史檔案。

一個幾十萬人鋪天蓋地越過深圳河的大逃港事件，內地報紙竟然幾乎隻字不提，而國內的一般人又不能看到境外的報紙。所以，這段轟轟烈烈的歷史近於消失。

早期的採訪非常艱難，我只有憑“關係”，“走後門”去接近這些在如今已對平民開放，而在當年是難以接近的港台報刊。

深圳的圖書館是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才建起來的，沒有 60 年代的報刊。因此，我帶著一封私人信件，坐通宵火車趕到長沙，希望在湖南省圖書館能有所收穫。

湖南省圖書館管港台報刊的“領導”從老花眼鏡的縫隙裡把我打量

了半天，站在他面前，橫揸著一個“為人民服務”的軍包，因為長途跋涉而一身汗漬的小夥子讓他感覺有點古怪——“深圳人”應該是“有著港味”的，衣冠楚楚，講著一口“細（是）啦，細啦”的港式普通話，怎麼來人像個來找工作的流浪漢。

“港報，對，1962年1月到11月的香港《文匯報》、《成報》、《星島日報》、《大公報》——都行。”我忐忑地說。

“幾十年前的事了，你還從那麼遠跑來，做麼子啊——”他用地道的長沙話對我說。

作為黨的資料工作者，他顯然對於我找資本主義報刊的舉動表示了警惕。但還是客氣地推辭說：“恐怕我們這裡也沒有咧——”

我急忙向他作了許多連我自己都說服不了的解釋。

顯然我的解釋蒼白而無力，他說：“那不行咧——你又沒有介紹信，又不是處級。那怎麼行咧——”

就當我要絕望了的時候，他突然同意了——我答應為他正想調到深圳去的兒子找份工作。當年，到深圳去工作是塊很誘人的釣餌。

“你還真算是記者咧——冒見過你這樣發狠（賣勁）的。”最後，他把我的記者證端詳了半天。

“在儲藏室——”

他把我領到了樓上圖書館的頂層，頂層的小屋灰塵厚厚的。然後，“啪”地打開了一扇恐怕十年也難打開一次的門。

“都在這裡——你自己找吧。”

陽光從唯一的窗戶中擠進來，照著一間冷寂寂的屋子，滿屋的灰塵，滿屋的亂報紙，到處堆著。牆邊上有一個櫥櫃上寫著“港澳台舊報刊”。

我高興壞了，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它們了！

打開一看，裡頭根本甚麼都沒有，空空的一個書櫃。這是怎麼啦？

我實在是太失望了：“怎麼搞的啊？那些報刊呢？”

“我也搞不清楚，我十幾年冒上來過噠。”

“圖書館讓紅衛兵衝了幾次的，那時候港報不是反動報紙嗎？可能是都燒了。”他輕鬆地說。

簡直就是一瓢冷水潑來！

“沒有了，就對不起啦——”他一邊鎖門一邊說。

材料一無所獲，倒貼上要給人找工作的承諾。

失望和惋惜籠罩著我。

天無絕人之路。大約兩個月後，在廣州中山圖書館，事情終於有了向好的變化。

這天上午天氣悶熱。廣州中山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見我開出的是這麼一個陳年報刊的清單，感到有些為難：“咁耐（這麼久）的啊，唔（不）知有冇（不知還有沒有）。”

我開始有些緊張，跟著她上樓的腳步便有些躊躇。但當她把我領到同樣是積滿灰塵的舊報室，看到那些堆積如山的舊報刊時，我簡直要歡呼。

真是萬幸！這裡的歷史報刊逃過了那個災難的年頭！

“不行，你不能看這麼多的——”帶我前往的管理員突然說。

我不明白她為甚麼要這樣做，也許不滿意於我的驚喜。也許，這些本應當是由“高貴身份”的人看的。這麼多寶貴的資料，竟被這樣一個揹著一隻黃軍包，白襯衣被汗漬弄得像黃襯衣的“毛頭小夥子”所佔有，有點太那個了一點！

“你就看《星島日報》，其他的你都不能看——”好心的她又給了我一個“殘忍”的警戒線。——不知道她為甚麼單單點了《星島日報》，也許根本就沒有原因。

她把我要看的所有的《星島日報》搬到我面前。我不敢爭辯，怕把這個機會也給丟掉。

唉，《星島日報》便《星島日報》吧。還得感謝她終於給了我這個機會呢。

“登記——”她扔給我一個發黃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覺：這些寶貴的資料多少年來都被冷落在這間小閣樓上。登記本顯示，在我之前“光顧”它們的竟然只有兩個人。悲哀！

可憐的港台報刊啊，你們當年遇到的就是這樣的命運！

她又不放心地再看了我一眼，然後走下樓梯。

但是，她失算了。因為，她沒察覺到，在小書庫的地板上，其實到

處擺滿著從香港進口的雜誌：有美人圖的，有消閑算命的，有教打麻將的……當然，還有新聞類的。

萬歲！

六二年大逃港的內容，幾乎本本新聞雜誌都有刊載，包括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

所以，我只能這樣告訴我的讀者：不幸中之萬幸，卻是掛一漏萬。

查閱了香港的《星島日報》和各類新聞雜誌，以及後來在香港各家圖書館中的斬獲，在有限的“進口武器”的武裝下，我可以站在深圳河的南岸，來看北岸發生的那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了！

亮了牆邊的電燈，有點昏暗的房間內一片光明。

拂去沉落在裝訂本上的灰塵和碎片，歷史歷歷呈現在我的眼前……

二、逃港大軍撼動香港

為了阻擋“洪流”，港府出動到邊境的警察、軍隊共多達5000人，並出動了上百條警犬，18架直升機。曾有上千警察在邊界手牽手結成人牆，阻擋冒死衝來的群眾。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沒有對人開槍了。

1962年5月3日，《星島日報》赫然打出標題《中共大量放人出境萬人伺機偷渡》：

“由於中共邊防禁閉放寬的原因，麇集於邊界準備偷渡入境者，現已至三四萬人之多。”

洪流般的人群湧向南岸，湧向香港新界的蓮麻坑、打鼓嶺。香港警方頓時慌了手腳。

港方有限的警力要想阻擋成千上萬的偷渡者，簡直就是螳臂當車，不敢一碰。

衝過了深港邊界第一道防線後，偷渡者“如同黃流流向原野”，蜂擁在香港新界的大路上，拖兒帶女，絡繹不絕。

香港雜誌形容：“他們自由自在，毫無懼色，彷彿就在大陸清晨起來上工、平時上鄉開會一般。”“看見警察後，（他們全無恐懼）還上前問去差館（警署）邊（哪）條路去呀？對於警察的拘捕是平凡的事一樣。”

這裡說群眾問警察怎樣去警署，是群眾主動到警署去報到。有一個時期，跑過邊境的逃港群眾，港英政府曾給予安置。

這時候，如果站在香港粉嶺的山頭上，看到的像是一幅大戰役般的場景：在綠色的香港新界的平原上，一股股雜色的人流越過了邊界後，便開始分散，並開始化作股股更小的雜色流，逐步向香港市區分流而去。

人數太多，港英政府害怕了，急忙通過倫敦同中國政府交涉。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採取措施，阻止難民進入香港。

路透社 5 月 23 日發電報：《中共裝聾作啞 拒談難民問題》。

法新社則認為：“相信中共嚴重之農業情況，與對饑荒之恐懼，引起放縱難民出境。”



香港報紙對大逃港的報導

霓虹燈閃爍的香港街頭，徒然湧來了一群群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拖兒帶女的大陸人，彷彿水中陡然沖進來一股黃流。

“他們隨處向人乞討，拉住人的衣衫就不放。走進食店不給吃就不走。”香港原來平靜的生活被攪亂了。

“共產黨放縱難民逃港”，一些右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大罵“共產黨缺德”，“嫁禍水於香港”。

與北京的交涉毫無進展。

5月14日前後，驚魂甫定的港英政府決定放棄“安置難民”，也不再寄希望於與中共的“交涉”，決心自行組織起有效的攔截。

5月15日《星島日報》刊發新聞《當局商定決策 必要時調駐軍加強封鎖》：

“鑒於大陸逃港的難民不斷從新界邊境湧入本港，此間的高級官員，連日舉行會議，必要時將使用軍隊。”

為了阻擋“洪流”，港府出動到邊境的警察、軍隊共多達5000人，並出動了上百條警犬，18架直升機。曾有上千警察在邊界手牽手結成人牆，阻擋冒死衝來的群眾。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沒有對人開槍了。

即使是這樣，也無法阻擋成千上萬的群眾“集團式”的衝鋒。

港英政府不能不採取新的措施，先後通過傳媒對外宣佈，從14日開始，對於湧入的群眾開始採取“即捕即遣”的辦法，不再准於在港停留。即是向外宣佈，不再接受逃來的“難民”：你們不要來了！

原以為這樣一宣佈，凡跑來的必送回去，就可以斷了“難民”的希望，就不再有“大批大陸難民湧港”，誰知還是不起作用，逃港的群眾，還是如潮水一般湧來。

《星島日報》5月14日頭條刊載：《大陸難民改變偷渡路線 昨由平原入境》。

港英政府開始抓人了，偷渡群眾的辦法也在“變”：停止了用“湧”的辦法，採取分散的辦法找佈防的空隙入境。

又載《偷渡深圳河 扁舟任縱橫》：

“精壯之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進入英界後，經拒水坑山、麻雀嶺、

萬屋邊——轉入市區。”

“較為老弱的婦孺輩，多用船偷渡深圳河、入落馬洲、從元朗方面流入市區。”

“每當黃昏，落馬洲對面華界之小丘即出現兩面白旗，不斷在動——接著，多輛木筏，即會載滿蛇客，劃入英界之邊緣。”

《星島日報》5月20日載《飢餓進軍化整為零 萬人沿邊伺機湧入》：

“飢民白天入境，多化整為零。至於入夜後，則為集體行動。每（批）人數近千，最少也有數百。令防守軍警無法阻止。”

“老弱婦孺之輩，由鐵絲網底挖洞，或由橋涵底下穿越而過。”

5月21日，天突降暴雨，深圳河邊境，逃港群眾，無法躲避，但依然冒死泅渡深圳河。

《星島日報》5月21日載《泅深圳河偷渡者日間千名 河現浮屍》：

“從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兩岸河面二三百尺。飢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為多。據泅渡的難民說，現在深圳河裡浮屍纍纍。她在渡河時腳踢到屍體。”

九死一生逃上岸來的群眾，又被香港警方追趕、抓捕。

《星島日報》報導《哨所前竟聞哀嚎》：“大陸難民中，近發現有扶老攜幼、舉家逃亡者……由晨至晚，不少婦女抱子負孫而來，涕泗滂沱，苦苦哀求。見者多為同情淚。”

儘管有大批越境者躲過追捕，進入了香港市內，但據統計，最初大約還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越境者被香港警方抓獲要送返。估計前後總人數達十萬。

十萬難民好抓，但這十萬哭哭啼啼的偷渡者，不是馬上走得了的。至少要同中方聯繫好送人的外交事宜。得在香港停留一到兩日。十萬之眾，如何安置？如何遣返？成了問題。

蝗蟲般擠在香港新界的偷渡者要住、要水喝、要飯吃……就是整個香港，一時趕搭十萬人的帳篷也來不及！

危難之時，香港市民表現了高度的人道精神。由宗教團體、鄉親組織、新聞媒體發起了全港市民“援助有困難的人民”的行動。自發給邊境的逃港群眾送衣、送食、送水。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投入了感人的“拯救”行動。



香港《明報》的社論標題顯示出對大規模逃港潮的焦心

據《金庸傳》記載，5月15日，香港《明報》發表了首篇社評：“‘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明報。狹窄的報館彷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與逃港者，往往有著特殊的親緣關係。不少逃港者就是香港居民的親屬、朋友、同鄉，甚至有的是妻子來港找丈夫、有的是兒女來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來港找哥嫂……有些就是親人指示他們逃來香港的。港英政府實行“即捕即遣”的決定，自然遭到普遍的反對。

報紙、電台，都有港民抗議，一片反對之聲。

但是港英政府堅持“攔截遣返”，毫不動搖！但“出於人道考量”，由於飢餓將斃的大陸難民，長時間都沒吃過一餐

飽飯了，“會讓他們好好吃一頓飽飯，才送他們走。”

《星島日報》在隨後的報道中說：“被捕獲的逃亡者，在凌晨送往和間山訓練營後，必給予飽食一頓。”

港英政府在新界一帶臨時建立了十幾個收容所。草草搭起帳篷，供給一頓豐盛的晚餐。據說，有魚有肉，也有麵包香腸，採取自助餐的形式開餐，想吃多少吃多少。

逃亡者在河北面，連飯都吃不上。“這樣的美餐，不說吃，許多人一輩子連聽都沒聽過”。當年的逃港者告訴我，有許多人就是衝著這餐飯偷渡的。

“逃過去就有餐好飯吃。就是留不下，也飽了一餐肚皮，死了，也甘心了！”他們說。

飢餓至極的人們，放開肚皮猛吃。據說一個姓黃的惠陽農民，一餐吃了八個麵包、十個包子，還加三碗大米飯，吃下去的魚、肉、青菜還不

算。由於暴食過量，第二天死在遣返的車上。

吃過了一頓飽飯的逃港群眾，第二天再被押上汽車，後來是火車遣送回大陸。據報載，僅5月23日一天開出的火車就達五班之多！

為了不被送回大陸，逃港群眾牽衣頓足，對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車！

《星島日報》連發新聞《逃亡後被解回大陸，如出生天再入地獄》、《落馬洲打鼓嶺邊境一婦當堂自刎》：

“割頸之利刀，可能是她隨身所攜帶，可知她早已抱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

《華僑日報》更是報道：《拘留所中哭聲震天，51人不免遣返，難民跪地求情》。

坐在窗前，看到這些報道，才知逃港百姓在那邊的遭遇。如鯁在喉，真想痛哭一場，為求生不得的婦孺、為失去尊嚴的老少爺們。

但更讓人心潮難平的是振動香港朝野，使萬人落淚的“華山事件”。

第二節 感天動地的華山淚雨

一、華山救親與港警大搜捕

華山血淚

此刻的華山，“淚飛傾盆，天地為之悲泣！”

一位記者寫道：“因為哭喚的人實在太多，山樑的地面都打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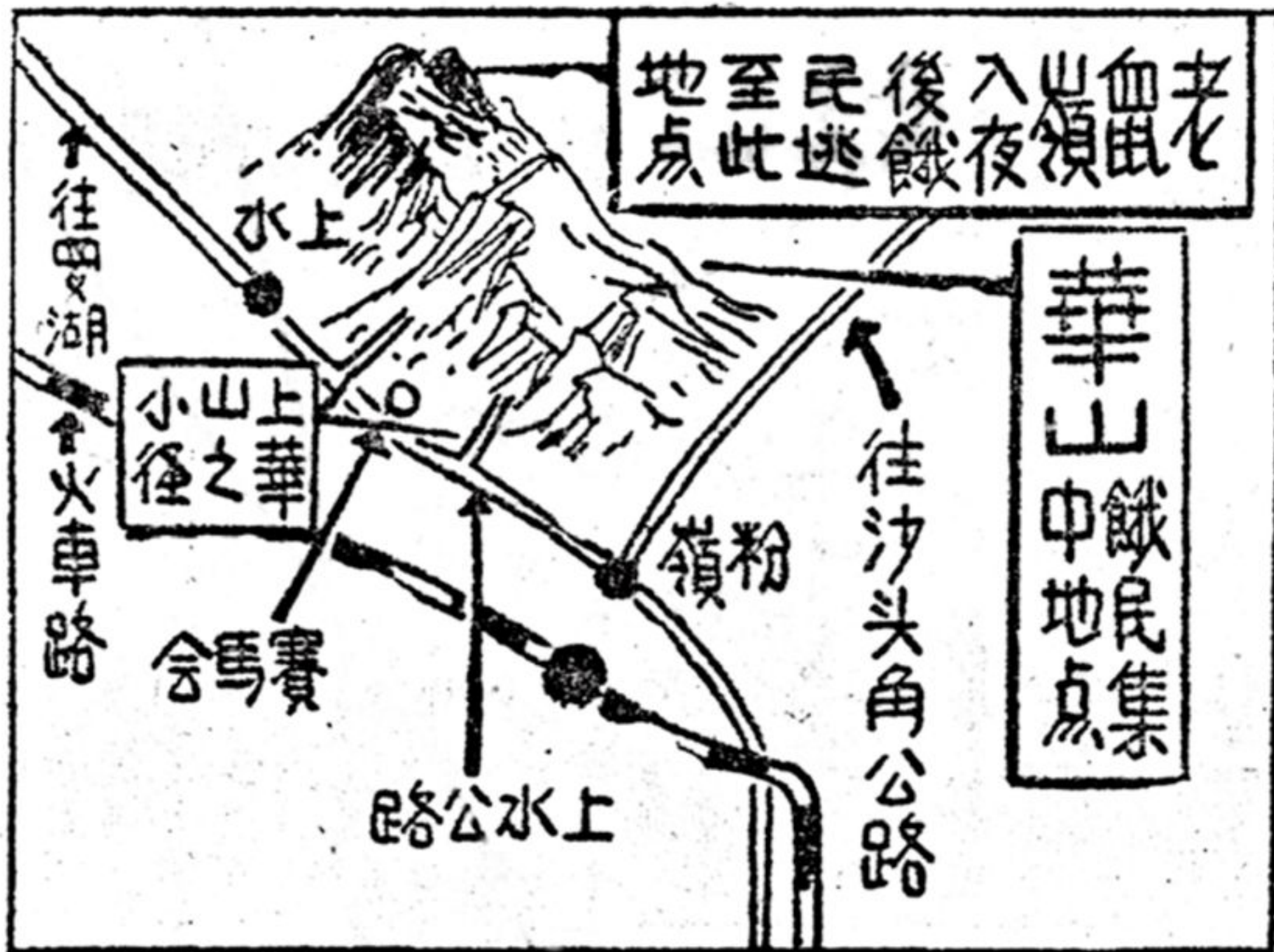
現場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為悲慘的場面感動。有些因此而不聽從命令，寧願站著，就是不下手抓人。

華山距離香港市區尚有一段距離，被亞熱帶樹木遮住的山樑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跡罕至，難得看到幾戶人家。

然而，在 1962 年的 5 月，當越境者的“洪流”沖到了山腳下時，這片寂靜的原始山林，立刻沸騰起來。

一份資料稱，當時“集結在香港市區附近華山一帶的偷渡者，前後人數大約三萬”。

華山由於位置正好在邊境與香港市區之間，成為逃港者進入市區的一個中歇站。在經過了長途的艱難跋涉之後，疲憊飢餓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



華山位置示意圖（見《星島日報》1962年5月17日第二十版）

稍得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的親人接他們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華山，還有一個目的：有眾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應，就是香港警察來了，幾百數千人抱成一團，一時也奈何不得他們。

的確，香港警方對於這些數量驚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驅趕成千上萬的逃難者，警力顯然不足。其次，對於這些手無寸鐵的逃難者，強制的行動有違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強制行動又難以奏效。何況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親人、朋友在香港，稍稍處理不當，引起的法律官司會層出不窮。港英政府感到很難辦。

華山上的逃港者，該不該抓捕？甚麼情況下抓捕？抓捕中會不會出現“執法過當”、抓捕了該不該送回大陸？在港英政府內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人士認為，應該全部接納這些衣食無著的“背叛者”，因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避難”。能夠把“政治避難”者當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樣，“再送回屠宰場”嗎？

據香港傳媒的統計，以一人牽動十個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計算，華山的三萬人就等於牽動著三十萬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說，大約每十個本來在高樓大廈中安睡無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個人要為突然出現在華山山頭上的親人、同鄉、朋友的處境擔憂。

逃港者中不乏聰明人，他們通過記者，不斷把消息帶到了山下。

5月16日，《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列下了一百多名難民在港親友的名字，呼喚這些親友趕快上山來救他們。

消息很快在全城傳開了，整個香港的輿論更加沸騰，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搶救華山上的親人”！

報紙、雜誌、電台，幾乎所有的香港媒體都出動了，一批批記者衝向華山搶新聞，他們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淚下的情景。

南粵的五六月已經進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曬、酷熱難當。成千上萬衣衫襤褸的越境者麇集在華山的山頭上。因為害怕被抓，像小野獸一樣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叢中，一些孩子因為恐懼在瑟瑟發抖。

山路上，年輕點的扶著老父親老母親，頭髮凌亂的婦人抱著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長途跋涉之後，又飢又渴，有人暈倒在地上掙扎，口裡吐著白沫……即將崩潰的越境者們一看到是揹著相機的記者，認為救星來了，頓時，整條山道上的人齊刷刷地跪在地下叩頭求助。哭泣之聲震動草木……

5月16日香港媒體整版整版地刊載發自華山的消息：

“因為害怕軍警抓捕，他們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來到附近村裡人家討要吃的。有些難民已經三天沒吃東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記者趕到該區採訪時，華山打靶場後的山邊，已有數名難民死亡在那裡。他們因風聲緊，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熱天氣中，極度疲乏飢餓。造成死亡。”

“記者曾趕往現場拍屍體照片，但為警戒人員堅拒。”

……

到底怎麼對待華山上的三萬人？議案一次又一次擺到港督的會議桌上。因為不得不下決心對這三萬隻“羔羊”下手抓捕，有港報形容：港督

在公眾場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決策最終還是在爭吵中作出：“依據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難民，只可視為偷渡處理，不予接納。”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陸，以避免事態擴大。”面對悲慘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顯得無情、冷酷！

很快，數千名軍警被迅速調到華山，開始大規模的驅趕和抓捕。由於集結的越境者太多，軍警只能先驅趕，驅散了再抓捕。

一家雜誌這樣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動：“你看過牧羊人抓羊嗎？羊兒太多，太密。所以讓牧羊犬把羊群衝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場去。”

羊兒被衝散了，母親在喚著孩子、老人在叫著孫兒、兒童在哭喊父母……華山痛了，像被塞進了一架絞肉機。

親人像羊群一樣被驅趕，這對香港市民來說，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傳來，工人放下鐵鉗，老闆關掉店門，菜農扔掉籬筐……他們要去華山，去救自己的親人！據統計，自1962年的5月15日開始，前後共有十幾萬人次的香港市民，帶著食品、飲水趕到了華山，與港英政府的強行遣返政策“對抗”！

在這場明地裡的或暗地裡的對抗中，市民用各種方法將華山上的越境者保護起來。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區者不計其數。

據事後估計，華山上的越境者，大約有五成以上，在市民們的幫助下，最後得以進入市區。當然，這與許多警察有意的“抓捕不力”不無關係。

抓捕行動開始後，媒體又做了連續報導。5月17日的《星島日報》刊載新聞《華山被包圍 送糧人不斷》：

“本港親友及見義勇為市民，紛紛自購麵包糧食，到上述地點尋找難民。山頭上，呼兒喚母，一片混亂。”

5月21日《星島日報》上的《弱女散失際 夫妻聚首時》，牽動了所有香港人的心：

“本報專訊。這是中英邊境上一件人間悲劇。一個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尋找他的妻子兒女，會見了他的妻子及兒子，卻失去了女兒。

“前往尋找妻子及兒女的香港居民葉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書，知

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兒子葉慶賢、女兒葉慶英（12歲）已到達邊境。葉若英數日來在華山一帶尋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終於在平泰山頭會見了他的妻兒，但女兒葉慶英在兩日前在紛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蹤了。夫妻抱頭痛哭。”

然而，像葉若英一家的慘劇，在華山上還發生了多少？

——
此刻的華山，“淚飛傾盆，天地為之悲泣！”

一位記者寫道：“因為哭喚的人實在太多，山樑的地面都打濕了。”

現場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為悲慘的場面感動。有些因此而不聽從命令，寧願站著，就是不下手抓人。

試想，誰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擁抱中的親人呢？

香港警察們同逃難者在一起流著眼淚，舉不起警棍。



《弱女散失際 夫妻聚首時》（1962年5月21日《星島日報》登載）

指揮官看看無法調動執行，只好命令暫停對難民的抓捕，回過頭來把重點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命令警察手拉手結成圓圈，不讓越來越密集的香港市民進入山中。

於是，在華山的山頭上，又出現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開，內圈的越境者呼喚著“媽媽——”、“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喚著“女兒——”、“妹妹——”……

相隔數米，不能接近。成千上萬的人同時悲哭，一幅人間慘景！一幕人間悲劇！

但是上命難違，訓詞切峻。兩小時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幾千名警察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強行把一個個緊緊抱在一起的親人拖開。

一聲聲呼號、哭泣再次撕裂華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應該說是被強行拖上汽車。其時，上百輛汽車正排成長龍在山下的路邊等候。

“哥——”

“媽媽——”

“細仔——”

看見親人上車，圈外香港市民的隊伍中又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痛哭聲、叫喊聲。成千上萬的人又尾隨著汽車的煙塵，形成一條條長龍，追向邊境的集中營——

按照當時香港政府的決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營後，給予兩餐豐盛的免費餐，然後等第二天天亮，派車由羅湖橋送返大陸。

夜晚，在集中營的外面，公路上、山邊上，密密麻麻，到處坐著翹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營內關著的是他們的親人、同鄉、朋友……他們苦苦地守在營外。據報載：“滯留（在營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眾。”“他們當晚就在露天臥睡。”

——

夜晚，星星依舊閃爍，樹葉依舊沙沙，牆外人望牆內人，牆內人望牆外人，繁華喧鬧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內，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對華山的事情表示同

情。幾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棄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機、電視機旁，關心著難民營中那些可憐人兒的命運。

一向理性、現實的香港，正被一種強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或許今天香港的年輕一代知道“華山望親”的人寥寥無幾，但對當時的人們來講，這是侵入骨髓的記憶。

二、萬名市民以身阻車隊

萬人截警車

本來分列道路兩旁的人牆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接著，一個、二個、十個、百個——成百的人擋在了路中央。

天，終於亮了。

打開收容營的大門，當遣返偷渡者的車隊長龍開出時，警方驚呆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呼喊聲向車隊壓來。

綿延數公里的路上，集結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萬市民。他們中有不少是趁著微明，從市內驅車趕來送親人的。

他們大多手裡還拿著準備送給親人的餅乾、麵包、糧袋。

當汽車駛出營門，人們不約而同地呼喊著親人的名字。

上萬人的呼爹叫兒，是個甚麼情景？也許比杜甫筆下咸陽橋“哭聲直上乾雲霄”的場面更浩大，更悲慘吧。

香港新界一帶的山林、大地都在震動！

“你們要走了，你們又要去受苦了！”

有人在車中找到了自己的親人。於是，把手中的糧食紛紛向車上拋去——要是被送回去，就把這點糧食也帶去吧，帶到惠陽，帶到東莞，帶到潮汕……給白髮的親娘、給病中的老爹，給那個一把米就能救活一條生命的村莊！

霎時，公路兩旁糧袋齊飛、淚雨傾盆。

——



萬人華山尋親，演出催人淚下的一幕。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機你慢慢開啊，讓我們再看親人一眼！車上的司機似乎理解親人的心腸，他們真的把車子開得很慢。於是，車隊就像是一條懶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動……

但是，司機的心腸再好，車開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還是要一寸一寸地把親人帶離香港。

就在車隊緩緩前行時，又一個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場面出現了。本來分列道路兩旁的人牆中，突然有人衝到了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接著，一個、二個、十個、百個——成百的人擋在了路中央。幾十輛汽車，像一條癱軟了的長蛇，停了下來。

“跳車——”

“跳啊——”

人牆裡有人發出一陣陣呼喊。

車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紛紛從車上往下跳。

人群中暴發出一片歡呼之聲。場面亂了。



左圖：“難民”在勞苦奔波後憩睡；右圖：港英警察在詢問“逃難”兒童

過了一會，被驚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這樣下去，場面將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須施行強硬措施！

於是，隨著哨令，大批武裝的軍警防暴隊被調來，強行把躺在地下的人們拉起，驅趕人群。

長長的車隊，在淚水和慘痛的哭喊聲中，又強行穿過人牆，向深圳河北岸緩緩駛去了……

逃港者上車走了，香港警方鬆了一口氣。

然而，石湖墟收容營地上的淚水還未乾，在市區、在邊境的叢林中，在深圳河邊樹蔭籠罩的小村莊裡，一個個越境者的慘痛的故事，還在上演著……

第三節 梁成功九龍寨奇遇

接下來的這個故事，發生在香港九龍寨（文中人名做了改動）。

華山上的淚水，並沒有打動到他的心，他的心，已經死了。

用梁成功自己的話來說，他要痛的，都痛過了。

他用不著那麼關心，因為他沒有親人，也不可能有親人從河的那邊來投奔他了。

當人們都趕去華山時，街道上彷彿安靜了許多，梁成功就喜歡這種安靜，一個人的孤獨的安靜。

他是大陸廣東惠州百花鄉人，說得更準確一點，他應該是福建人。他們全家是在十二年前隨母親逃到惠州的。

梁成功還記得，就在泉州城裡到處是一片紅旗的海洋，到處都飄蕩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時，他的父親，印象中，一個長得魁梧結實、個子高高的人，被捆走了。那年他十歲，弟弟七歲，最小的妹妹才四歲。

梁成功更記得後來的情景：那大約是5月後的一個黃昏了吧，是1950年的上半年。媽媽正披頭散髮地對著門口望，一個人推門進來，嚇得妹妹緊緊地摟住媽媽。

“行了！你們去吧——”那人洶洶地對媽媽說。

母親抱著妹妹，梁成功也莫名其妙地就牽了弟弟的手，天色昏暗暗。他們跟著母親走，走。

風在呼呼地吹，颳得路邊的草叢發出一聲聲尖叫，四周冷颼颼的。

他們很快到達了城邊的一片空曠地。空曠地周圍已經沒有人跡。幾聲鴉叫，老樹上貼著白紙標語：“打倒罪大惡極的梁忠誠”、“鎮壓反革命，人民得安寧”。

父親的名字上還打了一把大大的紅叉叉。

母親猛然爆發出一聲絕望的慘叫。原來，就在路邊的一叢草邊上，躺著一個人。母親發瘋似的朝躺在地上的人撲去，彷彿一頭絕望的母狼。

梁成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人就是父親。他的身旁，流著一大攤血。

“快點，快，就要拉走的了——”旁邊一個人朝母親吼著。

母親趕快拉著梁成功和弟弟跪下。梁成功和弟弟都跪了，都哭了。只有妹妹，好像甚麼都不明白，只是死死地揪住母親的衣服，她大概以為她的爸爸還像以前逗過她之後睡了，驚恐的大眼睛看看媽媽又看看地上的那個人。

媽媽把爸爸被血浸透的衣服脫下來，換上一件帶來的乾淨衣服。

“行了，行了——”旁邊的人吼著，一人拖著爸爸的一隻手，像拖一條死狗一樣把爸爸的屍體扔到一架板車上。有人拖著車走了。

“忠誠——”媽媽慘叫著。

“爸爸——”

他還記得他們幾個和媽媽最後的慘叫聲。

在梁成功的印象中，自那以後，他們就搬了家，沒有在以前那間大房子裡住了。新搬的地方是巷子中的一間小屋，媽媽在門口擺了一隻茶几，放著一些針線、鞋底。但是，小巷子裡也不會安靜，有時候會有人進來，把一些信紙類的東西拿給媽媽，要她填寫。那是街道的幹部來檢查的。

有一天晚上，媽媽突然對正在做功課的梁成功說：“孩子，我們不能在這裡住下去了，我們到另一個地方去。”

汽車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停下來了。媽媽告訴他，到了廣東了。這地方，叫惠州。

媽媽牽著他們的手，走到一個偏僻的山村中，弟弟再也走不動了。要找人家吃飯。

“就是這裡吧。”媽媽說。他們就這樣在一個偏僻的山村中住下來。

這兒——惠州的百花鄉，成了他們的家。

離開山村二三里地，有一個小學校。梁成功和弟弟便在那兒上學了。

有一天，他們放學回家時發現家裡來了客人。一個腿上黑紅黑紅的男人用甜薯乾逗著妹妹，一個胖胖的女人在一旁望著妹妹傻笑。不知為甚麼，梁成功恨死那兩個人了。

不到兩天，放學回家的兄弟就發現，每天都守在門邊等著哥哥回來的妹妹不見了。媽媽告訴他們，妹妹跟那兩個人走了。

“媽媽給妹妹找了個好去處，他們是貧農。你妹妹可以一輩子過安生日子了。”

每逢到過年過節，兩兄弟還會想著他們的妹妹，希望媽媽能把妹妹接回來，但是媽媽不肯。離他們很遠的一個地方叫淡水，兄弟倆知道，妹妹就在那個地方。有一天，兄弟倆沿著蜿蜒的山路去找妹妹，讓母親追到半路追回來。媽媽死死地打了他們兩人一頓，叫他們發誓不再去找妹妹。

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繼成立，戴著反革命家屬帽子的母親總是幹最髒最苦的活：插田，人家任務一天插三分，反革命家屬就得插半畝；大煉鋼鐵的時候，母親被驅趕著挑鐵礦、揸樹……全勞力的男人一天挑多少揸多少，母親一天也要挑多少揸多少。

那時候，小學生被組織起來為煉鐵爐做煤球，兩兄弟都來到鐵場上。看到疲憊不堪的母親，抬著同瘦弱的她一樣粗的樹木，力不從心地一晃一晃，兩兄弟心裡頭都在滴血。

有一天，召開公社學生“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誓師大會。一件他們想像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鄰公社一個幾歲的小女孩上台表演背誦毛澤東語錄，大人提上句她就能背下句。台下一片鼓掌聲。看著看著，梁成功的眼睛瞪大了，那個站在台上的貧下中農小女孩，多像是妹妹啊！兩兄弟猛然喊起來，那是我們的妹妹啊！

會場上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遮蓋了他們的喊聲。等到兩兄弟追到台下，看見四周到處是來歡呼妹妹的人。儘管兩兄弟喊啞了喉嚨，妹妹還是聽不到。她被一個戴著紅花、滿臉堆著笑的農民抱走了。

梁成功認識，那人不是別人，就是他最恨的、那年到他家來給妹妹甜

薯乾的那個農民。

回去之後，兩兄弟把看到妹妹的事情告訴了媽媽，媽媽開始是流淚，後來不傷心了，把淚擦乾，反而笑了：“你妹妹有出息了！”

照大陸的規矩，做了貧下中農的孩子，以後就能上大學，過好的日子。

母親是 1960 年去世的。臨死前，她把兩個兒子叫到床前，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欠人的錢糧、受人的人情、還有生產隊的工分賬都交代了兄弟倆後，母親說：“孩子，媽還有一件事，要交代你們。”

兩兄弟熱淚橫流說：“媽，你放心去吧，我們知道是甚麼事了。我們不會去找妹妹的。”

母親點點頭，去了。

沒有了母親的家，彷彿空了。每當下地回來，推開門，第一聲，還是叫的“媽——”但是，屋子裡空空的，已經再沒有媽了。

妹妹沒有了，母親也沒有了，用鄉下人的話說：“水桶沒有了箍了”，家要散了。百花鄉也不是自己的家鄉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對於這兩個少年來說，已經不存在了。

有一天，弟弟對哥哥說：“哥哥，咱們跑吧！跑香港去！”

兩個少年就這樣揹著兩斤炒熟的米，翻上了梧桐山的山頭。

1961 年 3 月的那個晚上，梁成功和弟弟順利地穿過了深圳河邊的蘆葦叢，當他向深圳河衝去時，聽到身後狼犬“嗖嗖”穿過蘆葦的響聲。

完了！他的頭腦中猛的一個感覺。但是狼犬沒有朝他來，他聽見的是弟弟的一聲慘叫。

他平安地過河了，回過頭，站在深圳河的南岸，他看著那個黑洞洞的原野，呼叫著：“弟弟——弟弟啊！”

無論是怎樣撕肝裂膽的哭喊都無濟於事。弟弟被狼犬旁的兩個穿軍裝的人拖走了。

梁成功是成功了，他順利地到達了香港，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證，在一個印染廠打上了一份工。但是弟弟沒有了。

半年後，得到了一個叫他傷心又叫他慶幸的消息：弟弟沒有死，他被

關在韶關的一座監獄裡了。“十六種人”——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加上他們的直系親屬，如果有偷渡行為，罪加一等，要被判刑的。

媽媽死了，弟弟關監獄了。妹妹改了姓跟了別人了，他梁成功還有甚麼希望呢！

他，梁成功，可能永遠都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了。

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每當從工廠做完工回來，他就躲到幾平方米的棚屋裡。把雙手枕在頭下，看天空的月亮發呆。

他太孤獨了，太需要人的撫慰了。有一天，他終於走進了九龍寨的閣樓，在陌生的女人的溫撫中度過了他處男的第一個晚上。

從此，他發覺自己上癮了，像是賭棍迷上了牌桌、煙棍迷上了煙槍。一到發工資的那天，他就要揣著僅有的幾個錢，到九龍寨去走一遭。

華山的事鬧得整個香港都地覆天翻時，他卻很平靜。

他的命太苦。也許，他所有的人間情感都在大陸的那些年月中流盡了。

正如他說的，“那是別人的事了”。他不願再想大陸的任何事情。

街上很少行人，好像安靜了許多。也許人們都朝華山去了。

商店都關著門，他熟悉的那家轉著紅燈的小店，門竟然開著。

“哎呀，是梁老闆呀——”“媽咪”就迎了上來，生意不好，老鴿特別地親熱：“快，芙蓉。三妹、春梅——快都出來”。立刻有三四個花枝招展的女人排了過來。梁成功拿眼睛瞟了一下，順便就點了一個年輕點的：“就她吧——”

“媽咪”連忙趕上來：“梁老闆真好眼力啊。紅妹最年輕，是80蚊（元）的啊。”

“隨便吧，80就80——”梁成功煩躁地說。

“媽咪”把梁成功引上了樓，門上粉紅色的看板亮著、旋轉著。裡面的房間卻十分陰暗，

房間頂上的燈放著粉紅的光，叫人一進去就感覺軟綿綿的。“媽咪”把空調開了：“梁老闆自便。”便轉身出去，順手把門關了。

那叫紅妹的還站著不動，似乎還羞答答的樣子，梁成功把她的手拉住了，牽到身邊來：“你不要怕，好快的，一會我就給你錢了。”

梁成功發現她的身子在發抖，像個剛入道的。

“你是才來的嗎？”

她很怕，半天才吭了一個字：

“是——”

“甚麼時候？”

“昨天。”

“啊，那你是從山上下來的囉——”梁成功說的“山上”就是華山。

那女子點點頭。

“你是哪裡人？”

“惠陽。”

梁成功翻身就從床上跳起來：“甚麼，你——惠陽？”

難道？他盯住發著抖的紅妹，啊，不是，不是妹妹。

他仔細看了看，不是，不像。

他此刻真有一個奇怪的念頭，要是面前的紅妹是妹妹倒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她。

不知為甚麼，梁成功突然又輕鬆地噓出一口氣：“你過來，不要怕，過來——”他把紅妹拉到身邊來了，開始輕輕地解開了她的衣扣。當紅妹的衣領揭開以後，梁成功驚呆了。不是被雪白的頸項驚呆了，而是被後頸項的一塊疤！那是母親抱著妹妹在福建老家烤柴火時，不慎被柴火星燙出來的。

他記起了那個在台上背毛澤東語錄的小女孩。

“妹妹啊！果然是你啊！”

——

後來據 1962 年 6 月 27 日《星島日報》報道：

“……兄妹抱頭大哭。才知其妹以四百元的代價賣與鴿母。乃與鴿母商量救其妹出火坑。終以港幣四百元贖回其妹。”

——

梁成功意外找到了妹妹的事情，很快像風一樣傳遍了香港。各個報紙、電台紛紛來找他們。有些公司還特意要以高工資聘請他們兄妹去上班。梁成功只好同妹妹躲到了一個同鄉的閣樓上，避開人群。

據一位香港雜誌的記者說，他們最後還是被接去了台灣，在那裡開了一家小餐館。因為不少人來看他們兄妹倆是個啥樣，小餐館的生意很火。

不過，此刻，我們已沒有時間去追尋他們後來的故事了。因為 1962 年的 5 月 26 日，深港邊境上，一件更大的、更慘絕人寰的事件發生了！

第四節 暴雨下的冤魂

一、邊界大慘劇

洪水吞噬逃港大軍

“前晨一股洪流捲去無數難民。據住在落馬洲的鄉民說，26日發現的浮屍有126具。昨天，經過了24小時以後，被水沖去的難民屍體，紛紛在深圳河的下流浮起被發現。隨潮水退落後飄出後海灣的，為數至少在200具以上。”

“天堂邊緣的深圳河，昨日在山洪如注、暴雨勃發下，竟成人間地獄。”1962年5月27日《星島日報》上的通訊《伏匿邊境外千餘難民俱身陷洪流中》開頭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

“昨日邊界一帶豪雨如注，連降幾小時。打鼓嶺河邊一帶約八尺高的鐵絲網，被淹沒僅露出尺許。深圳河水迅速向兩岸氾濫，陣陣驚濤駭浪向河岸鐵絲網外難民衝擊。一時驚呼喊救之聲，淒厲呼聲四起。沿岸千餘難民均身陷洪流中掙扎。”

深港兩地搭界的邊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從北流來，在深港邊境之間形成了一個鍋底。歷史上，深圳河不下暴雨則已，一

且暴雨，大水就從北面的山上如猛獸直沖向邊界，短時間內就把香港的新界變成一片汪洋。不知吞噬過多少新界的稻田和蔗林！

偷越邊界的群眾，過了邊界深圳河後，再橫過一條簡易的公路，便會遇到一條長幾十公里的鐵絲網。由於有英軍把守巡邏，白天不易翻越。便常常在鐵絲網下的這條簡易公路上停留歇息，等候夜的來臨。

而這裡，正是山洪暴發時，洪水衝擊力最大的鍋底。

據報載，5月26日凌晨二時許，沙頭角打鼓嶺群山間的山洪下泄，深圳河陡然氾濫。伏匿在鐵絲網外上千名難民，一時奔走不及，身陷於狂流急濤中。

人命關天！出於人道，英方軍警奉命啟開邊界鐵絲網閘口，讓狂流中的難民入境。但僅有半數人幸獲脫險。其離閘口較遠者，則唯有攀登高地或樹頂躲避，老弱則多被洪流吞噬。

第二天天明，有村民發現婦孺老弱屍體共十餘具。打鼓嶺公路側邊，則有青年屍體兩具，年約三十歲左右，很可能是在大水中因力竭被溺至死。

災情之慘，邊境鄉民都不忍心詳述。

——

兩天後，更多的屍體被找到。《星島日報》5月28日刊發長文：《深圳河畔難民異鄉魂斷 慘見二百浮屍在深圳河下游浮起》：

“前晨一股洪流捲去無數難民。據住在落馬洲的鄉民說，26日發現的浮屍有126具。昨天，經過了24小時以後，被水沖去的難民屍體，紛紛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發現。隨潮水退落後飄出後海灣的，為數至少在200具以上。”

“居住在落馬洲禁區的鄉民說，從浮屍穿著的衣服來看，顯是逃港的難民。浮屍有男有女，還有兒童。鄉民只能目睹這些屍體流向後海灣去。因為撈起這些屍體會惹來麻煩。”

依照傳統的說法，被溺死者的屍體，通常需要在一對時（即24小時）方能在水底腫脹浮起。所以，“昨日沿深圳河果然又發現大批浮屍”。

“最慘者係屍體中有年約三十歲的少婦，揹著一歲許男孩，齊被溺死。浮屍中亦有兩三人攪作一團的。可見死前曾在水中掙扎。”

……

如此人間悲劇，真叫人鑽肺穿心！

這一幕幕慘劇發生的情況是怎樣的？剛剛越過了邊境線的難民當時究竟遇到了甚麼？他們為甚麼沒有退回北岸去？香港警方有沒有營救他們？……筆者想了解。但非常遺憾，沒有找到有關那場暴雨時邊境情況的報道。

筆者曾為此而不解，這麼慘烈的一幕，為甚麼香港的報紙不報道？這不是他們最要追採的新聞嗎？

後來明白了：身在海邊的人便知道，南海邊的接天蓋日的颱風暴雨來時，是何等的可怕。如果報社此時派遣記者捲到暴雨洪流中去採訪，那是叫記者去找死！

鐵絲網“鍋底”下肯定發生過種種的人間慘劇，但是它卻永遠塵封於水底，不被人知曉……

——

深圳香蜜湖有個“名人俱樂部”，旁邊是“水上樂園”，每到週末，不少香港、深圳的企業界、金融界、物業界的知名人士都來這裡玩。

於是筆者得以認識他——香港金通公司的總經理葉小明先生。

坐在游泳池邊，我同他攀談起來，無意中問他甚麼時候開始學游泳的。

他的回答叫我吃驚：

“學？還用學嗎？”

我不明白。

“我是在62年那次大外逃中，在鐵絲網下學會游泳的，才16歲。”

天啦，1962年5月26日那場大雨，能從鐵絲網下逃出生天的，全香港也難尋啊。

難道是死在鐵絲網下的那些冤魂死不瞑目，讓我得以遇見他？

——

當他知道我不僅清楚那場暴雨，還能說出是幾月幾號，降水多少多少厘米時，“哇！你好嘢——”他向我豎起了大拇指。

“行，我話俾（說給）你聽——”

二、飢餓，你懂得是甚麼滋味嗎？

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個山頭，都被挖蕨的人翻了個遍。最後蕨根也吃光了，吃甚麼呢？

“陳記者啊，你懂得飢餓是甚麼滋味嗎？”葉小明突然問我，然後接著講：

離粵北的南雄縣縣城二十幾里地，有個小小的村子。村前有一條石板道，據說是當年從內地通南粵的必經之路。那就是有名的“梅關古道”。我們一家，就住在梅關古道邊的小村子裡。

我在 1958 年底失去了父親，他死得很慘，慘啊。

1958 年那陣，不是搞人民公社、煉鋼鐵嗎，我父親就被公社派去專門燒高爐，煉鋼鐵了。後來告訴我們說，父親出事了！

出甚麼事呢？你想都想不到。那時加礦石要爬到爐頂上去往下倒。他沒日沒夜地幹，太疲勞了。在夜班的時候，掉到鐵爐中，骨灰都找不到了。

人沒了，大隊補助了我家 50 斤糧食。又給我們家發了一本漂亮的紅殼面的“烈士證”。

那年，我 12 歲。

沒想到，苦難的日子還在後頭。

1961 年的冬天，全國都鬧大饑荒，每人每天只分吃三兩米。

在今天，三兩米對於一個需要減肥的太太來說，也許是夠吃的數字。可是，對於當年那些頂著烈日上山揸樹、下水耙田幹著重體力活的農夫，還有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孩子，那是肚子角也塞不滿的數量！

真正的飢餓是甚麼滋味，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一輩子都體會不到。

我還記得人民公社“吃食堂”時的情景：

在掛著“公共食堂”木牌的牆壁上開了一個框洞，用來賣“鉢子飯”。食堂外，早已是排著長隊，站滿了提著籃子、仰著頭望著蒸籠上冒出的熱氣的你擠我擠、飢餓難耐的人們。

蒸飯的大甑打開了，冒出一股更強的熱氣，於是所有的足尖都踮高了。

裡面一格格擺滿了隊列似的鉢子——所以農民把“吃食堂”稱為“吃鉢子飯”。

“拿票來——”炊事員叫著。

隊伍便開始騷動、喧嚷起來：“接我的——”“接我的——”一隻隻手臂高伸，伸上三兩、四兩的飯票——大隊按每人一天三兩的標準，把飯證預先發到每個人的家裡。炊事員順手接了飯票，用一條一寸寬的竹片，在飯鉢裡一刮，飯鉢中的飯便鼓了出來，倒在伸上來的籃子中，喊：“下一個——”

滿身汗味的婦女、小孩吼叫著：“不要雙蒸的，不要雙蒸的——”

甚麼叫“雙蒸的”？你不知道吧。

那時，糧食不是不夠嗎？公共食堂於是想出個“新”法子：把飯“雙蒸”，讓飯變多。就是飯蒸熟之後，把它涼了，再放回蒸籠裡蒸第二次。二兩米一鉢的飯，經過這麼一加工，竟然脹出來滿滿一鉢。

可是，“雙蒸”之後，“量”雖然多了，“質”是依然不變的，塞進肚子裡，轉眼便化了水了，一泡尿就拉走了。

肚子還是餓呀！

吃不飽飯的農民不願意下地、不願意上山挖鐵礦、不願意加班煉鋼鐵……

後來就用軟的，用另一“招”：吃“憶苦餐”。

甚麼叫“憶苦餐”呢？

叫人想方設法弄來幾十斤大米，做了飯。又到野外弄來幾大筐野菜，都先藏好了。

大隊幹部先在台上憶舊社會的“苦”：說舊社會怎麼沒飯吃，怎麼餓死人……

但底下人頭攢攢的農民兄弟肚子餓，早聽夠了，守不住了，於是喊：“別憶了！別憶了！快開飯吧！”

大隊支書說：“慢！大家在享受社會主義優越性之前，還要先吃一個東西。來——”他招招手，於是從裡屋抬上來兩大鐵鍋的野菜糊糊。“這叫憶苦餐，吃了憶苦餐，永遠跟著黨！”

大隊書記自己首先盛了一大碗，“吃——”，然後是共青團書記、然後是黨員、團員……都要吃。

群眾還不動，“不吃嗎——”大隊書記敲著鍋邊：“不吃的不給白米飯！”於是都動了。

當所有的人都吃過了一碗“舊社會”後，才能吃上一碗無鹽無油的白米飯。

到堂的人，把一碗白米飯都吃過了，抹著嘴巴，卻依然蹲在地上不肯走，說是“社會主義優越性”還沒享受夠。

第二天，農民依然不動，不肯上工。絞盡腦汁，甚麼辦法都想盡了。

食堂再也沒有辦法辦下去，於是，給每人分一斤兩斤救命的米，各自回家去“度荒年”吧！

——

“度荒年”這個詞，也永遠留在我遙遠的記憶中……

上山去揪幾把樹葉來，在鍋裡放一把米，倒一大鍋的水。一家人“呼呼”地喝幾大碗。後來，最後的一把米都沒了，就只能放些紅薯根根，喝著水粥，我一夜要起來三四次。

後來，就到山上挖草根吃。

山上能吃的草根很多，有一種蕨的根，是有很多澱粉的。要是把它挖回來，曬乾了，剝去皮，放在水裡搗碎了，就有一些白色的漿出來。沉澱了漿，就可以在盆底留下白白的東西，那就是當年救了許多人性命的蕨根粉。

那年頭，學校也不開課了，說是毛主席教導我們“勞逸結合”。我每天的時間就是隨著母親上山挖蕨根。

但是，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個山頭，都被挖蕨的人翻了個遍。最後蕨根也吃光了，吃甚麼呢？

於是有人開始吃樹上的樹葉，吃樹皮……

有的幹部對群眾說，牛馬能吃草，那人就也能吃草呀。紅軍長征不就吃過草嗎？還吃皮帶呀。就把青草割來，切得碎碎的，在鍋裡煮，滿屋的草汁味後，鍋裡就出現暗綠色的糊。

吃著草根、樹葉的人們，往往會患上一種叫“水腫”的病：一身浮腫。腿肚子上一按一個凹，最後轉移到臉上，臉面浮腫……得了水腫病的人，全身就像飄著的。

“我永遠忘不了了一件我一世都感到懊悔的事。”葉小明回憶說。

那時，上頭撥出了一批黃豆發到農村，每個水腫病人分到幾兩黃豆救命。

天已經很冷了，家裡搭了一個烤火的地灶。怕冷的母親蜷縮在灶火邊上。火上放著一個小罐，在“咕咕”煮著發給她治水腫病的一點黃豆。

我從外面回來，肚子餓得直叫，揭開火上的罐蓋，立刻冒出一股誘人的香味：哎呀，黃豆！我要吃黃豆。

母親憐憫地撫著我的頭髮，“孩子，吃吧，留給你的。餓了娘沒甚麼，別餓了你。”

我那時候還小，懂甚麼啊，就這樣把給母親救命的一罐黃豆全吃了。

“我為甚麼會那樣？我當時為甚麼就不會想想母親比我更需要？”葉小明責怪著自己，聲音哽咽地繼續回憶。

母親的病是越來越重了。

一陣陣風言傳來，說是鄰縣有人頂不住餓，吃“觀音土”——一種白白的黏土——腹脹死了。大隊幹部拿喇叭筒既叫社員不准相信“階級敵人的鬼話”，又警告社員不能吃“觀音土”。

一個個的村莊，死氣沉沉地臥在秋冬黃色的陽光下。乾冷的風吹過寂靜的原野。沒有人聲，也沒有犬吠，真個是“千里無雞鳴”啊。人們蜷縮在一幢幢的泥土牆後，等待著死的到來。

這也許就是最後的時刻了……

此時，有一個消息傳來說：深圳那邊開了口子，“英國女王大赦”，允許難民到香港去！

這簡直是救命的消息啊！

轉眼間，全村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隊支書和地主分子，和氣融融地都聚到一間屋裡，相互商量著跑香港尋活路的問題。轉眼，又是二叔父、三弟、表姑……叫開了。

原來，所謂的“階級鬥爭”，所謂的“親不親，階級分”，是人弄出來的啊。

人們都決定趕快過寶安去，說就是在那裡放人的。可是，我家怎麼走呢？母親還浮腫著在床上起不來。

為了讓母親能夠起來走路，我記得，我平生第一次“偷”了別人的東西。

我在鄰村偷了別人一隻雞，扭死了，謊稱是在路邊撿的死雞，燉了讓母親吃了下去。

有人說，富裕人家，吃甚麼都不補，貧苦人家，吃甚麼都是人參。母親晚上吃了，第二天就可以起身走路了。

於是，我們隨著逃荒的人上了路。

大路上，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牽的牽、扶的扶，大到六七十歲的老人，小到抱在手上的孩子，絡繹不絕……

我們終於走到了寶安縣，順利地到了梧桐山腳下。

記得我們到達深圳的梧桐山那天，可能是後來大雨的先兆：奇熱！好多人都坐在地上，光著膀子等太陽下山。當時有人傳來話說：你們夜黑了再跑，避免政治影響；放你們一條路，到了那邊，也不要講社會主義不好。

有人聽了，就舉著拳頭喊：共產黨萬歲！有人就要打他。

大家正議論著，忽然間，天上起了一團團烏雲，大風從遠處“呼啦啦”颳過來，揚起一串串塵土。要下雨了！

山上的人都歡呼起來：好啊，好啊！

下雨正好偷渡，不但這邊不管，過去後，大雨中，香港的警察警戒也會鬆懈，不方便抓人了。

“但是，我們沒想到，那雨，會越下越大，越下越暴！”葉小明慢慢地回憶著，神情變得越來越嚴肅起來。

三、鐵絲網下的冤魂

香港崛起的“真相”

“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甚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著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

眼淚，用血創造出來的！”葉小明眼睛閃著憤怒而又堅定的目光。

“好，以下講暴雨的那一段吧。”坐在游泳池邊的葉小明對我說。

那雨點噼噼啪啪地打下來。大家全身都濕透了，但都好像沒感覺似的。就聽見有人喊，下大雨啦，下山啊，好機會啦——

人們就像潮水一般朝山下湧。

邊界上是一片菜地，我們種莊稼的人，平時看著鮮嫩嫩的蔬菜都會繞著彎走，但那時，誰還管啊，甚麼菜地，甚麼白菜、青菜，稀裡嘩啦都踩在腳下。

突然聽見前頭有人喊：“走這邊，走這邊。”是幾個當地人，好像在給我們指路呢。（據了解，的確有村民給逃港的群眾指路，當時是想把群眾引出去，以免到村中生事——作者註）

羅芳村的那個出入口有個小門，還有個小石橋。大家紛紛從那個口子朝河邊上湧。

出了口子，就到了深圳河邊上了，一個崗哨也沒有。只聽見一片水響，大夥都下了深圳河。

過了河，我們的面前出現了一道很高的鐵絲網。

我那時小，記得有兩個我那麼高。我扶著孱弱的母親，望著那麼高的鐵絲網：這怎麼過得去啊。

我們正著急，就發現有人不知哪裡弄來的鐵棍在撬鐵絲網的孔。那小孔撬著撬著就越來越大了，但速度慢，又聽見那邊有人在喊，“快啊，來啊，一起用力啊，推倒它！”就有幾十個大人一二三喊著推那鐵絲網。鐵



深港邊境的鐵絲網下有過多少冤魂

絲網一晃一晃的。但還是沒倒。很牢的。

這個時候，颱風雨來了！

只聽見“呼——呼——”，飛沙走石，大風中，感到人的身體都在晃動，母親瘦弱得像紙糊的身體搖晃得更厲害。

你知道南海的颱風雨有多厲害。樹都拔得出。“呼——呼——”，地上的石子都給吹著跑。我聽見路邊的樹枝“咔嚓、咔嚓”地被折斷。

“媽媽，媽媽，你扶著我。”我們母子摟在一起，貼得更緊了。

那時天還沒有完全黑，西邊天上還有點光。南邊的天上烏雲一滾一滾地湧過來，“噼噼”一道電閃，天上像亮出來一棵好大的樹枝，接著，我猛然感到臉上一顆顆冷的東西，打得好痛。我一摸，是雨。

這時就聽見到處是一片“噠噠噠”“啪啪啪”的聲音。就像是看電影時，槍彈打在地上的聲音。好大的雨啊！

天上像是在倒水下來了，一盆又一盆。就聽見媽媽抹著臉上的雨水在喊：“孩啊，要當心啊，下大雨了啊——”

南方的暴雨，河水說漲就漲。我們剛渡過的那條深圳河的水，轉眼就漲起來了。

糟糕的是，當時我們就在那個“鍋”的“鍋底”。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河水一分一分地漲了上來，淹過了路面、淹向我們……還沒等我定神，那大水已經就淹到了我的腳底，很快漫到了我的小腿肚！

環顧周圍，前邊是鐵絲網攔著，後面是水追上來了。我扶著病體孱弱的媽媽，往哪跑啊！沒有路，心就慌啊。

難道真要淹死在這啦？

媽媽抱緊我的頭：“孩子，媽媽在，你別怕，你抓緊我啊！”

四周一片漆黑，躲水的人群一片混亂、一片害怕的尖叫。

媽媽拉著我的手突然鬆了。

媽媽，媽媽，你在哪裡？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四處撈媽媽。

就聽見媽媽就在附近喊：兆達，我在這！快過來，這裡有洞了！我以前的名字叫兆達。

過去一看，果然，鐵絲網被人撬開了一個大洞，我和媽媽浸在齊腰的

水裡，終於鑽過了洞。謝天謝地！

這就到了香港的地帶了！我們過了一關！

過了界，前面就是英國兵的崗樓，我們又擔心英國人抓我們。

感謝上帝！也許是英國兵良心發現，也許是下暴雨他們也沒法出門，一個英國兵都沒出來攔我們。

真是謝天謝地啊！我們快要得救了！

可是這時，情況更危險了。雨，下得更大了，水，四周的水一個勁地猛漲。我們周圍，到處是水，望也望不到邊。

“媽媽，媽媽，”我叫著，心裡害怕啊。

這時大水已經快淹過我們的腰部了，要再漲，我和媽媽就沒了。

媽媽拿手死箍著我說：“孩子，咱娘倆今天要死就死在一起了！”

就在這快要絕路的時候，我發現前面有棵樹。

這簡直就是救命的靠山啊！

“媽媽，快來，這邊有樹！”我猛喊。

好多人也都朝那株大樹露在水面的枝幹蹣去。抓到了樹枝的，都拼命地往樹上爬。

但是水一波一波地湧過來，在水裡走路，挪不開步子，猛地一陣水波湧來，把我和媽媽分開，媽媽又一把抱住我。千幸萬幸，我們終於捱到了那棵樹的下面。

媽媽就對我說：“兆達，快，你先上啊——”

我一看，樹的上面已經坐滿了人，再擠上一個人也難了。

媽媽半截身子在水中，求著坐在樹幹上的人：“大哥大叔，拉我們一把吧——”

大概是怕擠了他們的位置，樹上那麼多人，竟然沒一個人伸手。

媽媽還在求他們：“做做好事，我不上，拉我兒子一把吧——”

我也沒等他們拉，就強行爬了上去，把樹上的一個人擠得晃了兩晃。我聽見大概是那人的家裡人在痛罵：“你擠他！老子揍死你！”我的頭上、背上早挨了幾拳。

我不動，也不覺得痛，我寧可被他們打死，也不會下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廿八日

深圳河畔難民異鄉魂斷

(本報專訊) 暴雨中的深圳河，前長一股洪流，捲去無數難民。難民在驚濤駭浪中，被水沖去，屍體浮屍，紛紛在河下游浮起，被發現，據說，在離果馬草龍河，發現有屍體四五十具，在米埔附近河面，屍體數字更多，約有七八十具；至於海邊，估計難民也不少，但最低限度，日來河邊發現的浮屍，為數亦不少，二百具以上，似是無可置疑的了。



沙頭角至文錦渡鐵絲網已築成 沿邊三不管地帶昨日不見人跡

熟悉，這些浮屍首先發現者係居住在落馬洲禁區的難民，他們說：前(廿六)日晨起至下午六時，屍體約一百二十多具，從浮屍的衣服來看，顯係逃港難民，這些浮屍有男、有女，有兒童，屍體只能目視這些屍體向東流，流向后海灣外，因為若撈起這些屍體會惹起麻煩，只好目視這些屍體向東流。

依照傳統的說法，被溺死者，通常須在一對時(即廿四小時)後方能在水底飄漲浮起，昨日沿深圳河果然又發現有大批浮屍，據周草龍自擊的難民說：昨天亮以至中午十一時許為止，該處河面又飄來浮屍數十具，其中有二十餘具較為接近英界，鄉民均可目觀，最慘者係屍體中有一年卅餘歲的少婦，背負一歲許男孩，

齊被溺死，浮屍中亦有兩三人攪作一團者，可見死前曾在水中經過掙扎。在白鶴洲米埔以至接近后海灣的深圳河口，昨日飄流的浮屍更多，據說有八十餘具。

在打該區區被溺死的難民，其中有兩具男屍浮入英界打該鎮運公路邊，昨晨十時已由當局召黑福車到場，將該兩屍體檢去。

上述這幕慘絕人寰的悲劇上演後，已給予邊境難民以無限警惕，未幾告劫所有難身於邊境三不管地帶的難民，均已走避一空，昨日由沙頭角以至落馬洲三十里長段以外，均已不見人跡。

由沙頭角至打該鎮文錦渡一帶的新鐵絲網現已大部份建築完工，由羅湖料禁經馬草龍，落馬洲，白鶴洲的一段，現亦接續施工設中，承建商羅利公司每日自新界招羅大批難民前往參加工作，務期於本月底能全線敷設完成。

粉嶺警署訓練營閉後，在新界各地探察之大陸難民間中有被警員搜獲者，一律送往打該鎮警署，登記姓名年歲後，即由警車送返大陸。兩日被押解返大陸之難民約有百名左右。

“媽，拉住我的手。”我伸出手去，拉水中的媽媽……沒有一個人幫我……終於，我碰到了她的手。

“抓緊啊，媽媽——”

飢餓、孱弱的她，沒有力量了。她沿著樹身，上了幾下，又滑了下去。

“媽媽——”我滿臉的淚花，“你再用一口力啊！”

唉，要是我給她多打一隻雞就好了！

媽媽也許用了她最後的一點力量，她踩著一個樹樁，就要上來了。

唉，在這裡，我要告訴你人性最醜惡的這件事，我一生都難忘啊。

由於樹上的人太多，他們擔心樹丫斷了。這時有人在我母親肩上蹬了一腳，她就“撲通——”掉進了洪流中。

我呼天喊地：“媽媽——我的媽媽——”我還在喊：“我拉你，我拉你呀——”

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你再喊，連你也推下去——”

我只有空空地撕肝撕肺著：“媽媽，我的媽媽呀——”

媽媽再也沒上來了。

——

“陳記者啊，我的母親就這樣死在洪流中……”葉小明痛苦地對我說。

這是一個天上沒有星光的夜晚！

也是一個地上沒有良心的夜晚！

兩天以後，水退了。葉小明也到達了目的地香港。因為未成年，很快被香港政府作了登記。

登記完後他趕緊找自己的媽媽。同村的七叔領著他又來到新界。水已經退了，那株樹還在，他繞著那株樹在周圍找啊找啊，找遍了。終於在離那株樹一里多的地方，找到媽媽的屍體。

媽媽是被橫在兩棵樹丫間的，這樣大水才沒把她沖到更遠的地方。她蒼白的手指緊緊地箍住了一截小樹，死死不放，像要把那小樹都箍一個洞。

“我不知道母親在最後一刻的想法。也許無助的她，水流中的這棵小樹，便是她生命最後的求助！

“當時我為甚麼不跳下去？為甚麼不同母親一起去死啊！我恨，恨我

自己！我痛不欲生。我後來真想隨她而去，真的，陳記者。”

“我把她發白的手指扳開，把她放進挖出的坑裡。”

“我擦乾了淚，把他們埋了——還有她旁邊的攔在野樹邊的兩具不知名的屍體。我覺得我應該做，雖然這是旁人的父母。”

“擦乾淚水，我堅強地朝香港的高樓大廈走去。”

“我把名字改了，改成了葉爭氣，最近才改回叫葉小明的。我要為母親爭氣！立志要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發誓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她。”

“記者先生，今天上午的會，不是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跡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策略，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甚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著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淚，用血創造出來的！”葉小明眼睛閃著憤怒而又堅定的目光。

——

聽完他的回憶，我噓出了一口氣，合上筆記本。

香港，今天我終於懂得你了！

第五節 潮水衝擊之後

一、狂潮是怎樣平息的

1962年5月23日的《星島日報》，突然以大標題報道中國官方停止“放寬”邊境的消息：《中共封鎖邊境 今日起不准偷渡進入英界》。

文中說：“華界‘解放軍’警告，今後，不准再行偷渡，違者將判勞改四年。”“政府每天劫獲的偷渡者也從五千猛降到一兩千，甚至幾百人。”

5月26日的《星島日報》再次刊發報道：《偷渡者已銳減 粉嶺營昨關閉軍警撤退，邊境迅復常態》。

——
逃港大潮過去了……

如同留在沙灘上的砂石，人們的目光，開始注意大潮後留在香港的衣衫襤褸的所謂“大陸難民”身上。

二、逃港群眾進入香港以後

“地下隱行”的逃港者

逃港的群眾中，有醫師、會計、教師等，但因為無牌，不

能公開從事這些職業，一些人便在“地下”隱行。

香港《華僑日報》1957年8月6日刊登《香港難民問題》一文，記載了逃港者的情況：

“……當他們逃到港九以後，僅光著一身，投靠無門。除呼吸自由的空氣外，吃的、穿的、住的皆無著落。多迫而晝則沿門乞討，夜則露宿街頭。飢寒疾病，交相侵迫，哀號婉轉，慘絕人寰。”

首先是膳食。

一開始，港英政府對逃過來的無依無靠的群眾給予了免費膳食，求食者必須首先“向社會局長致函申請，派員前往居處地作實地調查……發給免費膳食證”。政府在全港多個地方設有福利站，執證者可以每日依時前往領餐，“此類膳食為六安士米煮成之飯食，一安士魚或豬肉、瓜菜等。”

其次是居住。

來到香港的群眾，一部分在港有親戚朋友的，得以投親靠友。絕大部分逃港群眾，則在公園、街頭的屋檐下、樓梯下宿夜；有的則住於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棄的屋宇中，文章說其如“上古穴居野處的生活”。

後來，他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接著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這就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台木屋”。

這些木頭屋，因為搭建簡陋，烈日懸空時，屋內炎熱如置身火爐；如遇颱風暴雨，常常連屋頂也颳跑。

為了生活的相互照應，後來，便有親戚、熟人、同鄉而結聚於各個山頭、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如潮籍人聚居老虎岩村、內地人聚居調景嶺等。

再次是謀生。

根據香港法律，沒有牌照是不能從業的。一開始，港英政府不承認逃港群眾的“居民”身份，所以，他們謀生十分困難。逃港的群眾中，有醫師、會計、教師等，但因為無牌，不能公開從事這些職業，一些人便在“地下”隱行。他們從事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業，即從小的工廠中拿來活計，“比方粘紙盒、挑手襪、打紗等”在家中加工。到20世紀60年代初，港人紛紛主張引進加工工業，這樣也就逐步解決了數十萬逃港者的就業問題。

“逃港難民”的木板屋，因為缺乏防護措施，隱藏著種種治安隱患。終於，火災在有大片木屋的石硤尾居住區爆發了！石硤尾六村大火，一夜之間產生了六萬多名流離失所的災民，終於使港英政府認識到“難民”問題已成香港之“要議”，下決心為逃港群眾建立安置區。

流落香港的群眾後來大多數都住進了安置區中的“徙置大樓”。

港英政府為數量巨大的“難民”安置住所，可謂費了心力。這種“徙置大樓”相對來說比較樸實而容量較大：“每層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個，每間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樓中間設有男女浴室、廁所和公眾水喉。每月租金僅十四元。”

這樣，數十萬的逃港群眾，終於逐步有了安身之所。

——

香港逃港群眾的聚居地，值得一提的是調景嶺安置區。

《華僑日報》在1957年8月發表的《香港難民問題》一文中介紹了調景嶺“難民”營：

“香港雖然有幾十萬難民，但正式接受政府和社會救濟的，就是調景嶺的難民。1949年之後，忠貞之士，相率避於海隅，孑然一身，衣食無靠。港府當局即委託東華三院收留他們。因東華醫院地方不敷，1950年乃遷往西環的摩星嶺。是年六月初有香港社會局接受登記，當時人數為6921人。旋於6月26日全部遷往九龍附近的調景嶺設營安置。唯該地一片荒涼，屋舍全無，於是聯合了全港九數十僑團發動捐輸。為難民建蓋臨時木屋居所。而難民之膳食則由社會局供應。調景嶺難民營亦正式成立。

“在此之後，由於大陸逃難人民絡繹而來，彼等咸希望獲得調景嶺居住及接受救濟，而人數過眾，此後即截止登記，除原來已登記之6921人發給‘領飯證’外，此後而來者只視作調景嶺難民營的寄居難民。聚居調景嶺之人數達30358人。”

“這三萬多人，把調景嶺建成了另一個世界。

“後來，他們獲得了台灣當局的重視，並通過台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援助，使他們返回台灣就業，幾年來獲准返台者，截至目前（1957年8月——作者註）為止，總數達一萬四千餘人。

“調景嶺營內僅有社會局設立的一辦公室管理營內秩序。或有人以為易發生混亂，但此等難民多屬前知識分子，或為軍隊中之將校，故彼等在此時能發揮自治之能力。組織自治辦公室，將全營建立保甲制度，使全營秩序井然，歷年來表現之治安良好，有逾於港九地區者。”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香港“徙置區”

山芋還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經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認了這個不情願的事實，不得不動手安排“難民”的生計問題，開始建立“徙置區”。

由於逃來的群眾太多，如何處理已經進入香港市內的逃港群眾，港英政府也頗費思量。

從本意上說，他們是不願意接受的。但從道義上看，尤其迫於香港市民及輿論的高度壓力，他們又不敢輕易推走這數以十萬計的難民。曾經一度想把這個“燙手的山芋”拋出去給台灣等地。

最先，他們幼稚地認為，這些群眾逃港“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們可能會選擇回到大陸、台灣，或者到其他國家去。”所以，一直拖延處理。但是，港英政府判斷錯了，年復一年、月復一月，這些群眾不願走，除了小部分到了台灣或其他國家外，大部分選擇的仍然是留在香港。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這麼多人，無論住房、醫療、教育，小小一島都難以承受。於是，港英政府又把問題解決的希望寄託於聯合國，即希望確立逃港群眾的“難民”地位。因為一旦由聯合國確定逃來香港的大陸群眾為“難民”，就應該由聯合國按照對待“難民”的條款來給予接濟了。

但是，聯合國所指的“難民”，必須具有以下兩個條件：

一、與其本國的政治組織不能相容。

二、難民承認其本國政府的政治組織，但其本國政府拒予收容。

1962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所以，

該條款所指的“本國”，在聯合國是指台灣的“中華民國”。但國民黨政府不願意在全世界面前丟失面子，如承認逃港的群眾“與其本國的政治組織不能相容”，即是承認與“中華民國”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確表態。這樣，逃港群眾的身份問題就一直擱著。

山芋還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經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認了這個不情願的事實，不得不動手安排“難民”的生計問題，開始建立“徙置區”。

不過，港英政府之所以後來同意著手“徙置難民”，還可能與 20 世紀 60 年代後全球的經濟發展，香港需要大批勞動力有關係。

四、台灣國民黨政府和各國政府密切關注“六二”大逃港

中國內地發生大饑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嚴重分歧，中蘇兩黨公開決裂、中印邊境上多年的摩擦導致了戰爭、深圳河邊又出現數十萬人的大逃港，所有這些都曾給台灣的蔣介石帶來過“希望”。一度認為機會將到，瞞著美國政府，秘密制訂了龐大而周密的“反攻大陸計劃”。

但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只是出了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穩定的。

出於種種考慮，甘迺迪在多個場合警告蔣介石：“台灣如對大陸採取行動，無異於自殺”、“台灣如出兵大陸，將違背《台美防禦條約》”。力阻蔣介石的狂妄之想。

對於發生在深港邊境的大逃港問題，美國政府的態度也僅提“以人道予以援助”，謀求以國民黨政府為主的各國解決辦法。

香港《星島日報》5 月 25 日報道：《美決研求方法 將予最有利的考慮》。指出美國總統甘乃迪（甘迺迪）已親自出面來關照此事。

甘迺迪號召除了台灣國民黨政府外，還希望世界各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面積大人口少的國家，都“盡可能地接受難民”。

對於數量眾多的逃港群眾，台灣國民黨政府雖感到是一個“燙手山芋”，但既然佔有聯合國裡“中國”的席位，就應該有安置“中國難民”的義務。

此時台灣民間輿論鼎沸，紛紛指責政府“接受難胞不力”。

5月19日《星島日報》載《國府謀求妥善措施》一文，指出5月18日，台灣立法院63名委員，集體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要求政府立即採取措施。應盡其在我，收容逃港難民”。

5月20日《星島日報》又繼續發文《國府日內召開會議 救總經派代表來港調查》，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終於決定“行動拯救逃港難民”，擱置“把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議見。

兩天後台灣國民黨政府“已決定成立專案小組，對最近逃港難胞，依自願接濟來台。並先撥食米一千噸捐贈”。

此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陸續派出船隻，到香港接“難民”。

對於這批“大陸難民”的去留，各方均表示，願意留在香港還是願意去台灣，“均取自願申請之方式”。

國民黨政府派出的輪船，於1962年6月底，從香港接出了第一批“願意赴台的大陸難民”。7月9日，又用輪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陸逃港澳的難胞”。

“港九難民委員會派人安置他們登輪。每一名難胞獲救濟金70港元。並由救委會贈送服裝。”（救委會指台灣國民黨的“救濟大陸災胞總會”——作者註）

對於美國的建議，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政府也先後表示願意接納“有限數量的難民”。如6月19日《星島日報》報道，加拿大已對留港難民移居開始接受申請。澳大利亞民間人士則表示願意在地廣人稀的地域，為逃港的群眾開辦農場。

所以，大逃港時逃到香港的大陸偷渡者，後來除大部分留在香港外，一部分去了台灣，還有小部分去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後來也有輾轉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買加等地的。

香港的國民黨駐港機構，一直在插手深圳河邊的群眾逃港潮，寄希望於中國內地的“內亂”。除在報刊上大造《中共正在崩潰，復國之期在即》的輿論外，還通過電台等竭力煽動；用氣球傳單的形式提供逃港路線圖。另一方面又派遣在港的特務人員，偽裝逃亡的群眾或民兵，混雜在群眾中鼓動、引路、煽動。

廣東省公安部門 1962 年 12 月 17 日的《關於當前邊防幾個問題的調查》的文件指出：

“惠陽縣外流人員中已發現有八十六名被敵特送到台灣受訓。”

“寶安縣已發現有八名外逃人員參加了特務組織。”

當然，後來“逃港潮”並沒有向著台灣國民黨政府期望的方向發展，更沒有演化成“大抗暴起義”。

如前所述，中國共產黨一“堅定出手”，“逃港潮”便在發生不到一個月後，就被迅速控制，顯示出中共在控制政權上的巨大威力。

這個情況引起了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思考。

“國府對中共政權穩定性的判斷是否錯誤？”“中共對其政權究竟具有怎樣的控制力？”需要評估。

在美國，研究美國政府政策的學者更認為：在如此嚴重的饑荒、外逃等衝擊下的中共政權依然鞏固，沒有發生動亂，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認同。無視這個大國是沒有道理的。60 年代的對華政策出現了微妙變化”。（見錢庫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P2-3）並最後促成了尼克松的訪華之旅。

五、港台“緊急援救”

國民黨政府決定派船到香港接運“難民”的消息傳出後，台灣民間廣泛支持，紛紛在報上獻計獻策。如：將“難民”安置在台東地區的屏東縣一帶，利用屏東的山林空地“開墾自救”。

骨肉同胞親，大批逃港群眾湧入香港，反應最為激烈的首推香港市民。從 5 月初開始，香港的各個民間社團便紛紛組織起來，商討如何援助大陸逃港群眾。

5 月 19 日的《星島日報》報道：

“昨日下午 4 時 30 分，數十團體代表集聚於雲咸街四號三樓，舉行

一個港九各社團救濟難民的座談會，公推調景嶺救濟會主席謝伯昌、周雁賓二人為主席。成立港九社團救濟難民聯席會議。推舉馬文輝等六人與官方洽談……昨天出席會議的有：聯合國協會、宗親聯誼會、元朗四邑同鄉會、蘇浙同鄉會、興寧同鄉會、惠州同鄉會、寶安縣同鄉會……”

5月18日，最早行動的香港基督教組織紀德士牧師表示：“四個國際性團體願以救濟物資獻給港府。物資達數百萬之多。”

民間團體對港英政府救援不力的態度十分不滿，要求直接與港英政府官員接觸，商討救援“大陸難民”問題。

5月20日《星島日報》報道，以馬文輝為首的五位民間代表會見了港英政府官員，提出五點辦法。

向港府表示了建議後，馬文輝等代表即向全港市民呼籲救濟難民大聯合：“明日下午四時半，地址大道中雲咸街二號三樓。請港九各社團踴躍參加。”

迫於壓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倫敦政府加快與北京政府交涉，制止深港邊境的“逃亡”潮，另一方面不能不現實地考慮如何安置已經進來的數以十萬計的“難民”了。

6月1日，《星島日報》以《救助需要幫助的人們》為題，發表社論，指出港府把“飢餓的難胞看成非法入境者，因此救濟問題便無從談起”。

文章提出儘快組織向其他國家移民，“英聯邦中，馬來西亞、婆羅洲、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都有很多地廣人稀的地方……”

此後各種解決的思路紛紛出籠。

一位讀者給媒體寫信，建議把香港的大嶼山開發出來，以供安置“大陸難民”：

“大嶼山的面積比香港大一倍，地大而人疏，如果香港政府能慈善為懷，將大嶼山開放，讓大陸逃難者居留，逃難者的親屬必會在大嶼山購置屋宇給他們居住。數年內，大嶼山之繁榮不亞於香港矣。”此建議後來促進了大嶼山的繁榮。

又有人提出花大力量把澳門開發出來，以安置“大陸難民”：

“請自由國家熱心人士幫助澳門發展成一個輕工業和擴大農業的地區。使能大量收容大陸的逃亡人士。”此建議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澳門發展。

在台灣，逃港潮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台灣報刊大量報道了“大陸難民湧入香港”事件。有農場主邀請“難民”前往台灣種地。

香港《華僑日報》發文《台北郊外一農場願收容難民千人》：

“台北郊外著興學農場負責人溫麟宣佈該場為響應救助大陸逃港同胞，表示願意收容一千人。並協助其解決生活及子女教育等問題……”

就在群眾大逃港期間，美國民間的救濟中國難民總會主席陳香梅，飛來香港同港府官員、各民間團體代表交換意見。並趕赴邊境與逃港難民實地接觸，了解情況，尋求安置辦法。

6月26日的《華僑日報》說，陳香梅表示將有巨款撥來“援救”“大陸難民”。

國民黨政府決定派船到香港接運“難民”的消息傳出後，台灣民間廣泛支持，紛紛在報上獻計獻策。如：將“難民”安置在台東地區的屏東縣一帶，利用屏東的山林空地“開墾自救”。

迫於壓力，港英政府最後還是接納了依然“滯留”在香港的“難民”。

1962年6月26日，《星島日報》以《初入境申領身份證者昨已逾四萬人》為題報道，首批進入香港的“難民”被香港政府接納。意味著問題開始解決。

這樣，從5月初開始，到6月底結束的風起雲湧一個多月的“六二”逃港潮，也終於在香港降下了帷幕。

第六節 全港大審判

一、行善者被法處

被宰割的羔羊

大陸難民流入到香港的各個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後，如同無助的羔羊，包藏禍心者也趁機伸出了犯罪的黑手。

當深圳河邊的暴雨過去，偷渡潮平息之後，香港法庭開始清理偷渡潮中發生的各種案件。大陸難民流入到香港的各個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後，如同無助的羔羊，包藏禍心者也趁機伸出了犯罪的黑手。一件件窩藏偷渡犯、拐賣偷渡犯、虐待偷渡犯等的罪案，於 1962 年的 7 月後，在新界粉嶺裁判署一一審理。第一天，同時審理了三件與偷渡者有關的案件。

首先被提堂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新界農民，他叫杜原。

杜原住邊界打鼓嶺木湖村，1962 年 5 月 23 日夜裡，門口的黃狗狂吠，他起床披衣出門想探個究竟。剛開門就聽見門外的草葉嘩嘩亂響，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從草叢中奔出來。後頭有人在追喊：“抓住他！抓住他！”

年輕人跑到屋邊後，便慌慌張張不知往哪去。杜原知道是大陸的偷渡者被警員追趕，連忙使眼色叫年輕人往屋後頭跑。可是，年輕人竟本能地

鑽進了杜原的屋裡。

這時，趕到的警員出示警證後，便進屋抓人。年輕人便跪在地上求警員：“大哥啊，你放了我吧！”

杜原看那年輕人才十六七歲，遍身是被樹枝草葉掛破的血痕，情狀實在可憐，便拿出一百五十元港幣，交給警員，說：“行行好，大陸來的，沒吃沒喝的，可憐啊，你放了他吧。”

警員沒有放走年輕人，回署後將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賄賂警員，企圖放走偷渡犯。

最後法庭判村民杜原賄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罰款。

二、非禮逃港婦女案

女子苦苦哀求，並要求黃收留。黃於是將其帶入屋內，讓女子換了衣衫，並給予吃喝。進而要求與女子發生性關係。

第二個案件是與偷渡者有關的非禮案。

被帶上堂來的是一個乾癟的四十多歲的男人。

黃某，45歲，住粉嶺聯合墟新村。5月24日夜，同樣是被狗吠聲吵醒，發現屋外的菜地裡，躲藏著一個衣衫襤褸的大陸女子，於是上前威脅要將其送往警署。女子苦苦哀求，並要求黃收留。黃於是將其帶入屋內，讓女子換了衣衫，並給予吃喝。進而要求與女子發生性關係。女子為了感激，同意與其發生性關係。

5月30日的《星島日報》寫道：“婦人姓李，一連幾晚，她先後被迫與黃某發生性關係。後來，她發覺黃某收留自己不懷好意。同時，那傢伙還不許她離家，把她當作妻子長留在那裡，大為驚惶。趁黃某不覺，離開村屋，跑到警署，把這件事揭發了。”

兩案審過，被告先後離堂。聽眾席較為平靜。

當第三位犯罪嫌疑人出庭時，滿座都“啊——”的一聲。

原來，這次上來的被告是一位雍容華貴、儀表高雅的港警夫人！她因救了一對偷渡的母女而被控有罪。她叫葛施梅（代名）。

三、港警夫人“窩藏”案

揹著孩子，站在這迷茫無際的原野上，何福明心中也一片迷茫。

小梅在她的背上哭著：“爸爸呢？我要爸爸——”

遠遠的，那邊的天邊一片光明，一排排白刷刷的高樓大廈矗立著，她知道，那就是他們全家夢寐以求的地方：香港。

何福明對背上的小梅說：“乖啊，再挺一會，我們就要到了！”

“爸爸在哪裡啊，媽媽？”

孩子的問題像針一樣扎在她的心尖上，丈夫與她們母女走散了……

兩個小時前，她和丈夫周信、女兒周小梅在人流的簇擁下，終於衝過了邊界，還沒站穩腳，一家人就被難民潮衝散了。

何福明六神無主了。在惠州鄉下，她是事事都要靠著丈夫的，就是趕趟墟，都得要跟著丈夫的腳跟走，怕丟，也怕人多。現在好了，丈夫不見了。

怎麼辦？她一籌莫展。

“媽媽，我餓——”小梅在背上哭著，她的心更亂了。

也許丈夫早就考慮到有這一幕，臨行前叮囑她：“要是萬一失散了，你也不要慌。香港那地方，是講法律的。你就帶小梅逕自往香港市裡去，總有辦法。”

“啫——”一輛摩托車開過來了，停在她們旁邊。啊，這裡竟還有摩托車來接人去市裡啊。

“上車，上車，十蚊（元）啦——”摩托仔叫著。

她看到，路邊上還停著好些摩托車。一些逃過來了的百姓，交了錢，就往車上跨。看來，坐了這個車，就可以進香港了。

何福明按按口袋，在貼身的內衣裡，還留著昨晚縫上去的全部家當12元錢人民幣。聽說是可以換港幣的。但那是她們到香港後唯一的一點活命錢了。

“我們沒錢——”想起要給小梅買塊麵包，何福明把小梅往上聳一聳：決心步行走到市裡去。

“媽媽我餓——”小梅在肩上哭著。

那摩托車就跟著她們走。

摩托仔說：“孩子餓啦，上車吧——我不收你的錢。”

何福明不敢相信，她知道香港還是“舊社會”，她不相信“舊社會”裡還有好人。她不敢理睬，還是只管自個兒走。摩托車就跟著她走。

“上吧，大嫂——我同你一樣，也是逃過來的人。”

何福明停住了。也許是這句話讓她放鬆了警惕。

摩托車輕快地沿著馬路朝香港市區開去。

摩托仔告訴何福明，他是去年跑過來的，就在香港以跑摩托車為生，老婆還在增城呢。

“唉，老公沒找到，也沒關係的，過來了，就是福了。打份工還是不難的。老公慢慢再找吧，要是不給抓到送過去，就算得著生路了。”摩托仔說，“慢慢都會發身份證的。”

“還會抓嗎？”坐在摩托車上的何福明有點緊張。

“發了身份證就不抓了。你們有親戚在這邊嗎？”何福明說沒有。

“那你們難辦了。你找誰擔保呀？”

說的也是，何福明心裡非常緊張。

摩托車已經到了香港上水的市面了。

“下吧——”何福明和小梅下了車。

“往下，就靠你們自己了——”摩托仔對她們說。然後，一踩油門，“嘟嘟——”走了。

我們怎麼辦？望著滿眼的高樓大廈，街上一個個陌生的面孔，靠誰啊？

“滴滴——”摩托仔轉了個圈又回來了。

“上車吧。”摩托仔說，“帶你們上一個地方去，大陸來的人，都在那兒找工作。我領你們去那吧——”

“你去做保姆行吧？”摩托仔回頭問坐在車後的何福明。

“保姆？”何福明不明白。

“就是給人家搞衛生、做飯的，你這總行吧？”

“行，我行。阿叔，這些事在家全是我做啦。”

“要有人來問你，你就說甚麼都願做，只要給口飯吃。”

“我知道，我知道。”何福明點著頭，真碰上好人了，“只要小孩有飯吃，就行。”

摩托車在街上轉了兩個圈，停在一個公園旁的路邊。

“就這裡——”

何福明往那路邊一看，原來，公園邊密密麻麻站滿了像她一樣的人，三五一群、衣衫襤褸：有的蹲在樹蔭下；有的伸手向過路的香港人乞討；有的在紅燈亮著的馬路中間走來走去……

摩托仔說：“你放心，在香港這地方，靠自食其力，只要不抓到警察局去，沒人會欺負你們母女的。”

又是一陣發動機聲，這回，摩托仔真的走了。

看看路旁那麼多的像自己一樣的大陸人，何福明的心又定了些：總算又找到自己人了。

她正要牽著小梅朝人群中去，突然，就看見人群像潮水似的湧動，“差佬來囉——”“抓人囉，跑啊——”旁邊有人大喊。

只見一輛香港警察署的車，轉著紅燈，發出“咕咕——”的怪叫聲，緩緩開來。跳下幾個警察，見人就追。

“快走——”有人提醒她。

那些圍在公園旁的逃難者，四面逃走。何福明路不熟，街面又滑，沒跑出幾步，就“撲通——”摔在地上，小梅也被摔出了半米遠。

何福明手也摔出血來了，小梅坐在地上，竟然沒哭。眼看後面的警車緊跟著她們來啦！這時，一雙白皙的手從頭上伸過來，把她從地上拉起。

啊，是個女人！那女人抱起地上的小梅，拉了何福明就往街邊的胡同跑。跑到胡同口停住了，何福明一看：呀，是一位衣衫闊氣的年輕太太呢！又一位好人啦！

闊太太把小梅放在地上：“你們快往巷子裡逃，他們的車進不了！”

“多謝太太，多謝——”何福明就要拉著小梅磕頭，太太卻急道：“還

謝甚麼啊，快走，他們來了——”

果然後面警車又叫了。可是，那警車開得慢著呢，好像故意不緊追這娘倆似的，何福明這才急忙抱了小梅鑽進胡同。

等她發現後面再也沒人追時，已經到了一條街的盡頭。

幾乎家家的門都關著，大概都怕湧進難民來。也有人挑開窗戶，從幾層高的樓上同情地看她和小梅……

現在怎麼辦？又沒路了，沒人敢接受她們。即使躲過了警察又到哪裡去？何福明帶著女兒在街上驚恐地走著。

天慢慢黑下來了……

——

葛施梅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沒有跟隨父母到不列顛去，而是選擇了同她高中時候的同學，一位香港警官謝宏明（代名）結婚。

婚後，葛施梅在一家地產公司做文員，夫妻一月的收入不菲。不出幾年，他們就在上水的××街買了一套房子。婚後的日子很美滿。

不上班的時候，葛施梅就在家讀讀武俠小說、學學插花……

當報紙、廣播連篇累牘地報道說，難民衝過邊境，成千上萬的香港人湧向華山去接濟親人時，葛施梅沒有動，她沒有親人在難民中。她的父母是在大陸政權更替後，從上海逃到香港來的，有親戚也不可能從上海跑到香港來，她想。

當然，即使在華山上有自己的親戚，她也不敢去看望的。作為警察的太太，她是不能像平常人那樣隨便行動的。

慢慢地，街頭巷尾到處湧滿了衣衫襤褸的逃難者，大人牽著小孩，還有五六十歲的老人。早晨起來，就會發現躲在屋角裡簌簌發抖的難民。

她從心底裡同情這些人。

每次丈夫回來，她總要盯著問：“手下沒打人吧？”“能放手的，你們就放手啊！”

丈夫總是安慰她：“沒有，我怎麼會呢？別聽報館亂說。”

……

“太太，請給點吧——”昏暗中，她發現一隻枯瘦的手向她伸過來。

原來又是一個乞討的！葛施梅從包裡拿了幾個銀幣，正要放到那人的手裡，忽然，她發現，這不就是半小時前救助的那女人嗎？身下還牽著那四五歲的小女孩。她們怎麼也轉到這兒來啦？

“是你們——”她吃驚地叫了出來。

看來，這對母女真是走投無路了。

“太太，是你呀，大恩人，小梅——”何福明拉過小梅來磕頭。

就在這一秒鐘，葛施梅做出了一個大膽和“錯誤”的決定。

“跟我來吧，”葛施梅一隻手從地上抱起了小梅，“我家就在這——”她指著漂亮的公寓說。

世界上的變化真快，剛剛還在街頭忍飢捱餓無依無靠，眨眼間，何福明已經坐在燈火輝煌的大客廳裡了。

這是一個像宮殿一樣的客廳，大吊燈、意大利沙發、阿拉伯地毯……何福明簡直看花了眼，她一輩子也沒到過這樣豪華的地方。

“來，換了，都換了——”葛施梅把自己不穿的衣服啦、皮鞋啦、胸罩啦……都翻出來送給何福明。

“沖涼房在那邊，去洗個澡。王媽——”她吩咐著保姆，“來客人了，快做飯——”

溫水沖在何福明的身上，她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服。

唉，怎麼“舊社會”的人這麼好呢！

何福明同小梅已經坐在小客廳的桌邊，小梅和她都換上了漂亮的衣衫，吃著王媽做的客家釀豆腐、番茄炒雞蛋。

“睡房在那邊，”等母女倆吃完後葛施梅說，“王媽會領你們去，你們就在我這先住下，哪兒也不要去。以後的事情你不要管，我會有安排。”她相信自己對丈夫的影響力。

何福明躺在床上睡不著。她知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人要來決定她們母女的命運，那就是葛施梅的丈夫。

要是他回來，會怎麼說？何福明其他的不懂，但她明白既然要抓她們，那“窩藏”就是有罪的。

她突然覺得，要是給這麼好的太太增加麻煩，那還不如自己走。

她決定了，第二天一早就悄悄揹著小梅走。

矇矓中，她聽到客廳裡一個男人低沉的問話：“來客人了？”果然，是男主人回來了。

沒有聲音，大概太太把丈夫拉進裡屋去了。

接著，她隱隱聽見兩個人議論的聲音，後來又聽不見了，大概房門被關上了。

其實，此時一場激烈的爭論正在發生。

“是從大陸來的？”

“是的，怪可憐的，留下她們吧。”

“你怎麼這樣糊塗啊，非法偷渡啊！”

“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你不知道我是做甚麼的嗎？你不知道香港的法律嗎？我能夠知法犯法嗎？你真糊塗啊！”

“那你是打算把她們母女送到警察署去嗎？你要是忍心，你就送去吧。”

丈夫的心也軟了，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葛施梅放低了語氣：“我們就幫人家這一回吧。我們留人家住些日子，等風聲過去了，就讓她們走，這樣也對得住我們的良心了，你看行嗎？我求你了！”

這時在謝宏明心中，“法”和“良心”發生著激烈的碰撞。

從一個公職人員對職業的忠誠來看，他不能褻瀆一個警官神聖的職務，應該將母女送交警署，按法律辦事。

從良心上說，把她們母女送到警署去，他做得出來嗎？把無依無靠、走投無路的母女往火坑裡推，做得出來嗎？

做了善事，就是上帝也會感謝他們的。

他準備放棄最初的念頭了。

“不行——我不能這樣做！”半晌，他猛地又翻身從床上起來。

這個在英國皇家警官學校進行過嚴格訓練的、有著強烈法律意識的年輕警官猛然感到自己的行為有悖法紀。

“母女倆一定不能留，一定得按法律辦事！”他對妻子說。

“我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第二天一早，兩夫婦有了一個誰也沒料到的好辦法。

首先，由丈夫謝宏明出面向法院控告妻子葛施梅違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陸偷渡人員，請求給予妻子法處。然後，由葛施梅向法庭認罪，請求寬處。接著，何福明、周小梅母女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請，要求考慮母女走投無路的困窘，按照人道的原則，免予遣返，並給予居留權。

5月25日，依計行事，葛施梅從容走進法庭，接受審判。

如果“窩藏”成立，葛施梅將被判入獄一年！

法官也舉不起法筆：這樣有良心的人，還要把她送進監獄嗎？

法律和人情在此較量！

應該說，這是當時所有因偷渡引發的最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太太的仁慈義舉、警官的忠於職守、何福明母女的可憐無依，都在香港市民中廣為傳開。

最後，法庭做出了讓所有香港人欣慰的判決：

5月26日《星島日報》稱：“李扶連法官認為，被告人乃出於同情，並無收費。被告人的行動值得原諒。被告人之丈夫以職責攸關報警亦屬合理。姑念被告人初犯，從輕判處，罰款五十元，另簽保行為三年。”

葛施梅夫婦高明的做法、法庭高明的處置，皆堪稱香港法例經典。

此後，由於此事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何福明失散的丈夫也尋到了葛施梅家中，於是，失散的一家得以團聚。真是禍中得福！

第七節 從逃港者到“洋參大王”

一、從“富農狗崽子”到“投機倒把分子”

“投機倒把分子”

我已經不記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機倒把”的高帽子，用繩索捆著，敲著破的熱水瓶或者破臉盆遊街了。口中一邊還得喊：“我是投機倒把分子莊永競！”“打倒投機倒把分子莊永競！”……

——摘自全國政協委員莊永競的回憶文章

1949年的冬天，一個冷雨簌簌的日子，我出生在粵東山區揭西縣一個富農的家庭裡。父親給我取名叫：莊永競。

在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頭，富農也被看成了階級敵人。其實，當年一般的地主，也不過有幢房子和一些田土而已，有些自己還得下地幹活的。富農也僅僅是有碗鹹魚白米飯吃而已。

解放軍隆隆的炮聲傳到了粵東，有人勸父親一起逃往香港。“我一不算有錢人，二沒害過人，靠自己做生意下地過日子。我怕誰呀，不走。”父親不願離開。

事實證明，父親想錯了。到了他想再去香港時，已經不再可能。

我家的財產被沒收，店舖被充公，連住的房子都被分了。別人跑進我家來，大大方方地搬走了我家的雕花床，還對母親叫著：“走開！走開！”好像是他們自家的一樣。

對於整個社會而言，這一切使大多數人富裕了。但對於某些家庭來說，卻是災難。用一句形象的話說就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我的家庭從此跪下去了。

我們被趕到一間才四五平方米的小屋裡，又黑又暗，下雨時屋外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山區的天氣冬夜很冷，我穿著一件用父親褲子改成的單衣，常常凍得直打哆嗦。母親心疼我，找來一條裝米的袋子：“兒啊，你圍在身上吧。”我實在太冷了，像隻害病的小貓，直往燒火的灶邊靠。父親幹活回來，看到這一幕，只有歎氣。

為生活所迫，父親不得不做起生意來。那時，農民做生意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犯天條的，他只能偷偷地幹。有一天，他挑回來四隻豬苗，打算去賣了，掙幾塊錢，誰知很快有人告了密。

父親被抓走了，全村社員開大會鬥爭父親。

父親胸前被掛上一塊“投機倒把分子莊建情”的木牌，上面還用紅筆打了把很大的“×”。有人拿大棍子打父親的頭，頭上的鮮血直流，肋骨也被打斷了。

我想衝上台去救可憐的父親，可是被母親的胳膊死死地拽著，母親的淚水像雨點一樣落在我的臉上。

“打！打死他！看他交不交代！”有人在吼著。

於是又有“積極分子”跳上台去，打了父親一個耳光。

我終於掙脫了母親的手，像一頭小犬一樣，衝上了台。可是我身小力薄，哪裡是那些人的對手。我用小拳頭揮打著，用尖利的牙齒撕咬著，但很快我就被他們像摔小雞似的摔下了台。

夜深了，山區的寒夜格外冷寂。桌上的油燈亮著，父親還沒有回來。

他怎麼還不回來呀！但願老天保佑父親沒事啊。

門口有微弱的叫門聲，是父親！

他是爬著回來的，門口的青石板上還留著他殷紅殷紅的血跡……

凌晨三點左右，父親飲恨離開了我們。他死的時候，眼睛還睜得大大的。他是不服啊！他冤啊！

這是一個我永生難忘的淒慘之夜！

油燈的光在一晃一晃。母親一邊哭，一邊打來了一盆清水，把父親身上的血跡擦乾淨，沒有沒破的衣服，母親就把自己一件衣服給父親換了，然後靠著父親的耳朵說：“建情，你去吧，我會把他們拉扯大的！”

此時，母親再在父親眼皮上摸了一下，眼睛合上了。

父親安葬在家對門的小山上，我跪在他墳前，暗暗發誓：“父親，你安息吧。我大了會替你爭氣的！”

我沒有父親了，母親為了讓我們不再背上富農的黑鍋，改嫁到幾百里外的一戶貧農家中。

時光一天天地過去，我也長成一個大人了。

也許是父親在我身上留下的因子在起作用。長大後的我對經商也有著特別的熱衷和敏銳。

那年頭，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甚麼都憑票：買糧要糧票、買衣服要布票、買油要油票。由於物資短缺，票證就變得珍貴，甚至有的地方只要付十斤糧票，就可以娶一個老婆回來。於是私下裡買賣糧票、布票、油票的情況很多。

於是我也盤算著，如果從甲地低價買回票證，用高價賣到乙地去，不是輕易地就可以賺到錢嗎？其實，這是一個太簡單的商業運作了，可那時候很多人就是想不到，或者想到但不敢去做。

我籌了一筆錢，雲遊他鄉，做起販賣票證的生意來。

當然，幹這種生意是違法的，要是被抓住了，就同小偷差不多，是要戴上高帽子遊街的。為了掙錢養家，我也顧不了這許多了。

我充分注意了各地的行情，發現糧票、布票充裕的地方是大城市。大城市裡，人們油水好、吃得也就少；家庭人口也少些、穿的也是好料子，不像農村人，上山下水衣褲容易破。所以城裡人往往手頭的糧票多，布票

也多。相對來說，小城市和農村就比較缺乏。我於是把收購糧票、布票的重點放在廣州等大城市。

“阿婆，有沒有糧票，勻一點給我。我是從鄉下來的，糧票用完了。”

老阿婆看了我一眼，我善良的面孔總是幫助著我：“拿去吧，孩子，不要你的錢，早點回去。”但我還是把錢塞給了阿婆。

收到足夠的糧票布票後我就拿到農村或者小的城市去，那裡早有接應我的“同黨”。

就是這樣，我利用著自己無害的“欺騙”和人們的善良，做成了最初的一筆筆票證生意。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走街串巷販賣糧票布票多了，常常會碰到危險的時候。

那時，人口是不可以隨意流動的。比如說，你要從揭陽到廣州去，得有大隊以上單位開出的證明才可以通行。各地都在道路上設卡檢查，每到過關的時候，拿著假證明，揣著幾百斤糧票，心口就“撲通撲通”地跳。

有一次，我終於被抓起來了。很簡單，只要對證明有一絲懷疑，再一搜身，那還有不露餡的？

我已經不記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機倒把”的高帽子，用繩索捆著，敲著破的熱水瓶或者破臉盆遊街了。口中一邊還得喊：“我是投機倒把分子莊永競！”“打倒投機倒把分子莊永競！”……

我被放回家時，家已經被抄了，僅剩的一點憑我的勞動和智慧掙來的錢、自行車和兩床乾淨點的被褥，也被抄走了。

那時我已經結婚，懷孕了的妻子正在空蕩蕩的房子裡痛哭。

我的一切希望破滅了。我知道在那高壓的政治下，想過上好點的生活，像人一樣的生活，只是夢想。

我不再留戀，只有走，過河去！走父親曾經想走而沒有走的路——逃港！

二、為活命揮淚別愛妻

堅決逃港！

走出牢房，我像是鳥兒出籠。我對著鎮委會“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監督我，到香港“監督”去吧！

母親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死前曾對我說：“孩子，你的事業不在這裡，你應該走，去找一個適合你發展的地方！”

在那個年月，許許多多的青年人，都做著去香港的美夢，去的人回來，一個個都成了“華僑”。還說香港是人間天堂，就是在街上乞討，放在你手上的也是麵包牛奶，誰的心裡都癢癢的。於是有了不少從中牽針引線做“蛇頭”的。當然，被蛇頭坑了的也不少。

據說一個蛇頭，收了一個湖南仔的錢，半夜把人家領到“海”邊，說，對面有燈光的地方就是香港，下水吧。湖南仔就跳進水裡，游到對岸，以為是香港，進村一敲門，馬上給民兵抓起來了。原來蛇頭把他領到的“海”，其實是今天深圳南頭的西麗湖，那時叫西瀝水庫。

不用別人，我要自己去開一條路！

我知道，偷渡能不能成功，關鍵看對深圳河邊的情況熟不熟悉。

我翻開地圖，首先對深圳河兩岸的地理情況進行了分析。如果能在河邊上生活一段時間就更好了。但是，怎麼才能到達河邊呢。

那時，深圳是邊防區，沒有特殊的證件不准靠近深圳一步，何況我這個上了黑名單的“投機倒把分子”，要拿到公社一級的證件是萬萬不能的！

不久，機會來了。

那時寶安縣正在大搞建設，建劇院啦、招待所啦，轟轟烈烈。寶安縣的人本來就少，都跑香港去了。而且自古那裡的人，就只會做生意，做工程是外行，所以總是到外面去請民工。

寶安縣的工地上，因此集結了一大批外鄉的年輕人。這些外鄉人中有的打工是假，瞅准機會逃香港是真。於是，我想方設法鑽入了寶安縣的建築工地，混進了打工仔的隊伍中。

有人問，到寶安縣打工的人有嚴格的控制，公安局都掌握著人員的花名冊的，你怎麼能混得進去呢？

這種表面嚴格的控制，實際上潛藏著驚人的大漏洞：今夜的人偷渡走了，下面不敢往上報，瞞著，明天又從外面招一批人來。數目沒有多大的變化。甚至人名也用逃走了的人的。公安局來檢查，那麼多的人，還能認出誰叫甚麼名字、甚麼面孔？

我在工地上混了一個多月，很快認識了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對周圍的環境也熟悉了。深圳河邊上，哪兒是山、哪兒是水、哪兒有哨兵都掌握了，連路上哨卡值班的規律都摸得一清二楚。

我的記性好，不用畫圖，也能全裝在腦袋裡。

一切準備就緒，我將手中承包的工程轉給了別人，拿到了一筆錢——幹甚麼都是要錢的，然後同幾個肝膽相照的朋友約好了日期，隨時準備渡河！

臨走之前，我決定再回家看看懷孕的妻子。也許還能看見她，也許死在渡河中，就永遠也看不到了……

我不敢往下想了，眼圈也濕了。

趁著夜色，我悄悄地溜回了家，不敢大聲，只敢用兩隻手指輕輕敲了敲門上的環。“吱呀”一聲，大著肚子的妻子就開了門。

“你還來呀，大隊的民兵下午剛來過了，來抓你呀，你趕快走吧！”

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聽見“汪汪”的狗叫聲傳來，妻說：“不好，他們又來了！”

果然，四個民兵衝過來，不由分說，把我五花大綁，送到了河田鎮關押起來了。罪名是企圖逃港。

奇怪的是，他們怎麼就知道我要逃港？這至今都還是個謎。

真是倒霉，還沒動身，就被關了起來。

身處囚室，心在河邊，一幫弟兄還在等著我呢，要是錯過了這次機會，又不知等到哪年哪月了。

為了能早點出去，我表現得特別老實，他們說甚麼我就承認甚麼，要我寫悔過書我就寫悔過書，要我交“浮財”我就答應全交出來。

看我態度好，又認罪積極，鎮委會關了我十幾天就把我放了，說是交

當地“監督勞動，以觀後效”。

走出牢房，我像是鳥兒出籠。我對著鎮委會“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監督我，到香港“監督”去吧！

這回真的要跑了。臨走前，我先到伯母家去看看，母親死後，伯母就是我的母親。

“孩子，走吧，你還是走好。”她用粗糙的手摸著我的臉，把掉在眼角邊的亂髮撫上去，“伯母，怕再看不見你了。”

伯母哭了，我也暗暗地流下淚來。

“孩子，你遭了十幾天的罪，也得吃餐飽飯上路，伯母給你做頓好吃的。”說著，就到廚房忙碌去了。

不一會兒，她就做了我最喜歡吃的，也是我母親常做的客家飯菜，熱氣騰騰地端上來了：“孩子，你快吃，沒你媽做的好吃。”

我心裡一熱，淚水都快要流出來了。想起母親在時，每當出門，她也是做著這樣的飯菜送我。

我喝下了伯母端來的一杯酒。

伯母啊，是你給了我鼓勵。這一生一世，即使後來我吃上了山珍海味，統統都比不上你給我送行的那頓飯！

我要走了！伯母打開門，一股夜風迎面撲來。

我得最後再去看一眼我的妻子，同她作最後的分別。

我靠近那間亮著燈光的小屋，心裡猶豫起來。妻子沒有多少文化，是個典型的鄉下女人，告訴她我要逃港，不但不能幫助我，反倒增加她心裡的壓力。我決心不告訴她。

看見我平安回來，她對著我看了半天，好像是在夢中相見。

我這才發現，家裡箱翻罐倒，已經給抄得個底朝天。我緊張地靠近床頭，在床腳下，有我藏著的兩百元錢，這是我逃港的經費。謝天謝地，它們都在！

靠近妻子，看著她虛弱的身子，鼓起的腹部，想起我今夜就要離她而去，生死未卜，不知能不能再見到她，也不知孩子生下來，她怎麼帶大……我的眼淚快要出來了。

我不敢再想下去，也容不得我再想了，唯一正確的辦法是早點走！

“我要到遠方去做生意了，一年半載是回不來的，得靠你自己照顧自己了。”她一聽這話，就“嚶嚶”地哭起來了。

“我知道你要做甚麼，我知道。”她忽然說。

我一聽，大吃一驚。她甚麼都明白啊，只是不說。

我生怕她聲張：“你快別哭了，讓人聽見又壞事了。我得走了，孩子出世，不管是男是女，都叫重陽。”

她一把抱住了我：“你不能扔下我們不管啊……”她的淚水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往下掉，地上都濕了。

我的心要碎了。妻子就要分娩了，我卻要“遠走高飛”，把她留在大陸。作為一個男人，這是多麼痛苦的事情！

“你等等好嗎，等到孩子出世，我同你一起走。我們死就死在一塊，好嗎？”

我愣住了，一個男人的責任，和追求自由創業的決心，在我心中廝殺著、搏鬥著。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潰了！

“你不要攔我，我要走了！”

不行，我不能讓妻子拖著，這裡是最最危險的地方！

我咬咬牙，摔脫了妻子的手。拉開門，一陣風吹來。

外面，是一望無際的黑夜……

三、深圳河上槍口逃生

死也要渡河

我知道，我不能後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賭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過河！

傍晚時分，我們接近了梧桐山。

梧桐山是偷渡香港的第一站。山高 998 米，道路崎嶇、荒草迷離。有人曾從山上摔下來摔死，有飢餓的越境者在山中為爭奪最後的一點口糧，互相殘殺而死。山上山下，不知留下過多少越境者的白骨。

我們一共有七個人，約好了在一片甘蔗林裡會合。

到了甘蔗地邊，我輕輕拍了一下巴掌，那邊很快有巴掌聲回應，過去一看：好傢伙，都來了。我們都穿了最能跑的解放鞋，為了防山上的蚊子，小腿又都用布條包好了，背上揹著一大堆乾糧，我們是準備在梧桐山中呆三天三夜的。那時候沒有塑膠瓶，沒法帶水，幸好山下有山泉，可以解渴。

還好，甘蔗地一帶沒有巡邏隊。遠遠的，一兩公里處的小村莊才有燈光。那個村子叫西坑，聽說那裡的巡邏隊很厲害，便遠遠地避開。

邊防軍的人數是有限的，主要搜索這一帶的就是民兵。我們都年輕力壯，只要沒有狼犬，他們是追不上我們的。

“帶好東西，上——”我一聲令下，七個人就穿過甘蔗林，向梧桐山跑。

“站住——”我聽見左方大約五十米的地方有人的喝令聲。接著，一頭狼犬兇猛地叫著，箭似的竄出來。

糟了，碰上邊防軍了，他們設了埋伏哨！

“快跑，不能停，分散跑——”邊防軍和幾個穿便衣的民兵向我們追來。

我們分散跑，狼犬就是咬著一個，也咬不了所有的人。我一邊叫著，一邊沒命地逃。

表兄和另外一個伙伴跟著我逃。另外四個以為巡邏兵追我們了，就原地躲了起來。

甘蔗“啪啪啪”地倒在地上，我用手分開甘蔗，發瘋似的逃命。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是死是活就這一次了！

不知跑了多久，再沒有人追的聲音了。我們爬上高坡，聽見原來隱蔽的地方傳來狗吠和人被打的嚎叫聲：唉，我的那四個伙伴一定是被發現抓了。

我們依然害怕狼犬來追，剛好旁邊有一條小河，就跑進河裡，順水而下——人下了水，狼犬就嗅不出氣息了。我們在黑夜中不知漂了有多遠，確信狼犬不會來了才上岸。

抬頭一看，眼前是一座險峻的高山——梧桐山到了！

幸運的是，這裡竟然沒有崗哨，我們安全地爬到了山頂。聽說那山邊有個危險的“老虎嘴”，我們特意地避開了。此時，七個人只剩三個：我、表兄還有一個姓邱的伙伴。

到達山頂已經是夜裡十一二點了。站在山頂上，香港的燈火就在腳下。一陣陣涼風吹來，好舒坦啊！

氣氛一時緩和了下來，肚子也開始懂得餓了，我便靠在一塊崖石上，打開乾糧包吃東西。那些餅乾，經河水一泡，都成了糊糊了，正好飽肚又解渴。

“永競啊，你到了香港想做甚麼呢？”表兄問我。

“先說你們吧。”我說。

“我沒啥要求。”姓邱的伙伴邊吃邊說，“就想吃一頓飽麵條。”接著他又問我：“香港人天天都能吃麵條吧？”

唉，那年頭，吃麵條也成了天底下最美的享受！

“我想開一家舖子，”表兄說，“然後把我老婆接過去，她看店面我進貨。再生個崽，讓他上有錢人的學校。永競你呢？”

我咽下一口餅乾：“我們拼了性命來，要是僅僅為了吃餐飽飯，我就不來了。要幹，就要幹一番大事業。我先從給別人打工做起，三年打基礎，五年成家立業，十年內開個公司，二十年要揚名香港。到那時再回揭陽縣拜祭祖宗！”

他倆都不由得佩服我有志氣。

也許是太累了，迷迷糊糊地我們就睡了。那晚，梧桐山的蚊子一定在我們身上佔了不少便宜。因為第二天早上一看，我們的臉上、手上，滿是蚊子叮出的紅點。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下山。

山南坡陡，我們拉著青藤往下溜，只聽見姓邱的“啊——”的叫了一聲，原來他踩到了一具屍體，還是個女的，二十來歲。可能是在向香港爬的路上餓死的。

唉，梧桐山啊，不知有多少逃港者就無聲地死在這山林中，他們的親人連屍體都收不到！

前面是一片稻田，稻田盡頭那波光粼粼的就是深圳河了。

“永競，你看——”表兄忽然指著稻田驚叫。

原來，稻田中東一個、西一個，藏著好幾個像我們一樣衣衫襤褸的準備逃港的人呀。

大家像是一下子都從地底下鑽出來了，都來這匯合了。

“你哪裡的？”

“惠東——”

“你哪裡的？”

“增城——”

唉，都是像我一樣呆不下去的人！

這是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卻像一支紀律嚴明、組織嚴密的隊伍。就要一起偷渡深圳河了，生與死的追求把人們連在了一起。大家藏在稻田中，都不說話。但從那淡淡的一句招呼、一個點頭中，你可以感覺——我們是可以生死與共的。

天，終於黑下來了，我們要向深圳河發起生與死的衝刺了！

真是幸運，這時天竟下起雨來了。一時烏雲滾滾，厚厚的雨簾遮住了人們的視線——這正是渡河的好時機。

像是約好了一樣，人們都躍起來，朝深圳河狂奔。一時間，稻田裡人影閃動，泥漿飛濺，發出一片噼噼啪啪的聲音。

也許是聲音太大了，遠處傳來了狼狗的叫聲。不好，又碰上邊防軍了。還沒等我定神，就看到一頭狼狗飛似的竄向人群。接著是“嘭嘭”的槍聲。邊防軍開槍了！

他們真的開槍啊！

此時的人群四處逃竄。像上次在甘蔗地一樣，每個人憑著本能做出選擇。而這一剎那做出的選擇又常常決定著一個人的生死：有人跳進了河裡，怕的又跑回山溝躲藏，還有人爬到了樹上躲避狼狗。

我知道，我不能後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賭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過河！

我終於跳進了水裡。我聽說過，下水就屬香港的領地了，但子彈還是在“嘭嘭——”向河上飛來，就在我身邊濺出一朵朵水花。我的命大，“噓噓”響著的子彈一顆也沒打到我！

我把一支蘆葦草管含在口中，鑽到了河底，槍聲真的不再朝我來了。大約過了十分鐘，我才敢探出頭來，看看情況。

我親眼看見，那姓邱的給拖著走了，樹上的人被狼狗咬著腿，從樹上

拖下來，鮮血淋漓，發出一聲聲恐怖的叫聲……

邊防軍終於朝西去了，我順著河水來到了一座橋下。我爬上岸，終於看見了香港的鐵絲網！

我知道我要勝利了，不知道哪來的一股力量，蹭地一下就爬上了鐵絲網的水泥柱，然後鬆手一跳，落在堅實的水泥地面上。沒站穩，屁股結結實實地給震了一下。

來前有人告訴我，中方的巡邏路是泥土的，港方的巡邏路是水泥的，我屁股給震了，說明真的到了香港啦！

我還以為是在做夢，回頭一看，高高的鐵絲網就在身後呀，我是真的過來了啊！

萬歲！我興奮得真想喊。

好了，我要投向那個陌生的城市了！

臨行時，我再看一看身上：長褲子在上鐵絲網時全掛破了，像是爛布條；身上的背包不知道哪裡去了，手掌上黑糊糊的全是血塊，滿臉的泥漿和髒水……

現在，我就這樣幾乎是赤條條地站在香港的大門口了。

在香港，迎接我的會是甚麼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

四、從苦力熬到大老闆

香港“二等苦力”

我還以為是我來晚了，但看見後來的伙伴都拿到了飯，便問怎麼回事。大師傅沒好氣地說：“今天飯少，要讓他們先吃，你們大陸來的沒這待遇！”

到了香港，我從苦力做起。

大陸來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術又都年輕力壯的青壯年，而香港的工廠裡，正好缺少這類的人。經熟人介紹，我跟兩個同伴進了一個毛線

工廠，專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裝車，然後卸到工廠裡。再裝了半成品，到另一個工廠卸下加工。每月工資 600 元。

沒日沒夜地幹，一大捆一大捆的貨物被扛起，每捆都有一兩百磅，壓在我的背上，從架在車上的“獨板橋”上走過去。一天下來，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動了。

一天，工頭跟我們說，誰願意加班給雙倍工錢，我一聽馬上答應。可沒措兩趟，就發現體力透支了，腿腳發軟，眼裡冒金花，“撲通”一聲倒在水泥地上。

就這樣我在小屋子裡，自我“照顧”調養了兩天，身體好一點，又去上工了。

這天中午，我回來得晚了些，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師傅卻說：“你們沒飯了。”我還以為是我來晚了，但看見後來的伙伴都拿到了飯，便問怎麼回事。大師傅沒好氣地說：“今天飯少，要讓他們先吃，你們大陸來的沒這待遇！”

一盒飯值幾個錢？太拿大陸來的不當人了！一氣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幹了！

說來也好笑，每當在別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勞動使我喘不過氣來時，我就偷偷地學唱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

“休看我，戴鐵鐐，鎖鐵鏈。鎖住我雙腳和雙手，鎖不住我雄心壯志衝雲天……”

我一直在找尋自己出頭的路子，我知道，高聳的大廈要從最初的第一塊磚墊起，要實現偉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紹我去一個藥店做學徒。我很快答應了，心想，做學徒就可以學到“藥”，學到了“藥”，說不定將來能開一間大藥店！

老闆是潮州人，姓陳名克文。他現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顧問。

做飯、打掃衛生、送孩子上學，像個男保姆。但為了理想，我甚麼都願意幹。

晚上舖門一關，架上兩塊門板，我就睡在藥店裡：一是解決住宿，二也防盜賊。

夜晚是我學習的好時候。藥店裡有不少的藥書，我就邊翻書，邊查對藥材。

這個時候，我又常記起小說《在人間》中的大作家高爾基，他也是當過學徒的，後來不也成了大事？

我總是用出色的人物來激勵自己。

我用訂書針釘了個本子，把每天晚上學習的心得記錄下來，便於記憶。

我還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這本子記的不是藥名、用法……而是專門記老闆在做生意時的方式方法、言談舉止甚至音容笑貌——

×月×日：一女人抱著孩子滿頭大汗，來店吵鬧要換藥。藥已用過，本不應退。但老闆毫不動氣，親為女人打扇送涼，並吩咐我換藥，還叫我打傘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闆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還抱著她的孩子。到家後此人感激不盡，後來成了店中常來的顧客……

半年後，姑表兄開了一家藥店，請我去幫忙。我便從小學徒變成了搞藥店進貨、推銷的……

又過了半年，我籌了五百元錢，同一位叫張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間小房，開始做藥材生意了。

全部本錢才一千多元，這個小老闆真夠可憐的。但這沒甚麼，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得好，小生意也可以變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囑自己：別貪多，別求大，賺多賺少沒關係。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貪黑，靠汗水來錢；大生意那是人家賺的，別眼紅。小生意賺得少，但賺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錢。

有時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參，手頭沒有貨我也應承下來，對客人說：“明天即送到府上。”實際上我的貨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應承後我撒開兩條腿，香港上下，東奔西跑為他找貨。千方百計找到貨後，買下來，再按時送到客人家裡。一天忙得疲憊不堪，也就賺了幾元錢。

但只要錢到手了，我就高興——集腋成裘。我們潮汕人的小本錢就是這樣滾大的。加上我幸運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幾萬元本錢！

於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 128 號，自己開起了一間“四海通公司”，專營高檔的營養品。

我為甚麼要做高檔營養品生意呢，這裡也有我的經營之道。

20世紀70年代後期，香港的經濟快速發展起來，人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荷包裡的錢一多，就考慮兩個出路：一個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開起來了，娛樂場所、健身房生意火爆；另一個是“吃”，人有錢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計地弄對身體有益的補品來吃。

就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我推出中國傳統的人參、鹿茸、魚翅等高檔補品。

但是，這種想法也不只有我一個人有。高檔補品店一多，就得看誰能拿到最便宜、品質最好的貨，誰能把手上的貨銷得最快。

到我這裡買貨，我會儘量給顧客讓利，決不斤斤計較。買少量藥材，零頭不要；成批量要貨的，給人家打折。還搞額外贈送。買過我的人參鹿茸的，過年會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禮品。要甚麼貨物，一個電話我就把貨物送到家。不滿意的，還包退包換。樣樣為買貨的人著想。

這些招式，現在香港的商家都會做了，但當時在香港都還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氣很快打出去了。

這就是我的經商訣竅，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經商一年多，我的財產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遠方，夫妻不能相見。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開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兒子的名字取名為“一洲”。

拿我兒子的名聲作保，表示在我店買的貨物，絕對可信可靠。不損人利己，不留罵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幾年，雖然有所斬獲，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溝中游來游去，雖衣食無憂，但要想成大器，卻是不可能的。

於是我決心冒險，闖出個自己的江山來！

但是，怎麼尋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終於有了靈感。

有一次，一個南美的老華僑來店裡買一斤人參要帶回南美去，問在飛機上怎麼吃。我搖搖頭：“很難。”他無意中感歎了一聲：“咱們中國的藥啊，比西藥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喲。”

老人的話使我靈機一動：中藥最大的缺點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這在惜時如金的現代社會，是個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補品製成便於攜帶的丸粒，坐在飛機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銷路。

於是我想到了製洋參丸，當時市面上還沒有把洋參製成成藥出售的，這條路沒人走過，可以走！

但是，製洋參丸要辦流水線、大成本，得冒險，得借錢興業。

成不成功，就在此一舉！

經朋友幫忙，終於借到了 40 多萬元。

1979 年 7 月 1 日，我在香港灣仔莊士敦道租了一個氣派的門面，光月租就一萬八。我像是一個賭徒，猛著膽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貨，後給錢，在他的藥廠加工了 2000 盒洋參丸，取名“一洲洋參丸”，先行投放市場。

現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參丸市場打開了，但當年誰知道你這個“一洲洋參丸”啊？要讓廣大消費者接受，得花一大筆錢去做廣告。負債也得做。

當時，手上的資金沒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著的一點首飾玉器都拿去賣了。我咬著牙，在港澳和國內外的媒體上發動了廣告攻勢——報紙、電視的廣告一齊上。

錢拋出去了，廣告也打出去了，但會有人來買嗎？

一個月過去了，沒有反應。

兩個月過去了，還是沒有反應。

我的心都懸起來了，難道錢丟到了水裡？

有朋友安慰我，廣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時間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們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著有訂單飛來。每天到郵差送信的時候，全家人都會到門口去望。等郵差的時間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 40 分鐘就到門口去等了。

我一邊等廣告的反應，一邊展開行銷的策略。

為了讓市場知道“一洲洋參丸”，我拿著登有廣告的報紙，到港九各家藥店挨家挨戶地問。

“老闆，你這兒有一洲洋參丸嗎？就是這個——”我指著報紙說。

老闆搖搖頭，他當然沒有。但老闆很機靈。

“先生，這個‘一洲丸’，現在俏得很啊，本店剛剛銷完，如果你要，請留下電話，明天進了貨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經“中計”，心裡暗笑。

回到家裡，他要“一洲洋參丸”的電話果然就來了。

就這樣很多人都感覺到：“一洲洋參丸”是市場上的俏貨！

四個月後，我收到了第一封從內地來的要“一洲洋參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幹部寫來的。

真是一發而不可收。緊接著，內地要洋參丸的信啊，訂單啊，不斷飛來，接著是台灣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來了。

“一洲洋參丸”的市場終於打開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順風……

1989年的國慶節，我以共和國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俯瞰城樓下歡騰的人群、海洋似的鮮花，我的熱淚突然湧了出來：想不到，我一個廣東偏僻山村的苦孩子，今天也能站在這裡！

家鄉啊，無論走到哪裡，你都是我的生命所繫！

1985年12月3日，從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後，我又回來了。

離開他時，我是個衣衫襤褸、一文不名的“投機倒把分子”，現在，我是為祖國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的“政協委員”。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親的小山崗，身後跟著市裡的書記、縣長、鄉長，還有一大批親戚朋友。

我跪在父親的墳前，哭得像一個淚人。

我拿有限的積蓄，在家鄉白石鄉辦了一所學校，用父親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學樓，讓更多像當年的我那樣的窮孩子能上學。大家都讚揚我的義舉，說我不計前嫌，誰又知道我的真實內心？

父母不在了，但還有一個父母在：我的家鄉！

(本章內容徵得編者同意取自陳禹山主編的《強人夢》)

第五章

撫不平的波瀾

——深圳河邊的社會主義大教育

第一節 北戴河的錯誤判斷

一、毛澤東北戴河一夜未眠

抉擇！

錯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勝不敗的將軍？至於當年那些做了“老實人”，說了“老實話”，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鬥爭”的人，應該給他們平反。

北戴河。清晨。

天，已經亮了。但海空上還有幾顆星光。

天還早，毛澤東夾了一支煙，走出戶外。衛士把大衣給他披上：“主席要出去？”

“是的，去散散步。”他這一夜又未眠，讓他想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

海邊靜悄悄的，沙灘空曠無人，海浪接著海浪，一波一波，堅持不懈地撲向沙灘，好像永遠也不會有休止的一刻。

人類社會的舞台也是一樣的嗎？歷史的發展，也是這樣的嗎？一波連著一波的，永遠也不會有靜止的時候？……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把人民群眾的熱情調動起

來了，創造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高速度。但接下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田地荒蕪、老百姓逃難，吃樹皮草根。他意識到，這同自己的“理想化”的“冒進”是不無關係的。記得，剛開始搞人民公社時，就有人提醒過他“搞早了”、“大躍進搞快了”、“口號喊大了”，這中間就包括武漢的李達，記得自己還同他發生過爭論。但事實卻證明人家是對的。

錯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勝不敗的將軍？至於當年那些做了“老實人”，說了“老實話”，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鬥爭”的人，應該給他們平反。對於自己的錯誤，也要公開指出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他就是這樣做的。

到1962年的8月，具體辦理平反的鄧小平，已經給全國600多萬幹部、黨員和群眾平了反。

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材料反映，被平反的人有的高興得跳起來歡呼，有的幸災樂禍地譏笑給他們平反的幹部，有人則公然宣稱說：“三面紅旗犯了錯誤”、“大躍進本來就是搞糟了嘛”。

而他的那些戰友呢？劉少奇沒作聲，內心是支持“平反派”的；周恩來在向知識分子搖橄欖枝，說他們現在都是“勞動人民”了；還有陳毅，他說要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糊塗啊！

無獨有偶，就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1962年6月，那個在廬山會議上被批判倒了的彭德懷，也跳了出來，向中央呈遞了一封長達八萬字的申訴材料，要求為自己“翻案”。

本來只是想“平反”了，給所有的人都平復平復，就像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的“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一樣。沒想到，他們的目的根本就不在這裡，他們的目的是要“翻案”啊……

翻案？翻誰的案啊？

不就是要翻我毛澤東的案嗎？不就是要重寫歷史嗎？不就是要把我毛澤東搞過的再翻過來嗎？

前不久，在習仲勳等人支持下出版了小說《劉志丹》，康生一見便指出：“這是為高崗翻案的”，還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如果照他們這樣，連高崗也要翻案了，如果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也錯了，那不就是我毛澤東的路線錯了嗎？

翻案風之外，還有一個更令他不安的事情，那就是農村的“包產到戶”。

所謂“包產到戶”，就是農村不要搞集體了，退回到土改的時候去，還是把田分給一家一戶，搞單幹。這實質上不就是否定他帶領人民走的這條“集體化”道路嗎？

這可是他毛澤東提出的根本路線啊！

本來，七千人大會上，部分地允許農民“包產”，只是恢復經濟的權宜之計，只是策略性的“退卻”。可是，許多黨的領導人就是不理解，把“退卻”看成是“放棄”，想著的還是私有化的路子。

“農業專家”鄧子恢自不必說，他還沒接受教訓，還在不同場合中提出要“適當擴大自留地”；管經濟的陳雲呢，最近也搞出個《青浦農村調查》來，大讚個體：“農民種自留地，積極性提高了”；至於鄧小平，他腦瓜子更是一有機會就會向“右”拐的，1962年7月，他就在大會上宣揚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才是好貓。”分不清路線了呀！

他也曾苦口婆心地教導他的這些戰友們：“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有的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放高利貸，討小老婆……”社會主義就向後退了，說明共產黨帶的這條路就失敗了。為甚麼他們就是不聽？背地裡寬容、支持、甚至提倡。這是為甚麼啊？

令人擔心的是，今天，就連他身邊最信任的人都在“動搖”，甚至可以說，跟他走的這支隊伍在發生分化了！

他想起與秘書田家英的那次談話。

二、“反對者”變成“支持者”

“農民還是要包產到戶。我看還是包產到戶好，這有利於調動積極性。”

幾個月前，田家英還是堅持反對“包產到戶”的。在廣州，田家英還將安徽省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他看，並含淚附信一封：“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互助求生。要求給一頭牛，一張犁，八個寡

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裡去！”說得多好，這就是中國的實情！這就是搞“包產到戶”的後果嘛！可是，還不到一年，兩個月前，田家英從外面調查回來了，立場全變了。

他點燃了一支煙，饒有興趣地等候田家英新的發現。

“農民還是要包產到戶。我看還是包產到戶好，這有利於調動積極性。”

田家英向他說起，農民認為公社搞的大集體生產不好，誰勤誰懶辨不清，積極性起不來。“要是把年產任務分到各戶去，讓農民自己來搞，勁頭就上來了，農民就有飽飯吃了。集體化還是個很長的路程。”

真是奇怪怎麼連家英也變了！毛澤東半天沒有吱聲。

突然，他提出了一個令田家英沒有料到的問題：“那你主張，是集體經濟為主好，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好呢？”

沒等田家英回答，他又接著問田家英：“家英啊，你的這個思想，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1】}

毛澤東警惕了，因為這一切已經觸及他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

也許，田家英還沒有意識到，他的話將在毛澤東的心中引起怎樣的波瀾：

看來，黨內黨外，確有一批人從骨子裡就反對走“集體化”道路，主張農民“單幹”，不同意我為中國引的這條路。他們只是礙著我毛澤東的面子不敢說。他們要翻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案”！

危險啊！

猛然，他記起 1959 年廬山會議前夕，見到賀子珍的那回事，離開時，子珍突然淚流滿面地向他說：“主席，你千萬得留心，王明這班人狠著呢，提防他們害你啊！”^{【2】}

這是甚麼意思，王明早已不在身邊了！誰害我？

海面吹來一陣陣的風，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慄。

他回過頭來，吩咐警衛員：“我們回去吧。”

他需要冷靜一下，需要慢慢地再思考，再仔細地分析。

【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29—1230 頁。

【2】 邸延生：《歷史的情懷——毛澤東生活記事》，新華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7 頁。

——

回到房裡，面對的又是桌上小山似的內部資料，他順手打開來看。

真是多事之秋啊，傳來的一個個都是叫人“警惕”的信號：蘇聯人在新疆塔城挑動邊民叛亂；印度人在喜馬拉雅山邊挑釁；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

他隱隱地感到有一股壓力——內的、外的——都在暗中積聚、匯攏，慢慢向他壓過來……

戰爭年代的“經歷”總是在“提醒”著他：這分明是一股在準備發動總攻擊的敵人呀！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煙……

於是，他的剛血個性、他的人生經歷、紛紜複雜的形勢，都在引導他向一個新的“判斷”逼近……

打開窗戶，海空遼闊。海浪拍崖，發出“轟、轟——”的巨響。它們還是那樣，不緊不慢，不停地撲、不停地退、又不停地撲……

這是甚麼，這到底是甚麼？這集合到一起向他撲來的到底是甚麼呢？

猛然，他明白了，明白了一個規律！一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規律：“階級鬥爭”是永遠不會停息的！

他吐出一口煙，揷滅了煙頭……

——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

對於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日子。在這一天，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極為重大，也是極為錯誤的對時局的判斷。

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是這樣寫著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他的判斷是：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之後，內外的敵人人還在，心不死，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以種種形式聯合起來，向無產階級的陣地進行反撲。

階級敵人或他們的影響，已經深入到黨內。階級的敵人，中國的赫魯曉夫，很可能“就睡在我們身邊”！

找到了！這就是幾個月來，種種跡象的本質，或者說是他時時感到的那個壓力的“源頭”！

這樣，他不僅放棄了中國共產黨八大以來有關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主要矛盾的論斷，把“階級鬥爭”當成“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來看待，而且認為這個時段不是“十幾年”，而是存在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到來之前的整個歷史時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幾百年！

這就大大改變了矛盾的性質。把階級的“鬥爭”，當成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的第一要義。

依照這種理論，“鬥”——長期的、複雜的，甚至是殘酷的“鬥”，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依照這個判斷，全黨要立即行動起來，牢牢抓住“印把子”，打退階級敵人從明裡來或者暗裡來的猖狂進攻！要立即在全國開展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新發動工人、貧下中農，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的權力再奪回來！

——

天，已大亮，關上窗，窗外海的波濤聲安靜了。

毛澤東吁出一口氣，向臥榻走去。

現在，他可以安心睡一覺了。

一位具有超人洞察力的領袖，此時卻朝著一條佈滿荊棘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節 在深圳河邊築起“鐵壁銅牆”

一、寶安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農民們看到“毛主席派來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動，有的抱來被子，有的送來糖水。但是，沒有人喝一口糖水，沒有一個人蓋老鄉的被子……

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後，全國組織了約 150 萬人的精銳幹部隊伍，稱為“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開赴各地，開展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抓“階級鬥爭”，把農村的陣地“奪”回來。

寶安縣的社教工作團，在 1963 年的 7 月 23 日到達了深圳河邊。

對於寶安縣來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反逃港。

當時，廣東省委直接抓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是後來的國務院總理，其時的省委書記趙紫陽。

開赴到深圳河邊上的社教工作隊，第一步工作就是“扎根、串聯”。

所謂的扎根、串聯，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時候的工作隊那樣，深入到每個農戶家中去，發動群眾。

一份材料記錄著當年社教工作隊，在寶安縣龍崗公社是怎樣扎根、

串聯的：

龍崗工作隊進村的第一夜，為了不驚擾群眾，沒有進農民的家，齊刷刷都睡在祠堂的屋檐下……

農民們看到“毛主席派來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動，有的抱來被子，有的送來糖水。但是，沒有人喝一口糖水，沒有一個人蓋老鄉的被子……

同村幹部當官做老爺的形象相比，工作隊一下子就取得了群眾的好印象。

工作隊員們還用種種常人難以做到的行為，感化貧下中農的心。

一位老工作隊員向我說起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可見一斑：

“當時，我與一位姓廖的工作組員，同住在一戶姓張的貧農家裡。張姓貧農全家三口，還有個五六歲的孩子，生活很艱苦，吃飯時，一鉢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飯，一點黑糊糊的從鹽罐裡拿出來的鹹菜。要是遇桌上擺有一碟冬瓜甚麼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們是不動筷子的，都讓小兒子吃。

“吃飯之前，五個人，他家三口，再加我們這兩個工作隊員，首先要圍著飯桌站立，由張貧農給大家講舊社會的苦、新社會的甜。接著，由老廖發音唱紅歌……”

“沒油水，下田幹活又累，肚子早餓得咕咕叫了。紅歌還沒唱完，眼睛早盯著桌上的黑鹹菜轉了。

“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還大，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終於，苦憶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來吃鹹菜飯了。

“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也許是太餓，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嚨裡的飯‘撲’地噙了出來，吐在桌上。張貧農氣得對著小孩頭上就是一筷頭，小孩‘哇’地就哭了。張貧農還要罵，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團飯，吃了進去。

“張貧農感動了，以後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調’到總團去了，後來當了秘書。”

“毛主席派來的人”很快在群眾中樹立了極高的形象，工作隊完成了第一步工作。

但是，往下要勸說群眾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隊內

部，對此的看法也不一致。

1965年11月12日，省委駐附城公社的工作隊印刷了一份名為《一場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辯論》的文件，從文件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情況：

“‘香港風’要不要反？在工作隊內部，大量的人感到這是個癩痢頭，難剃！基層群眾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們說，幾角錢分紅（指生產隊幹一天只幾角錢），怎麼能反掉‘香港風’？除非解放香港。”

面對複雜的形勢，工作隊沒有採用強壓的辦法，而是從人的“心”突破。

既然有人認為“香港好”，那就索性組織一場大辯論。

又如當年反“退社風”一樣，各村的辯論會積極分子帶頭發言，引導群眾。會議一開始，“香港好”的聲音佔了上風。很多人認為，雖然香港社會黑暗，但是，祖國政治好，香港經濟好：在港打工一月，勝過在家勞動一年；就算去香港討飯，倒痰盂也可以。

會議第二階段，針對暴露的情況，擺事實，算細賬，查危害，揭蓋子。

這份材料反映：“蓋子一揭開，大家大吃一驚：

各團委、分團長：

現把趙紫陽同志對附城公社反“香港風”的報告的批語，發給你們。這個批語很重要，請你們根據自己的情況考慮一下。

辛大光

十一月二十日

趙紫陽同志對附城公社
反“香港風”的報告的批語

寇慶廷同志關於清除“香港風”的報告，是一個很好的報告，建議印發會議閱讀。

寶安附城公社是“香港風”最嚴重的一個地方。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經過這次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上的一場大辯論，風向大變，情況大為好轉。說明這個問題並不是那樣難解決的。過去所以成為一個“老大難”的問題，主要是沒有認真地去抓，或者是抓的方法不對頭。

寶安附城公社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所以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效果，首先是由於領導上堅信羨慕香港的這

廣東省委社教工作團批“香港風”的文件

(1) ‘香港風’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 8901 人，男青年大一個走一個，許多社員說，如此下去，駛牛也無人接班。

(2) ‘香港風’吹得田園荒蕪，生產萎縮，分配逐年減少。每年損失數以萬計，而外流人員寄回來的錢卻寥寥可數。大家都說這是因小失大，虧了老本。

(3) ‘香港風’吹得幹部神魂顛倒，敵我不分。全公社有 83 名幹部外逃，有一批人當了叛徒。

(4) ‘香港風’吹得社員昏昏迷迷。男青年不願在家勞動，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

(5) ‘香港風’破壞了社會治安，四類分子幾乎全部跑光。”

……

會議的風向迅速轉過來了，很多人自覺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來做夢也想去香港，現在慶幸自己沒有上當。不少外流戶原來壓力大，後來也提高了覺悟，表示要動員親人回來……

趙紫陽親自在這份彙報大辯論的文件上批示：

“寶安縣附城公社是‘香港風’最嚴重的一個地方，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經過這次貧下中農會議上的大辯論，風向大變，情況大為好轉。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樣，開展一次反香港風的大辯論。”

這樣，一個關於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是建設家鄉好還是跑香港好的大討論，就在包括寶安縣在內的廣東省沿海的東莞、珠海、惠陽、汕頭等地普遍地開展起來。

二、西鄉大算賬——兩個制度的對比

香港“天堂”

“偷渡香港，要遭遇邊防軍的攔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風浪，有可能葬身魚腹。遇到親人要去偷渡，家人寢食難安；即使逃過去了，家裡人還是提心吊膽：男人擔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擔心兒女學壞、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歡……”

要怎樣才能打開群眾心中的這把“鎖”呢？或者說，你用甚麼來說服群眾不逃港呢？

就拿羅芳村來說吧，它的對面，南岸有一個村子叫較寮村。羅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一百多元，較寮村卻有一萬元，差距太大了，這個對比曾一度讓社教工作隊張不開口。

思來想去，工作隊發現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萬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來嗎，這事許多公社都出現過，這又是為甚麼呢？這說明，香港在群眾心目中，也不是甚麼都好嘛。

香港為甚麼不好？有哪些不好？這就是突破口，應該抓住這個突破口，仔細分析，仔細了解，便可以教育群眾。

省委領導指示工作隊員：

“你們要下去調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裡？社會主義好，又好在哪裡？不好，也要說出不好的道理來。”

“不做到心中有數，怎麼去說服群眾？沒有事實、沒有道理，群眾怎麼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開會鬥他，明天他又跑了。”

1965年11月，趙紫陽在附城公社掃“香港風”的材料上批示：“要敢於揭這個蓋子。要用大鳴大放辯論的方法，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依靠群眾，教育群眾。”

就在趙紫陽批示後不久，駐沙井公社西鄉的社教工作分隊，寫出了一份名為《西鄉大隊在港人員情況調查》的材料。

直到今天，筆者讀到這份材料時，依然不能不佩服西鄉工作隊出色的工作！調查“深入”，文章“頗具說服力”——它是怎樣證明“社會主義”好過“資本主義”的呢？

“香港真的就比西鄉好嗎？我們來看一看。

“探親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綠綠，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錢寄包裹回來……這些表面的東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撈到錢。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撈’嗎？”

文章舉出了頗具說服力的數字：

“解放前，西鄉大隊到香港謀生的共計82人。他們年輕力壯出去，現

在幾十年過去了，有的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基本上還是舊樣子，都還過著貧困的生活。

“據調查，這 82 人中，有 75 人還在為資本家打工，生活困苦，佔 91.4%；而有幸開上了魚檔、肉檔的，或生活稍好點的，只佔 8.6%。所以說，逃港者是極少數的人生活稍好了，絕大多數的人依舊貧困。”

沒錯，這是事實，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並非所有的人。

尤其是這些逃港人，還都碰到一個難題，就是建立家庭的問題。香港住房緊張，結婚費用很高，成個家不容易。

“這 82 人中，年過半百還是單身一人的竟有 13 人！河西一隊陳植財，在香港‘撈’了 23 年，甚麼也沒‘撈’到，至今還是個‘寡佬’。而他的弟弟陳秋權，沒去香港，就在生產隊幹活。現在結婚生子，生活穩定幸福。陳植財每次來西鄉探親，都要感慨道：還是你好啊！”

——真人真事，鐵的事實，對比分明！

“河東五隊溫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撈世界’，留得老母親在家。30 年了，因為說過不發財就不回家見母親，現在就是不好意思回來。僅僅在 1952 年寄過一次 200 元回家。母親臨終想見他一面，他都沒有回鄉。老母親直到死，都未能見兒子一面，相隔才十幾公里。”

解放前去香港“撈世界”的如此，解放後逃到香港去“撈世界”的人又會好嗎？

“全大隊 1962 年以來逃港的共 131 人。其中過去後靠給資本家打工的有 118 人，佔了絕大部分；另有 3 人投親靠友做了魚店老闆，一人做管賬先生，兩人淪為妓女，5 人下落不明（估計偷渡過海時已經葬身魚腹）。”

材料中句句說明，大陸解放後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貧的多，富或稍富者極少。原來想像的“發財夢”，並不是那麼容易達到的。

同樣，這批在港的 118 名未婚的外逃人員中，有 103 人至今沒有成家。

再拿同一家中的兩兄弟對比：

“河西二隊有個社員叫林植，有四個兒子。老大林貴生身強體壯、力大如牛。在家勞動時，可從兩里路外一次挑 200 多斤草回來。一個這麼好的勞力，在家鄉可以多掙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氣又有甚麼用呢？現在林貴生

在香港連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沒著落。最小的兒子林春耀，雖然體弱、勞動差。但留在這邊，反而結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過得美滿幸福。”

兩相對比，為甚麼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內地呢？

香港不但難“撈”，而且是一個害人的“陷阱”：

“河東八隊有個社員叫黃小沙，逃過去後，在香港這個染缸裡才幾年，就把吃、喝、賭、嫖、吹……甚麼惡習都學會了。他的親人強制把他從香港拉回來，戒毒治病。絕了惡慾的黃小沙身體才慢慢好了起來。現在他積極參加隊裡勞動，每天精神單純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個兒子，他感激地說：‘是社會主義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

事實說明香港也並非“天堂”，何況步向“天堂”的路上還充滿危險、充滿殺機，充滿陷阱——

“偷渡香港，要遭遇邊防軍的攔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風浪，有可能葬身魚腹。遇到親人要去偷渡，家人寢食難安，即使逃過去了，家裡人還是提心吊膽：男人擔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擔心兒女學壞、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歡……一些婦女說，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紅的變黑、心黑的要變爛。”

因為逃港，家庭發生變故的不在少數，文章舉出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廣州的知識青年李和平（代名），下放到西鄉大隊。因為人聰明、有知識，做了大隊出納，很快結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資本家的賬房先生。便很快跟一個年紀很輕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棄了原來的妻兒。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原是公社衛生院的護士，不得已也帶著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尋夫。誰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認前妻，把他們母子拒之門外。現在王修敏還流浪在香港街頭。”

有人反駁說，在西鄉大隊的逃港人員中，不是也有人“撈到”了，“發”了的嗎？為甚麼不也說一說呢？

是的，是應該說一說。

是不是有人“發”了呢？當然有。但所謂“撈到”了、“發”了的又是些甚麼人呢？

前面說了，西鄉大隊逃過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穩定職業的，僅佔8.6%，人數很少。而混得稍微好點的，更少。除了上面說的當了賬房先

生的李和平外，還有一個進了香港電視台的李大為（代名）、一個當了畫家的鄭少海（代名），兩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這兩人都是河東五隊的，出身地主家庭。他們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後台老闆的關係。”

“全大隊解放後出港人員，當了老闆、業主的，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和他們的親屬，在香港有關係幫襯的。”

很顯然，貧下中農出身的人，在香港幾人有富親戚？沒有幫襯，單憑一身死力氣，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發不了家的。

又有人說，跑不跑香港，那是別人心甘情願的事，又沒佔社會主義的便宜，還每年寄外匯回隊裡來，幫助國家搞建設，這不是好事嗎？

那又來算算這筆賬吧：

“西鄉大隊六年外逃出港共 131 人，平均每年每人匯回家鄉的款是 110.9 元。這些外逃人員都是好勞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隊正常的勞動值計算，每個工分 1.35 元，每人每年可收入 675 元，扣除每月生活費 20 元（按一般社員的生活水準），每人每年應能為家庭提供 435 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給家裡提供的要多 324.1 元。”

可見，如果這些人留在內地，給家庭創造的收入更多。他們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還能留下幾個錢寄回來呢？

外逃人員給家庭提供的少了，那麼外逃人員的家屬是靠甚麼生活的呢？

材料又算了這個賬：

“留在大陸的家屬，他們仍然享受著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低物價、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費在合作醫療就診、孩子上學享受免費……”

他們在內地的消費遠低於香港，從兩地的物價比較就可以看出來：

“大米每斤價是 0.28 元，而香港每斤大米價 1.32 元，差不多高了 4 倍！油每斤價是 0.93 元，而香港每斤油價是 4 元，也差不多高了 3 倍！糖每斤價是 0.68 元，而香港是 2.4 元，高了 2 倍。”

“外逃人員，依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把他們養大，培養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們為社會主義出力的時候，卻逃到了香港。丟下父母子女

由集體來供養。

“有個女社員，丈夫逃到了香港，丟下她和三個小孩。丈夫每年寄回來的才四百元。這女社員口口聲聲說一家人是丈夫寄錢養活的。試問，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帶去香港，吃飯、讀書、住房、看病……靠這四百元養得起嗎？那又是誰在暗中養了他們家中的四口呢？是社會主義，是集體！”

“逃港者享受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卻逃避了對社會主義和家庭應盡的責任。”

應該說，這是精闢的、頗具說服力的說法！材料最後一錘定音“外逃是可恥的！”

一個擺事實、講道理，反擊“外逃風”的群眾大辯論在寶安縣掀起來了！

村村開辯論會，隊隊開鬥爭會。大榕樹下、宗族祠堂都變成了辯論台。逃港次數多的，或者聯絡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來，貧下中農紛紛跳上台同他們算賬、講道理……

在社會主義教育的風暴中，在階級鬥爭的重壓之下，在反反覆覆宣傳



批逃港群眾大會

的叫人理不清說不明的“道理”、“數字”下，要逃的人猶豫了。

果然，深圳河邊沉寂了。

據有關的材料統計，1963年後，深圳河邊逃港的確減少了！

“路線鬥爭教育”在一個時期，的確起到了作用！

然而，“逃港風”能夠就此平息嗎？卓絕的思想工作又能夠奏效多久呢？

第三節 西坑之戰——社會主義陣地的爭奪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舜

“你是誰——”他驚奇地問我。
“一個喜歡尋根究底的記者——”

“老闆，請來一盒王老吉——”

這是 30 多年後，即 1999 年的夏季一個炎熱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邊的一間小雜貨舖邊歇息。

天氣太熱，雜貨店老闆正在樹蔭下同人下棋，似乎很專注。

“老闆，請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聲音。看來，老闆並不把生意當回事，那盤棋好像比他的生意還重要些。

“好的——”小舖老闆終於放下棋子，搖著蒲扇，拖著一雙拖鞋，“的啪的啪”地過來了。

老闆看上去五十幾歲，典型的廣東人瘦瘦的身材，很熱情，接了我的錢，一邊看了看我滿身汗漬的衣服問：“你是來找工作的吧？”遞上王老吉，見我沒回答，又走去棋盤邊坐下了。

其時，小店舖的前面，已經建滿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資的廠房。

我也走了過去，搖搖頭：“不，我來你們西坑村採訪。”

“你是記者——”他偏過頭來，似乎微微有點驚異，“你的車呢？”

“我是抽空來的，沒有車——”

“啊，坐公共汽車呀？那你走了很遠的路啊。”我感到他臉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

“到西坑村採訪誰啊？”

“你——”我對他說。

“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懸在半空，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進，二沒發家，三不偷不搶，你採訪我幹嗎？”懸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

“我還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沒出聲，似乎不值得回答。

“你姓魏——”我突然說。

他驚異了一下，感覺來得奇怪。

“你叫魏天燐——”

夾著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

“你是誰——”他驚奇地問我。

“一個喜歡尋根究底的記者——”

魏天燐，20世紀60年代廣東省社會主義教育的紅色陣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物。

二、神奇的西坑俱樂部

真實的事，真實的人，俱樂部台下坐的就是黃梅芳的親人、鄰居、同學、朋友……想起活脫脫一個美少女就死在街頭，誰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淚，台下聽山歌的人也流淚。

俗話說“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說的是偷渡時梧桐山的重要。

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從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經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參大王莊永競說“土八路厲害”，差點被邊防

軍和民兵抓到的地方。

由於位置重要，西坑村歷來就是香港煽動外逃的間諜組織和大陸的公安部門的必爭之地，兩邊都在村中安排了內線。國民黨特務組織更放言“早晚會砍掉西坑這面紅旗”。

外逃香港，在這裡太普遍了。照村裡人的話說是：“拿把柴刀上山砍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沒人攔得了你？”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隊外逃的就有700多人，佔了全大隊總人口的30%。

群眾跑還好說，共青團員也跑、共產黨員也跑。全大隊18個團員跑了7個，連黨支書、團支書也都跑了，支部開會都開不成。

“每天早上打開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傳遞：昨晚誰誰……跑了。”魏天舜說。

“縣裡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沒想辦法治，治不了啊——”

開批鬥會，把抓回來的人戴高帽批鬥，外逃的人反責問抓他的民兵：“你鬥我，你保得了明天你不跑嗎？”

社教工作隊說：這是給社會主義丟臉！給共產黨丟臉！

因此，寶安縣委決心在這個“據點”上，同“資產階級”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紅色堡壘建立起來，刹住外逃風！

1961年7月，寶安縣委把經驗豐富的鍾方亮（代名），從外地調回了西坑大隊做黨支部書記。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對著雲蒸霧繞的梧桐山，鍾方亮陷入了沉思。

為甚麼西坑的反外逃總是不見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還有甚麼在起作用？

正是學校放暑假的時候，一個個從城裡、從鎮上回來的中學畢業生，揹著背包高高興興從他眼前走過。有的開玩笑：“別進村了，直接爬山過去算了。”突然看見站在稻田邊注意著他們的支書，嚇了一跳：“啊，是鍾支書啊——”伸伸舌頭，不敢作聲了。

為甚麼這些中學畢業生，才出學校門就直想著跑啊？鍾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個問號在他頭腦中閃過：西坑村中，哪種人跑得最多？年輕

人。年輕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學校畢業生。幾乎畢業一個跑一個！

對了，鍾方亮的頭腦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讀書的青年，哪個沒有理想？幾個是還想回到西坑村來做農的？人往高處走，那是對的嘛。他們畢了業，在外面又無法找到工作，即使回來，西坑一個窮村子怎麼留得住他們？留住了他們的人，心還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嗎？你就是再對他說香港不好，再搞對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說成是個火坑，他們還是會想：我不信，是個火坑也要跳下去試一試。青年人嘛！

還有一個情況很能證明這個判斷：其他村素來是男的跑女的不跑，而西坑村，連女的也跑。那麼跑了的女的又是哪些人啊？鍾方亮扳著指頭算了一下：對，還是那些讀了書回鄉來的女青年。她們找對象都想找到河那邊去。而真正結了婚、生了孩子的婦女，心定了，跑的人就較少。

問題就在這裡，應該留住他們的“心”，否則留不住他們的“人”。

但是，西坑是個小村子，又窮，又偏僻，晚上一黑，小村莊就像黑鍋一樣，關門睡覺，死一般沉寂。拿甚麼留住人家啊？這批在外打球、看電影、演戲……過慣了文體生活的青年人，怎麼坐得住啊？還不是三個五個便湊到一起。湊在一起說啥呀，三句話不就說怎麼跑香港嗎？

鍾方亮一拍腦袋，計上心來。

不久，社教工作隊也進了村。鍾方亮把想法同工作隊賀隊長一說，兩人一拍即合。於是召開黨員大會，宣佈新的思路。

誰知決定一宣佈，黨員會就炸開鍋了。

“甚麼？辦文化俱樂部？”

怎麼鐘支書和工作隊來了，不抓政治、不抓生產，抓起文藝來了？

“對，把祠堂啊，空房啊，都騰出來，辦俱樂部。讓青年人好讀書、唱歌、演戲啊！”

這是幹嗎呀？沒事幹啦？要把西坑村辦成個文工團怎麼的？

“文化很重要，嗯。”屋角上有人吞吞吐吐發言了，“咱們的工作隊很正確，毛主席就很重視抓文藝工作的嘛，對不對？不過，現在是農忙了，稻子在田裡腰彎得要貼水了，要割了。農閑我們還是要抓的。對不對？賀隊長——”這人問工作組的老賀，繞著彎來反對。

“還是先抓反外逃吧，鍾支書——”有人提醒鍾方亮，“你是老抓偷渡的了，還不知道？年年是稻子一進倉就會跑人的。到那時，你收場都收不住的啊。”

“我看要開始開鬥爭會了，鍾支書，”有人提醒說，“好久沒開了，口號都忘了。不鬥地主，這批年輕人，我可鎮不住呀！”治保主任在角落中叫苦。

鍾方亮在心裡想：就靠開大會，掛黑牌子，鬥爭四類分子，年年都這樣搞的。你嚇住了人嗎？反掉偷渡了嗎？

大家七嘴八舌像開鍋的熱水，議論開了。

鍾方亮敲敲桌邊：“別嚷嚷！別嚷嚷！大家都聽著。稻子要割，不割稻子就會爛在田裡，這裡要造反——”鍾方亮拍拍肚皮，“外逃呢，更要反。不反外逃，社會主義爛在我們西坑，反動分子要造共產黨的反！”

支書這話說得在理。大家的眼睛都看著他。

“不過，目前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別的，是辦文化俱樂部！”鍾方亮堅定地說。

他想：要搞思想教育，群眾開會都不來，你能把人團結在身邊？你能收得攏人心？先得給青年人有塊好玩、好樂的地方，把他們吸引住，才能找尋機會，把他們往正路上引。

政治思想工作啊，不能專靠來硬的，不能靠鬥啊，掛黑牌呀……他記起一位領導對他說過：“藥”要做成糖丸，老百姓才願“吃”。

西坑的文化俱樂部辦起來了！

最高興的當然是那批青年人了。從來上面來的人，只會叫他們“鬥爭”啦、“階級”啦，男青年發梭鏢、女青年糊高帽子……還從來沒有誰想到要讓他們“玩”得開心的。

“賀組長，你們是這一個——”有青年伸出大拇指誇獎老賀說，“進村就給咱們青年人辦了件好事。”

“可是我們是兩隻空巴掌，對不住你們啊——”老賀說。

“俱樂部空蕩蕩一間屋，沒器材，隊裡又拿不出錢給你們，”鍾方亮說，“這個問題沒辦法解決。”

“不就是錢嗎？我們不要領導出錢，只要領導支持，我們自己帶傢伙

來。”青年人說。

第二天，青年們把自家的圖書啊、象棋啊、胡琴啊……都搬到俱樂部來了。

有的開玩笑說：“鍾支書啊，你要是同意，我就把床也搬來俱樂部，我就討俱樂部做老婆了！”

“哈哈——”俱樂部全屋的人都笑了。

報名的一下子來了幾十個。全村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都進俱樂部了。

夏夜，是西坑村最美的時光。當月亮升上了天空時，俱樂部裡就傳來一陣陣悠揚的胡琴聲、笛子聲、歌聲……

後來，在廣東省委要求各地學習西坑村的文件中，對這個大隊俱樂部做了如下描述：

“這個俱樂部有音樂組、戲劇組、國技組。每天勞動完了，吃過晚飯，洗完澡，換上乾乾淨淨的衣服，青年男女就往俱樂部去。各人根據自己的愛好參加活動，痛快地玩一兩個小時，到九點鐘左右就散夥回家睡覺。一天的勞累就煙消雲散，明天再精神飽滿地上田勞動。”

拂著夏夜的涼風，鍾方亮背著手在俱樂部外面的小路上走著，他露出了微笑——該醞釀第二步了。

幾天後，團支部書記楊譚發來到俱樂部說：“我想給大家出個題目，看看大家怎麼想的。”

胡琴、笛子聲馬上停止了。

“大家有沒有想過，我們革命青年到俱樂部來，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問題大家沒想過，一下把大家問住了。

“不就是來唱歌、拉琴、玩樂兒的嗎？”有人答道，“還有甚麼啊？”

“不對，”團支部書記說，“如果我們來俱樂部，僅僅就是為尋樂兒的，我們同舊社會的地主小姐、少爺們不就一樣了嗎？”

沒有聲音了，團支書這個說法很對啊。

“光是玩樂，行嗎？楊小亮，你想想，”他對一個胖胖的拿著笛子的小夥子說，“天天吹笛子，地裡能吹出莊稼嗎？鍾壽嬌，你的嗓子好，但是歌唱得再好，能唱出穀子嗎？也不能。光會玩樂，只是低看了我們革命青年的志氣！”

滿屋子人的眼睛都被團支書吸引住了，團支書還要說甚麼話？

“我們到俱樂部來，就要學政治、學毛著。用毛澤東的思想把我們的頭腦武裝起來，戰天鬥地，徹底改變我們家鄉的面貌。為了這個目的來俱樂部才有意義！”

大家都安靜了，覺得這說法對。

“那你說我們怎麼做？”楊靄祥問。

“學毛著啊！”楊譚發說，“首先通過我們俱樂部學毛著，把全村人學毛著帶動起來。轟轟烈烈幹秋收！”

那天晚上以後，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很快就在西坑村掀起來了。

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

“學習毛著、鬥私批修。”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

田頭的井邊，插上了語錄牌：“抓革命、促生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俱樂部裡，音樂組在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

一到天黑，從大人到小孩，從婆婆姥姥到“紅領巾”，一串串的人流都進了俱樂部來集體學毛著。

滿村的革命歌聲、滿村的毛主席語錄朗誦聲……西坑村果然出現了一個濃濃的政治氛圍。

稻穀收割完畢之後，鍾方亮想，現在到了把群眾引上“反偷渡風”的時候了！

首先，他把全村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都請到俱樂部來。

貧農楊長樂還沒上台就失聲痛哭：“年輕人啦，你們要吸取我的教訓啦。香港哪是天堂，那是火坑啊。我解放前跑到香港，生活不下去。親生女兒就是在那裡賣掉的，現在還不知道在哪裡呢！”

貧農羅東明 1956 年偷渡到香港，在牛肉行砍傷了自己，無錢醫治，老闆把他趕出了牛肉行。女青年曾小麗小學畢業後，不安心家鄉生產，逃到香港，被騙做了別人的第三個小老婆。不久丈夫去世，懷著身孕，

當年農村文藝宣傳隊
自創的節目手稿



現在還牽著孩子，流落在香港街頭，想回來又不好意思……一個個故事被組織成“反偷渡”的好教材。

“口述家世”的教育好，“身演家世”的教育更好：

西坑一隊有個貧農社員叫何二姐，兩個年輕的兒子被惡霸活活打死。俱樂部的戲劇小組根據這件事編出了《仇恨》一劇，安排一名叫鍾壽嬌的女青年擔任主角。結果鍾壽嬌不但放棄了外逃的想法，還申請加入了共青團。

西坑村還有個誰都知道的少女叫黃梅芳，長得漂亮人又聰明。從學校畢業後，一心想找個好的出路，拼著性命偷渡到了香港。滿以為好日子來了，誰知卻被騙和一個流氓結婚，染上梅毒，流離失所，慘死在香港街頭。

俱樂部的戲劇小組又根據黃梅芳的血淚史，編出了小戲《可憐少女黃梅芳》，並編了一首長達三百行的客家山歌。

真實的事，真實的人，俱樂部台下坐的就是黃梅芳的親人、鄰居、同學、朋友……想起活脫脫一個美少女死在香港街頭，誰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淚，台下聽山歌的人也流淚。

就在演出到黃梅芳倒在香港街頭，淒冷冷無人收屍的一刻，突然，從黑壓壓的人群中站起一個人來，高喊一聲：“打倒萬惡的資本主義！”

全場立刻一片雷鳴般的喊聲：“打倒萬惡的資本主義！”

那人便是團支書楊譚發。接著，他又領著群眾喊：

“逃亡香港死路一條！”

“堅決打退逃港風！”

“社會主義祖國萬歲！”

俱樂部裡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反外逃”的浪潮。

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工作組，她是女青年羅麗英（代名），她要同來訂婚的“香港客”斷絕關係。擺脫了“香港客”的羅麗英，後來嫁給了本村的五好民兵曾小建（代名）。

羅麗英之後，又有一位印尼的歸僑，父母都在香港的賀玉鳳（代名）找到工作組。表示，父母反覆來信要她去香港，她決心已定，就是大陸好，她愛大陸，不愛資本主義，她哪兒也不去。她咬破手指，給工作組留下了一封表示決心不去香港的血書。

決心留在西坑的賀玉鳳，後來果然愛上了村裡的五好民兵卞春來（代名）。兩人海誓山盟，堅決不逃香港。最後兩人結婚扎根西坑。

據後來的一份文件記載，在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全大隊有 28 位準備嫁給香港人的姑娘，斷絕了婚約。

正當西坑俱樂部辦得火火熱熱的時候，1962 年，一場聲勢浩大的“外逃風”捲地而來。從廣東到湖南，從惠陽到湛江，前後數以十萬計的群眾逃港。

西坑大隊經受了一次最嚴峻的考驗。

每天成千上萬的偷渡者從村邊上經過，呼喚著西坑村的人：“走啊，走啊，快同我們到那邊去過幸福生活啦！”

鄰近才一里半路的塘坑村，跟著跑了 50 多人，全村 15 個黨員，有 11 個認為內地不如香港。連黨支部書記的兒子也跑了。

而西坑村呢？

“這裡山頭的草都踏平了。村裡就是沒有一個人外逃。”

“事實證明，狠抓政治思想教育與不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一樣。堅守社會主義陣地和放棄社會主義陣地，就是不一樣。”

這是一份上報材料中對西坑村的評價。

中共廣東省委從西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的“階級路線”、階級教育來治理“外逃”的希望。

1962 年的外逃風過去後，中共廣東省委決定號召全省學習寶安縣西坑村。

1963 年 3 月 21 日，中共廣東省委以《一個堅強的社會主義思想陣地》為名，把西坑作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向廣東全省推廣。

1964 年，西坑村團支部書記楊譚發作為全國共青團員代表大會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大會，聽到了胡耀邦總書記的講話，還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

眨眼間，西坑成了全縣乃至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西坑村參觀學習的人敲鑼打鼓、絡繹不絕，村外的小山上都踩出了一條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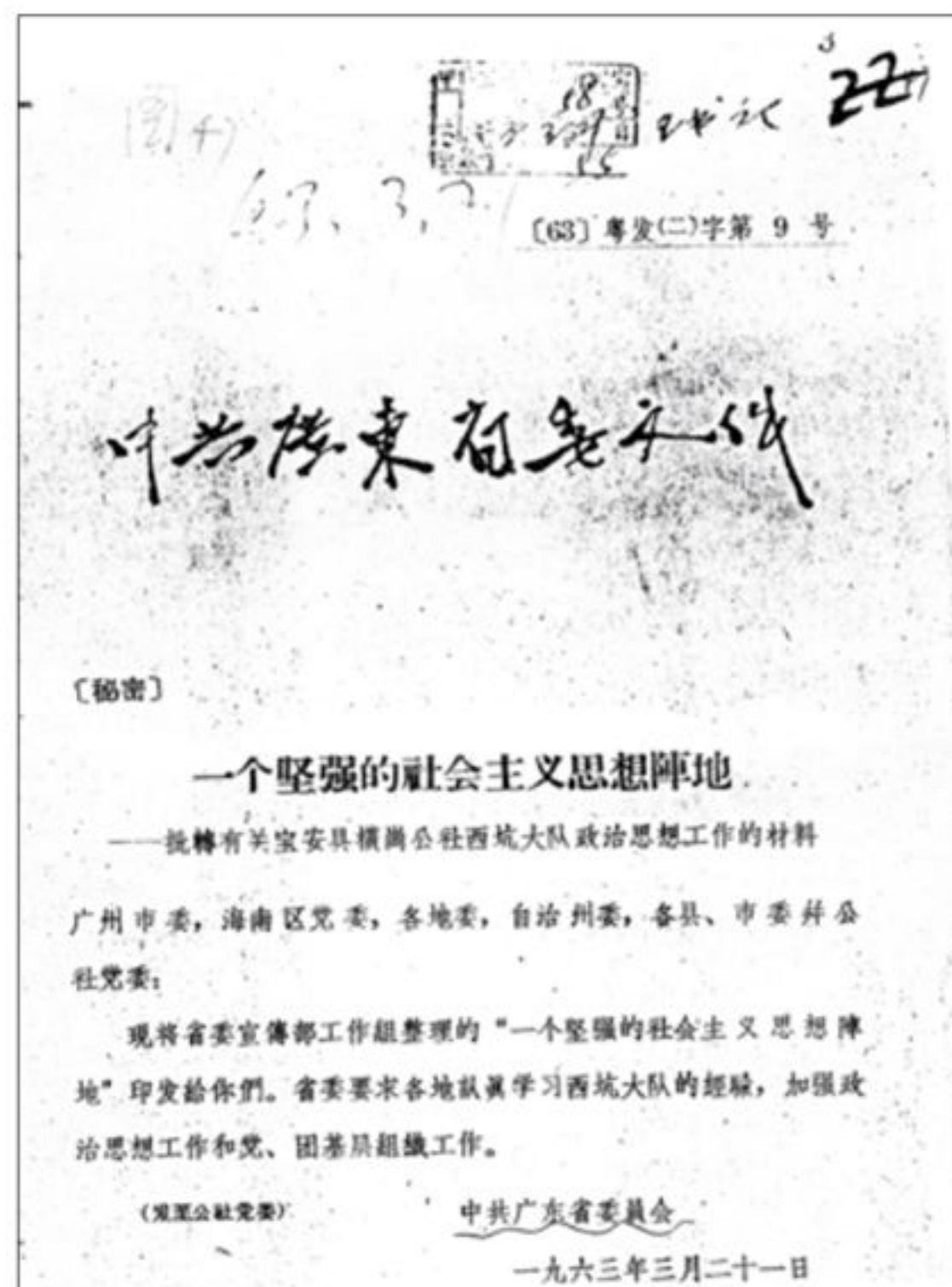
人太多，廣東省委和寶安縣委的領導覺得，這樣一天成百成千的來，光接待西坑村也受不了，倒不如走出去，組織西坑的人到全省各地去宣講。

除了領頭的鍾方亮、楊譚發、楊靄祥等人外，還應該有一個能現身說法、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教育大家的人，最好是跑過香港又回來的人。

西坑有這樣的人嗎？有。

有人向工作組推薦了一個人：魏天舜。

廣東省委號召學習寶安縣西坑大隊的文件



可以多种多样。其中，运用本地里的真人真事，找象魏天舜这样遭遇的人物进行现身说法，更是特别有说服力，可以收到更加良好的教育效果。只要认真组织，这样的人和事各地都可以找到。

如果你们认为需要，可把这个材料翻印给团员青年阅读。

在进行两种制度、两个社会的对比教育中，各地有好的经验、好的典型材料，希及时报告我们。

(发至公社团委)

共青团广东省委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

在香港三个月的遭遇和见闻

——青年魏天舜的自述——

我今年二十三岁，出生于英属尖美架。十五年前，当我八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母亲改嫁，父亲便把我和大哥托人带回家乡——现在的宝安县横岗公社西坑大队，并许给我伯母做儿子。我伯父、姊姊、哥哥、舅舅、堂表兄都在香港，有的开杂货铺，有的在纱厂做工。

去年五月间，我以为有那么多亲戚在香港，过去可以找个理想的职业。于是，借口去香港伯母处取回生母（在英属尖美架）寄给我的钱，要求大队给我开了一张“河边纸”（证明）。二十二日，我动身去香港，路上我想：要是能找到一个理想职业，就不回来了。

到香港，我先到伯母处，并暂在姊姊开的杂货铺帮工。一天只吃两餐，一个工钱也没有。我满想这样姊姊婆家的人不会有意见吧。谁知做不够一个月，她家婆就冷言冷语了，说什么买进来的菜亏了本啦，生意难做啦，等等。她家一个亲戚也跟着说：“亏本不怕，叫魏天舜从大陆担柴来就得吃。”言下之意，不是明明在赶我走吗？（想起来，我便离开了姊姊的店铺。第二天，我请伯母带我找堂表兄，想通过堂表兄找分工做。

· 2 ·

用青年教育青年。曾逃港的青年魏天舜自述。

這個魏天舜父母都在英國，1961年他到了香港，給資本家打過工、被老闆炒過魷魚、露宿過街頭、給資本家倒過馬桶，還親眼看見因為躲債，一對香港夫婦抱著兒女從高樓上跳下的慘劇……照他自己的話說是：“看透了資本主義的世態炎涼”。1962年，魏天舜回到西坑，黨團支部熱烈地歡迎他。他回來後表現不錯，口齒伶俐、思維敏捷，人又聰明，堪當大任。

1963年6月18日，共青團廣東省委把魏天舜的事跡，以文件的形式發給全省學習，題為《在香港三個月的遭遇和見聞——青年魏天舜的自述》。

三、梧桐山下的“紅旗”倒了

沒想到數年之後，就是在接著而來的大外逃風中，這個由多少個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堡壘，梧桐山下的一面“紅旗”，真的倒了！

“你要走了嗎？陳記者——”顯然，幾個小時親切的交談後，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

看見我要走到村口了，魏天焱又跑出小店來送我。

“我還有句話對你說，行嗎？也許你還用得上的。”

“行啊。”我把採訪本拿出來，將黃布包墊在路旁的石頭上，放上本子。

“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幫上忙。”他說。

“啊——你講。”

“你知道我當年很紅的啊，是吧。本來嘛，回來是相信黨嘛，對不對？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他們抓起來了，說我是特務。吊啊、打啊，我是逼打成招啊。後來，就把我關到了韶關的第二監獄，判了我18年刑啊，陳記者，這樣的冤枉事都有啊！被抓走時，最小的孩子才四歲，拖著我的衣衫哭。好慘啊，陳記者。”

這位年近六十，頭髮已經斑白的老人，當年的青年積極分子，眼裡瞬間泛上來一層閃動的東西。

“為甚麼抓你，總得有個說法吧。”我問。

“我是找了他們討說法，他們回答說，魏天焱同志，賬就算在林彪四人幫身上吧。”他歎息了一聲。

“你的意思呢？”我問。

“我找你就是這件事，你們做記者的，能不能替我們這些人討個說法，記者主持公道嘛！”

我半天沒作聲，說：“我理解你——天焱兄，你是想政治上有個清白。”

聽到這句話，他眼圈都紅了：“是的，陳記者，你說到我心檻裡去了。唉！”他歎息一聲。

他把我送到汽車站，準備要走了，忽然回過頭來，悄悄對我說：“陳記者，還有一件事，你別弄錯了。”他鄭重提醒我。

“還有事？”

“就是我們西坑那事啊。反偷渡典型的那事。”

“怎麼啦？”我問。

他沉默了一下，放小了聲音，似乎怕人聽見：“那事情後來變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據說當年香港的國民黨勢力，有意在西坑村同共產黨角力，要砍掉西坑這面“紅旗”。

他接著說：“他媽的，後來真的給他們砍掉了！”

1973年寶安縣公安局的《外逃情況報告》就指出：“駐港敵特機關妄圖掀起外逃高潮，實施一個梧桐山計劃，拔掉西坑村紅旗。”

沒想到數年之後，就是在接著而來的大外逃風中，這個由多少個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的堡壘，梧桐山下的一面“紅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壯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西坑二隊的男勞動力全部跑光。有個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無論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無論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強大，最後還是無法改變人民群眾對經濟生活的追求。

只有改革開放，才是唯一的出路！這是筆者採訪西坑村後最大的感觸。

此後文化大革命中的西坑村更慘。團支書楊譚發被鬥得死去活來，這個根正苗紅，三代苦出身的貧下中農，“罪行”很奇特。

“壞事就壞在他見毛主席這件事上——”2009年，當我再去西坑村座談時，決心寫村史的楊幹煌告訴我。

楊譚發從北京回來後，大家都好奇，問他毛主席長的甚麼樣子，他說：“毛主席好高啊！手指頭很粗很大，每根都有香蕉那樣大。”

甚麼？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手指比作香蕉？他被誣陷為“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被鬥得死去活來。

直到他死，這位社會主義陣地上赤誠的共青團員，依然揹著“反對毛主席”的罪名！

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啊！

四十年後，魏天舜在座談會上談起往事依然十分激動。



四十年後西坑的面貌完全變了，在明亮豪華的辦公室，知情人座談往事，恍若隔世。

第四節 “愛”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發丈夫偷渡

妻子“大義滅親”

一個個“大義滅親”的英雄人物，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教育下，無情地供出、鬥爭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實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小沖村的老人至今還記得那一幕：新羽被捆著雙手押出村，美容像瘋了似的跑出門去，癡癡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來，黨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我在翻閱有關寶安縣偷渡的歷史資料時，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資料在羅列了反偷渡英雄人物，包括前後俘獲偷渡人員 157 名、接受毛澤東授槍的民兵隊長郭勝全、與偷渡分子搏鬥的看林社員戴意友等人的同時，還特別開闢了一個專欄，叫做“大義滅親”。專門記錄那些在反偷渡中，勇於揭發親人的“英雄人物”。

如材料中記載，西鄉 × × 大隊檢舉哥哥羅為明的羅龍詳（代名）；墟鎮（深圳鎮） × × 單位檢舉丈夫劉東海的紀蘭香（代名）；布吉鄉 × × 生

林馬金用船載人組織偷渡案因親人揭發告破，他在被派出所審訊筆錄時仍不解行動因何暴露。

這次是河被扣。
想團裡個人偷渡經過此扣。
怎樣個人偷渡，把詳細過程講清楚。
約二十天前，有女人譚月與林順內人她到蛇口收買鋼鋼船鐵的到蛇口，當時我在蛇口真得，譚向我耳人過海不，如要的話個人幫一百元或十元人民幣做商勞其由於自己家人在蛇口，我向有几个人去，譚說三人至五人過了三天我想一個人無法駛船就去找林順(林順)打的高價過林順我出錢個人我出一百元，心譚我向林順如果取做就找林順(即我一作船)我的錢一林順(一作)向林順合夥備她們去。
過了三天譚月與另一個男人(不認識他這次未扣來)到蛇口找我問我是否確是去我否又確是并約是八月七日在南頭碼頭口一個荔枝園高岸及是錢，至昨天八月七日下午譚月與上個男的(已扣來)的一美鐘及社上進荔枝園見石一共是我四個人，林順與林順次到蛇口那個男的未扣來，經過高岸后譚交是錢一百元人民幣給譚月與林順向交是并確三人去(三男一女)譚月說要今晚引動，并說這很大不行，譚說她丈夫又來了再不能過，一是今晚去。
我向譚月說去如，譚叫我停船駛去林順等候她們下船備去，譚月說以就可行了，譚月說這大卡散去了，我一人進蛇口她三人向南頭方向去了。
當晚吃晚飯時我找林順讲了在荔枝園快是時間至天得黑時約七美鐘，蛇口市市比因支一得譚月帶去我卡這我帶走，送去南頭碼頭此，我到南頭碼頭時已見到二個男人已被扣了。
第二次譚月去蛇口找林順，譚月說「什麼石我不認識他這了是向譚月才知到，第一个人管起個人去偷渡為什麼還是找林順一人不行不解駛船。
船：你與林水何：人的名字不叫林水何，如林水何我打不給他知的，因為他有老婆，她文一埋頭他就進來，但林順(二人如不叫他不能也知)林水何不姓林了。
譚月交給你一百元是現在那
給我使了式之其年的都交給市文比同志評了，以前與譚月認識的，不认识的。

產隊揭發堂弟伍大丙的伍大果（代名）……一個個“大義滅親”的英雄人物，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教育下，無情地供出、鬥爭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實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不過，大凡這樣的事情，到後來親人雙方都會成為“仇人”的。階級鬥爭的禍害之一，就是將好端端的親人變成了仇人。

比如被堂兄揭發的伍大丙後來被判了刑，刑滿後回到老家，兩兄弟便成了死活仇人，一輩子不再說話了。檢舉丈夫的紀蘭香後來也與丈夫離了婚。

當然，也有依然生活在一起的。比如××公社小沖村的嚴新羽和李美容夫婦（代名）。

真不知道，想到睡在身邊的妻子曾經揭發過自己，嚴新羽那日子是怎麼過的。

為了更多地了解偷渡中親情受到的衝擊，我決心詳細查找關於嚴新羽“團夥偷渡案”的有關材料，最終找到了。

此案涉及到的有5個人，從事起，到聯絡、告破……幾乎所有的過程，都記錄在嚴新羽的“口供”和李美容的“揭發材料”中。

李美容是1961年嫁到小沖村的。過門時吹吹打打，一路上好不熱鬧。到了小沖村，新人把新娘子的蓋頭一揭，周圍人都驚呆了：哎呀，這新羽命真好，娶來了一枝花呀！

新羽呢，身板好，勞動強，百多斤擔子不當回事，村裡誰都誇他；美容呢，人勤快，又長得漂亮，全村人都說，這小倆口，真是絕配啦！

一天傍晚，美容把碗、筷洗了，屋裡弄得熨熨帖帖了，拿了個小本子就要出門。新羽問：“你上哪兒呀？”美容回答：“開黨員會。”新羽這才明白，妻子還是個共產黨員呢。

不知道為甚麼，新羽心裡並不高興。老婆老婆，過日子就是了，當甚麼黨員啊？那是男人的事。

那夜美容回來得也晚，新羽故意泥腳也不洗就橫躺在床上。美容推了幾下，他都不動，就把他的腳拉下來，先用涼水沖了，又端了熱水給他洗著。

“你對我開會有意見啊？”

新羽不作聲。

“當黨員也是為著大夥好嘛。”

還是不作聲。

“家裡的事甚麼也不耽誤還不行嗎？”

新羽再也憋不住了：“你要老往外頭跑——那我也會往外頭跑。明天我就給二舅做工去！”

誰知，事情就是從這裡開始了。

新羽說的是真話，舅舅家早就在蓋房子，要人手。第二天，他把兩件衣裳往腋下一夾，上舅舅家去了。

舅舅家在山頭上，房架子高。站在山上一望，遠遠地還能看見對面的香港。

來幫工的還有一個舅舅家的親戚，叫李海林。晚上兩人在一起睡不著，李海林指著海那邊說：“看見嗎？那就是香港，瞧人家那燈光，多亮啊！”

新羽神往著：“是啊，真近——”

“好地方啦，像我們幹這個活，幹一天，至少——”李海林把手抓了一下，“五十蚊（元）——”

新羽伸了下舌頭，這是在生產隊幹半年的收入。他的心有點動了。“你怎麼不去啊？”他問海林。

“去過，我去過的呀。”海林說。

“又回來啦？”

“不，沒跑成功，給他們抓起來了。”

“啊，是怎麼的？很難嗎？”

“倒不難，主要是我水性不好，游了一半就沒力氣了，只好喊救命。結果邊防巡邏的船就來了，命倒是救了，關了一個星期。你也想去啊？”海林問。

新羽沒有做聲，想起年輕漂亮的妻子，他還下不了決心。

建完房子後，新羽回去同妻子和好了，在家裡又呆了半個月。想來想去，晚上睡不著。還是那件事情“撓”著，便借了輛單車，到了北頭，找到李海林說：“你還去不去呀？要是你去，我也想去——”

“是囉——”海林說，“想去你早說嘛。不過，還得多邀幾個人。”

“還邀人做甚麼啊？”

“這你就知道了，人家那邊，最歡迎的是以團夥偷渡去的，去了有獎。”海林指的那邊，就是香港國民黨的“賑濟”組織。

“那好辦，”新羽說，“想去的人多呢。”

“別。不能甚麼人都說。要可靠，還要找會水的。下海時也可帶帶我。”

“行——”新羽說，“我也只會一點。我去邀崗亭去。崗亭，你認識嗎？那傢伙水性好。”

第二天，新羽找到崗亭問他想不想去。崗亭一聽，馬上同意，說：“我也正想跑呢，正愁沒人。你們打算從哪兒下水？”

“最好是白花洲。我們步行就可以走到那裡。”

“行啊，”崗亭說，“那兒離香港最近。”

“這就好了，”海林看見新羽領著崗亭來了，便遞了一支煙說，“我們兩人都不會水，你來了，這就靠你了。”

“甚麼？靠我？你們倆都是旱鴨子啊。那怎麼行？我把你們拖著走啊？我自己還要命不？”崗亭說。

新羽一想，這話也對。兩人都不會水，崗亭怎麼帶啊？

“不過也有辦法，就是拿籃球膽套在身上，有幾個籃球膽套著，甚麼風浪都沉不下去了，就不用人帶了。”崗亭說。

“是嗎？”崗亭真有辦法，新羽想。

“但是買球膽要錢啊，你家有錢沒？新羽。我家是窮得要鍋朝天了。”崗亭說。

這事，新羽不敢跟老婆說，她是黨員。就是同美容說，也是拿不出錢來的，結婚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

“那我們去邀拿得出錢的人。”海林說。

“人是有，就是不知道她們想不想走。”新羽說。

“你說誰？”

“就是林場的劉明明和李芳。她們倆剛在農場挨過鬥。”

新羽說的是兩個富農女兒。她倆在村中幹活受歧視，就申請上林場來幹活，誰知劉明明吃飯時打了偷食的狗一石頭，就被說成是打貧下中農的狗，是階級報復，林場開會，要批鬥。但批鬥一個不夠勁啊，索性連李芳也陪上台。

兩個女孩子正窩著一肚子怨氣，新羽繞著彎兒一提，馬上響應：“新羽哥，這日子過不下去了。只是我們兩個女孩跟你走，你不怕揹上包袱嗎？”

“沒關係，你們可以作貢獻的啊？”於是把缺錢的事情說了。

劉明明和李芳聽說是錢的事，馬上說：“錢沒問題，我們包了。”

新羽聽了大喜。

“不過，得晚兩個月喲，”明明說，“我家的豬仔剛下來，過兩個月才長得起來。”她說的是賣了豬崽就有錢。

新羽把情況同海林一說，海林說：“那好，眼下還是陰曆二月，水正冷著，下水也受不了的。再過兩個月，等水暖些了更好，就是要保密呵。”

“那你放心，她們兩個都是我小學低班的同學，又是富農女，不會說的。”新羽拍著胸脯保證。

這頭新羽折騰得歡，那頭可觸動一個人了，那就是新羽的妻子李美容。

新羽整天不歸屋，美容心裡就起了疑心。老公怎麼變了？平時老實巴交，門都不出的，最近腳底像擦了油似的這裡轉那裡轉，還跑到山上的林場去了。

林場裡有誰呀？她扳著指頭數，男人不就三個老頭嗎，他不會找，還有就是……

這女人要擔心起男人來，總離不了懷疑那事。加上林場的那兩個女孩子也湊戲，自從新羽談起了那件事後，心裡就老放不下，成天想著來找新羽說這事。林場本來有條寬路通山下，她倆卻偏偏要走小路下山，彎到新羽家門口。仰著脖子在禾場上喊：“新羽哥、新羽哥在嗎——”叫得山響。

“是誰呀——”讓新羽的妻子美容一聲問，又給嚇回樹林子去了。

美容看看朝山上躲去的兩個背影，心裡更生懷疑，這是怎麼了？有啥見不得人的事？心裡早有了幾分醋意：別讓老公給兩個小妖精叼走了呀。於是吃飯跟著老公、上墟也跟著老公，老公同誰講句話也湊過去，還常繞著彎兒要說話給老公聽。

“老公啊，你知道嗎？村裡女孩子都說你像偵察科長呢——”她說的是電影明星于洋演的曾泰。那陣正放《英雄虎膽》。“要是解放前呀，你

呀——”小容在新羽腦殼上點了一下，“你還不知道要討幾個呢。哼——”

新羽正躺在竹床上抽煙，只當是女人話，還挺舒服，沒當回事。

他，太大意了。

這天，美容又給他炒了兩個菜，他喝了兩杯，倒在床上就“呼呼”睡了。美容給老公蓋上被，扶他翻了個身，就發現他胸兜裡硬硬的像有東西：呀，是封信呢！

要是平日，美容是不會看的。可是這回不同：會不會是那兩個小妖精來信啦？她便大著膽子把信從丈夫兜裡拿了出來。

的確，是兩個女孩給新羽的信——找不到新羽，她倆憋不住了。

開頭看還沒甚麼，都是些抱怨農場的話，看到後頭，她嚇壞了，“新羽哥，我倆一分鐘也呆不下去了，我們早點行動吧！”

美容是共產黨員，覺悟是很高的，她很快就猜到了信後面的那兩個字：逃港！

一股“階級覺悟”就在“醋意”的推導下，在這個貧農女兒心中陡然升起！

半個小時之後，嚴新羽在夢中被人推醒，揉揉眼睛才看清是治保主任和兩個執槍的民兵站在床前！

嚴新羽和李海林團夥偷渡案就這樣告破了——兩個富農女，還有崗亭都被抓了起來。

據說李美容在向大隊報告的時候，還反覆問過：“叫我老公不跑就行了啊，你們不會抓他的吧？”當時大隊治安主任笑著答允說：“當然不抓的。就是教育教育嘛，貧農只是覺悟問題。”她才放心。

可是，大隊治保主任說話不兌現，新羽還是被抓到公社去了。他這算是有組織的團夥偷渡了，要判刑的。

這，美容可萬萬沒想到。

小沖村的老人至今還記得那一幕：新羽被捆著雙手押出村，美容像瘋了似的跑出門去，癡癡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來，黨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看見新羽押過來了，美容就撲了上去，抓住丈夫不讓走。兩個執槍的

民兵看是兩口子，就也沒阻攔。

新羽先是站住了，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後一腳就把美容踹到路邊的一條小溪裡：“啐——狗婆娘！”

新羽後來被判了一年刑，算是輕的，因為是三代貧農。

一年後，他從韶關刑滿回來，揹著一捲被蓋回村莊。不想過橋，怕人多，丟臉。繞了一個圈，到離村子遠點的地方，捲了褲腿下水。

他正要上岸，發現小溪的對面，正站著等他的妻子李美容。她早在候他了。

李美容望著丈夫，喉嚨裡哽了半天，不知是懊悔還是甚麼，可憐的女人，說不出話，只知道伸手去抓新羽肩上的行李。

新羽猶豫了一下，開始不肯，後來看見美容眼裡的淚水都湧上來了，心也軟了，手就鬆了。

是的，要是不回家，他又到哪兒去呢？

家是回了。但從此以後，儘管升了大隊副支書的李美容如何對他溫柔體貼，如何說當初不該，這一輩子都欠他的，淚水把枕頭都濕透了，但新羽的心，還是像頂塊石頭。

夫妻就是晚上睡在床上，也再沒那個事了。

最後，兩個人都感到沒意思。

半年後，他們分手了。離婚是美容主動提出來的。

好些人都不明白，美容為甚麼要離婚呢？她感到有愧，要卸下壓在心上的那副擔子。

據說，後來新羽還真的跟那富農女兒劉明明結了婚。上世紀 70 年代的一次大逃港時，兩人抱著一個一歲多的孩子跑了過去。

美容呢，在小沖村裡也沒呆多久，呆不下去的。說是後來也沒改嫁，回了娘家了。

“大義滅親”——一個幸福的家庭就這樣給“滅”了。

沒有了感情的夫妻，就會像摻著水的沙和土，捏不到一塊的。不過，有時候，加加外力，沙和土也能捏到一塊去。王自立和羅秀姑就是這樣一對。

二、美女羅秀姑軼事

男人都逃港了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現在你們生產隊除了幹部，就剩癩腿老四他們幾個，還有些十一二歲的‘紅領巾’了。你看見了的吧，都快成婦女生產隊了。是不是？”

聽說我在寫那年頭“偷渡”的事，南頭的人就都問我：找沒找到她呀？就是那個美女羅秀姑呀，她最有“戲”了。

為了找到羅秀姑（代名），我幾乎跑遍了老寶安縣的蛇口、南頭、光明農場，就像有句歌唱的：“鞋底都跑透”，但一無所獲。

被問的人都說，她在當年可是大名鼎鼎。後來當過大隊的治保主任，回回縣裡省裡的先進大會少不了她。但是現在“風”都變了，人家還會出來嗎？

看來，這位“女明星”是找不到的了。

好在羅秀姑的事情，至今許多南頭蛇口的老人都還說得上，於是只好把他們說的綜合了，也算是一個交代吧。

——

秀姑呢長到 18 歲時，活脫脫已經是“西寶安一枝花”了。南頭、蛇口一帶小夥子們常掛在口上的話是：“誰要跟羅秀姑說上一句話，一包煙。”

她頭髮黑得像塗著漆，臉龐兒白裡透紅像噴著霞。手腳又麻利，下田插秧，人家是一隻手插，她是兩隻手左右插，“唰唰唰——”就像插秧機，引得滿田埂的小夥子眼珠“的溜溜”跟著她跑。

公社召開民兵大會啦，表彰啦，發獎狀啦，小夥子們的眼光不看台上講話的書記，專盯著台下捧著獎狀笑盈盈美得像一朵花似的羅秀姑。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羅秀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信，信末尾也沒有落名字，沒頭沒腦地要邀她到海邊大礁石旁邊見面：“晚飯後，我穿白襯衫，斜揸一個寫有為人民服務的黃挎包，挎包上頭插一片樹葉，那就是我……”

天啦！這不像電影中的特務接頭嗎？就差一個“暗號照舊”了。把秀姑和女友們笑得在床上打滾。

參加廣東省第五次婦女代表大會的寶安縣代表



那陣鬧“偷渡風”，能幹點的小夥子都跑香港了，男青年少，往往是女孩子比男孩子還主動。只有秀姑例外，那愛情信是成天三封五封地飛來，把郵遞員都“熱”壞了：“秀姑啊，你得給我買鞋啊，都跑破皮啦！”

那秀姑看上的是誰呢？

有人說，姑娘的心啊，是山中的鳥，眼珠子是朝外邊長的。

沒錯，她的心裡有一個他——劉建國（代名）。

其實建國也很平常。父親死後，他在深圳火車站頂了父親的職，由於好學習，當了一名普通的技術員。南頭、蛇口的人，見過的都說他很帥氣。

上學時，建國和秀姑在一個班，建國還是班上的團支書，入團時建國就是她的介紹人。秀姑一直在心裡頭感激他，他們在一起插過田、煉過鋼、上台領過獎。他還送過她一個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呢，上面寫著：“讓我們在毛澤東的偉大紅旗下，共同前進——劉建國”。

拿到語錄本的秀姑思考了半天，為甚麼要用“我們”呢？她想啊，想啊，想不通。

趕墟的日子，賣完了菜，秀姑總會偷偷擺脫姐妹們的糾纏，跑到車站宿舍裡去坐坐。給建國捎上些梨瓜呀，番茄甚麼的。星期天呢，建國也會騎了單車跑到南頭來看她。給她帶些她愛看的報紙啦，封面是王丹鳳、秦怡的電影雜誌啦。可兩人從來沒說過其他甚麼。

有一次，送他到村口，建國剛說：“我走……了。”左腳就錯踩在右

邊的踏腳上，身體沒平衡，“撲通”摔了一跤。秀姑“撲哧”笑出了聲，拿過建國的手心一看，都摔出血了，她又心疼得不行。

她心裡暗自明白，他愛上她了，而她……也愛上了他。

人家說，姑娘戀愛時，是她一生最愛笑的時光，見甚麼甚麼笑。見了花，花笑；見了樹，樹笑；抬頭見了小鳥，小鳥也在笑……

但是，自從碰見了另一個“他”，秀姑就再也笑不起來了。

他叫王自立（代名），是與她同村長大的。

自立比她大一歲，從小就是個苦孩子。15歲的時候，父親就在替公社出海作業時遇難了。自立還有兩個妹妹，母親經常是臥病在床。小小年紀，一家的擔子，就壓在自立瘦弱的肩上。

當時，他還在上中學。在學校裡，他的數理化成績是拔尖的，都說將來是塊上大學的料。可父親一死，家庭的重擔就讓他再也讀不下去了。

“怎麼也得讓他上完高中，”有一次，公社李大龍（代名）書記來隊裡視察，聽說了這個事，“生產隊要給他透支交學費！照說，他父親還是因公死的呢。”

就這樣，自立靠家裡每年從生產隊透支，拿錢上到了高三。

可是，透支歸透支，欠著生產隊的錢還是要還的。年終生產隊把算盤一撥，王自立一家，不但沒收入，還倒欠隊裡幾百塊。別人過年吃肉，孩子穿新衣，王自立家則端著青菜碗。看著都十幾歲了，依然是穿著破衣爛衫的妹妹，他心裡只有苦酸。

離畢業還有一年時，自立再也不想讀了。他決定下田幹活，替家裡還債。

那年頭，村裡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跑光了。站在大田邊一望，插秧的幾乎清一色都是女人。這時在女人堆裡突然冒出一個小夥子來，那實在是太“扎眼”了。

常說，女人進了男人堆，男人都不說話；要是男人進了女人堆，“噼噼啪啪”就會像火星落進了柴堆裡。

“他們家是怎麼啦？三嫂又病啦？”

“咋不去上學啊？”

“可惜啦，是塊讀大學的料呢！”

“勸勸三嫂吧，還是讓自立去上學好。”

這些話，埋頭在水田裡的王自立都是聽到了的。

男人受到女人的關心，往往倍添力量；但如果男人受到女人的憐憫，那添的反而是痛苦。

他一聲不吭，只望著水面，插啊插……眼淚兒在眶裡打圈圈。

血紅的太陽慢慢落向西邊了，晚霞燒紅了半邊天。田埂小路變得灰蒙蒙的，像是迷在一股帶著泥香的霧氣中。

自立挽著褲腿，提著鞋子，走在收工隊伍的最後面。他不想跟著大隊的婦女後面走，免得聽她們說這個問那個。

自立以為是自己走在最後了，其實，這個時候，誰也沒發現，有位姑娘比他走得更後，悄悄地跟著他。那就是羅秀姑。

“自立哥，你也回得這麼晚啊？”

昏暗中，少女的聲音，像銀鈴隨著晚風敲動。

“是啊，我到溪裡洗腳去了。”自立頭也沒回地說。

“自立哥，你一個學期要交多少學費啦？”

她怎麼問這個？

不過，兩人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自立就沒有再多心了。

“三十多吧，要是不吃飯的話。”他指的是學費。

“那——以後學費我替你交啦。”

王自立驚異地張大了嘴巴：“甚麼？你替我交——交甚麼？”

“學費呀。”

“為甚麼？”

“不為甚麼呀！”秀姑笑笑說，臉上窩出了淺淺的酒窩，“你是個有出息的人，你該去上學呀。”

聽著秀姑這話，自立彷彿有一股暖流流過心田。

“不行，不行，秀姑，怎麼能讓你受累呢？”他說著，心中卻充滿了感激之情。

“自立哥，只要你能看得起，能幫你是我甘心情願的。”

甘心情願！她——他愣住了，呆呆地看著她。男孩子一碰上這號事，總喜歡往那上面想。

平時，每當大隊的小夥子們傾慕地議論起羅秀姑時，他自慚形穢，

總是悄悄地躲到圈外，聽都不敢聽。自家窮，長得又不好看。他從不敢提“秀姑”這兩個字，怕的是“玷污”了美麗的她。對於他來說，秀姑就是天上的月亮，落在樹上的凡間鳳凰。她那麼亮，那麼高，高得叫人不敢接近。沒想到，沒想到今天她會主動找他，這是做夢吧……

“自立哥，你答應嗎？”昏暗中的，又傳來秀姑溫柔的聲音。

“答應，我當然答應——”王自立感覺手腳都不知往哪放，手心都出汗了。

一股幸福之情湧上他的心頭。

晚霞燒紅了自立的臉，也燒紅了秀姑的臉。還好，沒人。田野昏暗暗的，誰也沒看到。

但是一個有心人看到了，他檢查插秧進度，走得更後。

他就是公社書記：李大龍。

雙搶搞完了，照例又得抓反偷渡了。公社書記李大龍蹲點到了秀姑隊上。

那天，大龍書記把工作佈置完了，便喜滋滋地進了秀姑的家門。

“秀姑啊，水生說，你這段表現不錯啊。”水生是秀姑隊上的生產隊長兼大隊副支書。

大龍書記拿起桌上的茶壺，自己沖上水。書記是老熟人了。

“又要開會呀，李書記。”秀姑在編筐，也沒起身，以為是來通知她開會的。

“不是，是給你帶好消息來啦。”書記說，“支部正在考慮你的轉正問題啦。”秀姑的黨員還是預備的。

“真的啊——”秀姑臉上泛出了光，她太高興了，她對入黨是太神往了，“書記，我做得還不夠，組織還應該多考驗我呀——”

“會考驗的。今天就要考驗，給你一個任務。一個又光榮又最嚴肅的任務，好不好？哈哈——”奇怪，為甚麼書記交代嚴肅任務還大笑呢？

這是甚麼任務啊？

“秀姑啊，你坐過來。這任務啊，說嚴肅，也輕鬆，說輕鬆呢也嚴肅。我問你，現在咱們隊裡最缺甚麼？”

秀姑的黑眼睛閃了一下：“缺插秧機啊，還缺化肥、缺……”但這些，我也不能做啊，她想。

“嗨——”書記擺擺手，“不對。那些都缺，但最缺的是甚麼——知道嗎？”

秀姑搖搖頭。

“缺人，缺男人——”書記自己回答說。

秀姑的臉“刷”地一下紅了，書記要說甚麼啊？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現在你們生產隊除了幹部，就剩癩腿老四他們幾個，還有些十一二歲的‘紅領巾’了。你看見了的吧，都快成婦女生產隊了。是不是？”

書記說的沒錯，男人都快跑光了。

“缺男人，更缺有這個的——”書記點了點自己腦袋說，“有文化的、有知識的男人。去年你們隊那個會計跑了，想找個有文化的，跑遍了全大隊都找不到，後來還是我到別的公社給你們借的人。是不是？真給社會主義丟臉啊！”

秀姑沉思著，書記給我說這些，到底是為了甚麼啊？

“留住人很重要啊——”書記繼續說，“這可是關係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問題，關係到千秋大業的問題。知道嗎？”那陣正宣傳接班人的問題。

“明白——”秀姑說，但她心裡還是不明白，她在揣度書記到底想說甚麼。

“唉，你們隊裡就這麼一個高中生——”書記歎了一口氣，掏出煙來，“也不知留不留得住啊。”書記好像很犯愁。

“誰——”秀姑問，其實她是知道的。

“王自立啊。”

“啊——”不知怎麼的，一提起這個名字，秀姑心裡就“撲撲”地直跳，好像做了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但是，秀姑臉上微妙的變化，怎能逃過老練的大龍書記的眼睛。他微微一笑：“能讓他跑到資本主義那邊去嗎——”

“能。啊，不能，啊——自立也要跑？”秀姑說話有點亂。

“不是——他可沒跑。”書記笑一笑說。

“啊——”秀姑心裡的石頭又像落了地。

“但也難說啊。他高中不快畢業了嗎，現在正趕上外逃風，如果不對他加強教育，我怕他左腳出了校門，右腳也會上香港的船呢。”

秀姑心裡亂亂的，不知怎的，秀姑也在為自立擔心。

是的，這些年，這現象簡直成了有文化的中學生的通例了，培養一個走一個。

“所以黨要交給你這個任務——”

啊，說了半天，就是這個啊，她的心緩過來。這事她做得多了。

“沒問題——”秀姑笑笑說，“我明白了，書記。我同自立從小在一起，關係也不錯。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秀姑笑笑著，繼續編她的竹筐。

“可不是啊，”書記搖搖手，笑笑說，“不是做思想工作啦。”

那是做甚麼啊？

“做夫妻——”

甚麼？秀姑的手指停住了。

“我看你們倆倒挺般配的。組織上希望你們結成一對，樹一個堅守社會主義陣地的標兵夫妻！”

羅秀姑愣了，她可從來沒往這上頭想的啊。

“你再考慮一下吧，”書記語氣很寬鬆，“看自立這人行不行。婚姻自由嘛，黨員也一樣。組織上是看準這事了，做主當然還是你自己！”

大龍書記走了，村口的電燈亮了，天上，卻一個星星都沒有。

秀姑站在門口，眼前好像迷來一團團的漆黑。

“秀姑，秀姑——”是海英她們幾個來了，拿著夜校課本，在叫她呢，可她聽不到。

“走啊，學毛著啦——”

她這才發現自己站在門口好半天了。“啊，啊——”她應著，回屋去拿毛著，卻拿了針線筐。

“你們先去吧，我還有點事——”

這真是太突然了？怎麼就交給自己這麼一個“任務”呢。

秀姑的心，亂了。

迷離中，似乎兩個青年的影子一齊向她走來。

一個高高大大，穿著鐵路工人服，挺英俊的，推著單車。另一個呢，是個還拿著書本的高中生，又矮小又瘦弱，見了人老是蔫蔫的，像一根放了幾天的豆角秧，眼睛都不敢抬起來看你一下。

這怎麼辦啊？她從心底裡問自己。她很清楚，她愛的是誰。

她怪自己剛才沒向書記說清楚，她應該向書記說自己有心上人了。

但是，她怎麼能這樣說啊？

組織上的安排很明顯，一個共產黨員，怎能在黨需要的時候後退呢？

思啊，想啊，秀姑走到村邊來了。

村邊的溪水又清又涼，她用手掌捧了一把，洗了洗臉頰，讓昏沉沉的大腦清醒一下。

這時秀姑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同自立一樣，沒有父親，她的父親死得更早。還在她七歲的時候，給地主當長工的父親上山砍樹時，給樹壓死了。家裡窮得連床草蓆都沒有，是母親拿著鋤，她用小手捧著土，把父親埋了的。村子裡呆不下了，母親牽著他的手在外面流浪。腳上從來沒有穿過一雙鞋，身上從來沒穿過一件沒補丁的衣服。到解放那年，母親還牽著她在東莞要飯。村裡的人告訴母親：“你還不回去啊，共產黨來了，分田地了，你們也有一份。”她們這才回到家鄉。

土改了，她母女分得了一畝二分田，兩間青磚瓦房。秀姑還上了小學。她們做夢也沒想到能有這樣的日子。她們重新把父親埋葬了。每年清明，母親都要領著她去給父親上墳。母親總是流著淚告訴泉下的父親：“現在你放心了，我和你秀秀都過上好日子了。”

想到這裡，秀姑覺得眼圈麻麻的。她怎能忘記黨的恩情？不能，不能啊。

她整晚沒睡好。一早起來，她的主意定了，準備到城裡去一趟。

她含著眼淚在籃裡放下給建國做的一雙鞋子，一件費了多少個夜晚打成的毛線衣——那是準備在答應他的那一天再送給他的，還有一疊用塑膠紙包了又包的他給她寫來的信。上面有她熟悉的鋼筆字體：“親愛的秀姑同志”。

摸摸那些留著墨水氣味的信紙，看著她熟悉的稱呼，她覺得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以後，就很難看到這些了，也聽不到他的單車鈴響了。她這次去，要把信件全部退還給他，讓他把她寫給他的信也通通燒了，不要再想她了。

一輛公社的拖拉機停在路邊上，司機是熟人。

“你要去哪裡？秀姑。”漂亮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坐上車的。

“上城裡——”她坐了上去。

她打算去鐵路宿舍看了“他”之後，再去縣裡的中學看“他”，把錢

交給“他”，然後馬上回來。

為甚麼馬上就想著回來？秀姑問自己。根本不像見了建國那樣，希望與他多呆一會，再多呆一會。他呢，也同她一樣，到村口了也不想上單車。

拖拉機已經停在鐵路宿舍旁邊了。秀姑不由心頭一陣心酸。

正好是星期天，吃中飯的時候。站在草坪裡，遠遠望見他從食堂出來了，端了一碗飯，上樓去了。

真的，真的嗎？我以後再也不會來了嗎？再也聽不到他的單車鈴聲響，再也看不到他淺淺的笑了嗎？

也許就是在這一刻，她突然覺得，她愛他，她不能沒有他，她離不開他！

“就在那一下，我又決定，不退了。”後來羅秀姑在“鬥私批修”中“檢討”自己的“思想深處”說：“我的私字上來了。小資產階級邪念佔了上風。”

改變了想法的羅秀姑猛地掉過頭，朝縣中學走去：她決定要去安頓好的是王自立。

王自立沒想到秀姑會來看他。喜滋滋地抓著腦袋，傻笑著：“你怎麼來了——”

“給你送學費，”秀姑從荷包裡掏出一個信封，“這學期的。”

自立看時，都是五角一元的，還有一角的小票。拿著信封，王自立不知說甚麼好。

秀姑又從籃裡拿出一雙布鞋：“自立哥，你穿著看看，要合適，以後我再給你做。”

“好呢。”王自立連忙地把鞋套上了腳。

“家裡的事，你不用操心，把書讀好，爭取考上大學，為我們村出個人才。自留地裡幹不完的活，我會去幫三嬸的。”

“好，好。”自立一個勁地點頭，他怎會想到秀姑這時的心呢？

“我要走了，自立哥——”

“你多呆會吧。”自立還不捨得她走。

站在校門口，回過頭來看著癡癡送著自己的自立，秀姑心中又升起一種難受的感覺，沒有了她，以後照顧自立生活的又是誰呢？她會像自己一樣的關心自立嗎？

“自立哥，從今以後，你要學會自己關心自己啊——”

“會的，我會的。”自立說。

“自立哥，將來一定會有一位比我更好的姑娘來照顧你——”說完這句話，秀姑一甩頭，跑出了校門，幾乎是飛奔著離開的。而自立依然傻傻地幸福著。

——

到了鐵路宿舍，見到了建國。她把一江河的水都傾瀉了出去，那是一個少女滿蓄在心中的情意……

連建國都幸福得懵了。

兩人第一次表明了“愛情關係”。

幾天後，女伴海英拿著鞋底喜滋滋地進門來了：“好啊，秀姑，這麼大件好事還對我保密呀！”

“你說啥呀！”秀姑打著毛衣說，“鬼丫頭——”

“沒有，你敢說沒有？你這衣服給誰打的，嗯——”

秀姑臉有些紅了。建國的事情她們知道了？

“甚麼呀？”秀姑裝著甚麼事都沒有。

“你硬要等到吃喜糖了才說呀？”

“你說啥呀，甚麼事——”

“同自立的事啊！”

自立！秀姑愣住了。

“還瞞呢，大龍書記都說了，”海英說，“你敢說前天沒去深圳中學？嗯——瞞我。”海英還在一個勁地逗笑。秀姑卻感到眼前一切都在旋轉、旋轉……

“秀姑，秀姑——”這時門外有人叫她。

原來是隊長水生哥樂呵呵地來了。怎麼今天水生看她的眼神也那麼親熱。

“啊，海英在呢。”顯然水生來是有事，海英趕忙找岔走了。

“秀姑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轉正通過了。”他是大隊副支書，“支部讓我來通知你。五一節就給三個新黨員辦宣誓啦。”

這回，秀姑心裡說不出甚麼味。

水生又說：“還通知你一件事，咱們隊的治保主任不是跑了嗎？支部開會，東看西看誰都不上眼，只有你。大家都推你啦。以後，你就是我們大隊的治保主任了——”

秀姑一下子簡直懵了，不知該怎麼說。

“水生哥，我不行，我還很不夠，真的——”她但願這一切不要來，不要來！

“你就別謙虛了吧，別人想還當不到呢。這是大龍書記和大夥要培養你啦——”

“我不行，你們別選我，真的——”她幾乎是在哀求著水生了。

“你是怎麼啦？這是組織交給你的任務——”水生很嚴肅地說，“難道這還不光榮嗎？”他有點生氣。

不知甚麼時候，水生已經走了。

“秀姑，秀姑——”她聽見門外雀噪般的叫聲，是一班姑娘們來祝賀了，肯定是來“吵”自立的事。這事都傳開了！

秀姑坐到凳子上，感到眼前發黑……

高三年級快畢業的時候，校長通知王自立說：“上辦公室來一下，你們公社來人找你了。”

自立去看時，笑呵呵的，是公社李大龍書記呢。

“哈哈，小秀才呀。”書記拍著他的肩膀，高興地叫他，“快成龍了啊，畢業後有甚麼打算呀？”

自立沒吭聲，害羞地低著頭。

突然，書記又問：“你知道秀姑為甚麼會愛上你嗎？”

書記怎麼問這個啊？

自立老實地搖搖頭，他真還沒認真想過這件事。

倒也是，秀姑是那麼出眾的姑娘，自己就這麼個樣，家裡還那麼窮，怎麼就愛上了自己呢？當初怎麼就沒想一想？

“是組織的安排，知道嗎？組織上希望你們倆結成一對，革命的一對。扎根農村，我們還要把你和秀姑樹立成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的典型，在

全縣宣傳、學習、推廣。這也是秀姑對你愛情的要求。”

“沒問題，我向黨保證，如果考不上大學，我一定扎根農村不跑香港。”自立堅決地說。

“好！”書記高興地說，“今後，咱們公社團委書記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這事要保密啊——”

聽到書記回來傳達與自立的談話，除了聽清楚“要保密”三個字外，秀姑好像甚麼都沒聽見。

這段日子，她就像個木頭人。一連串的“任務”衝她這個新上任的治保主任而來：先是被派到縣裡的幹校學習，接下來又到公社參加學習班，後又到惠陽參觀……晚上還要搯了槍值勤。簡直透不過氣！

她想，越忙越好，越像個木頭人越好！

1965年的10月1日，對於南頭蛇口一帶許多小夥子是個“傷心”的日子。因為這一天，西寶安縣最漂亮的姑娘羅秀姑要出嫁了，對象是他們根本沒看上的瘦瘦蔦蔦的王自立。

結婚的那天，全村充滿了喜氣。婚禮在秀姑原來設想同建國成親的新屋裡舉行。當然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禮、宣誓，然後是證婚人公社書記李大龍贈送一套《毛澤東選集》，照例還要給新人贈送一段毛主席語錄。

“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李大龍書紀念著。

然後是主持人宣佈：“撒糖——”

海英她們一幫姑娘們出來了，端著一盤盤紙包糖，向人群中撒去。有人跳起來抓，有的在人群中搶，小孩忙著在地上撿……滿場發出一陣陣笑聲。

這時，有個放牛的孩子跑來告訴秀姑說，村口有一個人，老朝這邊望，就是不進來，還推著單車。

“建國——”秀姑的第一反應就想到他，那是她收藏在心底的建國！

她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了。

“建國！建國——”她像瘋了一樣朝村口奔去。

大夥看見新娘子突然扔下場上的人往村口跑，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事，有的就要跟了去。

到底是做書記的有水平，李大龍向大夥擺擺手：“沒事——他同學，來吃酒的，讓她去接吧。”

他知道，有些情緒，是要讓它發泄出去的。

書記對大家說：“大夥坐啊，樂啊，喂，海英，撒糖啊——”

“撒糖囉——”又是一把糖向空中撒去。

又是一片歡笑聲起來了。

村口卻很寂靜，秋風撒著樹上的葉子，順著小溝裡又冷又涼的流水無力地流……

秀姑站在空空的村口，四周空空的，沒有人。

建國走了！

“建國——建國——”你為甚麼要走啊！秀姑撕裂一般的喊聲在空曠的田野上迴蕩。看看四周沒有人，她的哭聲像山洪爆發出來。

故事說到這裡，就要截止了。

這對夫妻後來過得怎麼樣，說法不一。

我只知道後來秀姑成了出名的“模範典型”。她帶著民兵巡邏、站崗、抓偷渡……工作很出色，經常到公社、縣裡介紹經驗。後來還升了公社黨委委員。

而大龍書記呢，幾乎每次總結大會，都會提起“××公社那個羅秀姑”。也正因為這個“點”抓得好，出接班人出成績，大龍書記也屢屢受到縣裡省裡的表揚。

至於自立，他與秀姑結婚後，的確沒有跑。在隊裡安心當了兩年農民，甚麼幹部也沒當。開會時幹部都說：“你們青年人看啦，王自立是多好的文化人啊，回鄉當農民，現在人家甚麼幹部都不是，可就是不跑，堅守田中幹革命。”

其實，大龍書記是很講信用的。兩年之後，自立便被“選”上了公社的團委書記，比秀姑還高一級，是“國家糧”編制。

自立與秀姑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大龍書記升到外縣去做縣委副書

記時，秀姑和自立都來了，牽了兒女去給他送行，感謝幫助了他們的恩人。

那天好熱鬧啊，汽車停在公路邊，大龍書記坐的是車站班車，他不要縣委派專車送他。來給李大龍送行的農民兄弟絡繹不絕，有的還提著土產。都說難得有這樣的好書記。

李大龍抱著秀姑最小的孩子親了一口：“不要謝我，感謝黨吧——”書記說。

看著這麼多送他的鄉親，大龍書記的眼眶也濕潤了：“鄉親們啊，都回去吧，我還會來看你們——”他也很難捨。

大龍書記最後看了一眼這片多年來曾經為之付出過心血的土地，心中暗祝深圳河邊的人民幸福、安定。

“伯伯走了——”他讓手中的孩子再在自己臉上親了一下，上了車。

——

四十年後，我聽到了他們的故事。

我最後還是放棄了再找羅秀姑的念頭，我想，就是找到她，這位白髮蒼蒼的老“明星”，大概也不會再說甚麼了。

叫她怎麼說呢？這人生的是是非非，誰分得清？誰說得清？

如果要說痛苦，她是醒著；如果要說幸福，她是睡著了。

多少女人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不也兒女成行嗎？不也同吃同眠嗎？只要心底的傷口不流血，都叫一輩子。

第五節 刑場上的鮮血——老頭與青年殊死血鬥

“我是怎麼也要過河去的，在家也是等死！”

——殺人犯官文烈語

“我是貧下中農。誰想過河，我的柴刀對他不客氣！”

——老民兵戴意友語

“階級鬥爭被強調到過分的程度，早晚就會出這種事。”

——一位老公安語

一、有偷渡者被槍斃？

“那地方原來是刑場，知道嗎？就是槍斃人的地方。幾個小山包，推平了的。”

2005年的春節，幾位朋友相約一起吃飯。觥籌交錯之間，有人說起要添一套住房，問深圳的豪宅哪裡的裝修好又便宜。大家都推薦說××花園好，特別的豪華氣派，價格每平方米比其他花園還低了兩三千元。

一位原籍寶安縣的朋友卻搖頭：“這麼豪華，還這麼便宜，你們知道為甚麼嗎？”

大家都等著他的回答。

“那地方原來是刑場，知道嗎？就是槍斃人的地方。幾個小山包，推平了的。”
原來如此。

真有偷渡者被槍斃嗎？當年對逃港者的刑處，真有如此之重嗎？

“有的，”一位熟悉情況的老公安領導告訴我，“對於被捕獲的偷渡者，各個歷史時期的處理不盡相同，有遣送回原籍的，有送農場勞動改造的，也有關監獄的。如果被槍斃，那可能還有其他原因，比如歷史上有反革命罪啦、抗捕啊、殺人啊等等。”

二、四青年密謀逃港

“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這邊。”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一則香港報紙的報導闖入我的視線。這是1963年5月某右翼港報上的一條消息：《深港邊境羊台山昨釀血戰，四名偷渡義士被擒》。

報道稱：四十餘名偷渡義民，皆攜帶武器，在邊境羊台山附近與四千多名軍警民兵血戰，堅持數天，終於失敗。其中領頭官文烈等四位義士被擒。這些報導的真實性引起我的懷疑。

“啊，官文烈——”老公安拉長了聲音，“有的、有的。”

“真是這樣嗎？”

“不過，他們把事情誇大得面目全非了。那時四個青年強行偷渡，而且砍傷了一個老民兵，於是我們調動了全縣的軍民圍山。是的，那次去的武裝加上群眾，的確有四千人。事情就發生在羊台山。”老公安說。

“羊台山？在哪裡？”

“這裡——”老公安吐了一口煙，指著一張地圖說，“就在如今的石岩、龍華和南山的交匯處附近……”

從地圖的標誌看，羊台山是一片人跡罕至的古森林。

“三個判了無期，一個槍斃了，被槍斃的那個就叫官文烈。”

我停了一下。照這樣說，雖然不像香港報紙說的那樣聳人聽聞，但事情的確是存在的了。

我想知道事情的內情，便繼續追問。

“官文烈是個怎樣的人呢？”

“年輕，就二十歲吧，那時的佈告上有照片。”他抽了一口煙說。

“我叫人去找找。”老公安又抽了一口煙，“階級鬥爭被強調到過分的程度，鬥啊鬥啊，你死我活啊，早晚就出這種事了。”老公安這樣總結說。

可惜他最終沒有能找到照片。

好在當年有關槍決官文烈的佈告在寶安、惠陽、東莞城鄉到處張貼過。我終於在寶安縣的農村找到了一張發黃的舊佈告，看到配在文字旁邊的照片。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那個被譽為“義士領袖”的官文烈，並非我想像的那樣高大兇猛，竟是個瘦小、孱弱的小青年。

佈告上的照片大概是被捕後在公安大院內照的：官文烈穿一件破舊棉襖，一根麻繩繫在腰間，眯縫著無神的小眼，好像害怕強烈的陽光。而同他一起被捕的范金波、鄭良才、鄭錦安，也是衣衫襤褸，同官文烈如出一轍。就是把他們拉到一群乞丐當中，你也不會分辨出他們來。



四個年輕的偷渡犯被捕後，在公安局大院拍照時還一臉茫然。

“他們就是一群可憐飢民嘛——”一位研究歷史的朋友看了照片後說，“就像是逼得沒路走的兔子，回頭來咬了人一口，於是被共和國的法律嚴判了。”

“官文烈——”我產生了強烈的衝動，想去了解這個已經逝去的年輕的靈魂。

四十多年了，如果他活著的話，應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吧。

普寧縣高塘公社高明村是個窮地方，太平年代地裡打的糧食就不夠吃，“鬥地主”也沒鬥出稻穀來，再碰上那場“天災人禍”，高明村幾乎家家都冒不出煙了。

有次，官文烈和鄭良才、鄭錦安幾個小青年在山上放牛，實在餓得不行了，官文烈就說：“飯都吃不飽！到哪裡去弄點吃的呀？”

“有啊，去不去——”鄭良才湊過來說。

山下有一壟番薯地，公家地裡的東西，收了也不歸自己，所以番薯遲遲沒人收。官文烈說：“有吃沒人收，刨了再說。”

於是三個人就在隊裡的番薯地刨番薯，一人刨了兩筐藏在草叢中，又一人拿著一個番薯啃著。誰知這事讓人發現了，一溜煙告到了治保主任那裡。

當天晚上，鬥地主的大會變成了鬥“盜竊犯”。三個小青年被五花大綁著推上台來，跪在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低頭認罪”。

就刨了幾個紅薯，也挨鬥，官文烈不服氣，扭了兩下，要抬起頭來申辯甚麼，治保主任便在他脖子上橫“砍”了一掌。

“富農崽，還頑固——”腳便蹬在官文烈的脖子上，一腳踩下去……

他家是富農，離地主不遠，貧下中農踩了便踩了。

那天被鬥回來，官文烈把打了叉的木牌往地下一摔，對父親說：“爸，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讓我跑吧——”

“跑哪裡？”

“香港——”

父親看了他一眼，沒做聲，那意思顯然是：這裡哪還有路啊？跑吧。

官文烈便去邀鄭良才和鄭錦安，一說，都表示：“在家也是等死，跑了好，一走了之。”

“了可還沒了，我心裡這口氣還窩著啦。”官文烈咬咬牙，“受他欺負！讓他踩一腳，我走了也要先還這個賬！”官文烈說的是大隊治安主任。

“我也窩氣。”鄭良才說。

“我們打他一頓，出了這口惡氣再跑！”官文烈說。

三人先是把去邊境的路徑弄清楚了，又準備了乾糧和紅藥水，隨時準備上路。

官文烈知道，這一回，打了人，就別想再回來了。臨走前，他特意進裡屋，看了一下奶奶。奶奶正病在床上，他從小是奶奶帶大的。

“我要出遠門了，奶奶——”

“到哪裡去？好久回啊？”奶奶擔心地問。

“半年，去福建，打石頭——”奶奶耳朵不好，他貼近了大聲說。

“這麼久啊——”

“我打了石頭，賺了錢，就回來給你治病。”

“不要，不要，”奶奶搖著手，“我甚麼都不要，你陪著奶奶就行。我沒多久了，你不要走了——”

這時，官文烈感到一陣心痛。後來他交代說，那一刻，他也不想走了的，他知道奶奶快不行了。

這時屋外面有人吹口哨，是鄭良才他們來了，他心一橫，站起來就走了。

天黑時分，三人潛到了村邊的一條山坳裡。

山路的那頭裡閃出了電筒光。“來了——”鄭錦安過來說。果然，治保主任打著手電筒從大隊開會回來了。

“記住，良才蒙頭，我和錦安下手。別打頭，打腰，腿。別把人揍死了。”說完，就從地上操了一根棍子。

還沒等治保主任弄清楚怎麼回事，三人一擁而上，一人蒙頭，兩人拿繩子，將人捆了拖到樹邊。

治保主任大喊“救命——”官文烈上去就是一耳光。拿棍子在他頭上敲了敲：“再喊，打死你——”

“聽著，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官甲海的兒子。”官文烈對蒙著頭的治保主任說，“平時受你的氣受夠了，今天也該你倒倒霉了。”說完棍子便雨

點般的打下去。

治保主任連喊：“饒命，饒命。”

三人牢牢實實把治保主任捆在大樹上。“還你一腳——”官文烈走前狠狠地在治保主任腰上踹了一腳。一揮手，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出了村口就是一座大山，上了山，三人看看後面沒人追，坐在山路上，“哈哈——”笑開了。

這輩子，這是他們最痛快的一次笑！

笑過後，鄭錦安有點擔心了：“烈仔啊，打了人了，我們這輩子，看來是回不了家了？”

官文烈說：“我是不打算回來了。”

“不回就不回，”鄭良才說，“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這邊。”

天上露出微明，三個年輕人拿棍子撬著乾糧，敞開了衣服，迎著吹來的涼風，朝西南邊的寶安縣方向走去。

三、四千軍民夜圍羊台山

老頭一看我要搶，就從塑膠袋裡抽出把柴刀來，揮舞著，嘴裡大概是喊：不要過來啊，要不就劈死你！

“走了大約一天的時間吧，中午十二點的樣子，我們估計快到邊境了，”被捕後，官文烈對審判員交代說，“不敢走大路了，就決定上山，走小路。”

“那山上沒有路，到處是樹，我不知道叫甚麼山，很高的，就上去了。上到最高頂（羊台山燈芯頂——作者註），看見那兒有塊大石頭，再一看，石頭上坐著一個人呢，怎麼這深山坳裡有人？就很警惕地問他是誰？”

坐在大石頭上的人，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比官文烈高些，他叫范金波。豐順縣人，也是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跑到邊境偷渡來了。

“聽他說也是來偷渡的，我們就放心了。”官文烈說，“他還答應說，他姨父在香港開工廠，過去了，個個都有事做。還可以寄錢回來。大家聽了，都很高興，就給他乾糧吃，給他水喝。”

四月的南粵，正是好天氣。太陽暖暖地照在大石頭上。四個人都有些睏了，官文烈就說：“睡覺吧，到晚上再趕路。”

年輕人貪睡，四個人躺在大石頭上，眨眼間就睡熟了。

猛然間，他們被一陣咆哮般的喊聲叫醒。

官文烈睜開眼睛，白花花地看見離他們八九米的地方，站著個老頭。老頭叫戴意友。

——

戴意友本來是把種田的好手，但是畢竟上了年紀。開春的時候，生產隊長就安排他上羊台山大隊林場養蜂。

這羊台山，號稱寶安縣西部第一山。密林深澗，野獸出沒。幾個農民住在那裡養蜂，就像是與世隔絕，十天半月才能下山一次。

日子過得快，轉眼就到了四月，過了清明，蜂糖便打完了。

場長李茂才說：“戴叔啊，事情閑了。你都一個月沒下山了，明天你回家打一轉吧。”戴意友掐掐指頭，真的一個月還多呢。

場長特意叮囑說：“路上不安全，有豹子的。叫個人陪你下山吧。”

戴意友邊把柴刀裝進塑膠袋中邊說：“怕啥，有這玩意。我年輕時候還打過野豬呢。”

從林場下山，要經過羊台山的最高峰燈芯頂。戴意友喝了兩杯米酒，提了塑膠袋，搖晃晃地往燈芯頂上走來。

天氣很好，太陽暖洋洋地照著。春風颳過來，滿山的樹木發出“嘩——嘩——”的響聲。戴意友一邊走，一邊還掐了一把路邊的野花，打算逗最小的女兒秀春。

再過去就是燈芯頂了。

他絕沒想到，就在那個地方，一場災禍正在等待著他。

剛一上燈芯頂，他就看見那個大石頭上睡著四個人。那樣子衣衫破爛，還放著糧包，一看就是想偷渡的。他把柴刀拿出來，向他們喊……

范金波口供整理：

“那老頭在石頭下，噥噥呱呱亂喊，一下往南邊指，一下又指指林場。他說的那些我們不懂，不知說些甚麼。只知他看出我們是偷渡的了。”

案子結束後，寶安縣宣傳部報道員去採訪戴意友：“你是不是奮不顧身？你估計自己能對付得了他們嗎？”

戴意友：“不行。當時我一琢磨，我就一個人，他們有四個，要吃虧的。便不接近他們，就站在隔他們十幾米的地方喊。聲音儘量大點，希望能傳給遠處的人，比如在山上砍柴燒石灰的啦。”

報導員：“你都喊了些甚麼話，怎麼他們都說聽不懂？”

戴意友：“我說，你們是逃港的嗎？那裡逃不過的，有解放軍的。你們回去算了，到我們林場去也可以，有飯給你們吃的，過兩天就送你們回去。”

戴意友說的是龍崗當地的客家話，四個人根本沒聽明白，反而認為老頭是要叫人來抓他們了。

范金波口供整理：

“聽到老頭喊，烈仔就向我們三人使了個眼色，意思是：別理他，快走。我們便起身，趕快走。如果我們走了就好了，那就沒事了。”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導致四個逃港青年起了殺人之心。

原來睡覺的時候，官文烈把糧包放在石頭上，由於沒放穩，這時滾到石頭下面去了。

站在石頭下的戴意友順手就撿了糧包，抬腿往林場去——拿走你們的包，看你們還走不走得了？等把你們引到林場就有好看的。

這時，老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老頭只顧夾了糧包走，卻沒注意大石頭下還有一根三指粗的棍子，而正是這根棍子成了四個青年的武器。

官文烈口供整理：

“那老頭一走我就急了，沒糧包怎麼過河啊？我就喊放下，放下。他硬是不放，還往林場走。地上那根棍子他沒撿走，我就從地上撿起那棍子，追了上去。本來是想嚇一嚇他的，沒打算打他。這時，范金波他們三個人也上來了。老頭看見我們都圍上來，有點怕了，就站住了。嘴裡又不知道說了些甚麼。我說包是我的，還給我。他不聽，還朝著林場那邊喊。我更急了，要是林場來人了就完了。一急，就去搶那糧包，想搶了就逃。

“老頭一看我要搶，就從塑膠袋裡抽出把柴刀來，揮舞著，嘴裡大概

是喊：不要過來啊，要不就劈死你！

“我沒怕，心想，你拿我的包，還拿刀砍我，哪有這個理？就拿棍子打過去，打中了他的右手，刀‘噹’地掉在地上。我就撲上去搶他的刀，他手快，拾起刀就向我揮來。猛地，我感覺手指頭像給螞蟻咬了一下一樣，一看，給削掉了一截了。

“我本來沒想打死他的，這下火就起來了，我就喊：打死他，打死他！又一棍，打中了他的頭。”面對審訊員，官文烈一一交代了當時的情景。

“他倒下了沒？”審訊員追問。

“沒——他還挺著。”

在打鬥中鄭良才也被砍傷，戴意友趁機爬起來，跑向林場。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一看，老頭跑了。一定是回去報告，就又喊：快抓住他，不能讓他走！我們三個就一擁而上把老頭又摔在地上，老頭這時已經跑不動了，我奪過柴刀，砍向他的頭……”

关于表彰追捕偷渡杀人犯有功

的单位和人员的决定

当前，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县广大军民决心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进行垂死挣扎。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中午，偷渡杀人犯官文烈、郑锦安、范金波、郑娘才，潜至我县龙华公社阳台山，被我龙华公社龙华大队民兵、养蜂员戴意友同志发现、追捕。但是，这一伙丧心病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抗拒追捕，竟敢行凶杀人，把戴意友同志连砍十七刀。官犯等以为戴已被砍死，便毁灭罪证潜逃。

案件发生后，驻我县边防部队，积极主动，领导亲自指挥，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我县的公安干警，

寶安縣委對龍
華大隊民兵戴
意友追捕偷渡
犯立功給予表
彰的決定

“我那時性起，人也瘋了。還有，我不砍死他，他就要去報告，我們就跑不成了。反正是你死我活了。”

一個要報答黨恩，一個要尋找幸福。

在“階級鬥爭”的驅使下，兩個素不相識的人變得水火不容。

問：“砍了多少刀？”

答：“我記不得了。”

問：“手發抖嗎？”

答：“不抖。開始還有點，後來就不了，砍下去軟軟的，就像是砍棉花一樣。”

問：“砍了以後怎樣？”

答：“用腳踢了兩下，沒動了，估計是死了。就對其他人說，死了，我們快跑，誰也不准說呀。我想跑過河就沒事了。”

丟下戴意友，四個人拼命往深圳河跑。

——

天黑了，一個巨大的包圍圈，開始向他們圍過來。

命大的戴意友並沒有死，一陣山風又把他吹醒了，竟還能呼救。

據寶安縣委的文件記載，戴意友被送到龍崗鎮人民醫院後，有關部門迅速在全縣佈下了抓捕殺人犯的天羅地網——邊防部隊、公安、群眾共四千七百多人，在寶安縣委的指揮下封鎖邊界，圍山搜捕。

這可能就是港報所說的“四千多軍警與四十多名偷渡群眾血戰”的故事。

我問老公安：“後來真的與官文烈等四個人發生了血戰？”

“沒有。香港的右翼報紙總是誇大其詞，根本談不上有甚麼血戰。他們沒有吃東西，後來餓的根本不行了。”

“後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這要問 5443 部隊。”

5443 部隊是駐紮在寶安縣的邊防軍。在採訪中，已退休的作戰參謀仔細回憶了邊防軍參加搜捕的經過。

“我在晚上八點四十分接到寶安縣公安局馮、羅兩同志的電話，說有四偷渡犯殺人後畏罪潛逃，可能還沒有到達邊界，請求部隊派出警犬支援。我迅速把情況向團首長作了彙報，首長命令立即派出引導員劉慶生、王義詩、劉家興，攜了兩隻警犬前往增援。

“我們趕到寶安縣公安局的時候，縣委副書記，還有龍副局長早在那裡等了。他們顯得很焦急，說全縣都動員了，但是山高林密，不好追捕，有部隊，事情就好辦了。當時分析，殺人犯可能走得還不遠。但要防止他們進入沙河一帶後，從深圳灣海上偷渡。

“晚上十點多的時候，我們正商量往哪條路上追，突然有消息傳來，說沙河方面，有人在看電影回來時，發現塘朗山上有兩個人影，趕去看就不見了。

“我們分析，可能是殺人犯已經進入沙河附近。

“沙河離深圳灣很近了，我們最擔心的是他們游水過海。現在關鍵的是要把他們攔在山邊上，避免他們進入沙河一帶。不管怎麼樣，先把那兩個黑影抓到。

“當晚 23 時 40 分，我與公安局邊防科廖科長引犬趕至沙河民兵哨卡。經了解，的確是兩個人，不是四個人。為甚麼變成了兩個？當時分析殺人犯已經分散行動。

“四個民兵打著電筒指引方向，我們的警犬在前面帶路，往塘朗山上趕。林又密，路又黑，好容易趕到了發現兩個黑影的地方。

“警犬‘嗯——嗯——’在路邊嗅了幾圈後，猛地就朝灌木叢中竄去，緊接著聽見一聲女人的尖叫聲。

“我們趕到時，發現一男一女嚇得縮成一團躲在灌木叢裡。他們不是那夥殺人犯，是兩個從增城來偷渡的教師夫婦。

“目標失去了。我們有些著急。

“13 日凌晨，我們與另一個搜捕組匯合了，他們報告說，殺人犯是逃不脫了，幾千軍民已經把羊台山一帶圍得水泄不通。還帶來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據沙河的民兵反映，在山上發現有四個人的身影，估計就是他們。方位還在塘朗山一帶。

“我們又有了追蹤方向。

“13日7點10分，我們搜捕到塘朗山南的一個山坳裡時，兩頭警犬表情異常。一陣狂吠後，都朝樹叢中奔竄而去。

“很快，我們聽見樹叢中有嘶打的聲音：警犬發現目標了！

“我們趕過去，發現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後來證實是鄭錦安——作者註）正操木棒與警犬搏鬥。我們對天鳴了兩槍，命令他：‘放下——’他怕了，把木棒丟在地上，然後束手就擒。

“接著，草叢中又站起來一個人（後來證實是范金波——作者註），也舉起手。

“我們把他們丟在地上的東西翻出來看：一袋乾糧，一瓶紅藥水，還有四塊用來當雨衣的塑膠布。

“這時，突然又聽見警犬發出兇猛的叫聲，飛也似的朝山頭上竄去。

“山頭上猛地站起來一個瘦瘦的小青年（後來證實是官文烈——作者註），他用普寧話大聲向同夥喊：‘良才，快跑，狗來了——’

“這人便揚著一根木棍，主動迎上來阻擋警犬，掩護另一個青年（後來證實是鄭良才——作者註）向山下跑。

“當然，這一切都是白搭。一個餓得皮包骨頭的小青年能擋得住我們？

“聰明的警犬不撲拿棍的青年，卻直奔逃向山下的青年。

“那拿棍的還想攔犬，一個民兵跑上去，一槍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

經數小時的緊張抓捕，四人均被捕。審判時四人都供認不諱。問人是誰殺的，都說是一起動手的，沒有誰先誰後。

但經分開審訊，兩天以後事件的前後經過就都清清楚楚了。

四、群眾齊喊：殺、殺、殺——

他知道不行後，哭了，流著淚，沒再說。執法人員又問他還有沒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飽飯，有肉的。”他說這些年根本就沒吃過一頓飽飯，死了，也要放開吃一頓！

事件結束後，寶安縣委決定在全縣範圍內，開展學習老民兵戴意友的活動。而為了“擴大影響，起到教育群眾的作用”，寶安縣委要求公檢法部門走群眾路線，到戴意友的家鄉龍華公社龍華大隊去，徵求當地群眾對判刑的意見：看殺還是不殺。

首先請到的是戴意友的親人——愛人、三個女兒，要他們表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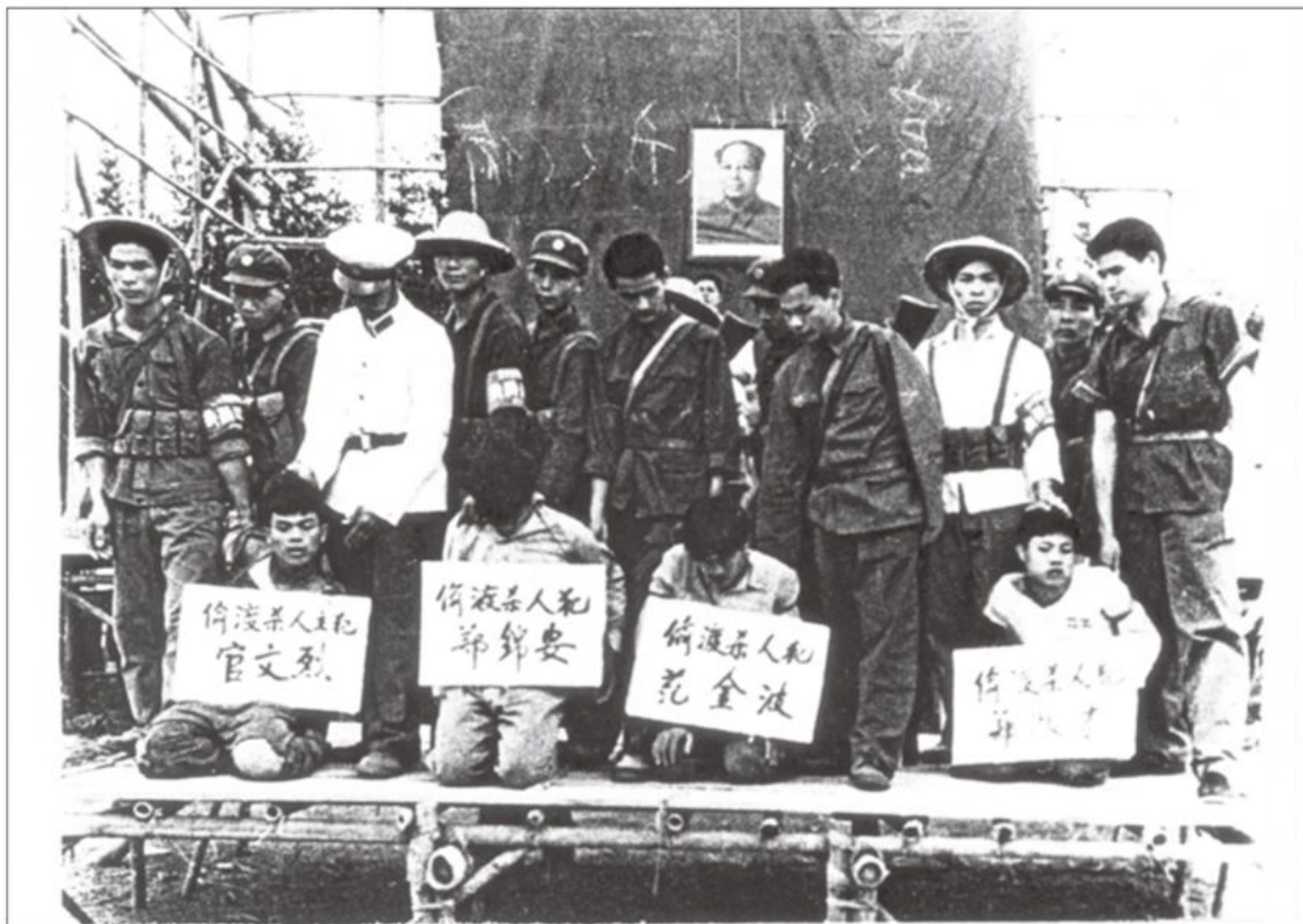
據說早在此前，四個偷渡青年的家人都從家鄉趕來了，哭哭啼啼向戴意友的親人們求情，想讓他們說別殺，留四個青年的命。

果然，家屬表態時，都沒說要殺：“老頭子的命保住就行了。殺不殺是政府的事。隨政府吧，我們沒意見。”

又問家屬有甚麼要求，他們說，就是想讓政府把那四個壞蛋押來，讓他們看看是甚麼樣子。

人，對未知是有好奇心的。

床上的老頭戴意友的表態也差不多：“我又沒有死，沒讓他們過河我就甘心了。判甚麼？隨便吧。”很隨意。



佈告上的照片：三個年輕的偷渡者被判刑，官文烈（前排左一）被綁赴法場槍斃。

在群眾大會上，群眾的表決卻完全不一樣了。當大隊幹部問激動的群眾：“大家說，殺不殺啊？”台下齊喊：“殺、殺、殺——”。

“同意殺的請舉手——”大隊幹部接著說。

台下支支胳膊高舉如林，如同羅馬角鬥場中對倒地者的判決！

“全體貧下中農通過，殺！”大會主持人宣佈。

最後判處官文烈死刑，其他三人判無期徒刑。

當然，這也符合上頭的精神。當時上頭有指示，暴力對抗是必須鎮壓的。

大凡要被槍決的犯人，在臨刑前都會被問：“你還有甚麼要求沒有？”

據老公安說，當時官文烈提出了兩個要求。

第一個是想見一見他奶奶。

這要求當時就被否定了，沒有同意。奶奶年紀太大了，又有病。這麼遠的路一折騰，難保路上不出意外。

他知道不行後，哭了，流著淚，沒再說。執法人員又問他還有沒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飽飯，有肉的。”他說這些年根本就沒吃過一頓飽飯，死了，也要放開吃一頓！

食堂真的給他端來了一斤六兩米的飯，滿滿四個瓦鉢。就這麼個精瘦的小青年，竟一口氣全吞了下去。

至於肉，那是沒有的。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長的兒子，書包裡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餓肚子。當官的做百姓的，所有的人都一樣。

“嘭——”幾天後山岡上空發出一聲清脆的槍響。

官文烈年輕的生命結束了！

——

深圳河，依舊不捨晝夜，繞了幾個圈，帶著血水和淚水，平靜地朝南流去……

尾聲：從大逃港到大開放

一、“群眾外逃，我們總得想個法子呀！”

那時節，“沙沙沙”，十幾個青年男女一字兒排開都跪在了沙灘上，含著淚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們送公安局吧。讓我到方書記面前去丟人吧！與其在家鄉憋死，不如讓你送監牢關死……”

望著旋起一輪輪漣漪的河水，寶安縣縣委書記方苞陷入了沉思……

1978年，粉碎四人幫的驚雷響過了，新的一頁翻開了，萬物復蘇。深圳卻依然深陷在“偷渡風”的漩渦中。

他來寶安工作了多年，擔任過公安局局長、政法書記，現在又做了縣委書記。但年復一年，歲歲反偷渡，為甚麼偷渡就是治不了？

20世紀60年代初期，寶安縣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口號，執行“三個五”政策，得到了陶鑄的支持。幾年後，寶安的人民度過了經濟最困難的日子。誰知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而來，縣委書記李富林被關進了監獄，“三個五政策”被指為“崇洋媚外”，再不許農民過河去做生意，連養幾隻雞也要挨批鬥。方苞自己也被紅衛兵批鬥、“勞

動改造”。寶安縣冷清了，農民又開始喝蕨根糊糊，吃番薯根根……

結果，外逃風又起來了。

他不明白上面的政策怎麼總是擺來擺去，要是這樣下去，寶安的老百姓能過上安定的日子？能不跑嗎？

有一個保守的數字，即使是這個“保守”的數字，也令他著急——1962年，寶安縣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數是12144人，1978年寶安縣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數是17456人。方苞心裡知道，報上來的這個數字，還遠不是實情。真正跑走的人可能還多。有一個統計數字可以作參考：寶安縣有30萬人，而在香港的寶安籍人呢，也近30萬，哪來的呀！

深圳河邊的一些村莊，男勞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動的老人、婦女。有個生產隊只跑剩一個跛子。而在蓮塘村附近的一個村落中，竟有一位70多歲的老嫗也鑽過鐵絲網偷渡到香港去賣針線了。弄得他上任後的頭號任務就是組織機關幹部、國家職工，包括飲食店的“娘子軍”們，堵截那些要跑到“資本主義陣營”裡去的“叛逆者”。

為了反偷渡，縣委不知道想過多少辦法：1974年，縣裡組織了一千多人的幹部隊伍，下到農村各公社、各大隊去，幾個幹部負責一個隊，一隊之中，有人跑，拿隊長是問；一家之中，有人跑，拿老公是問，罰穀，餓肚皮……結果呢，人還是跑，地還是荒。你有啥法子？法不治眾。跑的人多了，你罰誰的穀呀？

他也想盡了辦法，做思想工作。縣委幹部輪流下鄉，同農民一起在田



方苞（原寶安縣委書記、廣東省政法書記）對作者說：“改革開放是人民群眾和歷史的必然選擇。”

裡勞動，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床。苦口婆心，勸了又勸；新舊社會，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謂不細緻、不深入。

當你佈置反偷渡任務時，那些隊長呀、支書呀當著你的面一個勁點頭，“行！不會跑的。”“不能給社會主義丟臉，方書記你放心！”

反偷渡的晚會開得多熱火！那些粵劇團、文藝小分隊編的《××× 餓死香港街頭》、《××× 大義滅親》等節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輕媳婦上台發言，要召回逃過河去的丈夫的場面，何等感人！還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決心：“永跟共產黨”、“十二級颱風颳來都不走”……誓詞何等堅決！你能說，是裝出來騙他方苞的？不是，絕不是！

然而，最後他們都還是走了，摸著月黑風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們再也記不得“黨的恩情”，再也記不得幹部如何同他們睡在一個床頭，吃的一鍋飯；再也記不得工作隊是怎麼苦口婆心地留他們；再也記不得他們曾經雙淚橫流立下的誓言！

縣委的工作還不出色，做得還不好嗎？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崗公社東方大隊的那個支部書記，他永遠記著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個祖孫三代的貧農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實又善良。他們隊還是全縣反偷渡的典型隊呢！方苞還想用他來做教育全縣的樣板，平時同他一起開會，一起下田割禾，比親兄弟還親。但是就連文治祥，後來也背著他逃港，終於被公安部門抓起來了。

“你怎麼也這樣呢——”從廣州趕回的方苞望著監牢中流著淚的文治祥，說不出有多難過，“老文啊，黨白白教育了你 20 年啊！”

“方書記——”這個四十多歲的漢子竟然捂面大哭起來，“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你！”

“算了！你還策劃，你還放人呢，你讓我拿你怎麼辦嘛！”方苞生氣地說。

策劃逃港是要判刑的呀。文治祥心裡能不清楚嗎？有句話到了嗓子眼了，就是不敢向方書記說：

方書記啊方書記，咱不能睜著眼不看群眾的生活哇！你說我們河這邊的社會主義“風景獨好”，河那邊的資本主義“一天天爛下去”，可別人

爛了嗎？沒啊。人家吃甚麼？牛奶、麵包，咱們吃甚麼？喝粥、吃鹹菜根根。看著鄉親們受苦，我心裡疼啊！

你怪我策劃偷渡，那是怎麼回事你知道嗎？那天夜裡，十幾個青年正要駕船逃跑，槳還沒動呢，我領著七八個民兵趕到了。“不許動！”槍口對準了自己的親人：侄兒、兄弟……那時節，“沙沙沙”，十幾個青年男女一字兒排開都跪在了沙灘上，含著淚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們送公安局吧。讓我到方書記面前去丟人吧！與其在家鄉憋死，不如讓你送監牢關死……”

我的心酸了，我的眼淚快出來了！

一邊是跪在地下的自己的親人，另一邊呢，是黨紀，是國法！

我是黨員，我擔在肩上的的是黨交給的反偷渡任務，黨性重於泰山。但我又是他們的親人，我是叔父，我是兄長，我更是大隊支書，是他們的當家人，我有責任要讓他們過上好點的生活啊！

為甚麼，為甚麼此刻黨性和親情如此水火不容？

梧桐山的山峰啊，深圳灣上的密霧啊，我分不清誰清誰白。深圳河的河水啊，南海的海水啊，我嘗不出孰鹹孰淡——

罷、罷、罷！讓我一個人來措吧，就讓我文治祥受刑受罰來償還黨的恩德吧。

“起來，起來——”文治祥對跪在地上，把手都背向背後等他捆的十幾個青年扶起說。

“走吧，都跑香港去吧，跑得離我越遠越好——”文治祥背對著他們說，他自己也要流淚了。

十幾個青年一下子愣了，等他們明白過來，便一個勁叩頭：“叔啊，你大恩大德——”“叔啊，我們來世相報——”爬起來，慌慌張張抓起槳就要開船。

“慢——”文治祥說，“西堤邊上設了埋伏哨，你們往東走——”

到這時，文治祥已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吩咐身邊的民兵：回去通知隊裡的老少，要走的，今晚上都走！要快——快上船！

兩天後，文治祥一案被偵破，罪名：有組織偷渡。其實，一點也用不著偵破，是文治祥主動向公安投案的，他從心底裡感覺自己對黨犯了罪！

——

30年後，方苞（右）見到的是原東方大隊支部書記文治祥的兒子文國祥，其父文治祥已在出獄後去世多年。



梧桐山上，風，依然在輕輕地吹；深圳河上，水，依然在微微蕩著漣漪……它們溫馨、它們真實，它們叫人清醒、給人教育……它讓一個跟隨共產黨走了幾十年的老黨員，第一次深深地思索共和國走過的腳印！

縣委書記方苞的頭腦中在激烈地矛盾、鬥爭——

他想起最近《光明日報》刊發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得多好啊！說一千道一萬，實踐才是第一的嘛！

過去一直說，“偷渡”是國內外階級敵人煽動的，那為甚麼不但“階級敵人”跑，貧下中農也跑，我們的黨員幹部也跑？不是別人煽動，是我們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動群眾往香港跑嘛！

30年來的逃港風潮，說明我們的政策有問題呀！

他也想早早改變這樣的局面，也想早點來些實際的、能替老百姓著想的政策，讓寶安縣人民過上好點的生活。但是，難啊……

他記得，與他共事多年的辦公室主任周煥東曾悄悄問他：“方書記啊，現在都搞撥亂反正啦，咱們這反偷渡是不是也該撥一撥，搞點放寬……”

但是，能行嗎？

謹慎的方苞看了周煥東一眼：“別亂說——”心裡卻在嘀咕：小周啊，我也有你的想法，但這可不是小事啊，這麼大的事情，上面沒說，是你我敢“反正”的嗎？

——

正當方苞和他的助手們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時，鄧小平來了，到了廣州！

二、鄧小平的話是甚麼意思？

半晌，鄧小平揮了一下煙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稍過半刻，他又說：“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廣東省經濟的王全國突然接到緊急電話：“速來南湖賓館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臨行時帶好有關材料。”

中央領導同志來了，是哪位中央領導同志啊？後來他發現去的人還有王首道、焦林義、李堅真、劉田夫、吳南生等。

會議室中傳出一陣陣輕微的對話聲，其中一個帶著濃厚的四川口音。難道是他來了？是鄧小平？王全國心中一陣陣激動。

王全國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是作為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的，沉寂多年了。三個月前，在北京的工人體育場舉行的一場足球賽中，他突然出現在看台上，引起群眾一陣陣排山倒海的掌聲。沒想到僅僅三個月，他就來廣州了，就來摸情況了。

當時的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聽到門口的腳步聲便招呼道：“快進來——坐，坐。”

這是一間剛由部隊交給省革委的賓館，房間很大，顯得有點空蕩，擺了幾張沙發。鄧小平正坐在沙發上，與韋國清說話。

彙報會很快開始。

“全國，你說說——”聽了其他人的彙報後，韋國清點將。

王全國談的主要是經濟，他從廣東是僑鄉，又毗鄰港澳等有利優勢，談到在粉碎“四人幫”後，全省正加緊恢復經濟，但百廢待興，問題依然不少。廣州市場供應緊張，老百姓說我們“四季常青吃菜難”，“海岸線上吃魚難”，“邊防寶安一帶，偷渡外流嚴重”。

“跑了多少人？說具體數字——”韋國清也許是在有意提醒。

“據彙報上來的數字是——”王全國翻著材料，“194274人。”

鄧小平不說話，他聽著，靜靜地抽著煙。

“老百姓也有說法，”韋國清插話對鄧小平說，“他們說生活太苦，河那邊經濟發達，兩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難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房間中所有的人，從鄧小平到在場所有的廣東省的領導，都在為這件事情焦心！

“我們加派了部隊，”韋國清接著說，“也沒解決問題。”

半晌，鄧小平揮了一下煙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稍過半刻，他又說：“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小平同志說的是甚麼意思？

政策有啥問題啊？哪裡出錯了？為甚麼外逃的事部隊都管不了？那會交給誰來管邊防呢？

鄧小平兩句話很快傳達到寶安。方苞和縣委一班人開始沿著鄧小平的思路往深處想……

“當時我們的認識水平也有限。”方苞回憶說，“那時能想到的，只要能再給寶安縣來個‘三個五’就好了，我們治理外逃就有辦法了。”

縣委搞經濟的李廣鎮卻看到些苗頭：從這話看，可能政策要調整呢！

但是，新的政策會不會真的來呢？

新的政策沒有來，一位新的省委書記倒是真來了。

他就是曾被打成“反黨分子”，剛剛平反出山的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

——

習仲勳一上任，就提出去寶安縣。

省委書記來調查了，好啊。

方苞和李廣鎮等人都感到：機會來了！

三、省委書記與大隊支書的一場辯論

“習書記，你也是吃過苦的，所以，我才對你講了這些真話——咱們共產黨政策要還這樣下去，還不改，人都會跑光啦！”

“不聽彙報了——”習仲勳擺擺手，對圍著他的一大群縣委幹部說，“別都圍著我。你們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這——”他拍拍腿桿子，“同我下農村去——”

本來，寶安縣委想對這位遭受過迫害的老一輩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準備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產，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蠔的生產……

監獄的生活卻告訴這位省委書記，那些“陽光”下的東西恰恰是不用看的，會看的領導要看陽光背後的東西。

“你們第一書記叫甚麼？對，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領我到你們最亂的農村去看，哪兒最亂去哪兒——”

方苞琢磨：這可是來了個“石”（實）書記呀。那就領他去沙頭角一帶看吧。

汽車沿著邊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無際的蘆葦，蘆葦叢中，不時傳出來警犬的叫聲。

習仲勳拉開窗簾，從車窗望去，蘆葦地上蹲著幾個衣服襤褸、像叫花子一樣的農民。

“你們又抓人啦？”習仲勳對抓人特別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們。”

三個農民被反綁著手蹲在地上，旁邊兩個揹槍的民兵跑過來敬禮：“報告首長，偷渡的，剛剛抓到——他媽的，看你還跑！”順勢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腳。

“哎——你怎麼踢人啦！”習仲勳喝道，“你們要訂個制度，不准打人。”

“訂了，說了好多遍了。”方苞趕緊回道。

“好多遍，好多遍就要執行嘛！”習仲勳不高興地說，又繞著三個農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把偷渡者解開。

習仲勳看見其中一個青年兜中有個紙片，就抽了出來看：“哈哈，小夥計，你還畫逃港路線圖呢。圖畫得挺利索的嘛，讀過多少書啊？”

被領導鬆了綁，又被叫“小夥計”，這青年顯然膽子大了：“報告首長，初中畢業——”

習仲勳看著他厚厚的胸脯：“小夥計，你讀了這麼多書，身體又這麼

壯，留著建設家鄉不好嗎？怎麼還要跑啊？”

“小夥計”沒回答。方苞便向周煥東使了個眼色。

“書記讓你說話啦——”周煥東給小夥子“打氣”。

“——你是大官吧？”小夥子突然問。他聽出習仲勳說的是北方話。習仲勳笑了一笑：“大又怎麼樣？小又怎麼樣？”

“官大我就說，官小我不說，沒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認識你，你是方書記，跟你說就沒用啦——”

方苞脾氣好，“嘿嘿”地笑了笑，沒呵斥。

“這是省委習書記來啦！”周煥東在一旁提醒小夥子，又在他耳邊加重聲音，“還不大呀——”這話等於說：傻瓜，還等啥呀！

“啊，那我就說吧——”小夥子說。

“你們共產黨天天開會說社會主義好，好在哪裡呀？別人資本主義不好嗎？逃過去的，每月都是幾百幾百地寄回來。共產黨有錢給嗎？我們村那些逃港的家屬，家家都蓋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個逃港青年興頭也來了：“我們在家不跑的，跟你們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過去的交公糧、養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給我們搞個政策吧。”小夥子要求說。

“政策？”習仲勳有點驚愕，“甚麼政策？”

“就是你放我們過去一個人，到了香港後，我們每年給政府交兩百塊港幣。”

——
“真是亂彈琴——”習仲勳坐在車上搖著頭，“你們這裡思想很混亂啊，老方——”他顯然有些不滿意。

“不瞞你說，習書記，我們思想工作也做了，階級鬥爭也抓了，就是沒把這股歪風扭過來，”方苞說，“30年了，還這樣，只能怪我們工作沒做好。”

習仲勳點點頭：“關鍵還是要抓這呀——”他指了指腦袋，“要加強思想教育呀，老方。讓他們同舊社會比比，舊社會吃甚麼？現在吃甚麼？新社會好了，還跑嗎？一比，就清楚了嘛。”

“書記呀，可不能比呀——”在車後排插話的是周煥東，“比不過人家

呀，他們說香港人天天上茶樓、吃海鮮，社會主義卻天天吃番薯根根啲。”

這話很有說服力，書記一時不知怎麼回答。

“不對——”習仲勳突然想起來了，偏過頭來，“那是甚麼？那是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動地說：“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天天大魚大肉啦，我們能去吃嗎？能這樣比嗎？”

方苞一看不對，馬上轉移話題：“書記說得不錯，不能那樣比，還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經把那些逃港較嚴重的大隊的支書都召集起來了，現在正在辦學習班呢，就在黨校。已經集中三天了，習書記要不要去看看？”心細的方苞又在盤算著。

聽說辦了大隊支書思想教育學習班，習仲勳換了語氣：“這就對了嘛，那我去看看，給他們講講當年的艱苦生活。當年幹革命，比現在艱苦得多呀，革命隊伍中的人為甚麼不跑，為甚麼國民黨隊伍的要往共產黨跑？”省委書記還是很開明的：“當然，他們有意見，也可以提，我也聽，調查嘛——”

“他們的意見很右的啊，首長，”方苞似乎有點擔心，“就擔心衝撞了你。”

“哎——你這就說錯了。共產黨員就是要聽不同的意見嘛，聽不進反面意見的人，再英明都會犯錯誤——”這位當年的中央委員話來得很遠。

一進教室，習仲勳就感覺情況有些異樣：這批支書，對把他們集中“開學習班”，看來心裡有意見。昏暗的燈光下，東一團、西一堆。省委書記來了，沒有掌聲，一些人連身子都不轉過來。

這批臉龐黑紅黑紅，一看就知道是舊社會受過苦的人，怎麼對共產黨的感情就這麼“淡”呢？

但習仲勳是做“足”了準備的。看見隨來的保衛人員還帶著槍，習仲勳揮揮手：“你們都出去——”

氣氛輕鬆多了。習仲勳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隊”的支部書記移了移，更近了。

“大家放鬆點，學習班很快就可以結束。明天最後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讓大家早點回家。”方苞大聲對大家說。

看大家都在望著進來的生人，方苞便介紹說：“這位就是習書記，省

委新來的書記。習書記來，不是來為難大家的，是來看望大家的。決不延長散會時間。大家心裡有話，也可以抓住機會說。你們知道嗎？習書記本人就是受過四人幫迫害，坐過牢的。”方苞特意把後面幾句話加重了語氣。

下面開始有點騷動。

方苞又說：“大家放心，習書記說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辮子！”

“三不”下去後，下面似乎有人想說話，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習仲勳只好伸下頭去，問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漢子：“你哪個大隊的？你先說說，為甚麼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那漢子苦笑搖搖頭，反而側轉頭，用廣東話對旁邊的人說：“呢個嘢啊——好難講啦！”

“甚麼？他說甚麼——”習仲勳著急問，他不懂廣東話。

方苞解釋：“他說，這話不好講。”

習仲勳說：“有甚麼不好講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還



1979年，習仲勳（左二）夫婦在寶安縣。

不夠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輕人。

但還是沒反應。

“大家放鬆，剛才方書記說了，我也是受過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時大家講的很多話都是虛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來的嘛，哪能怪你們呀？我這次來，就是想聽你們說實話，說錯了不怪你們。你們給我說實話，逃港到底有沒有辦法治呀？”

也許是省委書記後面這番話掏了“心肝”，這時，屋角上傳來個悶聲悶氣的聲音：“我看，不要治。”

“甚麼？不要治？”習仲勳有點奇怪，仰起頭往後面看。

方苞也感到奇怪，怎麼這樣回答省委書記？學習班學來學去，倒學出個“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嗎？”習仲勳脾氣好，忍下了，他儘量和氣，想聽聽這人會說些甚麼。

這人約摸四五十歲年紀，一臉的“老農皺”。報紙捲著煙葉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緩緩地一閃一閃。

“讓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別人做甚麼呀？”

省委書記奇怪了，怎麼這樣說話？但他還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這些“落後”支書們，腦袋裡到底裝著些甚麼“花花”。

“香港怎麼可以隨隨便便去呢？”習仲勳和藹地問，“政策也不允許的嘛！”

“憲法不是說居住自由的嗎？”老頭突然蹦出一句，“是我們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呀——”

省委書記顯然沒想到他會這樣說，有點激動了。應該說，這位大隊支書的話，很有“殺傷力”。

“你……怎麼這樣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是啊，20年黨齡。”硬邦邦地頂回來一句。

習仲勳早聽說寶安人不怕官，沒想到會這麼不怕。

“你……你甚麼成份？”他有點火了。

“我三代貧農，土改根子。”

“你……徵購任務完成了嗎？”他再問，顯然想挽回主動權。

“完成啦，我年年超產。”

方苞趕忙貼在省委書記耳朵邊說：“習書記，他們大隊生產上是個先進呢。”

“甚麼先進？”省委書記再也忍不住了，“這種書記還先進？你……你叫甚麼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傳來的聲音堅定而平靜。

半天，再冷冷地頂了一句：“寶安縣福永公社鳳凰大隊，共產黨員文富祥。”

呀，省委書記面前，一點不怕！

這時，這位監牢中出來的省委書記反而沒有發火了。他被這位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氣概所打動：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從嘴上摘下來，在腳下踩滅：“習書記，你也是吃過苦的，所以，我才對你講了這些真話——咱們共產黨政策要還這樣下去，還不改，人都會跑光啦！”

習仲勳沒再說話。這些話已經深深地打中了他。

這位老布爾什維克在沉思，在激烈鬥爭……

兩天後，習仲勳離開寶安，他沒有說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對寶安縣委的人說：“香港九龍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就冷冷清清，很荒涼。你們要下決心改變這個面貌。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經濟搞好了，逃過去的人又會跑回到我們這邊來。”

方苞最關心的還是給經濟政策的問題，希望省委書記能“開口子”。

“我同意你們提的辦法，過去文革搞錯的現在都要改正過來。”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這句話。有了這句話，就可以把以前被錯誤批判的政策都恢復過來，包括 1962 年搞的“三個五”。

20 多年後，也就是 2000 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20 週年的時候，筆者有幸在深圳迎賓館見到了習仲勳同志，問起他為何後來去北京找華國鋒、找



2000年，習仲勳與夫人齊心在深圳迎賓館。（轉摘自《深圳商報》）

鄧小平，反覆向中央要“權”，要求讓廣東在全國發展經濟中當先行官？為甚麼改革開放的決心會那樣大？發展經濟的要求會那樣急迫？

習老的回答讓人深思：“那應該同下面的反映也有關吧。我們共產黨人的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經領我到邊防去看過，好像還開了一個黨員學習班，有個支部書記我印象很深……”

他說的那個“支書”，應該就是文富祥吧！

四、寶安縣等來了“尚方寶劍”

“過去的事就別計較了吧，誰能想得到呢？我們在香港賺的錢，全拿來村裡，人和錢都回來，還是讓我們做村裡人，行不行——”人總是會奔向更好的生活，當年逃港的人如今紛紛爭著搶著回家。

1979年1月，廣東省委準備召開擴大會議。

根據習書記在寶安縣所表明的態度，寶安縣委向省委呈遞了一份報告，要求省委在經濟開放上給予更多的“權”。恢復和擴大“三個五”政策，以治理群眾外逃問題。

“省委擴大會議一開，我就在小組上發言。要求省委放權。散會後，我

又去習仲勳房間門口等答覆，”方苞回憶道，“習書記很熱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這樣催領導，方苞感到有點不好意思。但他沒辦法，沙井、松崗幾個公社來的“情報”說，又有好幾個村有群眾在準備“行動”，要“跑”了。如果早點有政策出台，就能穩定民心。

當時習仲勳就把劉田夫、黃靜波叫過來，讓他們和方苞一起研究一下，儘快解決寶安縣的問題。

方苞繼續回憶說：

“當天晚上，黃靜波就來找我了，說，你們再寫個報告來吧。同意你們把‘三個五’再搞起來，還可以搞大些，門再開大些。你們先代省革委起個草，我們看看，有些甚麼要求，都要寫上。邊境的形勢啦、群眾的呼聲啦，都要寫。他考慮了一下又說，不僅你們那裡搞，將來珠海也會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麥庚安也來吧——麥庚安是當時珠海的縣委書記。

“他一走我就忙著打電話回縣裡。當時縣委管經濟的葉振忠患病了，準備讓年輕點的李廣鎮接手抓經濟，就通知廣鎮快點到廣州來，說他的估計不錯，省裡真的答應要給新政策了。

1979年到深圳任市委書記的張勳甫說：
“改革開放是形勢一步步逼出來的。”



“第二天廣鎮就火急雷急趕到了廣州，我們兩人躲在賓館裡商量了幾條，由李廣鎮起草成文。怕不準確，又找來李富林他們 1962 年搞的老文件看了，對照著改。並且打電話問附城公社的人，看還有哪些政策要補充。最後弄出了一個報告給省委。黃靜波看了很支持，說，你們給一份給珠海，讓他們參考一下，也交上來。”

1979 年 3 月 6 日，廣東省委批准了寶安縣委《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若干規定》的報告（13 條）。

據 1979 年任深圳市委書記的張勳甫回憶（批覆下來時寶安縣已經改為深圳市）：

“13 條”比 1961 年李富林他們提的“三個五”，又有了發展，政策更寬了。不僅允許邊境的村莊與香港做生意，而且還擴大到允許寶安縣的十四個公社都可以這樣做。

如果說 1961 年還只允許農民經營小河鮮、草皮、稻草、吊鐘花等外貿部門不經營的小專案的話，這一次的“對外開放”，擴大到只要是農民完成了上交國家的任務物資，包括豬、禽、魚、鮮果、蔬菜……都可以拿過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

此外，1961 年的留成比例是四六開，即所得的外匯，40% 歸集體（隊），60% 歸國家；1979 年的留成比例則倒了過來，成了 60% 歸個人，40% 歸國家。老百姓得到的實惠更多了。

寶安縣實行這項優惠政策的多達十四個公社、鎮，就是說，在中央開辦特區之前，深圳已經有了一個實行特殊對外政策的地區。其範圍，基本上就是後來辦特區的區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區”靠近了。

1979 年 3 月 6 日，當文件正式下達到深圳各基層時，整個深圳河邊都沸騰了！

此後，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個面向香港，抓活經濟的熱潮。到處種蔬菜、挖魚塘……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 7 萬畝魚塘，改種 7 萬畝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魚鮮運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來。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鍾的農婦，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 條新政

策一來，姓鍾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養豬、養雞，一個人搞不過來了，就寫信給逃港的兒子說：“你們還是回來吧，兩邊掙的都差不多了。”結果兩個兒子都從香港回來了。一家人養了一萬多隻雞，掙的比在香港打工的還多。

而記錄深圳歷史的檔案則顯示，最早進入深圳投資辦廠，“試水”中國改革開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發了財的當年的逃港者。

隨著港商過河，三來一補工廠也辦起來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來。建工廠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來越金貴了。當年逃港的家屬們寫信給丈夫說：“你們要再不回來，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幹部逗樂說：“當年困難的時候，你們往外跑，現在好了，你們又跑回來要分地皮了！”

“過去的事就別計較了吧，”當年逃港的人說，“誰能想得到呢？我們在香港賺的錢，全拿來村裡，人和錢都回來，還是讓我們做村裡人，行不行——”

人們的眼光特別注意到離香港最近，歷史上人跑得多的兩個地方，一個是漁農村生產隊。這裡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從來了“13條”後，再沒有一個人外逃。另一個地方是前面說過的沙頭角鎮。就是這個隨便跨一步就可以過香港去的地方，也沒有人願跑了。幾戶跑過去的家庭，後也攜老帶幼的又回來了。

跑與不跑，邊境線上的羅芳村看得最清楚。一開始，羅芳村村支書陳天樂還有點擔心，“13條”後過境自由了，會不會有人過去就不回來了呢？

為此陳天樂準備了一個小筆記本，專門登記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賣菜的農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來了。

每當夕陽西下，暮靄開始降落到深圳河兩岸的原野上時，他就會緊張地站到檢查口邊，等待村民從香港歸來。每過來一個，就在名字上打個“√”。採訪的時候，他告訴我，那時候，他天天都在祈禱不要發生不回來的事，不然，又會出現像1957年、1962年那樣的情況，剛剛打開的“門”又得關上。

可是，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這回“開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腳了。幾乎每位早晨過河去的農民晚上都滿面堆笑、大包小袋地歸來，

“好哇！”情況上報到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那裡，他一拍桌子，“經濟上來了，老百姓的熱情上來了！”

1979年4月，當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時，滿懷信心的習仲勳決心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鄧小平彙報。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仲勳和王全國等人在會上提出了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問題，並要求劃出一些地方來，搞特殊政策，辦出口加工區。

鄧小平和華國鋒等對於廣東的要求十分支持。

習仲勳特意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廣東省委要求劃一塊地方搞“特殊政策”時，鄧小平對這位當年的陝甘寧特區政府主席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又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年8月26日，在葉劍英主持召開的五屆人大會議上，正式宣告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

廣東省委任命吳南生擔任了創辦經濟特區後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從此，深圳市（寶安縣）變成了深圳經濟特區，擔負起為中國改革開放探路的歷史重任！

一個寶安縣的新的紀元，一個中國的新的紀元，從此開始了！

五、歷史，在隨時光遠去

30多年前，那個僅30萬人的為外逃困擾著的小縣，如今已經變成一個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

斗轉星移。

30多年前，那個僅30萬人的為外逃困擾著的小縣，如今已經變成一個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將達到1.5萬億元，接近新加坡的總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全國第一。



當年冒死偷渡逃港，今日憑身份證可自由去港了。

隨著“深圳試驗”的成功，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迅速推開，中國一轉眼便今非昔比。

30年前，中國還徘徊在經濟崩潰的邊沿；30年後，它的外匯儲備量已雄踞世界第一。

這是怎樣的夢幻般的巨變啊！

寶安縣的老百姓用一句話概括說：全因為有了改革開放！

而那條橫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間，曾經為了跨越它而灑下過許多鮮血的邊界線，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成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鐵將與深圳地鐵在福田口岸和羅湖口岸接通，兩地陸上將直通一體。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佈：將邊境面積縮小七成。深港邊境，慢慢成了一條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體的一項調查顯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來深圳安居買房。深圳和香港的居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連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橋接通——橋下正好是當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灣——兩地海上直通一體。

2009年4月1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許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至於深圳和香港，會不會在可以看到的未來逐漸成為一“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美國學者理查·佛羅里達卻堅持認為，這一定是幾十年後的事實，性急的他甚至已給這個亞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個名字，叫做：香圳！

附

照片中的逃港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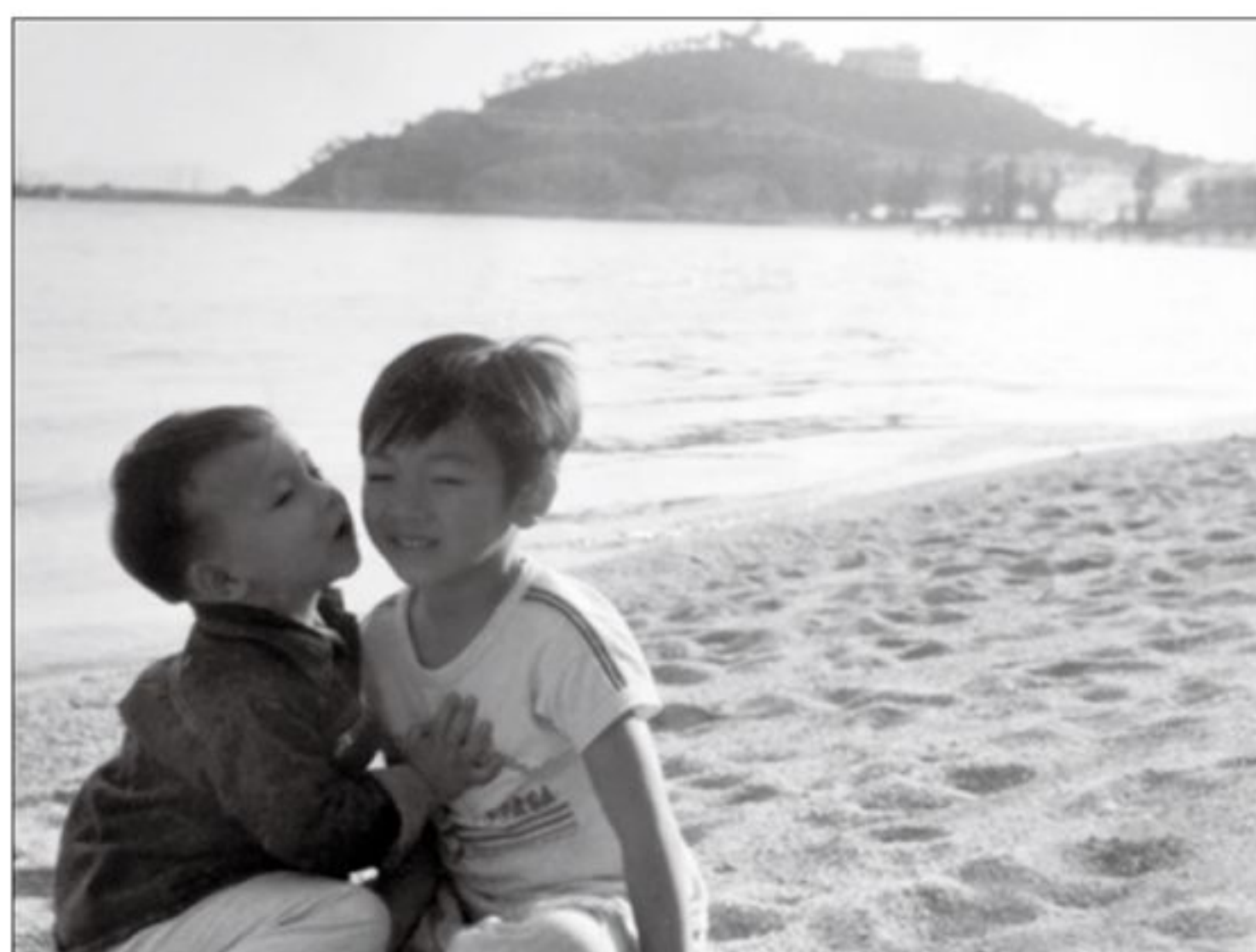
葉劍英在深圳

1979年，在大逃港的高潮時期，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來到深圳與深圳市委和部隊領導人商量“治逃”對策。並到逃港嚴重的深圳灣等地巡視。據說葉劍英明下令部隊不准對逃港群眾開槍，誰開槍誰負責。這是當時的合影。葉劍英（前排左三）、深圳市委書記張勳甫（前排左二）、副書記方苞（前排左五）。



生死一繩（左圖中右一為姐姐周麗珠，右圖中右一為弟弟周少文）

1970年，廣州知青周麗珠和弟弟周少文，在珠江練好水性後，決計逃港。他們在荒山野嶺中輾轉幾天幾晚，忍飢捱餓到達海邊，用一根繩子相互繫住，對父母發誓：姐弟有一人生則同生，有一人死則同死，然後泅水橫渡大鵬灣。經一夜苦泅，終於到達香港岸邊。其時，水性較好的弟弟已經奄奄一息，反是姐姐周麗珠把弟弟拉上岸。



一瓶“益力多”和一位父親的逃港

1979年某日，寶安縣蛇口公社的知識青年歐陽東帶兒子在沙灘上玩。兒子看見一逃港回來的鄉親正吸“益力多”，饞羨不已。歐陽東帶走了孩子，決計逃港。他說：“我要讓我的孩子也吸上益力多！”一個月後，歐陽東成功從深圳灣泅水逃到香港。圖為歐陽東的孩子（右）在沙灘上。



劫後餘生，逃港者在海外建立的家庭。

高燦東（前右一）和李小薇（前左一）從大陸逃到香港後，又輾轉到了美國。共同的命運很快使他們相識、相愛、成立家庭。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不久生下兩個男孩。這是 90 年代大兒子從史丹福大學畢業時全家的合影。（照片提供：汪倫）



扎根在大鑊島上的邊防軍家庭

蛇口的大鑊島，是珠江口一帶逃港的必經之路。1956年，17歲半的王永超（前左）參軍來到了荒無人煙的大鑊島守衛邊防。結婚後又把妻子張桂娣（前右）從惠東帶到了島上。張桂娣在島上辦起了第一所小學，教育漁民子弟愛祖國，反逃港。生下了兩男一女，扎根海島20年。1998年，張桂娣老師去世，逃到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學生紛紛趕回來給“媽媽”送別，靈柩前跪下長長一排，感人下淚！這是王永超、張桂娣與三個孩子，80年代在大鑊島的住屋前留影。



四十多年後，四個逃港的知識青年相約回到海邊。

四個知識青年，逃港的道路各不相同。黃東漢（左二）是利用當民兵的有利條件，划船從深圳灣偷渡到達香港流浮山的。張宇德（右二）是逃港失敗了三次後，第四次在小梅沙海邊下水，天明時成功橫渡大鵬灣，在香港吉澳島上岸的。孫仲勳（右一）也是從大鵬灣小梅沙下水，幸運地遇上順水，經九小時泅渡，到達香港的。關鎮威（左一）更是突發奇想，他不照常理正面逃港，而是在廣州附近下水，順珠江口而下，企圖憑超人的游水本領，進入太平洋後，再返道游入香港，結果在現虎門大橋下的下橫檔島被捕。但他決心不減，日後終於橫渡大鵬灣成功。



“反逃港”文藝宣傳隊隊員“逃港”了。

1969年，蛇口公社成立了“反逃港文藝宣傳隊”，用樣板戲、對口詞、快板等各種形式，宣傳毛澤東思想，號召群眾不要逃港。但是，兩年後宣傳隊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宣傳員（後排左三、四、五，中排左二、四，前排右二）都逃港了。“反逃港文藝宣傳隊”只好解散。這是1969年宣傳隊與駐軍邊防軍三團聯合演出後合影。

逃港者自述

(黃東漢提供)

啊，鐵絲網下的那條小路！

(自述者：香港市民胡向坤)

(一)

逃港者都知道，橫亘在東起沙頭角，西至羅湖，貫穿整個梧桐山的中港邊界，有一條二十餘公里長的鐵絲網，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每到夜間，逃港者就會在梧桐山的多個點上，向這道鐵絲網發起衝擊。

那不算太長的鐵絲網，絕不是今天的模樣，早已被逃港者輪番的衝擊弄得千瘡百孔，逃港者根本不用帶任何工具，因為平均每隔十米左右就有一個可容人鑽過去的破洞。邊防軍在鐵絲網前放一條長鐵絲，上面拴了很多空鐵罐，逃港者一不小心就會弄出響聲。於是鐵絲網前後手電光頻繁閃動，傳出士兵急速追捕的腳步聲、狼狗的狂吠聲和人被狗咬後痛苦的呻吟聲，間或還有一兩下槍聲，難得有一個平靜夜晚。

一般人以為，鐵絲網便是最後的疆界，一旦幸運地鑽過了這道鐵絲網，便萬事大吉，其實錯了，過了約鐵絲網後約 60 米處，還有一條小路（國防公路）。那裡才是防守的重點。聰明的邊防軍正是在那裡設重兵埋伏，可謂五步一崗，十步一哨。

我和兩個逃港的弟兄就是在鑽過鐵絲網後，遇到了這道堅固的屏障，我僥倖逃脫，而我的那兩位弟兄，就永遠留在那條小路上！

(二)

我名叫胡向坤，1954 年出生於廣州，在家中排行第三，原是廣東番禺石壁村人士。1958 年父親因私藏炸藥而被判為反革命。



右一為胡向坤

父親是怎樣私藏炸藥的呢？父親生性豪爽好客，有一些打石工常來我家住。其中兩個在逃港時，遇到海軍追捕，他倆向巡邏艇扔了兩個土製炸藥包，被捕後判為反革命，在審訊中他倆供出了曾在廣州我家住過。於是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刑滿後還要留場勞改。

從 1958 年起 4 歲的就一直再沒見過父親。母親感到一個女人實在沒有辦法養活 6 個兒女，便狠下心來把剛出生的小妹送人，給她一條生路。直到今天，想找回小妹一事，始終是我的一樁心事。

1969 年 7 月，我從廣州二中初中畢業了，像我這樣的反革命家庭成份，城裡能容下我麼？我很快被下放到博羅縣一個專門種植柑的農場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 1973 年，我已 18 歲，我感到在大陸只能做一輩子的“人下人”，就決計逃到香港去。剛剛行動就被場裡發覺了，場裡開了一個千人的鬥爭大會，把我按在地上五花大綁綁起來，拳打腳踢，要我交待罪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只有從這裡逃出去！如果不快走，說不定不知甚麼時候、甚麼籍口，另一個千人鬥爭大會又在等著我。

我回到廣州，與一個有三次“起錨”案底（我們把逃港說成“起錨”）、綽號叫仔仔的何君商量好，冒死出逃。

我倆先在廣州乘汽車到惠州，然後出了城在郊外爬上了一輛南行的貨車。在那個年代，廣東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沒錢的知青爬貨車是平常事，一般人都見慣不怪，都會隻眼開隻眼閉。這輛貨車只走了一會兒就不走了，我倆又爬上了一輛滿載甘蔗南行的貨車。藏在甘蔗堆中，隨著貨車南行了幾十公里，連闖幾道關卡，傍晚時候在寶安縣境內一個叫鎮隆的地方停下來。我們趁沒人的時候跳下車，因為再前行就要靠雙腳上山了。下了車先找個地方躲起來，等天黑了才竄上附近的山，憑藉指南針的指引和星月暗淡的光芒摸黑靠近邊界。

我們的目的地是大鵬灣。白天躲在山上的草叢中，晚上才趕路，終於經過四個夜晚的逃竄，在12月初的一個夜晚來到了大鵬灣的海邊。

誰知一股強大的寒流也到了海邊。那晚不停地下著寒雨，人還未下水就已全身濕透，冷得直發抖，海上波濤洶湧。冒著寒風冷雨，我倆挺著發抖的身軀慢慢走入海中，剛一開始的時候感到還可以，但當海水浸泡到腰部時，冰冷的海水令我倆清晰地意識到，如果今晚勉強下海夜泅，不被淹死也會冷死在海中。

為了保存性命，我倆退回岸上，重新退回了山上。

在山上我倆重新檢查裝備，幸虧剛才下水時沒有扔掉乾糧和指南針，只是乾糧已不多，且已部份被海水浸濕了。我對何君建議：你應該回去。因為我是反革命分子的兒子，農場時刻都在找機會鬥我，已無退路，而你雖有三次逃亡的案底，但家庭成份好，回去沒甚麼大不了。但他堅決反對這樣做，理由是自己已叛逃了三次，回去也沒有好出路，將來還是要再逃，倒不如乘這次一舉直搗黃龍，想不到，他的堅持要了他的性命，以致我倆陰陽永隔，生離死別了。

曾經在梧桐山躲過的人都應該記得躲藏的滋味吧，真的不好受。晚上氣溫降至幾近零度，寒風刺骨。所穿上的雨衣早已殘破不堪，身上的衣服幾乎沒有乾的，在徹骨的寒冷和飢餓中，我病倒了。整天發高燒，人也昏昏欲睡迷迷糊糊的。遭此雙重打擊，如果是平常人這時應該考慮等待下次再來了。但我沒有退路，這時打道回府，農場將會又有一個千人大會等著鬥我，一想到自己被五花大綁跪在碎玻璃上，我就寧願死在邊境也不回去！

第四天白天出了一會兒太陽，我找到一些乾草，我們隨身帶有針線，我把兩件背心縫起來，中間塞滿乾草，製成一件乾草背心。穿上這件特製背心，在寒冷的晚上也覺得暖了很多。那件背心我穿了幾天，直到要鑽網了才把它扔掉。

折返梧桐山西行的第六個晚上，我倆在一處山坡的草叢中潛行時，突然發現在下方約二十米處有一個士兵休息的帳篷，這一發現非同小可：說明我們所處位置離鐵絲網不遠了，鐵絲網應該就在帳篷下方不遠處，邊境不遠了！

於是我倆靜靜地等待機會，躲在草叢中休息。

突然，我發現有一個人影在爬向何君，我便悄悄地跟在那人身後爬，待到相當接近時，便一躍而起，把對方按倒。正當我要動手時，對方哆嗦著說：別動手，我也是偷渡的。

我一聽對方也是廣州口音，便放開了他。大家一交談，原來這個“廣州仔”是7個人一起來的，與同伙失散了。可惜我與這個廣州仔只相處了一天，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廣州仔”背了七個人的乾糧，還有藥品，這對我們來說，真是“天降甘露”！三人飽吃了一頓後，又組成新的團隊，準備向邊境作最後的衝擊。

(三)

從大鵬灣折返的第七天，我們準備行動了。

白天躲在梧桐山上較為高處的山坡上的茅草中，觀察到下方平均五百米左右就有一個帳篷，帳篷後面不遠就是鐵絲網。我們決定從兩山之間的山溝底部爬過鐵絲網。

上半夜我們三人很快就順著山溝爬到鐵絲網前，根據前人提供的“教訓”，我們爬得很慢很小心，盡量不碰到那些串在一條鐵絲上的金屬罐。

果然鐵絲網下方有很多剪開的洞口，我們在茅草遮蓋的地方找到一個破洞，三人很快就順利地鑽了過去。

鑽過了鐵絲網，我們以為就到了香港邊界了。這時，一幅圖景讓我們大吃一驚：

真像是電影中那樣啊，一股強力的探照燈從幾百米遠的大營房頂向四處亂照，強烈的光柱不時掃過我們躲藏的地方。在光影中我們看到了原來前面還有一條窄窄的公路，那才是我們將要越過的最後邊界！

我們所處的位置剛好在兩個小營房之間，不時看到士兵牽著狼狗來回巡邏。從鐵絲網到公路是一片約 60 米左右開闊的平地，而公路之後有一個約 45 度的碎石斜坡，這個斜坡我們估計就是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約有 150 米長，斜坡盡頭是一條小水溝，水溝旁邊就是英方的球形鐵絲網。那裡就是屬於香港的地面了。

鑽過了鐵絲網後，馬上感覺到網前網後的草明顯不同，網前的茅草有一公尺多高，人不容易曝露，網後的草很短，很明顯全都經過人為地剪矮了，人很容易曝露，我們趕快找到一處稍為凹下去，草稍為長一點的地方，全身伏下，頭緊貼著地面先躲起來。

這個時間大約是半夜一點鐘左右，三人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這時要越境就必須衝過這片 40 多米開闊地和公路，滾過那大斜坡，才能到達香港地面，而要衝過去，就得面對狼狗和士兵。

說起梧桐山鐵絲網前後的狼狗，那時真是聲名遠播。由於它視覺、嗅覺敏銳，牙尖爪利，加之速度飛快，所以傷人無數，往往把人咬住了好一會兒，士兵才趕到，發現和抓住逃亡者建功的主要是狼狗。我從平時收集到的情報中知道，早上 7 時正，士兵換更的那一刻，他們會把狼狗短暫地拴起來一會兒，我們三人只有在那一刻沒有狼狗的時候迅速衝過公路，才有成功的希望。

那一晚我終於有機會見證了梧桐山狼狗的利害，躲在草叢中的幾個小時，我就親眼目睹、親耳聽到幾起狼狗咬人的事。

很多鑽過鐵絲網的逃港者，不知道只有早上 7 時才會有拴狗的一刻，因而越近天亮越焦急，終於在黎明前會按捺不住向公路發起衝擊，而天明前是防範最嚴、狼狗咬人最多的時刻。我那晚聽到了多起狼狗的狂吠聲和人狗搏鬥聲，遠處的公路邊有 4—5 次，而最近的兩次就發生在我們的左右斜前方約 20—30 米處。甚至可清清楚楚聽到被咬者痛苦的呻吟聲，那麼近的距離狼狗沒理由不會發現我們，原因可能是一來我們運氣好，二來

那些狼狗實在太忙，去咬他們了，無暇顧及我們吧。

天漸漸亮了，我們變得緊張起來，因為我們知道要衝鋒的那一刻快要來臨了。

天亮的一刻，邊境恢復了少有的寧靜，因為寒流來襲的原因，早上6時多天色還很暗，這時我們已做好了衝鋒的準備，拋棄了多餘的裝備，靜待7時正的來臨。

7時前的一瞬間，在晨曦中果然看到最近兩個營房的士兵正在換更，狼狗此時正被拴起。如果此時不衝，那麼稍後天就大亮了，我們將會無所遁形。

手錶7時正，三人一齊跳出草叢，向40米外最後的邊界——那條國防公路衝去，向著自由世界衝去！

我們以為勝券在握，可我們怎麼也沒想到，這一衝往自由世界的勇敢行動，竟要以生命作為代價。

由於事出突然，我們有可能衝出了十幾米，守軍才發覺。但他們已來不及放狼狗了，也沒有開槍。我想，如果那時軍人開槍的話，我必死無疑，可能軍人自信可在公路上攔住我們，可以生擒就盡量少開槍以免讓英方聽到吧。

三人之中“廣州仔”跑得最快，當時已看不清他是如何滾下斜坡的了，何君先他一步衝過公路，我清楚記得何君開始時是坐著滑下斜坡的，然而巨大的衝力令他後來是翻著跟斗滾下斜坡的。三人之中因為我大病剛癒，跑得最慢，在公路邊一個士兵剛好同時追到，那士兵伸出手來抓我，在千鈞一髮之際我突然一矮身，閃過那士兵的手，也滾進了路邊那三不管的斜坡。

那斜坡坡面全是大大小小容易滾動的石頭，寸草不生。在急速的下滑中，山坡上大大小小的石塊也跟著下滑，一塊籃球般大的石頭擊中了我的腰部，由於多天來的驚恐、勞累，虛弱的軀體在強烈的地心引力作用下再受此重擊，我頓時就暈了過去。

大約在早上十時左右，昏迷了約三個小時的我甦醒過來。發覺自己已身在坡底，雙腳插在坡底的水溝中，而水溝邊就是英方的球型鐵絲網。不

知是水溝的水冷醒了我，還是坡頂的狼狗狂吠聲叫醒了我，這時我感到全身上下特別是背部和腰部劇痛，原來下滑時由於背部緊貼坡面，背部的衣服盡皆磨爛，全身上下尤其是背部有多處擦傷，血跡斑斑，被石塊擊中的腰部，來港後醫治了幾年才治好。

我張目四處一看，發覺好友何君就躺在離我約十米遠處，一動也不動，我艱難地爬過去一看，他頭顱破裂，七孔流血，早已氣絕身亡。再看一下，“廣州仔”倒在離他 20—30 米處，也死了。

此時坡頂上狼狗叫聲甚急，我恐怕狗吠會令士兵發覺再來抓我，便鼓起最後的力量，默默地告別了兩位同行的難友，慢慢地開始爬英方的滾筒型鐵絲網。

英方的滾筒型鐵絲網剪不開，只能爬過去，可一平方寸的網眼就有兩根半寸長的尖刺，整道鐵絲網就是一道佈滿尖刺的牆，可想而知當血肉之軀赤手空拳爬這道刺網時，軀體會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鞋子已不知何時丟失，雙腳已完全赤裸，當我一躍而起爬那滾刺網時，雙手還好，手指可直接插到網眼裡，傷害不大，身軀要緊貼尖刺，但因還有破爛的衣服遮擋一下，只受了少許傷，最慘是雙腳，第一腳踩下去，右腳扎了 7 個洞，忍著劇痛再踩第二腳，左腳扎了 14 個洞，等我爬到網頂滾下鐵絲網時，雙腳早已鮮血淋漓，血流如注，血肉一片模糊了。但我仍要奮力往上爬，我充滿了信心，充滿了幸福，因為我已抵達自由世界！

當我還在奮力向上爬時，一雙香港警察友善的手伸向了我。

事後香港警察對我說，當我們倒在鐵絲網前時，他們就已注意到了，當發覺到我還能自行爬過鐵絲網，就立刻趕過來營救我。

傷痕累累的我終於突破了固若金湯的中央陸路防線，而兩位好友為爭取自由永遠地留在了那條可怕的小路上！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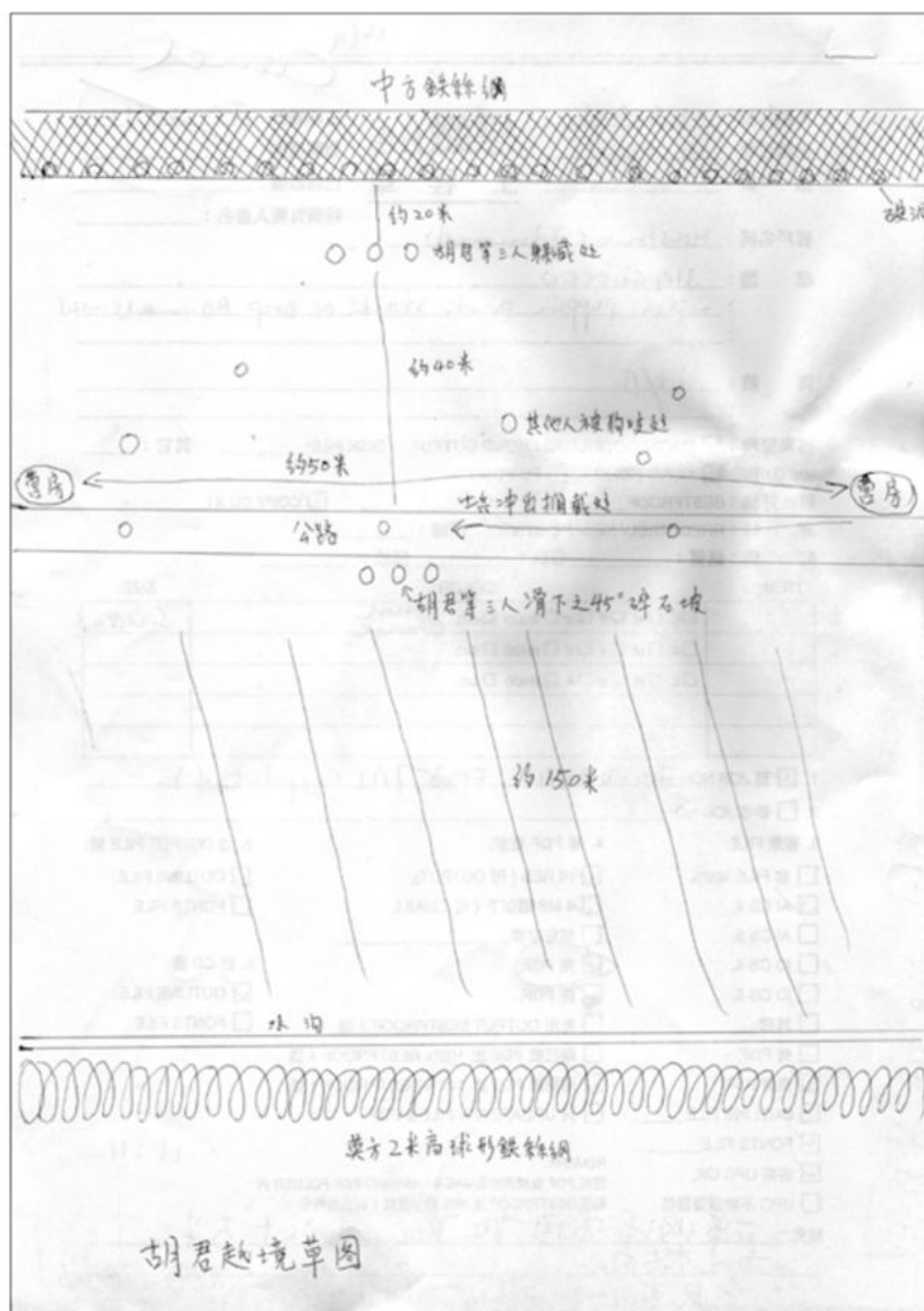
飛出了囚籠的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兩個同伴。從此後，何君的母親就成了我的母親。在不能回大陸的那段日子裡，我每個月都寄錢給她，從不間斷。八十年代開始能回去的時候，我就做起兒子應該做的事來，除了給

錢之外還經常返廣州探望她老人家。

我照顧死去的同伴的母親二十多年，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何母去世。

2011年10月15日寫於香港

2014年11月修改



胡向坤自繪的當年偷渡位置草圖

生死大鵬灣

(自述者：香港市民陳擎國)

(一)

我叫陳擎國，是廣州市人。每當回憶起當年和四名“死黨”（生死與共的朋友）橫渡大鵬灣的一幕，真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那是拿性命去拚出來的成功啊！

逃港，那時是許許多多廣州年輕人的想法。

1970年農曆7月底，籌備多時後，我們準備出行了。這時，我們已在珠江裡苦練了一身好水性，以便橫渡大鵬灣。

出發前的一天，我們的死黨一共十多人，齊聚於珠江邊的大同酒家，為我們送行。大家都知道吃那頓飯的意義是甚麼，都明白此去前途無限兇險，不成功，要麼是葬身海底，要麼是被抓起來送去勞改，難以再見；而僥倖成功了，大家也會天各一方，後會無期。參與這樣的偷渡送別會，所有參與者都有風險，一旦給公安局發覺，肯定以參與反革命聚會論處，但所有參與者都無所畏懼，可見當時嚮往自由的逃亡風在廣東知青中是多麼的盛行。

臨別，送行者紛紛低聲向我們祝福，祝我們一路平安、一帆風順、一次成功。真有點“風瀟瀟兮易水寒”的味道。

(二)

我們翻山越嶺，朝當時的寶安縣去。由於沒有經驗，我們行程緩慢，起程後的第五天，才到了東莞縣一個叫清溪的平原地區。

大約午夜時分，我們4人摸黑來到一條小村附近，突然一股強勁的手電光照到我們的頭上，耀目的光柱把我們的眼睛都弄花了，跟著聽到一聲大喝：“偷渡！一切聽我命令！”，驚呆了的我們幾秒鐘後才看清楚，對方只是一個農民，用一支強力電筒高舉在頭上照著，那農民可能是夜間出來捕田雞的，沒有帶槍，驚魂未定的我們不約而同地向旁邊的蔗田竄去。一衝進蔗田便各自躲藏起來，由於人多，那傢伙也不敢進來抓人。只聽那傢伙嘴裡罵著髒話，在蔗田邊來回穿梭，就是不敢進來，好一會兒，沒聲了，可能是回村搬兵了。

說時遲，那時快，我們4人立即逃離蔗田，越過水田，很快就上了山，我因為起步稍慢，發現十幾個農民，男女老少都有，各持著扁擔鋤頭，亮著電筒已衝過來了。我不敢再跑，就著田基爬下躲起來，追捕的農民就在我頭頂兩尺處跑過，我緊張到連呼吸都差不多停止了，幸虧沒人發現我。

逃離了那條恐怖的小村，一行人跌跌撞撞，日宿夜行，又走了兩天，終於越過了清溪平原，根據地圖，估計已進入了寶安縣東線的山區。

東線的山又高又大，爬到了山上，只要順著大山脊往南走，就可以走到大鵬灣的海邊。這時，風暴陡然來到，猛烈的大風吹過來，人連站都站不穩，我們每人都帶有塑膠雨衣，穿在身上，除了可以防水之外，還可保暖。乾糧沒有了，但煙絲還有一些，肚子餓時唯有在背風處抽一根煙。山上沒有農田，幸好隨處都有野山稔，肚餓時唯有到處搜尋野山稔，一找到就在風雨中和著雨水往下吞。

那場風暴對我們來說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大風中沒有民兵來巡山，讓我們得以在白天一個又一個山頭地攀爬。風暴颳了整整三天，倒是讓我們越來越靠近大鵬灣。

出發的第10天，風停了，梧桐山此時遍佈濃霧，那霧濃得幾十步外就看不見人，我們唯有靠著指南針在濃霧裡亂轉，費了好多時間。

出發的第13天中午，在濃霧中我們攀上了一個山頭，正當我們坐下來喘息時，一幕奇景突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一陣清風徐來，把我們面前的濃霧吹開一條縫，像電影銀幕一樣慢慢拉開，不知道是誰驚叫了一聲：海！

在那短短的一刻中，一望無際的大海出現在我們4人的面前！

(三)

從山上到海邊還有相當遠的距離，大霧中我們沿著一條小路慢慢摸索著前行，我們走得非常的小心，因為知道這是最後一段陸路了，而這最後一段路可能正是防守最嚴密的一段。

果然，我們發現前面不遠處，一男一女兩個持槍民兵亮著手電，一路說說笑笑地朝我們的方向走過來，4人急忙在路邊躲起來。大家緊張到了極點，幸虧那兩民兵只顧著拍拖談情，這麼近的距離都沒發現我們，說說笑笑又走過去了。

大約晚上12點，我們來到離海邊一百公尺左右的一個蔗林邊，我們坐在田埂上稍事休息，作下水前的最後準備。拋棄了多餘的裝備，吹脹了塑膠枕頭，正準備下海時，突然聽到一聲恐怖的犬叫，一條軍用大狼狗不知甚麼時候穿過蔗田，向我們直衝而來。這一刻我們都驚呆了。那大狼狗就站在我們面前，它站起來比人還高，4人一動都不敢動，狼狗竟然用前爪輪流搭在我們身上，用鼻子嗅聞我們的氣息。那一刻，我們都嚇得全身發抖。

由於4人坐著不動，狼狗不能分辨我們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當狼狗嗅到我時，狼狗噴出來的氣息直接噴到了我的臉上，我害怕狼狗會咬我，便本能地用已吹脹了的塑膠枕頭擋開狗頭。這一擋不要緊，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那狼狗不咬我了，突然一張口咬走了我手中的膠枕跑了。好鬼的畜牲啊！它自己不能判明我們是好人壞人，竟咬了此物去讓主子作決定！

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我們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向大海衝去。那狼狗見我們跑，竟然回頭猛追過來。現今看過動物世界的人都知道，猛獸追捕獵物時通常都會專追捕那些較弱小的，我個子小，跑得慢，那狼狗便像箭一樣衝我而來。

我突然急中生智。我知道，它在陸上飛快無比，而我這時已到了海邊，就在狼狗撲向我的一刻，我勇敢地奮身一躍，與狼狗同時落入了茫茫

大海中。別看狼狗在岸上兇猛無比，一旦落了水便威力大減，而人游水比它快。我甩脫它奮力向前游，才幾下子人狗就拉開了距離，它趕不上了。

這時，一個邊防軍人已到了海邊，他竟然沒開槍，而是向狗喝了一聲“回來！”，海中的狼狗便快快地轉回頭上岸去了。

我就是這樣，終於逃過了海邊的這一劫！

身在水中，冰冷的海水提醒我這裡就是大鵬灣，對面就是香港了。我一邊暗暗慶幸，一邊想著，更危險的橫渡大海在等著我們！

(四)

我們互相招呼著，向對岸游去。

這時天空突然出現奇蹟，籠罩多天的大霧突然散去，那晚正是農曆八月十五，天上一輪明月，將大海灑滿了月光。

由於多天來的緊張、飢餓與疲勞，我突然右腿抽筋，水中經驗豐富的我知道，水中抽筋很危險，唯有放鬆身體，盡量浮在水面。抽搐中我在月光中回頭一望，還可看到朦朧的山影，而向前看則一片黑暗，不知何處是彼岸。

就在這時，一個吹脹了的塑膠枕頭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原來是我的死黨阿關來幫我了。據事後阿關說，在面對狼狗時，為了大家，我引開狼狗，讓大家得以下海，但失去了救命的膠枕，就為了這一點，都必須幫我。

此後在大海中，我倆輪流使用那膠枕，見證了人世間的生與死的友誼，我們互相推讓、互相扶持與鼓勵。我們都不是雷鋒、王傑、歐陽海式的英雄人物，都不是學“毛著”的積極分子，但我們都有中國人真正的傳統美德！

游著游著，發現前面有大量的白炸（水母），由於風暴剛過，氣溫與水溫升高了一些，所以海面上突然湧現了大量水母，下海的人都知道，水母有很多細長的觸鬚，還會分泌毒素，人會被它的觸鬚刺激得又紅又腫，嚴重時還會破損出血。我們被刺得像被火燒一樣熱辣辣的，但由於疲勞與飢餓，身體本來很冷，水母一刺，整個人反而感到暖和一些，都希望多刺幾下。那次，我們給水母刺得遍體鱗傷，以致從此之後，一遇上水母，我

都會不自覺地叫起來。

大鵬灣實在太寬了，我們經過十多天的攀山涉水，捱過了幾近一星期的斷糧飢餓，來到海邊時，年輕力壯的我們都成了強弩之末，與海水拚搏了兩三個小時後，我們都快要支持不住了。

就在我們快將沒頂之際，一艘艘從大陸來的漁船亮著燈從我們附近經過，我們知道只要大叫“救命”，就一定會被人撈起，撿回性命，但卻前功盡棄。生與死的抉擇一次次在我們面前閃過，為了自由，為了更好地活下去，我們勇敢地選擇了繼續與大海拚搏，放棄了叫人援手的機會。

上天不負這群勇敢而又義氣的人，經過近六小時的拚鬥，天明前筋疲力盡的我們先後爬上香港的一個小島：鴨州。

(五)

八月十六清晨，在鴨州的沙灘上，剛戰勝死神獲得自由的4人感到陣陣寒意，為了增加游速，此時我們每人身上都只剩下一條短褲，幸好沙灘上有很多逃亡者脫下來的衣服，被海浪沖上來，雖已很破爛，但披在身上也可抵擋一下風寒。

天大亮後，我們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步履蹣跚地向島內走去。

島內有一條小村，還有一個小教堂。教堂裡的村民拿出昨晚的剩飯讓我們吃，餓壞了的逃亡者那狼吞虎嚥的模樣把村民都嚇壞了，村民怕他們會噎死，讓他們吃了一點就把剩飯奪回。唉，真正的飢餓，只有我們這些死裡逃生的人才知道。

中午，一條水警輪開過來把我們接走了。原來那時每天香港水警都要巡邏大鵬灣，拯救那些溺水而來的逃亡者。不久我們就順利進入了香港市區，並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證。

投奔自由成功了的我們，從此展開了漫長的“洋插隊”，也就是在香港打拚的生涯。

多少年過去了，雖然在工作和生活上都遇到不少困難，然而有甚麼困難可難倒跨海而來的我們呢？憑著兩隻手，我們從無到有，慢慢過好了生活。

大陸改革開放後，我回廣州買樓、結婚，如今一家早已在香港團聚，每月在廣州還有不菲的租金，當年跨海而來的生死朋友，都過上了寬裕優遊的日子。

我沒有忘記當年“風瀟瀟兮易水寒”、在大同酒家送我走的那些朋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不能回去的日子裡，我差不多每個月都會寄 200 元港幣給滯留在廣州的“死黨”，資助他們的生活，那時我想，如果他們也要“起錨”的話，我一定會幫助他們的。

2012 年 7 月寫於香港

2014 年 11 月修改



照片左一為自述人陳擎國。

後 記

歷史是由誰推動的？由人民。

20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人民“逼”著“推”出來的！

20年前，在深圳寶安縣採訪時，一位曾經逃過港，後來又被村民們推選為村經濟發展公司總經理的朋友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知道鄧小平為甚麼要在深圳辦經濟特區嗎？”我一時語塞。

是啊，鄧小平為甚麼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龍江，在廣西的憑祥，在吉林的延邊……辦特區，而單單選擇了深圳呢？

可以說，長期以來，歷史對這一涉及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重大問題，記述遠不是明晰的。

——

共產主義曾經描繪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宏偉壯麗的圖景，它曾承諾不僅將給社會帶來平等、公正，而且將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人民群眾帶來比資本主義更為豐富的物質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世紀，社會主義無論在亞洲還是歐洲，都取得了廣泛的勝利。

但是，後來的進程卻使人失望，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未能實現對民眾的承諾。即使僅從經濟發展上看，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也是失敗的。

無論是西方的柏林牆還是東方的三八線，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眾寧可以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也要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跑。

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最樸素的話說就是：“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

這一切，對於那些本書提到的一直在邊境前沿與民眾接觸的有良知的共產黨人：陶鑄、趙紫陽、習仲勳、李富林、寇慶延、方苞、張勳甫、吳南生……可謂洞若觀火，看得清清楚楚。實踐的教育使他們比之其他共產黨人早一步覺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脫離舊的思維，在實踐的引導下，成為 20 世紀中國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當年，正是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決肚子要吃飯的問題”，逼著共產黨人想法子。1961 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要政策，提出了開放香港沿邊十四個公社的要求；1978 年，以方苞為首的寶安縣委再次向廣東省委提出開放沿邊十四個公社和一系列的對港開放政策，得到了陶鑄和習仲勳的支援，並發展為外貿出口基地。實際上，即使在辦特區之前，在深圳（寶安縣）也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眾日趨高漲的“逃港潮”一次次地衝擊著“圍牆”，到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要求“對港開放”已成為寶安縣的共產黨員、幹部和群眾內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這種要求的強烈推動下，1979 年 4 月，習仲勳、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願望去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提出給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

此時，可以說即使是鄧小平本人，包括鄧的改革開放戰略的直接實施者谷牧等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裡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

這些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昇華了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辦特區，先搞一塊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歷史，是沿著這樣一條路發展的，而不是其他：從群眾到領袖，從被迫到自覺，從特區到全國，從群眾要求到理論昇華……一場源起於 20 世紀下半葉的復興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就這樣一步步推開了！

沒有百萬人用鮮血演繹出的大逃港，歷史，也許還停留在深圳河的蘆葦叢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說，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所以我說：如果將來要給中國現代歷史劃段的話，顯然，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在沿海的寶安縣，而不在內陸！

比起東歐的柏林牆（成功越牆 5043 人，被捕 3221 人，死亡 239 人，受傷 260 人）、朝鮮的三八線，發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後歷時 30 年的百萬人“大逃港”，時間更長、人數更多、規模更大、情狀更慘烈，對於中國改革者的衝擊和教育也更強烈、更深刻！

可以說，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中，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永遠也無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長期以來，因為種種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歷史卻被深埋著，不能公開。

22 年前，當我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創辦經濟特區的歷史，遠不是平日書本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的時候，我就決計補闕它，我相信歷史總有被公開的一天！

我不聲不響地幹著這件事，從醞釀、收集資料，到下筆寫作、完成此書，前後整整 22 個年頭。

這本書的創作時間這樣長，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難的是人物的採訪和史料的獲得。

就在三年前，有關群眾外逃的歷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家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就是說，我即使能夠得到寫作材料，採訪到歷史見證人，甚至能

夠成書，在這批歷史檔案公開之前，也是不可能公開出版的。

22年中，強烈的使命感讓我一直不願放棄，不斷地準備、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舊村瓦舍、山中小徑，採訪那些逃過港的老農，曾經失去了親人的婦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焱、歐陽東、張樹木、文國祥等一批至今來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後代朋友。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成逃港者，潛入筍崗橋老收容所酷熱、惡臭的監房中，聽逃港者們傾訴對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氣……

當然，有時我也是“不被歡迎者”。就在兩三年前，被採訪的逃港者、被糾纏得甚感為難的檔案管理人員，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我。我理解他們，但我堅信，所有的歷史，包括那些塵封著的檔案總有一天會解密。

這一天終於盼來了。

2007年4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萬兩千多件檔案，有關群眾逃港事件的內容亦在其中。我於是有了讀到更多歷史資料的機會。這也無異於給我的寫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書，也終於可以公開出版了。

感謝上帝：歷史，不該沉於河底！

即使由於某些原因，本書的歷史只能以文學紀實的方式寫出，但其中的人和歷史事實，皆屬真實可靠，有號可對。

本書能完成創作，還得感謝我採訪過的尊敬的長輩、老師和朋友，從習仲勳、寇慶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寶安縣農民萬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關單位：從深圳市檔案館、寶安區檔案館到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以及席軍、張沫清、潘強恩等一大批熱心支持和關心過我的朋友（包括網上給我以鼓勵的朋友），還有那137名樂意談起他們經歷的朋友。是眾多勇敢地站在歷史良心一邊的人們的幫助，使我終於得以完成此書！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記起，22年中，那些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曾經無

私地反思、含淚回憶當年並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寶安縣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李馨亭、周水君、楊譚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看不到我的書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見的未來，這本《大逃港》能給記錄中國當代歷史尤其是記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人們，以一點有價值的參考，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的話，那便是我和我身後的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願了！

——

深圳河邊地下有知的魂靈，現在，你們可以安息了！

陳秉安

2000年8月動筆於深圳錦隆花園，
2009年8月寫成於深圳蛇口春樹里。

1949年後，內地綿延三十年的逃港浪潮一波接一波，這段歷史一直被湮滅。本書作者以記者的身份，在二十多年裡，一個一個跟蹤尋訪大逃港的親歷者，從當時的地方要員到普通百姓，從立功受獎者到因罪受罰者，從逃港後發家致富者到終生窮困潦倒者，真實記錄了從1950年到1979年間發生在深圳河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事件，再現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大變局前夜的這段歷史。

本書自2011年出版後深受讀者歡迎，已經成為常銷書。此增訂本增補了多幅照片和逃港者自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上架建議：當代歷史

ISBN 978-988-8369-53-9

00490



9 789888 369539

WHA0080 HK\$108 NT\$490